



博士学位論文

DOCTORAL DISSERTATION

論文題目: 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研究
(1949~2012)

(日文): 中国共産党の農村政治動員モデルの研究
(1949~2012)

作 者: 李 汉卿

指导教师: 加々美光行 教授

2014 年 3 月 20 日

论文题目：

(中文) 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研究
(1949~2012)

(外文) 中国共産党の農村政治動員モデルの研究
(1949~2012)

作者姓名：李汉卿

所在单位：大学院中国研究科

专业名称：现代中国学

研究方向：中国基层政治

导师姓名：加々美 光行教授

论文提交日期：2014年3月20日

论文主题词：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

一元化建构；嵌入式管控；

协同治理

摘 要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相继登上历史舞台的地主改革派、资产阶级改良派、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分别从自身立场出发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君主立宪的改良道路、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农民革命道路。百余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道路是成功而且卓有成效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不同于前三种解决方案，因而铸造了中国独有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它依靠充分动员生活在下层的农民阶级而获得强大之力量。在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亦是如此。

然而，在改革开放后急剧变革的时代，农村的多元化发展与党的一元化领导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矛盾。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到农村，农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他们开始重视自身权利的保护，较为凸显的是反对地方政府借以“城市化、工业化”的名义来掠夺他们的生产资料——土地。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大量涌现，严重挑战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权威和地位。那么，一个曾经以农民为基础的政党，一个引领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政党，奈何在部分地区受到了农民的反叛，未来的农村治理应该何去何从，如何对待这些曾经以及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这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当前亟待探讨的话题。

基于这种关怀，本文以国家—社会关系和“共同态度性”范式为理论视角，采用历史社会学中运用概念分析历史的研究方法，从政治动员的视角重新审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的农村策略，并着重分析 1949 年以来它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从而围绕当前困局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在考察改革开放前后两种政治动员模式之时，笔者采用分析历史的方法并选取了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在二者的影响下形成的动员体系三个维度来审视之，

试图寻找出形成这两种动员模式的要素。同时，为了更好地揭示两种动员模式的内在规律，本文还选取了该时期比较典型的事件作为个案展开分析，以试图实现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的结合。最后，本文在分析比较两种动员模式的基础上，也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的重构做出了一些思考。

本文的具体内容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 1 章，是本文的导论。该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核心概念、既有研究的综述、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以及内容的相关安排。

第二部分包括本文的第 2~5 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之一。在第 2 章，本文采用分析历史的方法，逐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走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并分析了中共在革命过程中是如何动员农民以获得革命胜利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通过以阶级斗争为内核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发动了农民革命取得了胜利。它也成为了中共重要的政治遗产。

第 3 章主要是对 1949~1978 年间的中共农村政治动员展开分析。在本章中，笔者基于全能主义政治提出了“一元化建构”动员模式的基本观点，并通过大跃进时期河北省徐水县瀑河水库的修建为个案进行了审视。该模式的形成也有深刻的制度与思想背景：单极制度的建立和稀缺资源的控制以及封闭性意识形态。由于该动员模式主要依靠党的官僚化的组织体系进行，因而，我们也可称之为金字塔式动员体系。从动员的性质看，它是一种强制性政治动员。

与第 3 章相对应，第 4 章则主要是以 1978~2012 年的中共农村政治动员进行探讨。从国家—社会关系看，此时中国逐渐形成了后全能主义政治。笔者认为，在后全能主义政治时代中共农村政治动员逐步演化为“嵌入式管控”模式，且借助广东省“乌坎事件”对该观点进行了剖析。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政治与社会变迁以及开放性意识形态的形成是该动员模式产生的制度与思想根源。然而，这种动员模式日益受到多重挑战。中共面对这些挑战也做出了一定的回应，效果也不甚明显。可以说，这是一种过渡型模式。因此，农村政治动员体制亟需重构。

第 5 章主要是围绕着前面所述的两种政治动员模式进行了比较。在本章中，笔者先是从政治动员的构成要素——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手段及动员目标比较了两种动员模式，而后又从议题建构、认同聚合以及动员效果三个维度对两种动员模式进行了评价。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第 6 章，亦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之一。在本章中，笔者借鉴了日本自民党农村政治动员的经验，对于未来中共农村政治动员体制的重构进行了思考。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关键是实现国家对社会的“嵌入性自主”，达到国家与社会共治的局面，而这需要中共在向执政党转型的基础上，培育农民组织以形成农民利益共同体并进行农村公民文化建设，建构政策合意机制以形成协同治理的格局。

第四部分即结语。在这部分，笔者通过反思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的变迁，认为中共是具有调适与发展能力的政党，体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这种调适和发展中，中共也实现了农村地区“动态的稳定”。在未来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过程中，中共依然要继续根据历史时期进行自我调整与发展，还要接受时间和实践的双重检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一元化建构；嵌入式管控；协同治理

要 旨

アヘン戦争以来の中国近代化のプロセスで、地主改革派、康梁を代表としてのブルジョワ改良派、孫中山をはじめの民族ブルジョワ及び中国共産党人は歴史に相次いで登場した。中国が近代化にショックされたのに対して、彼たちはそれぞれに「中体西用」の洋務運動、立憲君主制の改革の道、民主共和の革命の道と人民民主独裁の農民革命の道を自身から提出した。百年余りの歴史によって、中国共産党人が選んだ農民を主体としての革命の道は著しい成功を取たとわれわれは知った。この凄まじい農民革命はほかの三つの道と違って、中国の独特的な近代化の道路を塑造した。中国共産党が指導した革命は空前の規模の農民革命であり、そして、下層の農民を十分に動員したのを通じて強い力を得た。革命時期だけではなく、社会主義建設時期もそうである。

だが、改革開放後の急劇的に変革の時代に、農村の多様化的な発展と中国共産党の一元化指導の間に構造的な矛盾が生まれた。改革開放が農村に進んでいるに従って農民の権利意識がだんだん覚えて、自分の権利保護を重視しはじめて、この著しいのは地方政府が「都市化、工業化」の名で農村の土地を掠奪するのを反対することである。新しい時期に、農村のグループイベント（group events）がよく出たのは中国共産党の農村区域での権威に対して厳しく挑戦している。では、一つのかつて農民をもとの政党、一つの迅速的に近代化の道に中国を引いた政党、どうか部分の農村地区で農民に反対されるか、未来の農村のガバナンス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か、社会主義建設に巨额的な貢献したあるいは貢献している農民にいかが大切にするのなどは、労農同盟をもとの中国共産党に対して目の前に迫る問題である。

この関心に基づいて、本文は国家—市民社会関係とコ・ビヘイビオリズムの理論から、歴史社会学の研究方法で、政治動員の視点によって中国共産党の

成立からの農村戦略を見直すし、1949年以來の農村政治動員のモデルを重点として分析するし、いまの窮地を巡って自分の考えを提出する。

改革開放前後の二つの政治動員モデルを比較するために、筆者は制度、イデオロギー及びこの両者の影響したで形成した動員体系の三つの視点から検討するし、だが、二つの政治動員モデルを検討する時に歴史分析法で二つの動員モデルの要素を探ってみる。同時に、二つの動員モデルの規律をさらによく揭示されるために、本文はまたその時期の典型事件にケーススタディをする。最後、本文は二つの動員モデルを比較的に分析するもとで、新時期に中国共産党の農村政治動員を築き直すのを考えてみる。

本文は四つの部分の内容からなっている。

第一部分は第1章であり、すなわち本文の序論である。この部分は研究の意義と目的、核心概念、文献概要、理論視点、研究方法及び研究内容を要約的に紹介する。

第二部分は第2～5章である。第2章には、本文は歴史分析法で、中国共産党が「農村から都市を包囲する」という革命の道にいかが開いたのをだんだん揭示するし、革命過程で中国共産党が農民をいかに動員して勝利を獲得したのを分析する。毛沢東を代表としての共産党人は、階級闘争を核心としての農村政治動員を通じて農民革命を発動して勝利を得た。これは中国共産党の重要な政治遺産である。

第3章は1949～1978年間の中国共産党の農村政治動員を研究する。本章で、筆者はトタリズム (totalism) の政治に基づいて「一元化構築」の動員モデルの仮説を提出して、大躍進時期に河北省徐水県瀑河ダムの建設をケーススタディとしてこの仮説を検定する。このモデルの形成は深刻的な制度と思想背景もあり、すなわち、一極制度の樹立と希少資源の支配及び閉鎖のイデオロギーである。この動員モデルは共産党の官僚化の組織体系に頼るので、ピラミッドの動員体系と言える。動員方式から見ると、強制的な政治動員である。

第3章に対応して、第4章は主に1978～2012年間の中国共産党の農村政治動員を検討する。国家—市民社会の関係の視点から見ると、この時には中国はポストトタリズム (post totalism) の政治時代にだんだん歩いた。だから、筆者はポストトタリズムの政治時代に中国共産党の農村政治動員モデルが

「嵌入式制御」であると思って、広東省「烏坎事件」をケーススタディとしてこの考えを検定する。改革開放後には農村で経済、政治と社会の変遷及び開放的なイデオロギーの形成はこの動員モデルの制度と思想根源である。だが、この動員モデルは多重的な挑戦を受けてくる。中国共産党はその挑戦に答えるが、効果も大きくない。これは過渡的な動員モデルであると言える。だから農村政治動員の体系を築き直すのが必要である。

第5章は主な内容が前に述べた二つの政治動員モデルを比較する。本章に筆者は先に動員主体、動員客体、動員手段と動員目標などの政治動員の構成要素から二つの動員モデルを比較するし、そのあと議題作り、共識の形成及び動員効果の三つの視点から二つの動員モデルを評価する。

第三部分は本文の第6章である。本章に筆者は日本自民党の農村政治動員の経験を参考して、未来に中国共産党の農村政治動員の体系を築き直すのに思考する。農村政治動員を築き直すかぎは国家が社会に「嵌入式自主」を実現して、国家と社会の共同ガバナンスの局面を達する。このために、中国共産党が与党に転換するもとの、農民組織を育てる上に農民の利益共同体を形成するとともに農村の公民文化を建設して、政策合意のメカニズムを築く上に協同ガバナンスの局になるのは必要である。

第四部分は結語である。この部分に筆者は農村の政治動員モデルの変遷を考え直す上に、中国共産党が調整と発展する能力がある政党であって、強大的な生命力を表現すると思う。自分の調整と発展の中で中国共産党は農村地区の「動態的な安定」を実現する。未来に農村政治動員を築き直すの過程で中国共産党は時代の変遷によって自分の調整と発展を依然として続けて、また時間と実践の二重の検定を受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キーワード：中国共産党、農村政治動員、一元化構築、嵌入式制御、
協同ガバナンス**

目 录

第1章 导 论.....	1
1.1 研究缘起.....	1
1.2 核心概念.....	4
1.3 既有研究.....	8
1.4 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	18
1.5 内容安排.....	25
第2章 政治遗产：革命场域中的农村政治动员.....	27
2.1 理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提出.....	28
2.2 政治保障：党的建设与群众路线.....	51
2.3 动员手段：利益满足、政治鼓动与主体性塑造.....	67
2.4 局部实践：根据地土地改革中的政治动员.....	82
2.5 革命时期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及评价.....	88
2.6 本章小结.....	94
第3章 一元化建构：全能主义时期的农村政治动员（1949~1978） ——以河北省徐水县瀑河水库的修建为例.....	95
3.1 理论视角.....	96
3.2 微观探究：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	97
3.3 宏观透析：瀑河水库修建的制度、思想背景.....	118
3.4 一元化建构：金字塔式动员体系的形成.....	139
3.5 本章小结.....	150
第4章 嵌入式管控：后全能主义时期的农村政治动员（1978~2012） ——从广东省“乌坎事件”谈起.....	151
4.1 研究视角.....	152

4.2 微观解析：“乌坎事件”的来龙去脉	153
4.3 宏观透视：“乌坎事件”的制度与思想根源	181
4.4 嵌入式管控：内涵及其挑战	193
4.5 本章小结	203
第 5 章 改革开放前后两种动员模式的比较及其评价	206
5.1 两种动员模式之比较	206
5.2 两种动员模式的评价	212
5.3 本章小结	220
第 6 章 从革命到治理：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的重构	221
6.1 自民党的农村政治动员——以“不买《读卖新闻》运动”为例	222
6.2 中共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思考	237
6.3 本章小结	258
结 语：调适与发展中的中国共产党	259
参考文献	264
致 谢	292

图表索引

图 2-1 中共组织体系图	54
图 2-2 农会会员证	71
图 2-3 革命时期农村政治动员的基本模式	91
图 3-1 瀑河水库示意图	99
图 3-2 “一元化建构”的政治动员模式	149
图 4-1 乌坎村的社会自治结构	180
图 4-2 “嵌入式管控”的政治动员模式	204
图 6-1 农协的组织制度	226
图 6-2 农协组织体系图	227
图 6-3 农业委员会制度的结构	229
图 6-4 农协、政府与自民党之间的协同关系	232
图 6-5 当前农村社会中秩序与变革的张力	240
图 6-6 内输入的政策过程	251
图 6-7 外输入的政策过程	253
图 6-8 协同治理体制下的政治动员	257
表 2-1 1925 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类型、数量及其对革命的态度	37
表 3-1 瀑河水库大队评比记分表	111
表 3-2 1949~1983 年县及以下的党政机构设置	142
表 5-1 改革开放前后两种动员模式之比较	212
表 5-2 两种动员模式的评价	219
表 6-1 经典群众路线与新阐释的对照	253

第1章 导论

现代化意味着一种特殊的希望。体现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是所有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革命、所有人类曾经拥有的欲望。为了实现任何一种迫切的目标而创造出政治权力，但这种权力并不总是很好地、明智地得到运用。无论方向是什么，争取现代化的斗争赋予了我们这一代人以意义。它检验了我们所珍惜的制度和信仰，它使我们的国家暴露在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市场中。

——[美]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①

1.1 研究缘起

现代化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然而，实现现代化的路程充满了荆棘与崎岖，且各国独具特色，因而也给予了我们侧目观赏的机会。从人类现代化的进程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即内生型与外源型。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现代化，急剧地社会变革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因为在传统社会中逐步孕育的现代性，终有一天会冲破既有制度的藩篱，并创设出一套全新的框架，以维护自身的成长。当现代性破土而出的时候，就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开始。

中国现代化是外源型的。按照李约瑟、黄仁宇的研究，由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发达，而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官僚政治工具，“在农业社会的中央集权官僚管理和货币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体制方面的不相兼容性”^②，并且这个“领取全额薪水的专业管理群体，把行政官职视为等级秩序内完全可以互换

^①[美]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②见李约瑟、黄仁宇：《中国社会的特质——一个技术层面的诠释》，原载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东方文化》，第12卷（1、2期合订），1974年。收录于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本观点引自该书第18页。

的职务。”^①所以，“通用型地方官员的可以互换之原则，意味着专业人才（水利工程师、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总是被搁置一边而很少能身居高职。”^②这就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中国没有货币经济，从而缺乏巨大商业以及需要大额资金支持工业；二是与第一个后果相伴生的，即中国科学技术缺乏进步的动力。所以，1400年前后，一直领先于欧洲的中国科学技术开始逐步停滞甚或落后了。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才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然而，中国是在1840年英国的炮火声中渐渐觉醒的。也就从那时起，古老的帝国开启了它漫长的现代化之路。

在中国一百余年的现代化历程中，相继登上历史舞台的有地主改革派、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中国共产党人。针对中国所受到的现代化冲击，他们从自身立场出发分别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君主立宪的改良道路、民主共和的革命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农民革命道路。百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道路是成功而且卓有成效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不同于前三种解决方案，因而铸造了中国独有的现代化进程。费正清曾这样评价中国共产党，“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以土地为基础的地方权贵，建立起了党的控制，创造乡村一级的新秩序而得以生存和发展起来。”^③邹谠也这样评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从阶级斗争中又引伸出群众的观念，并以它的严密组织和逐渐强大的组织能力，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参与政治，所以在革命的过程，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的格式起了数千年以来第一次的根本变化，农民及贫苦大众下层阶级都变成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不少上升为干部。”^④这两段话都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性质及其方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它依靠充分动员生活在下层的农民阶级而获得强大力量。

在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亦是如此。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

①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页。

②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页。

③[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④[美]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按照革命时期的承诺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小农所有制。然而此景不长，为了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掀起了一场合作化运动及大跃进运动，将农民私有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建立起人民公社体制。该体制的建立为“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战略提供了制度安排。但是这种安排也导致了农村地区长期发展缓慢。

中国的改革开放被邓小平称之为第二次革命。这次革命也肇始于农村，从小岗村的大包干开始，农村地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产生了新的内涵，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人民公社体制随之解体。为了与获得经济自主权的小农生产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开始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尽管这种制度设计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后来却被法律化进而演化成为农村地区的基本政治制度。

然而，该制度设计中存在着一种内生的张力，即：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村党支部与农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强化党的领导背景下，“两委”之间的关系或表现为村委隶属于村支部，或表现为二者之间的对抗。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到农村，农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他们开始重视自身权利的保护，较为凸显的是反对地方政府借以“城市化、工业化”的名义来掠夺他们的生产资料——土地。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大量涌现，严重挑战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权威和地位。

在改革开放后急剧变革的时代，一个曾经以农民为基础的政党，一个引领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政党，奈何在部分地区受到了农民的反叛，未来的农村治理应该何去何从，如何对待这些曾经以及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这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当前亟需探讨的话题。

应该说，中外学者对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及其成果颇为丰富。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政治动员的视角重新审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的农村策略，并着重分析 1949 年以来它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从而围绕当前困局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1.2 核心概念

本文所涉及的概念主要有三个，即：动员、社会动员和政治动员。

1、动员

目前学界关于动员的概念与内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学者们在不同场景中使用该词，同时也赋予了它多元化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作为军事或战争的动员。动员，原初意指军事或战争动员，指的是“把国家的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以及把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运输业等）转入供应战争需要的工作”^①。这指的是一种军事动员。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动员”一词的应用范围已经大大超越了军事领域，而被看成是现代组织或统治集团所采用的一种行为。

二是作为获得一定资源的动员。这是从目的的角度对动员进行的界定。《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对于动员有着这样的描述：“动员指的是，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或社会目标而进行的有意图的资源调度活动。其中，重要的资源包括人（比如军队和安全力量、选民、社会运动）、共享的身份（党派性、阶级、意识形态、宗教）、物质支持（比如维持一支常备军及其武器所需的金钱、竞选赞助经费）、信息（情报和战略方案、竞选活动议题陈述）以及组织（军事职业化水平、与其他社会或政治团体之间的网络关系、竞选活动志愿者）。”^②由此可知，动员的目的就是获得对某种或多种资源的控制。

三是作为过程的动员。德国学者卡梅伦提出了“行动者—动员”模式，他认为既要关注动员的结果和社会成员对社会化新模式的服膺，同时也应该解释动员的具体过程。^③《新编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注解：“动员是指发动人们参加某项活动”。^④如果我们将之分解，可以得知它包含四个环节：“一是谁发动？——动员主体；二是发动谁？——动员客体；三是如何发动？——动员手段；四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03页。

②William A. Darity Jr.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nd edition), Vol.5, Detroit: Thomson/Gale, 2008, pp.213.

③Cameron, David R. "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36, No.1, 1974, pp.138~171.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03页。

是为何发动？——动员目的。”^①所以说，动员是包括主体、客体、手段以及目的在内的一个过程体系。

应该说，学者对于动员的理解是多元的，但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一定的主体采取相应的手段或者措施来发动客体，以获得某些资源而完成预定目标。

2、社会动员

动员一词的应用已经从最初的军事领域延展到了经济、社会等范畴。其中较为凸显的是社会动员，它不仅是民族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且是政治动员的基础与前提。关于社会动员的理解大体有以下两种：

第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持此观点的是卡尔·多伊奇，他首创了“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这一术语。他认为社会动员是：“人们旧有的社会、经济和心理承诺和义务遭遇腐蚀和崩溃的过程，从而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城市化、商业化和工业化，这些都是政治动员必要的先期准备。”^②据此可以得知，多伊奇认为社会动员与现代化是相伴而生的，既是现代化的指示器，同时在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人们价值观和期望值的变化又为政治动员提供了基础。

第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某项活动以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经给社会动员做过这样的定义：社会动员是一项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的群众性运动，是一寻求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过程。^③郭岩认为，“社会动员就是把社会发展目标转化成社会行动的过程。一旦它的发展目标真正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需求，社会各界、各阶层广泛参与，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又有保障，社会动员就得以实现。”^④同时，杨龙也持类似的观点，他提出“作为社会的整体运动，发展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没有广大群众普遍的发展积极性，社会的经济发展无法实现。发动全

^①徐彬：《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21~1966）》，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②Karl 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5, 1961, pp. 494.

^③郭岩：《社会动员的概念方法与过程》，载于“城市社区参与治理资源平台网”，<http://www.ccp.org.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6>，2006年04月01日。

^④郭岩：《社会动员的概念方法与过程》，载于“城市社区参与治理资源平台网”，<http://www.ccp.org.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6>，2006年04月01日。

社会广泛地参与发展，需要进行社会动员。通过社会动员，可以调动广大民众的发展积极性，激发人们的政治参与，为社会的发展进行力量积蓄和思想准备。”^①

综上，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社会动员概念主要用来描述与解释传统社会的衰退以及新生社会（现代化）与传统社会的对立过程，主要是指人们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变迁。而中国学界使用的社会动员通常是一种狭义上的理解，是指向明确目标、有意识的、存在动员主体与动员客体之明确区分的概念。

3、政治动员

国内外学者关于政治动员的研究亦颇为丰富，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②：
其一，过程说。

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提出：“对中共精英来说，政治不只是一种和平的政治竞争或行政管理，而是在危机形式下动员和激发人的资源的一种努力。……政治动员是获取资源（在这里是指人的资源）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③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也持有这样的观点，“所谓的动员，说的是那些在某一特定的时间点上并未提出其抗争要求的人们是如何开始提出要求的。动员的过程增加了集体性提出要求的行动的可用资源。”^④施雪华则明确指出，“政治动员是政治领导主体以自身的价值观、信仰去诱导和说服政治领导客体，赢得被领导者的认同和支持，取得被领导者的自愿服从和主动配合，以实现政治决策规定的目标和任务。”^⑤

其二，执行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动员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政策。例如，胡伟提出“政治动员就是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等名义下，运用大众舆论和宣传教育等政治社会化的手段调动民众对执政者及其政策的认同、支持和配合，从而加强政治体系的施政能量，促进政策的贯彻执行。”^⑥

①杨龙：《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②此划分方法主要参照李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以5.12抗震救灾为例》，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0～11页。

③[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77页。

④[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⑤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0页。

⑥胡伟：《政府过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其三，目标说。

此类观点指出政治动员是具有目标指向性的。例如，“政治动员是指动员主体通过一定的方式发动动员客体参与政治活动、获取政治资源，从而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政治活动”；^①“政治动员就是执政党或政府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运动”；^②“政治动员是指一定的动员主体(主要指国家和政党)，在特定的环境中，为了组织社会力量实现特定目标而利用各种动员资源，采取各种动员方式，以激发和鼓动政治动员客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行为和过程。”^③

其四，行为说。

此观点将政治动员看作是一系列活动。如，“政治动员是指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政治集团等，为聚集力量，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等行为。”^④“政治动员是指政治管理主体对客体进行的一系列宣传、教育、解释、说明、激励等活动。目的是激发政治管理客体实现主体决策的积极性。”^⑤“所谓的政治动员，是指作为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权力的行使者，如政党、国家权力机构等政治集团，或者政党领袖、官僚等精英群体政治权力的所有者，如宗教领袖、社会精英乃至于人民群众以及社会中间组织等等，通过规范性、约制性和诱导性等政治动员的手段，激发政治动员客体的参与，以实现动员主体的目标的过程与行为。”^⑥

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政治动员进行了规范性描述，但是他们对于政治动员的论述均存在这样几个要素：动员环境、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方式与手段、动员目标等要素，同时认为政治动员旨在扩大人们的政治参与，借以实现政治目标。结合上述学者们的观点，笔者认为，政治动员就是政治动员主体(如政党、国家机关等政治集团，或者政党领袖、官僚、有权威者等精英群体)在特定政治环境中采用一定的手段和措施（比如受训控制、蒙蔽性诱导、宣传教育、鼓动、利益诱导等）获取资源并激发动员客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之

①徐湘林：《渐进政治改革中的政党、政府与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②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

③关兴：《新农村建设中的政治动员研究——以皖北T县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5页。

④《中国小百科全书》（第4册），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⑤石永义等：《现代政治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⑥徐彬：《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对动员主体产生政治认同，从而实现既定政治目标进而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关于政治动员的考察，既要注重政治动员主体的主导作用，同时也要关注动员手段与措施的选取以及动员客体的反应与回应。

上述三个名词就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在此需指出的是，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之间有着诸多的相似性，中国学者常把两词混用。其实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比较显著的。诚如前面所述，西方现代化理论视社会动员为一种人的社会化模式及行为模式的变迁。如此，我们可以将社会动员视作政治动员的前提与基础，同时也可看成是政治动员的结果与表现。即便它们均运用在社会运动分析中，也可以制度化的介入加以区分。一般而言，社会动员是要突破既有的规范，实现广泛地社会与政治变革，并常常伴随着暴力；政治动员则是按照制度性的规则进行的，其目的是为政治权威服务（革命时期的政治动员除外，笔者注）。^① 本文就是基于这些差异性而将两词区别运用的。

1.3 既有研究

伴随着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的研究，诸多西方学者对什么是政治动员，如何进行政治动员进行了研究，而一些中国学学者也对中国的政治动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在中国国内，由于历史因素和思维定势的影响，政治动员属于敏感词汇，中国学者对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下面，本文就分别将国内外关于政治动员的研究情况做一总结。

1、国外学者的研究

政治动员的研究，是由于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关注而兴起的。概括起来说，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政治动员的理论研究

笔者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译本）这本在国际政治学界享有权威性的工具书中，也查阅不到“动员”、“政治动员”相关概念解释，说明西方对政治动员理论的研究也尚未成熟。

^①该观点主要参阅 William A. Darity Jr. (Ed.).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nd edition) Vol.5, Detroit: Thomson/Gale, 2008, pp.213.

卡尔·多伊奇首次提出“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这一术语。他认为社会动员是：“人们旧有的社会、经济和心理承诺和义务遭遇腐蚀和崩溃的过程，从而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城市化、商业化和工业化，这些都是政治动员必要的先期准备。”^①这样就将现代化过程的中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联系起来。

自多伊奇之后，西方学者纷纷从政治动员的角度探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问题，如布莱克(C. E. Black)、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英格尔斯(A. Inkeles)以及亨廷顿等。他们都把社会动员看作是现代化的首要特征，特别是亨廷顿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动员做了较为深入地探讨，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出发，把政治动员看作是一种政治发展的手段，并注意研究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以及政治稳定、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亨廷顿并未对政治动员作出精确的定义，动员、社会动员、政治动员依然是混合运用、没有区分的。^②

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体系方法去分析和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过程，以及在各个层次上所发挥的功能作用”^③，并把政治动员分为社会动员和革命动员两种类型。^④

戴维·阿普特则将动员体系视作实现现代化的工具与途径之一，阐述了动员体系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但他认为现代化的动员体系不能长久维持，并分析了动员体系日趋衰落的原因。^⑤

（2）政治动员的策略研究

关于政治动员的策略，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阐述较多。首先，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分析了纳粹德国、苏联和越南的革命动员，并阐释

①Karl Deutsc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5, 1961, pp. 494.

②相关研究可参见[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以]S. N.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美]A.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以及[美]塞缪尔·P.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的政治参与》汪晓寿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③[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④[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183页。

⑤[美]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章。

了中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策略。他们指出，大规模独裁运动的领导者上台后常常试图打破现存的社会结构，而代之以一种受到控制的等级分明的组织或是政党和政府行政机构这种双重等级组织，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越南为控制乡村所进行的斗争，则是一个在冲突中摧毁和重建社会交流网。^①他们还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动员成功的关键就是对交流网的控制；控制交流网的一个途径是争取传统的社会关系网，并使之适应新的目的，例如，以种族为基础的党派通常都凭借现存的家庭、宗族和共同体的关系网来向集团成员传达新的政治目标并协调政治行为；另一种途径是，在那些旧的关系业已摧毁或本来就不存在着关系网的地方建立新的关系网的过程中，训练领导人并创建样板组织。^②此外，他们还提出了共产党国家的独裁—技术—动员型战略的发展策略。在这种策略下，“共产党政权用它们的政党作为动员民众和渗透社会的工具，作为制订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工具。人民是被动员起来执行党的精英人物已经制订好了的政策，而不是参与制定政策，所以这是一种被动员的或是结构化的参政形式”^③。

以上就是西方学者对于政治动员的一些观点，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散见于各种著作或文章中，还缺乏系统的论述。近些年来，国外学者开始运用政治动员的理论分析政党政治和政治体制，例如：借助克什米尔叛乱来说明政治动员体制退化^④，欧洲的政治动员，1860-1980 阶级分裂等^⑤，西方学者还对政治动员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做实证分析，如母爱与政治动员：美国加州的婴保制度在战后如何保存下来；互联网与政治动员的关系，如何在美国城市对墨西哥移民进行政治动员，等等。^⑥

除此之外，西方学者还从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角度研究动员。这方面

①[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小 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82 页。

②[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小 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81 页。

③[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小 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45～446 页。

④Sumit Ganly. “Explaining the Kashmir Insurgency: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c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2, 1996.

⑤Stefano Bartolini.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European Left, 1860~1980: The Class Cleav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⑥Cano, Gustavo Hernández. “The Chicago-Houston Report: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Mexican Immigrants in American Cities”, <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5h93g1gk>, 2002-10-30.

的代表主要有资源动员学派(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代表人物麦卡锡(John.D.McCarthy)和扎尔德(Mayer.N.Zald)。他们在《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和《资源动员和社会运动：一个局部理论》两篇论文中，以资源动员为视角来研究社会运动。他们认为：资源动员应当作为市场交换概念，社会运动组织在资源动员中成为科层化、且有社会影响的利益群体，而社会运动形成的动因是需求与供给；因而，在社会运动中，参与者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者；理性的核心在于个体对社会运动参与与否，主要取决于他在行动中的收益。^①另外，梯利(Tilly)认为动员在社会运动的集体行动中处于核心地位，基于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interest)、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mobilization)、个体加入社会运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repression/facilitation)、政治机会或威胁、(opportunity /threat)、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权力(power)等因素构建了社会运动的动员模型。^②总体上看，资源动员理论有两大取向：一是社会运动组织(Social movements organization)形态的分析，认为资源的组织化程度与社会运动的成功成正比；一是对社会运动的动员背景(Mobilization Context)的分析，即探析政治体制，如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对社会运动的影响。^③这些学者的研究均给本文的写作提供了研究基础。

（3）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研究

在西方学者中的中国学者曾经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詹姆斯·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是较为系统地论述中国政治的学者。在他们看来，政治动员是“统治精英获取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并对中国建国初期、集体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以及“文革”时期的政治动员做过粗略地论述。^④他们指出，中共建国后，支持政治整合和前期社会改革的彻底的动员必须先于新体制的制度化，完成这一任务的首要途径就是群众运动。每一次的群众运动都有两个目的，既要针对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问

①齐美胜：《乡村社会动员机制研究——以皖南G村为个案》，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7页。

②转引自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172页。

③冯士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④[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7~78、116~117页。

题，又要在中共领导下动员群众资源。^①

关于中国革命政治动员策略的研究有两个个案范本：一是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是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在前一本书中，韩丁对晋东南的一个村庄（张庄）的土地改革运动给予了考察。她试图通过张庄这个缩影，来揭示中共在土地革命中的动员过程：即“农民在共产党的指引下，从部分认识逐步到达全面认识，从自发的行动到有指导的行动，从有限的胜利到全面的胜利。同时，通过这样的过程，他们把自己从自然和社会力量的被动的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新世界的积极的建设者。”^②这也是作者所理解的“翻身”的实质。后一部著作则以记事的手法，介绍了十里店村的农民群众是如何响应土改复查与整党工作两项群众运动的，其中对于农民心理的描述，对于理解当时的政治动员极具启发意义。^③

裴宜理在《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一文中指出：“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益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事实上，中国的案例确实可以读解为这样一个文本，它阐明了情感能量如何可能（或不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④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介入中国革命、进行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重视情感。

黄宗智在研究中国革命时，通过借助土地改革中“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背离，来分析农村阶级斗争中的政治动员，这对本文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⑤

同时，一些学者虽然并没有直接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但是他们的研究却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基础。^⑥

①[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7页。

②[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倬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714页。

③[加]伊莎贝尔·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安强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④[美]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第98～99页。

⑤[美]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载于[美]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6～95页。

⑥相关研究可参见[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以及费正清等人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

总体上看，西方学者并没有专门就政治动员进行系统地研究，他们的观点和论述大多散见于著作或相关文章中，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探讨大都是以革命年代、建国初期以及文革时期的农民动员为主，而很少涉及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的变迁。

2、中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学者基于本国的经验特别是革命战争的历史，对政治动员进行了较为系统地研究。他们主要围绕什么是政治动员、政治动员的技术与策略以及政治动员的结果展开了论述。下面，就分别进行归纳总结。

（1）政治动员的理论建构

当前，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专著是徐彬所写的《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21～1966)》一书。这是国内学者对于政治动员较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此书对于 1921～1966 年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进行了详细探究，他从动员的主体、动员的客体、动员的手段以及动员目标四个维度建构了政治动员理论，同时他也在体制化和人格化两个层面上区分了政治动员的主体，将政治动员的手段分为规范性、约制性、诱导性三种，提出了强制性和诱致性两种政治动员的类型，并从过程的展开、手段的运用以及结果的产生对政治动员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作为政治动员，它首先是一个政治过程的展开，在此过程，无论是体制化还是人格化的政治动员主体均通过一定的动员手段对动员客体进行动员，以期达到主体的目标。……作为政治动员，它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结果。就手段意义而言，在中国政治动员中，中国共产党及其精英人物创造和使用了灵活多样的政治动员手段，包括规范性、约制性和诱导性等等。这些政治动员手段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以及解决某一具体社会问

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瑞] 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 1937～1945》，杨建立等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版；[美] 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美]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金野純：『建国初期中国社会における政治動員と大衆運動——「三反」運動と上海社会（1951～52年）』，『アジア研究』，Vol.51, No.3, 2005；高橋伸夫：『党と農民——中国農民革命の再検討』，東京：研文出版社，2006 年。还有一些纪实文学和回忆录，如[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胡愈之等译，1984 年版；[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马庆平等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 年版；[美]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沈苏儒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年版；《中国未完成的革命》，陈瑶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年版等。

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积极效果。……它在产生许多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产生过一些负面效应。诸如权力人格化等等、思维绝对化等等。”^①

孔繁斌通过反思现有的政治动员理论认为政治动员研究观念、方法滞后，解释不了基本问题和现实的变化，提出从动员议题建构和公众聚合认同两个视角来拓展新的研究空间，来解决威权政体下政治动员往往带来“崇高的紧张”的结局、自由民主政体下竞选动员走向“失衡的承诺”的普遍化的现实，克服政治动员的“身份—功能”危机，以适应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转向的趋势。^②

黄琨提出了内生型和外力型两种动员类型，借此分析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内生型是指组织者主要依靠当地各种乡村关系形成农民的聚合，它是在乡村既有秩序之下的秘密组织，在斗争后渐行对既有秩序进行打破，不过在有些地方它也同乡村既有秩序紧密结合以公开的形式出现。外力型是指主要依靠外部物力的帮助建立党及农会的组织，它通常是先打破乡村既有秩序，然后重新构建新的乡村权力体系。^③

还有一些文章分别从现代化角度、政党转型等角度，或者以某一特定事件的政治分析，又或者采用历史比较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进行了阐述。^④中国的其他学者也涉及政治动员的研究。例如林尚立曾提出：“所谓政治动员，

①徐彬：《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21～1966)》，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页。还可参见徐彬：《论政治动员》，《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第21页。

②孔繁斌：《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③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5页。

④相关研究可参见张新萍：《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动员》，《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12期；朱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探析——以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视角》，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杨会清：《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动员模式研究（1927～1937）》，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黄兢：《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研究》，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王长付：《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政治动员分析(1927～1937)》，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王长付：《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政治动员分析(1927～1937)》，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李杨：《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49～2007)》，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王兴东：《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政治动员概述》，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刘一皋：《社会动员形式的历史反视》，《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周政华：《当代中国乡村政治动员研究——从人民公社到村民自治的历史之旅》，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吴婉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运作模式研究——以“大跃进”运动为例》，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李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张建涛：《危机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例》，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郭东峰：《中共政治动员研究：以“工业学大庆”为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乔晶：《重构农村：“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政治动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等。

简单的讲就是执政党或政府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运动。”^①刘荣刚对政治动员的概念、过程、功能等基本理论进行了阐述，并依据历史发展对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动员进行了分析。^②胡伟将政治动员在政府执行过程中的运用称为动员模式，并认为它与官僚模式一起构成当代中国政府执行的驱动力。他认为“邓小平南巡讲话”是以邓小平人格化权力为特征的政治动员方式，是新形势下一场典型而成功的政治动员。^③

（2）政治动员的技术与策略的研究

刘荣刚曾经提出八种政治动员的方法，即宣传鼓动、受训控制、典型示范、组织控制、权威支配、蒙蔽性诱导、强制参与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④这是就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动员策略而言的。更多的研究则是通过某一特定事件来论述政治动员的模式，尤其是对于革命战争年代政治动员的论述尤多，例如，张鸣借助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模式：派驻工作组进村建立核心组织——通过诉苦大会明确阶级斗争的方向——进行土地改革——动员农民。^⑤同时，诸多学者还对土改过程中的“诉苦”及其在社会重构、政治动员与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⑥

马磊运用“治理术”此一概念分析了中共对于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并用阶级分析和诉苦制度阐明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何以可能。^⑦周政华对改革开放

①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

②关海庭：《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六章。还可参见刘荣刚：《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现实思考》，《理论与改革》，1998年第4期。

③胡伟：《政府过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325页。

④关海庭：《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254页。

⑤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第15期。类似的研究还可参见李炜光：《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载于“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网”，http://www.scuphilosophy.org/ScholarsLibrary_display.asp?userid=818&art_id=6744，2008年9月16日；许蕾：《政治运动的动员机制——以“三反”运动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张励：《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的群众动员》，《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第3期；李巧宁：《建国初期山区土改中的群众动员——以陕南土改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林伟京：《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动员》，《齐鲁学刊》，2007年第1期。

⑥相关研究可参见程秀英：《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

⑦马磊：《乡村社会中的政治动员——对共产党乡村革命的治理术分析》，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前后的政治动员机制进行了区分与比较，他将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动员机制表述为意识形态、魅力领袖与运动；把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政治动员机制总结为自治、自利与分化。同时，他还从经济、政治背景以及动员的策略和目标等角度比较了两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动员的差异。^①

有些学者对转型时期的政治动员模式进行了探究。比如，陈华森就以社会转型为背景，分析了在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社会流动加剧、单位体制解体、城市社区兴起等情况下政治动员的新模式，认为应该在单位制基础上加强社区动员、坚持“利益兼顾”的动员原则，发挥精神动员的作用，并营造参与型的主流政治文化。^②徐彬在区分了“强制性”政治动员和“利诱性”政治动员的基础上，认为不同政治动员类型满足不同历史时期的合法性要求，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应该由“强制性”政治动员转变为“利诱性”政治动员。^③梁丽萍、段尚琪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将政治参与的模式演变分为：革命型参与—动员型参与—建设型参与—自主型参与，得出最后的理性参与模式。^④

在面对网络发展的挑战，也有的学者提出了在网络时代政治动员的措施。例如张雷、刘曙光认为，网络时代政治动员具有迅速快捷、影响范围全球化、政府控制困难等特征，并提出国家的应对措施：一方面要利用网络技术实现民主政治的充分参与；积极响应网民合理的政治诉求；引领积极的网络政治动员；另一方面要采取积极的“制动”措施；依法采取有效措施瓦解破坏性和颠覆性的网络政治动员。^⑤

除此之外，还有的学者通过个案调查描述了中共对于基层社会的政治动员。张济顺通过对上海弄堂的调查，阐明了在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的历史情境下，中共对上海基层社会的政治动员的场景。^⑥萧楼以“柔性政权”的概念，分析了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的乡镇分权与村治空间的构成以及乡镇政权、村治精英与乡村工业的三方互动。^⑦

①周政华：《当代中国乡村政治动员研究——从人民公社到村民自治的历史之旅》，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②陈华森：《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模式研究》，《党史文苑》，2004年第8期。

③徐彬：《论政治动员》，《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

④梁丽萍、邱尚琪：《建国以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演变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5期。

⑤张雷、刘曙光：《论网络政治动员》，《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⑥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⑦萧楼：《柔性政权：“政治动员”下的乡镇和村庄——东南沿海D镇个案分析》，《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3）政治动员效果的研究

关于政治动员效果的研究，颇有些见仁见智的意味。从总体上看，学者们大都从积极效果和消极效应两方面对政治动员效果进行阐述。

有些学者从正面评价了政治动员对于战争的作用。例如，翁有为以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为分析对象，充分结合抗日根据地的特色进行了阐述，认为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能够促进根据地人民“公民”意识的觉醒，扩展个人的政治空间。^①在此，笔者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那时农民是被动员起来的，即被动政治参与，对于个人政治空间的扩展值得商榷。刘荣刚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代和当代中国的政治动员效果进行了比较中肯地评价，例如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动员起了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则使得中共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并树立了自己的权威，第三方面是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动员是很不成功的，党和政府错误地估计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根据实际变化了的形势和任务，调整动员的策略、途径和方式，以致出现了一些偏差。^②

黄兢从绩效评价出发，提出了政治动员绩效的公式：政治动员绩效=f(目标实现度*客体参与度)，即动员绩效是目标实现程度和动员客体参与程度的函数，并利用这个函数对建国初期中共政治动员进行了评价。^③这一函数表明了政治动员的绩效需要从目标实现度和客体参与度两方面进行测评，而改变了以往单纯的目标实现度评价机制。

林伟京则对转型时期党的政治动员实效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导致此情况出现的原因有：社会转型的深刻影响、“革命党”动员模式的弊端、误解和偏见的消极影响、腐败对党的政治动员造成危害等。^④

以上就是中国学者对于政治动员的研究，其中有宏观的理论阐释，也有个案的调查，但是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革命时期，尽管有关于中国现阶段的研究但尚不系统。当然，这对于总结政治动员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①翁有为：《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山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②关海庭：《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276、290页。类似的论述还可参见徐彬：《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21～1966)》，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326页。

^③黄兢：《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研究》，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25～35页。

^④林伟京：《转型时期党的政治动员实效下降的原因分析》，《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

但是对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动员的思维影响研究不足，就使得我们无法厘清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动员，也无法对政治动员进行新的拓展性探讨。具体表现就是，当前诸多学者仍未把政治动员同革命化、运动化的动员方式区分开来。

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革命时期以及建国初期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研究较多，这可能基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和共同点，但是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研究还有待深入。而这种扩展研究，既有利于加深对革命年代的农村政治动员的理解，也有利于拓宽我们认识现今中国农村发展的视野，从而推动农村治理体制的变迁，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本文正是出于此种考虑，试图通过对中共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的归纳与总结，推导出未来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的重构，以期能够为农村的发展做出有益的探索。

1.4 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

1、理论工具

本文拟采用的理论工具有两个：一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另一个是“共同态度性”范式（Co-behaviorism）。

（1）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本文主要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模式。应该说，政治动员模式的形成受制于一系列的因素，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国家—社会关系，所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便成为本文的理论视角之一。

国家—社会关系是政治学研究中的老话题，它关注政治权力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布。在西方国家，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作为与国家相对存在的社会领域被认为是限制国家权力和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因此国家—社会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市民社会理论展开的。^①市民社会理论历经古典理论、近代理论以及现代理论的发展，市民社会与政治或国家的学理分野，在黑格尔

^①关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可参阅[英]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133页；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学理架构可参阅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载邓正来等：《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100页等。

的政治理论中得已完成。^①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分野到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确立的过程中，可以说大体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框架：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架构，二是黑格尔所提倡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框架。^②前面一个框架可以称之为“社会中心论”，而后面的框架被称之为“国家中心论”。

然而，无论是社会中心论，还是国家中心论，都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为前提，将二者的关系看作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两种理论对新政治事实的解释力。一些新的经验现实表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二者可以是相互赋权、相互增进的关系。这就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关系表现出较多关切。例如，20世纪90年代对市民社会的关注，学者们发展出国家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互动、公私合作的理论，并提出了“治理”和“善治”的理念^③。这些观点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提供了经验借鉴和理论支持。

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也沿着两个方向展开，即“国家在社会中”^④和“国家与社会共治”^⑤。尽管是在两个方向上探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两者之间

①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②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③ 李姿姿：《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5页。

④ 以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并不如国家中心论所说的国家独立于社会和强大，社会中长期存在着的复杂的网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家能力。他们认为，“国家中心论”的分析方法掩盖了国家形成过程和社会中争夺控制权力的斗争的复杂性，因此他们提出突破国家—社会二分的限制，建立“国家在社会中”(state in society)的理论，来分析国家的不同部分如何与社会不同部分发生联系。他们主张把国家看作社会的一部分，国家可以形塑社会，但是也嵌入社会中并为社会所形塑。这些观点可参见：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rologue;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 and Society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⑤ 持“国家与社会共治”论的学者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界并不十分明确，公民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国家力量，国家制度的建设也可以促进公民参与，二者互为条件，所以通过制度设计可以将国家嵌入社会或者让公众参与公共服务，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治。这些观点可参见：Xu Wang. “Mutual Empowerment of State and Society: Its Nature, Conditions, Mechanisms, and Limits”, *Comparative Politics*, Jan. Vol. 31, No. 2, 1999; Wai Fung Lam.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Public Agencies and Coproduction: A Study of Irrigation Associations in Taiwan”, Elinor Ostrom. “Crossing the Great Divide: Coproduction, Synergy and Development”, both in Peter B. Evans (Ed.). *State-Society Synergy: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pp. 11-47; pp. 85-118; 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亦存有一些共同之处：（1）社会呈现扁平化的网络结构。现在的社会由各种不同的力量组成，它是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和社会运动等的联合体，它们的权力来自组织内部的等级结构、符号资源的使用等。社会力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心理等诸多领域展开竞争或者合作，为争取对社会的主导权而斗争。（2）国家与社会互动形式的多元性。国家与社会互动可以达致四种可能的结果：两种极端的形式是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国家整合社会失败而导致的国家与社会分离；两种中间状态是国家吸纳了新的社会资源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和社会新的力量改变了国家或者社会由非国家力量主导。从经验出发，前两种极端状态是极少发生的，反倒是后两种中间状态是现实政治生活的常态。这也就说明了国家与社会是相互形塑的。

虽说“国家在社会中”和“国家与社会共治”两种理论有些共同之处，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主要是国家在社会中作用的差异。前者将国家看作是社会的一部分，在社会这个系统中与其他组织相互形塑。后者则认为国家是嵌入到社会中的，并且赋予国家以自主性。国家嵌入一套具体的社会纽带之中，这些纽带将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为目标和政策的协商提供制度性渠道。本文则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因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尽管注重国家（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的互动，但是这种互动对国家（政府）而言并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自主性的。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国家（政府），应该具有通过制度性渠道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政策协商的能力。这就是埃文斯所说的“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①。

综观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变化，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野，各种学说观点之间亦存在着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和发展性。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犹如钟摆在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的两极摆动。最终，学者们提出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不再片面强调以社会为中心或者以国家为中心。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国家—社会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原来的国家控制社会转变为国家逐步向社会分权。应当说，当代学者提出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为建构未来中国国家—社会关系指明了方向，也为本文提供了理论指导。

^①这个概念是埃文斯在其著作《嵌入性自主：国家与工业转型》一书中提出的，在此书中他对国家与社会二分法提出了批评，认为既有“嵌入性”也有“自主性”的国家才能称得上发展型国家，才能成功实现经济战略。具体参见 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2）“共同态度性”（Co-behaviorism）范式

从政治动员的概念，我们可以得知政治动员包括动员环境、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方式与手段、动员目标等要素。因此，在政治动员过程中需要分析处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的动员主体与动员客体之间的互动，这需要分别考察主客体对动员目标的认知、主体动员方式的选取以及客体对动员手段的反应等。“共同态度性”范式为这种考察提供了依据。

“共同态度性”是日本学者加加美光行新近提出的一种研究范式。此范式体现在他撰写的《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共同态度性的提倡》^①一文中。“共同态度性”范式原本是针对西方世界采取东方主义（西方中心论）对中国进行主客观分离研究的现状而提出的，它表现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怀疑与批判，强调了在“共同态度性”的基础上达成多主体间的“互动关联性”关系以使得彼此间可以平等对话、多元互动。应该说，这是对整体的中西方学术理念与方法在彼此间对话关系上的一种建设性态度。^②

加加美光行对“共同态度性”范式的前提做了三个规定^③：

第一，必须承认，作为研究对象的各个国家的各种主体，如国家、企业、个人、集团（地区居民、NGO、学术团体）等，具有依据自身的目的性价值判断来从事本国变革的主体性，而且这种主体性与作为外国人的“国别学”研究者的主体性处于同等位置。而针对各种主体构成的这种状况，作为外国人的研究者也具有自己的目的性态度（价值判断与行为）。

第二，研究对象各主体与研究者自身这一主体之间，各自的目的性态度相互联动和影响，任何一个主体的态度都难以单方面地操纵其他诸多主体的态度。这里将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联动性称之为“共同主观性”或者“共同主观的存在结构”（inter-subjectivity on being）。外国研究者这一主体当然也受控于这种相

^①该文是日本爱知大学教授加加美光行在“07年现代中国学研讨会”上发表的主题报告。在该文中，加加美光行表明了之所以主张“地域研究”应确立其固有的方法论，是基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地域研究’中存在着由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也即‘未开化的东方’、‘文明的西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导致的偏颇，而且这种弊端随着时间的演进愈加严重”。而要达到中西方多元主体之间平等对话的“国别研究”，就必须提出新的范式，即其在结语部分提出的“共同态度性”。（后该文日文版被收入加々美光行：『中国の新たな発見』，東京：日本評論社，2008年第2～38ページ。中文稿收录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研究》2007年第5期）

^②汤忠钢、魏丹：《论“共同态度性”范式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的运用问题》，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21页。

^③加々美光行：『中国の新たな発見』，東京：日本評論社，2008年第35ページ。

互动性。

第三，上述诸多主体的目的性态度（行为）之间的相互联动性不仅表现为相互协调、相互结合，也可能相互对立。在这种相互联动的“共同主观性”中，东方主义的弊端就会因为西方中心主义性质的价值判断这样一面互相映照的镜子的存在而原形毕露。外国研究者进入这种辐辏而成的“共同主观性”的相互联动性之中，必须探明东方主义的认识结构和存在结构，从中发现研究课题和解决方法。

加加美光行认为只有形成上述三点为核心的方法论框架，“国别研究”（nation-studies）才能成立，并且将这一方法论称为“共同态度性”（co-behaviorism）。同时他也指出“Behavior”之所以翻译成“态度”，是因为“态度”是人们针对具体状况时的姿态和行为，包含着立场。也就是说，人们在面对具体状况时是他们基于价值判断的目的和意志在起作用。“所谓‘共同态度性’就是将这种相互联动性经常作为中心视角来展开研究的一种研究方法。当然，这一视角必须将研究者自身的‘态度’看作是与其它主体的态度同等同格的。”^①在文章的最后，加加美光行指出，“这种‘共同态度性’的研究视角，不仅适用于日本国内核电站的安全问题、福知山铁道的列车脱轨事故，也必然适用于日中关系、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乃至文化摩擦等多种问题的研究。”^②

“共同态度性”虽然是一种跨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但它是从人的主观认识结构和存在结构出发，以具有不同价值判断的人们或者组织的相互联动性为对象的一种研究范式。它强调这种相互联动性，尊重具有不同价值判断和意志的人们的平等对话。在政治动员过程中，需要尊重不同人或者组织的需求，需要考察这些人或者组织之间基于不同价值判断的交互过程。从此角度说，“共同态度性”范式也可作为本文的另一理论视角。

2、研究方法

本文拟采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从历史上看，历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过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18世纪中期，从孟德斯鸠和休谟、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到涂尔干（E. Durkheim）和韦伯，持续了很长时间，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撞在右翼和左翼极权主义的墙上

①加々美光行：『中国の新たな発見』，東京：日本評論社，2008年第38ページ。

②加々美光行：『中国の新たな発見』，東京：日本評論社，2008年第38ページ。

而一蹶不振。^①历史社会学的第二次浪潮是从它摆脱结构—功能主义的束缚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开始消解，逐步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与分支学科——历史社会学。诸如巴林顿·摩尔撰写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和西达·斯考切波所著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均是历史社会学早期的代表作品。两位作者运用宏观的历史比较方法，研究处于同一个历史过程中的历史因素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中是如何发挥不同作用的。历史社会学的兴盛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降的事情，特别是查尔斯·蒂利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杰出的协会创立者的努力，使得社会学长期存在的历史倾向得以复兴。^②“有关欧洲工业革命的根源及其后果、工人阶级的出现、官僚体制的国家和政治民主的传统，到今天历史社会学仍在研究。但是现在的研究与学科奠基人所不同的是，更倾向于提出更多的证据与分析方法。更值得一提的是，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议程已经扩展至可涵盖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以及各种从学科奠基者那里继承而来的新议题”^③“但是历史社会学还是混杂了与经济、社会历史的边界，甚至在主要研究领域上也是糅合的，也没有区分与政治社会学的边界，而这可能碰巧是政治学学者们的努力。历史社会学正在对大规模结构和长期社会变迁过程本质及其影响作传统研究，事实上，这是一种始终围绕社会学核心问题展开的跨学科研究的努力。”^④

一般而言，现代社会学接纳历史有两种方式：一是利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保留下来的史料进行二次分析；二是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出发，进入与此问题相关联的历史情境中，通过对这些历史情境的处理和分析，来解释和解决现有的问题。^⑤第一种方式是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和解释历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套路，可以称之为“关于过去的社会学”^⑥；第二种方式出于

①[英]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井建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②[美]西达·斯考切波：《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页。

③[美]西达·斯考切波：《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375页。

④[美]西达·斯考切波：《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页。

⑤吴帆、吴毅：《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与特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96页。

⑥吴帆、吴毅：《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与特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96页。

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而进入历史场景，通过历史情境的处理以解释和解决现有问题，如此更具社会学意味，才是历史社会学的精义所在。因为它的研究起点与终点均是现实，而社会学正是注重现代性研究的学科。

至此我们可以得知，历史社会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议题广泛，注重从现实问题入手、还原历史的社会场景，并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等综合的研究方法阐明该历史场景的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借此反思和解决现有的问题。然而，“历史社会学并不是把演化发展这类庞大体系加在过去与现在关系上的学科。也不仅仅是为了辨识现代的历史背景。它企图了解个人的活动、经验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视为时间之中的连续建构。”^①“简而言之，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②“就其精髓而言，历史社会学是理性的、批判的和富有想象力的。它追求社会自身得以变化与延续的机制，探求使一些人类抱负受阻，同时又使一些人类抱负得以实现的深层社会结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③

按照西达·斯考切波的划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策略可以分为三种：一般模型在历史中的运用、运用概念解释历史、分析历史中的因果规律。^④第一种研究策略试图构建一种一般化的模型来解释历史事件；运用概念解释历史，则需要根据给定的概念和主题比较整个历史过程，依据贯穿于所比较的历史事件的可选择的假设和比较关系相关方面来思考问题；第三种策略的关注点是形成一种适当的有关明确定义的历史后果和模式的解释方法，这种解释方法既不是包罗万象的单一模型逻辑，也不是对每个单独时期和地点的复杂特点有意义的解释，实际是一种分析历史的方法。

本文的研究是以政治动员为核心概念重新审视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策略，因而与运用概念解释历史的研究策略有些类似。此研究策略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嵌入于文化中的个人意图或者组织行动的关注；

^①Abrams. Philip. *Historical Sociolo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6.转引自 S.肯德里克、P.斯特劳、D.麦克龙：《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王辛慧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②[英]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井建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③[英]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井建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④[美]西达·斯考切波：《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1~407页。

二是所有被选择用于历史研究的课题和各种论证，应该是对现有的“文化”或政治都是有意义的。^①因此，重视对行动者、制度与文化内容的考察就成为该研究策略的重要特征。然而，为了弥补该研究路径之不足，本文在分析中还吸取了其他两种策略。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采取的政治动员策略不同进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动员模式，对改革开放前后政治动员模式的总结与比较也是本文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考察改革开放前后两种政治动员模式之时，笔者选取了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在二者的影响下形成的动员体系三个维度来审视。^②而在考察每个时期政治动员模式的过程中则采用了分析历史的方法，试图寻出形成这两种动员模式的要素。同时，为了更好地揭示两种动员模式的内在规律，本文还选取了该时期比较典型的事件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意图实现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的结合。可以说，任何一个事件都是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而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明显地表现出两阶段性的特征，因此可以从典型案例出发探究两个时期的政治动员特征。最后，本文在比较两种动员模式的基础上，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的重构做出了一些思考。

1.5 内容安排

本文的结构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1章，是本文的导论。该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核心概念、既有研究的综述、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以及内容的相关安排。

第二部分包括本文的第2~5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之一。在第2章，本文采用分析历史的方法，逐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并分析了中共在革命过程中是如何动员农民以获得革命胜利的。

^①[美]西达·斯考切波：《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8页。

^②亨廷顿曾指出：“没有组织的参与会蜕化为群众运动；缺少参与的组织则会蜕化为个人小集团。强大的政党需要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动员’和‘组织’，这两个共产党政治行动的口号恰恰确定了加强政党力量的道路。能够综合这两者的政党和政党制度便可以使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协调一致。”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页。亨廷顿的这段话，指出了共产党动员成功的重要原因。其中，在“组织”和“动员”之间的纽带就是意识形态。而动员方式以及效果的取得是受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制约的。因此，本文设想从三个角度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即：制度、意识形态和动员体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通过以阶级斗争为内核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发动了农民革命取得了胜利。它也成为了中共的重要政治遗产。

第3章主要是对1949～1978年间的中共农村政治动员展开分析。在本章中，笔者基于全能主义政治提出了“一元化建构”动员模式的基本观点，并通过大跃进时期河北省徐水县瀑河水库的修建为个案进行了审视。该模式的形成也有深刻的制度与思想背景：单极制度的建立和稀缺资源的控制以及封闭性意识形态。由于该动员模式主要依靠党的官僚化的组织体系进行，因而也可称之为金字塔式动员体系。从动员的性质看，它是一种强制性政治动员。

与第3章相对应，第4章则主要是以1978～2012年的中共农村政治动员进行探讨。从国家—社会关系看，此时中国逐渐形成了后全能主义政治。笔者认为，在后全能主义政治时代中共农村政治动员逐步演化为“嵌入式管控”模式，且借助广东省“乌坎事件”对该观点进行了剖析。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政治与社会变迁以及开放性意识形态的形成是该事件发生的制度与思想根源。然而，这种动员模式日益受到多重挑战。中共面对这些挑战也做出了一些回应，效果也不甚明显。可以说这是一种过渡型模式。因此，农村政治动员体制亟需重构。

第5章主要是围绕着前面所述的两种政治动员模式进行了比较。在本章中，笔者先是从政治动员的构成要素——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手段及动员目标比较了两种动员模式，而后又从议题建构、认同聚合以及动员效果三个维度对两种动员模式进行了评价。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第6章，亦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之一。在本章中，笔者借鉴了日本自民党农村政治动员的经验，对于未来中共农村政治动员体制的重构进行了思考。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关键是实现国家对社会“嵌入性自主”，达到国家与社会共治的局面，而这需要中共在向执政党转型的基础上，培育农民组织以形成农民利益共同体并进行农村公民文化建设，建构政策合议机制以形成协同治理的格局。

第四部分即结语。在这部分，笔者通过反思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的变迁，认为中共是具有调适与发展能力的政党，体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这种调适和发展中，中共也实现了农村地区“动态的稳定”。在未来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过程中，中共依然要继续根据历史时期进行自我调整与发展，还要接受时间和实践的双重检验。

第2章 政治遗产：革命场域中的农村政治动员

无论是反对派政治精英还是执政的政治精英，如果他们高度重视革命性的或民族主义的目标，他们也会发现扩大政治参与符合其自身的利益。……革命的领导者都知晓这一真理，一个自称为革命者的精英，如果不去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那么，他不是自取失败就是在隐瞒他的真实目的。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①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城市，最初的党员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属于城市精英。然而，它却领导中国农民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开创了独特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发动了数以千百万计的农民，使他们卷入到革命大潮中，而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这是20世纪中国政治不可忽视的事实。但是中共成立之初并没有直接采取农村策略，而是效仿十月革命的经验，发动城市暴动，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大革命失败之后，以彭湃、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开辟了农村革命的先河，前者建立了最早的苏维埃政权，而后者则发展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所以说，中共转向农村既反映了它的策略转移，又表现出了它在革命实践中的逐步成熟。它日益成熟的表现之一就是动员农民的能力在战争中得以逐步提升。中国共产党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练，构建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内核、以民族主义为外衫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从而取得了全国性政权。下面，本文就通过分析中共革命时期的历史，来逐步揭示它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的形成。

^①[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167页。

2.1 理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提出

政治动员之于革命犹如水之于鱼。可以说，没有强大的动员体系就不可能造就成功的革命。政治革命如此，社会革命更是如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走向了失败，就是革命党人孤身奋战的结果；而后来北伐的成功则取决于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政治统一战线的形成。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得国民党人不再形单影只，而能够联合当时的革命力量——工人与农民。从1894年创办兴中会到1924年提出三大政策，孙中山经过了三十年艰苦探索，终于意识到动员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无独有偶，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以政治动员促成革命的探索也曾走过一段弯路。

2.1.1 转向农民：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常见的一句话。它表明了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重要意义。随后，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1920年初，陈独秀等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3人齐聚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就意味着出现了两股拯救中国的政治力量。^①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新型政党。可以说，它诞生于中国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自然也就承担了解决政治、社会

^①此时期出现的另一股政治力量是由孙中山于1919年10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成的中国国民党。两大政党指导思想与政治纲领均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解救中国于危亡。之后，在苏联的帮助下，两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并进行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两党的合作后被蒋介石破坏。按照徐中约所言就是，“在社会重建和民族振兴方面产生了两种相反的观点：由胡适解释、后来为国民党部分接受的实用主义及逐步进化方法；与中国共产党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从1921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主要是这两个党派及其不同途径斗争的历史。不管是沿着进化的抑或革命的路线，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创造一个完全现代但与众不同的新中国来拯救民族。”参见[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2～513页。

问题的历史重任。受十月革命的影响^①，并且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很长时间内“以俄为师”，不仅强调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主张以工人运动求得解放，而且还效仿苏俄“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道路。所以，确切地讲，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是俄国化（列宁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是经过苏俄（联）共产党解释的马克思主义。^②然而，在俄中两国国情迥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工人，通过工人运动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共产党初建期，农民阶级并没有被看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而是工人阶级的友军（这里的农民专指佃农）^③。例如中共一大制定了如此的党纲：（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④同时，还规定了工人运动的基本策略：成立产业工会、通过出版物宣传党的政策、成立工人学校教育工人以及成立研究工人运动的研究机构。^⑤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共一大上做的报告中也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第一步，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时刻不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最后，第四，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

①首先，社会主义之所以吸引人，就是能够提供摒弃“中国昔日传统和西方今日操纵”的实践思想，而且社会主义追求的理想目标还没有在西欧和美国出现，可以在思想上领先于资本主义国家；其次苏维埃的友好示意（试图放弃后来建议通过谈判来废除沙皇与中国的平等条约，以换取中国的承认。）以及诱人的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竞争和猜忌，必将导致冲突和最后的灭亡。亚洲和其他不发达地区的受压迫人民，应该奋起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最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实际成功等因素，共同在中国创造了一股澎湃的思潮。参见[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7～518页。

②美国学者詹姆斯·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也持相近的观点，他们分别从利益与观念的高度重合、受苏联控制（1921—1934）、依附于共产国际、苏联模式的有效性及其苏联意识形态等角度阐述了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参见[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51页。

③《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载于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125页。

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中共一大的党纲是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帮助起草的，因而具有深深的列宁式政党的烙印。

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威和罢工。^①可以看出，中共成立早期就很重视政治动员的手段与方法。正是在上述策略的指引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在一年时间内，上海地区就进行了六次罢工、联系了五处工会并参加工人群众运动五次。^②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工人运动开始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了第一次高潮，持续时间长达13个月。在此期间爆发的罢工有100余次，参与人数多达30多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中共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的。

在这次罢工潮中，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1922年1月12日），牵涉铁路、矿业等行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2年9月14日）、开滦五矿大罢工（1922年10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4日）等。其中除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曾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外，其余的罢工均遭到了帝国主义和当地军阀势力的残酷镇压而以失败告终。^③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所以选择工人运动为其主要的革命道路，是因为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俄国革命的某些经验，忽视了中国的国情。例如，《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曾言，“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笔者注）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阶级斗争就是打倒资本主义的工具。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斗争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益雄厚。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定要用大罢工的方法，不断的扰乱资本家的国家，使劳动群众的敌人日趋软弱。要是到了可以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政权的最后斗争的时机，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这就是给资本主义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并且当资本家被打倒了之后，这些产业组合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主管经济生命的机关。”^④他们这些早期的共产党员这时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考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⑤

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对于目前实际问题的计划》指出，在中国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②关于中共一大后一年间的工人运动的详细情况，可以参见《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载于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55页。

③这部分内容详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网络版）之第三章第三节《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http://www.zgdsw.org.cn/GB/218994/219014/220524/222757/222777/14961985.html>。

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8～549页。

⑤[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

工人阶级中，铁路工人、海员、矿工是“三个有力的分子”，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要先成立这三个产业的联合组织，作为工会运动的中坚。因而，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就出现在铁路、海员和矿业行业。尽管这三个行业的工人人数相对较多，但是这些重要行业均被帝国主义势力及其代表——封建军阀控制，加之工人中中共党员人数较少，难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因此而导致工人运动失败。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是在城市范围内试图以和平斗争的方式取得工人、农民及被压迫人们的解放。然而，这一段曲折的革命实践，促使了一部分中共党人转向农民且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曾经对这一段历史做过比较中肯的评价，他在1958年6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上对此件（《中国共产党宣言》，笔者注）作了如下的批语：“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①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②

2.1.2 农民力量的发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将社会大众划分为若干个阶级，是马克思阶级分析法的具体体现。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也经常采用阶级分析法，来寻找革命的力量与道路。他们中间比较早的是陈独秀。陈独秀曾经在1923年相继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③、《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④两篇文章，分析了当时的社会阶级。

在第一篇文章中，陈独秀把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三种：“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如中国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工商业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

^①关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在中共二大上就已经提出来，并明确区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此毛泽东只是针对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而言的。

^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1页。

^③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原载于1923年4月25日出版的《向导》第22期），载于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79~585页。

^④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原载于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前锋》第二期），载于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93~603页。

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财富，他们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他们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资产阶级，如中国新旧交通系之类。自盛宣怀以至张弧王克敏，乃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所营的工商业规模极小，没有扩大的企图，没有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种小工商业家，在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①在军阀阶级与资产阶级已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尚未截然分离的情况下，担负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命的中国国民党，应该“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革命”^②。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既要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又要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因为目前的资产阶级在遭受外国帝国主义政治或经济的侵略之下还很幼稚。

在第二篇文章中，陈独秀进一步把当时中国的社会阶级分成幼稚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农民以及工人阶级等。他认为：幼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强有力的政党、未脱离利用敌人势力发展它自己势力的时期，所以，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尽管这样也不能就说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要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官僚资产阶级则是依赖外国势力及本国贵族军阀政府，利用国家机关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们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们是工商阶级发展的真正障碍。而小资产阶级（包括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由于企业因竞争崩坏，生活不安，也可能产生浪漫的革命心理，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动摇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但是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安和不满足，也可以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趋于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因素导致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由于农民是生活困苦的小私有者，一旦组织起来就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与学生农民

^①转引自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83页。

^②转引自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85页。

不同，他们有着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在国民革命中是重要分子，然而还不能成为一股独立的革命势力。

可以说，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明确提出了除官僚资产阶级之外都是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革命力量，都是国民革命联合与团结的对象，更进一步指出包括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的国民革命是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

这两篇文章撰写的时代背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以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国共产党力量还很幼小，从而也受共产国际的控制。^①作为中共领导人的陈独秀有责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在工人运动前景暗淡的情景下，撰写相关文章为建立联合革命战线鼓吹。这既反映了陈独秀与反革命势力不妥协的立场，也表现出他对于进行一场完全而又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期待。然而，囿于时代的限制，陈独秀在这两篇文章里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而没有对各阶级进行细致分析，也没有阐明如何促使各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同时，他虽然强调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但是也明白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可以说，在第二篇文章中，陈独秀陷入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教条，即先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教条。陈独秀的美好愿望，很快就因孙中山的逝去和蒋介石的掌权而归于破灭。以“四·一二”政变为标志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破裂，正式宣告了共产国际路线的失败，也推动了国共两党的深刻反思。

在早期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比其他人更为深刻。一方面是因为他较少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他的工作主要在基层。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②一文，全面剖析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并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当时党内存在着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

^①201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陈独秀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命令。他后来评论道：“只不过是因为第三国际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才勉强承认在国民党内开展活动的必要性。”参见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53, 60. 转引自[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3页。

^②本文最早刊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5年原文收录于姜义华：《毛泽东著作选》，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本文即参考1925年原文，现登载于 http://www.zjsy.org.cn/news_detail.aspx?id=5308&classid=183，2013年4月15日访问。

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①

在文中，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当时的中国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②他认为，各阶级的革命态度是由它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依照此标准，毛泽东将社会各阶级分析如下：

①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与外资有密切关系之银行家、商业家、工业家）、大地主（如张作霖、陈恭受等）、官僚（如孙宝琦、颜惠庆等）、军阀（如张作霖、曹琨等）。他们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他们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

②第二，中产阶级。如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因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本国资本银行工商业的发展尚限在中产阶级地位。所谓银行业乃指小银行及钱庄，工业乃指小规模工厂，商业乃指国货商。凡是大规模银行工商业无不与外资有关，只能算入买办阶级内。）小地主、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资银行工商业之从业人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这个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乃取了矛盾的态度。即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的运动。但因现在的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发展及存在，感觉着威胁，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实现民族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全国内至多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

③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阶级在人数上，在

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②关于此文，宣道华（斯图尔特·施拉姆）曾这样评价：毛泽东所采用的框架，与陈独秀在1923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着重分析农民的家计是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佣劳工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来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各阶级。参见[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6页。从此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对于马克思的理解还不是很成熟。尽管如此，这是毛泽东早期对中国革命力量的全面分析，对其以后的革命策略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合计达一万万五千万。这个阶级虽同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时有三个不同的部份。第一部份是富裕阶层。他们的经济地位与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革命亦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大概不及小资产阶级全数百分之十，约一千五百万，乃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随着近年帝国主义军阀大中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使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但他们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大概要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百分之五十），即七千五百万。第三部分是每年要亏本的。这一部分人，大概原本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饱等，渐渐变得要亏本了。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其人数约占小资产阶级中百分之四十，即六千万——一个不小的群众，乃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以上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份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一定参加革命；中派可以参加革命；即使右派份子，受了无产阶级及小资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五卅运动和两年来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④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乃包含半自耕农、半益农^①、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之六种。半自耕农的数目，在中国农民阶级中大概占五千万，半益农贫农大概各占六千万，三种共计一万万七千万，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虽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由于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故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半益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以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既无固定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手工业工人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因其经济地位略与农业半益农相当。店员乃小商人的雇员，其地位与手工业工人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地位与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手工业工人人数大

^①半益农是分益农（Sharecropper）的一种。分益农是指向土地所有者交纳一定部分的收成作为地租的佃户。这种地租通常占收获物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以上。半益农指的是要向地主缴纳一半收成的佃农。

概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即二千四百万人，店员大概有五百万，小贩大概有一百万，合起半自耕农、半益农、佃农人数、半无产阶级人数共计约二万万，占全人口之一半。

⑤无产阶级。其种类及人数主要有：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都市苦力——约三百万、农业无产阶级——约二千万、游民无产阶级——约二千万，共约四千五百万。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而大多数在外资产业之下，就成为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还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经济地位与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其有组织的集中和在生产力上的重要。中国的农业无产阶级，乃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他们在乡村中乃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与贫农处于同样紧要的地位。游民无产阶级为失了土地的农人与失了工作机会的工人，其人数在二千万以上，他们乃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乏，又一个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当时中国各阶级的类型、数量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可以用表 2-1 表示（见下页）。

在文中最后部分，毛泽东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作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的真正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这一铺唾沫。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团结起来呀！”^①

^①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原文），“载于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网”，http://www.zjsy.org.cn/news_detail.aspx?id=5308&classid=183，2013年4月15日访问。

表 2-1 1925 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类型、数量及其对革命的态度

阶级		人数	对于革命的态度
大资产阶级 ^①		一百万	极端反革命
中产阶级		四百万	右翼邻近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但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都是半反革命。
小资产阶级	富裕部份—右翼	一千五百万	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
	自足部份—中央	七千五百万	平时中立，战时参加。
	不足部份	六千万	欢迎
		共一万万五千万	
半无产阶级	半自耕农	五千万	参加
	半益农	六千万	积极参加
	贫农	六千万	勇敢奋斗
	手工业工人	二千四百万	同半益农
	店员	五百万	同手工业工人
	小贩	一百万	同贫农
		共二万万	
无产阶级	工业无产阶级	二百万	主力军
	都市苦力	三百万	次于工业无产阶级的主力军
	农业无产阶级	二千万	勇敢奋斗
	游民无产阶级	二千万	可引导为革命的力量
		共四千五百万	

资料来源：转引自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 年原文），“载于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网”，http://www.zjsy.org.cn/news_detail.aspx?id=5308&classid=183，2013 年 4 月 15 日访问。

^①大资产阶级是在 1925 年原文中的表述，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而该文收录于《毛泽东选集》后，做了比较大的修改，表述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毛泽东是全面分析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及其对革命的态度第一人。他不仅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工业无产阶级，还找到了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农民阶级。尽管此篇文章写于1925年大革命高潮时期，但是毛泽东已经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1927年所发生的“四·一二事变”，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这篇文章是中国革命的指明灯，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以及动员这些力量的方式（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抉择关头，毛泽东选择了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进发，开辟根据地，走出了与苏俄“城市武装暴动”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2.1.3 “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提出

在中共成立的早期，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其实并没有一致的意见。由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知识、经历以及所处的环境，他们不可能形成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统一意见。李大钊和陈独秀不仅形成两个地方派系，而且对于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的看法也大相径庭。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主张工人运动，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方式；同样不接受农民能在改造中国社会中充当领导的想法；而李大钊则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所约束，为了寻找一条使知识分子接近社会生活的具体路径，他第一次把自己的目光直接转向农民。^①

由于陈独秀、瞿秋白先后担任中共总书记，加之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以工人运动为主。在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构想中，无论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农民的地位和作用都是相当模糊不清的。^②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瞿秋白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是将农民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附属。早在1922年，共产国际就做出了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估计，因而需要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

①[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②[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页。

理论上的论证和研究。陈独秀是带着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因而，他无法理解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最落后的这部分社会力量（被传统牢牢束缚的农民）竟能在社会改造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像诸多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认为，政治上落后的乡村必然要依附于先进的城市，城市无产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将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主宰力量。^①基于此，陈独秀并未把农民看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瞿秋白与陈独秀一样，都把城市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看作是社会革命中仅有的两支社会势力，他们都把城市无产阶级看作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和领导者。^②1923年7月，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新的指示，从战略上要求中共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决不能忽视农民的地位和作用。

虽说如此，在早期的中共文（章）件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农民问题的动议。1920年底，发表于《共产党》月刊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公开号召农民“自己动手”，“抢回”自己“靠着吃饭的田地”，并说共产主义者一定支持他们的要求。同时还号召：“同志们呀！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这种自觉呀！”^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正式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④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共产党员和它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某些地方发动了农民运动和减息运动，并成立了农民协会等组织。^⑤

中共二大的大会宣言中也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⑥这个宣言第一次分析了农村的阶级，指出它包括“富足的农民和地主、独立耕种的小农和佃户和农业雇工，其中小农、佃户和雇工占农民总数的95%，他们

①[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②[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4页。

③《告中国的农民》，《共产党》第3号，1920年12月23日。

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⑤此时期有中共党员沈定一在浙江萧山从事农民运动，并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彭湃在海丰成立海丰总农会从事减租斗争；刘东轩、谢怀德在家乡湖南衡阳从事减租的斗争。

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要解除穷困和痛苦，必须与工人握手进行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①其中再次提出应规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并把它作为最低纲领的一部分。“二七惨案”的发生，使早期共产党人认识到单靠工人阶级的力量难以取得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该年11月，陈独秀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农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②1923年，陈独秀又先后发表了《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重申了农民力量之大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但不足之处是过分夸大了农民的弱点与不足。邓中夏在《本团应注意农民运动》、《论农民运动》等文章中，在肯定海丰、衡山两地的农民运动并认为他们丝毫不逊于工人运动的同时，还提出无产阶级要注意农民运动，“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中国不革命则已，欲革命我们不教育，煽动，领导这占人口大多数之农民积极的参加，那有希望。所以我们现在要积极分出精力来做农民运动，是不该有疑问的，是必须充分了解的”^③。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依照正统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人，尽管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下开始重视农民的力量，但是始终没有将其作为革命的中心力量，而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毛泽东担任中共的主要领导者。出现此种情况，除了领导者个人的认识之外，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也是重要因素。正像斯图尔特·施拉姆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政策始终服从于斯大林的错误理论，斯大林最关心的是维护同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那些表面上似乎激进的政策完全被他们在国民党的权威下订立的契约所限制。斯大林公开发布命令，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而且这个党在农民运动中至少占有名义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③《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上的优势。这意味着共产国际代表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必须注意防止农民采取过于激进的行动促进农民革命，破坏统一战线。”^①

可以说，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农民运动是一种零散的、自发的、以个别人物领导为主的，还未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统一政策，亦不是党的有组织行动。尽管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是以个别人物领导为主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思想有着承继关系。李大钊在1918年冬至1919年春，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则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将彭湃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割据政权的思想总结并发扬光大，进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②

与陈独秀等人不同，李大钊很早就关注农村。早在1919年2月，李大钊就在《晨报》发表《青年与农村》^③一文，认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黑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黑暗；他们生活的利病，据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因此城市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去“开发农村”，使“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④实际上，文章中已经隐含着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成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正确认识的先导。毛泽东十年后则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的论断。

①[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2页。关于斯大林为什么坚持中国共产党要开展工人运动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斯大林出于与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需要。参见[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531页。

②关于李大钊对毛泽东影响的论述可以参考[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特别是序言和尾声部分。而关于彭湃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论述参见[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367页。

③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曾评价此文道：《青年与农村》大概仍然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展史上，对俄国早期民粹主义精神最准确的表达。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民粹主义倾向的意义并不在于年轻的知识分子应该去农村，还是留在城市。其意义在于，《青年与农村》一文中的许多理论观点与俄国民粹派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这些东西，都严重地影响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也影响到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的看法。在现代中国革命的政治策略当中，《青年与农村》所阐明的斗争策略（即通过民粹主义的方法将知识分子与劳工大众联系起来，实现中国的解放。笔者注。）是不容忽视的。《青年与农村》的问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拓荒者的尝试。也就是说，它是运用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讨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准备一场知识界的新思潮所做的尝试。1926年，在李大钊写《青年与农村》一文的七年后，他在沿着非正统倾向前进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发表《土地与农民》长文，第一次试图把农民革命的力量看作是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群众基础）。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95、98页。

④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308页。

1925年12月30日至1926年2月3日，李大钊在北京党组织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发表了长文《土地与农民》。^①在这篇文章中，他又重新详尽阐述了他早在1919年就形成的富有民粹主义精神的观点，第一次试图把农民革命的力量看作是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群众基础。在文章中，李大钊认为在完成民族革命大业的过程中，农民革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是第一位的。他曾预言道：“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②无独有偶，1927年2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李大钊重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③关于如何组织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的问题上，他一方面强调农村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很重视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④此外，李大钊对于共产党员在农村革命中的作用也做了明确地说明，“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如哥老会、红枪会等旧时的农民组织，笔者注），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随着乡间的组织工作，当注意到乡间的文化提高问题。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知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并须要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⑤

李大钊，“就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来说，与其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领袖，还不如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解释者。李大钊最先承担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使它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他的著作代表着我们时代最易引起

①原文可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86页。

②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③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④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⑤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4～85页。

争议的革命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解释与好战的民族主义的结合”^①。同时，李大钊厌恶城市生活的腐化，热爱乡村的纯朴，因而他督促年轻的知识分子要到农村去解放农民，激发他们的革命能量。实际上，他在农民的解放中看到了中国的解放。^②应该说，李大钊所解决的问题^③，是所有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要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及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与他同时期的图书馆助手毛泽东那里，在毛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上，引起了特殊的共鸣。^④

到了1925年底，在中国共产党内，对农民的革命潜力发生兴趣的，除了李大钊之外，还有毛泽东（先前的北大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他于1925年初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其故乡湖南组织了农民协会。此外，彭湃在广东进行了组织农民运动的尝试，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到了1926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农民暴动，农民运动走向了高涨，它已经成为共产党战略、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党内引起争论。尽管大多数共产党员都不否认农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着某些作用，但是对于如何估价这种作用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⑤

毛泽东是将外国的理论与中国实际融合最为成功的人。虽然他在1925年才开始从事农民运动^⑥，但是李大钊的思想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他。早期的毛泽东在长沙、安源等地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及以后，毛泽东陆续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论持久战》等文章

①[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2~3页。

②Maurice J.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81 转引自[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0页。

③这里的问题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笔者注）。

④[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5页。

⑤[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⑥据毛泽东本人回忆，他从事农民运动是从1925年开始的。他曾经对埃德加·斯诺说：“在以前我还未充分了解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可是在五卅惨案以后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活动的大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参见[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自传》，汪衡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宣道华（斯图尔特·施拉姆），也持有此观点。他依据埃德加·斯诺的著作，将1925—1927年作为毛泽东的农民时期，并认为此时毛泽东确立了他的农民是革命的中心的思想。参见[美]宣道华：《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7页。

或演讲，这些著作不仅强调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开创了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还提出了要对农民进行政治动员以取得民族主义战争胜利的思想。

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基本内容在前面已有所论述，因而不赘述。笔者将通过后面几篇文章阐释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形成。

自 1925 年中期开始农民运动逐渐走向高潮，“迫使甚至最面向城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农民运动表示敬意，已成为共产党和（或）国民党的发言人几乎每次谈话中自动出现的套话”。^①《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②发表于 1926 年 9 月 1 日，即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高潮阶段。所以，毛泽东开宗名义地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还指出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作用，“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就是全靠“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因此，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最后，他号召道：“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

^①[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928～929 页。

^②此文是《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该刊是毛泽东一九二六年五月至九月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主编的，旨在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该文的背景就是国共合作之后，孙中山提出了扶助农工的政策，并且以李大钊、彭湃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也着手于农民运动并获得了蓬勃发展。该文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刊印。参见 <http://news.sina.com.cn/c/2006-08-31/150510885041.shtml>，2013 年 4 月 12 日访问。

国民革命运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指出了旧社会权力的真正中心在农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击也必然要打在农村。^①也就提出了“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并说明了组织动员农民的基础——满足农民的需求。

然而，随着农民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右派害怕动摇在农村的统治基础，还有斯大林主导下的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维系国共合作，因而，此时中共内部又出现了防止农民运动过火，并对其责难的一种倾向。毛泽东针对这种责难，回到家乡湖南湘潭，在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后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指出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他论述道：“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②在湖南的考察使得毛泽东真正认识到了农民的革命潜力。

第二，进一步明确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③

第三，重新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与1925年底的分析不同，此时的毛泽东采用了马列的通用概念来表述农村各个阶级，他将农村的各个阶层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并提出农民中的三种类型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富农对于革命持消极态度，中农则对革命怀疑从而游移，贫农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④

①[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30页。

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

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④关于富农、中农和贫农对于革命态度的详细分析，参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第四，提出了利用农会组织农民和在农村建立农民武装的观点。他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①的观点，并认为农民加入农会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②。与此同时，指出了农民武装的两种来源：一种就是将旧武装从地主手中夺过来变成农民的武装；另一种就是成立农民的梭镖会。^③

第五，强调了政治宣传在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中的作用。他写道：“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④

除了上述五个方面的观点之外，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中也列举了一些其他的事项，比如从政治和经济打击地主；破除族长、神权及夫权的束缚；打破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严禁打牌、赌博及吸食鸦片；废除苛捐；开展文化活动；合作社运动及修道路、修河塘等。这些行动体现了毛泽东在农村开展政治革命的同时，也要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张。因为社会革命的成功是政治革命的保障。可以说，该报告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正确处理农村阶级关系以及制定相关阶级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领导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到这时他已具有中国革命的重点在农村的农民的观点，并且以后从没有动摇过。^⑤

上述就是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对于农民运动的理论探索。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发现了政治动员在农民运动中的重要性。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0年代的农民运动主要是政党支持与动员的产物，特别是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广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2页。

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9页。

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⑤[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3页。

东农民运动的兴起表明了这一点，而大革命失败后工人农民脱党的远比知识分子为多，也从侧面证明了北伐时期的工农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共发动起来的，民众自发的成分其实甚微。^①于是，我们可以认为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笔者注）的农民运动是在政党主导下变革乡村权力关系的革命运动。^②这场农民运动虽然是国共合作推动的。但是中共农民运动的本质是要进行阶级斗争，而国民党则是出于利用农民之目的。因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反而最终成为了动摇两党合作基础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中共虽然在农民运动中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但毕竟是在国民党的旗号下进行。^③农民运动的兴衰与国民党高层军政人物的支持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中共忽视了政权和军队，片面重视民众运动，当国民党右派举起屠刀时，民众运动立即走向瓦解。例如，虽然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迅速，可是一遇到国民党的反动，农民运动迅速土崩瓦解。^④

可以说，在大革命过程中，中共的组织运作成功地支持了北伐的顺利进行，但这些并没有保证它在此次革命中取得最终胜利。“共产党的‘文斗’毕竟敌不过国民党的‘武斗’。合作破裂后国共双方都总结各自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从中得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而蒋介石对中共最为羡慕和佩服的，即是中共的严密组织技巧和高超的民众动员能力。”^⑤

①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476页。

②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1页。

③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扶助，主要表现在制度层面，农运的具体推行主要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承担。如北伐前夕的广东农民运动，农运干部所以能和当地的地主分庭抗礼，主要借助国民党中央和广东省政府的法理权威。参见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3~484页。

④湖南农民运动瓦解的起因是“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晚，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率叛军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等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杀害。事变后，许克祥与国民党右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继续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这次事变为“马日事变”。这一事变是武汉汪精卫集团开始叛变，并准备与南京蒋介石集团合流的信号。湖南省委在三个多月之后承认：“湖南的党经过五月事变的打击，差不多完全瓦解了。”参见《湖南组织报告（5月~8月）》（1927年9月5日），载于《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省委文件）》（1927年）甲5，北京、长沙：中央档案馆、湖南档案馆，1984年版第125~126页。

⑤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6页。

1927年大革命失败^①之后，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尽管同年的8月1日，在南昌爆发了由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但是仍因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而以失败告终。基于此，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议上反思道：“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着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②会后，其本人被派往湖南组织农民秋收起义。自此，中国革命开始实现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不久之后的湖南省委讨论暴动和土地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的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行动，实行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③毛也提出了中共要独立进行农民运动的建议，他曾给中央写信：“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的旗帜已成军阀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④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之初，起义军仍以进攻长沙、浏阳等城市为中心而损失惨重，不得不转移到江西，转战国民党

①关于国共合作破裂原因的探讨，徐中约曾经有过较深刻地论述。他认为，“国共合作只不过是一场追求利益的结合，双方都需要对方，但也厌恶对方。国共合作只不过是一场追求利益的结合，双方都需要对方，但也厌恶对方。国民党在振兴党、发展一支党的军队和进行国民革命中渴望得到苏维埃的援助；并且期望利用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想利用国民党的基础来扩大影响，并最终从内部颠覆国民党。莫斯科的真正意图是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嫁接到已经成长的国民党的身躯上，这样共产党就能够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像榨『柠檬』一样将右翼分子排挤出去。”[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页。

②《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载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八七会议》。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③《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载于《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7年10月27日。转引自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54页。

④《湖南致中央函》（1927年8月20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北京、长沙：中央档案馆、湖南档案馆，1984年版第115页。

统治比较薄弱的山区，后来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联合建立和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道路，于是从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主要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0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①一文。在该文中毛指出了红色政权能长期存在的五个条件：第一，当前国内的政治状况是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并且新军阀之间混战，因此，红色政权可以在这种夹缝中求得生存；第二，红色政权发生在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即那些地方大都经历过民主革命的洗礼；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有利于小地方革命民众政权之长期存在；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是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必要条件；^②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正确决策。这是在付出大革命失败的惨痛代价并接受实践检验后而提出的。毛泽东这样写道：“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③

红色政权能够生存下来，毛泽东的斗争策略以及党的正确领导至关重要，这是保持红色政权长期发展的关键。当时党的特委（书记是毛泽东）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④在这些策略的选择中，毛泽

^①这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问题》。该文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6页。

^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它所以能存在和发展，既同当地存在着大革命时期受过革命浪潮影响的农民武装有重要关系，也不能忽视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湖南秋收起义队伍中有着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样一支正式武装，以后又有朱德率领的有着较强战斗力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上山。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54页。

^③《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④《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充分意识到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必要性，此时期他主张将所有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农民，以能全部抓着农民。^①同时，他也提出了正规军队以及地方武装之间相互支持，用逐步扩大根据地的方式取得工农武装割据胜利的思想。^②

第二阶段，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1930年，毛泽东面对党内对红军前途持悲观态度的思潮，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③，以增强党内的信心。他如此写道：“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④他还总结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⑤这就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革命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三阶段，毛泽东农民政治动员思想的提出。在《论持久战》（1938年5月）的演讲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抗日的政治动员”，他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⑥“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⑦毛泽东将农民政治动员视为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条件，也标示着他农民政治动员思想的发育，而后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日趋

第 51 页。

①《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 12 期，1927 年 10 月 27 日。转引自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54 页。

②这些思想参见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载于《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7～84 页。

③此文原是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后改题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97～108 页。

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98 页。

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98 页。

⑥《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80 页。

⑦《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13 页。

成熟。此种政治动员的思想一直存续到 1949 年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规模的多频次的“群众运动”就是其具体表现。

2.2 政治保障：党的建设与群众路线

革命年代的农村政治动员得以有效实施，关键在于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以及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在于有力的政党能够深深植根于革命群众。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共产党 18 年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①党的建设则是这三大法宝的核心环节。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中共还采取群众路线，与根据地群众打成一片而获取他们的支持。可以说，党的建设与群众路线便是革命时期农村政治动员的政治保障。

2.2.1 动员主体的强化：党的建设

影响 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重大事件，就是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 1924 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两者均是中国人‘以俄为师’的结果。从‘师夷制夷’，到‘取径东洋’，再到‘以俄为师’，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榜样的又一次重大转变。”^②可以说，两党之所以能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就是因为两党以俄国为师，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进而成为引领中国政治的两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虽以俄国为师，但它是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紧密联系的。它从成立之日起就很注重自身建设，这也是它能在短期内聚集力量的原因所在。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的改善是中共动员农民的基础，因为它在动员农民之时需要依赖

^① 《〈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 年 10 月 4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06 页。

^② 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 页。

其内部的官僚体制以发动党员。相对国民党而言，中共与俄共在宗旨、意识形态上更加接近，学习俄共的建党模式就更加彻底一些。它不仅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层级机构，而且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并广泛宣传^①。它沿袭了列宁首创的“民主的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将其中国化为“民主集中制”。这样具有严密组织体系、鲜明意识形态以及严明组织纪律的列宁主义政党就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如果说中国国民党只学习了俄共的组织制度与组织技术，那么中国共产党则属于全盘吸收俄共的经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在建党初期充分借鉴了俄共组织的严密性，比如在关于党内集权和党员纪律方面，国民党与俄共基本相似，而以中共的规定最为严厉。^②中共也效仿俄国建立了基层组织，将每一个党员纳入到组织中来。^③此外，中共也继承了俄共的党团制度^④。俄共党章中专门列有“党团”一章，规定在一切党外机关和组织中，凡有党员3人以上者，即成立党团。党团的作用就是在非党群众中实现党的政策，加强党在各方面的影响，并对上述一切机关和组织中的工作开展党的监督；党团完全服从党；党团所在的党外组织中必须解决的每个问题，应预先在党团内讨论，做出决定；所做的决定，党团成员必须遵守，并必须在该党外组织的大会上表示一致的意见。^⑤这项规定在保证了党与非党群众密切联

^①这里需指出的是，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时通过了第一个党章，由于中共初建并没有完全仿照俄共的章程，也就没有俄共那样建立一套与行政层级相并行的党的组织系统，一直到1927年6月中共党章第三次修正时，才真正以俄共党章为蓝本，确立一个比较完备的党章。参见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②比较三党党章关于“纪律”的条文，可以发现，俄共党章中只有4条，国民党基本照抄俄共党章，而中共则有9条之多，诸如“下级机关必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的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地方党部不得自定政策，不得单独发表意见；不经中央特许，党员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不得为任何资产阶级国家之政务官；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等等”，这些条文在俄共党章中均无。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97～598页；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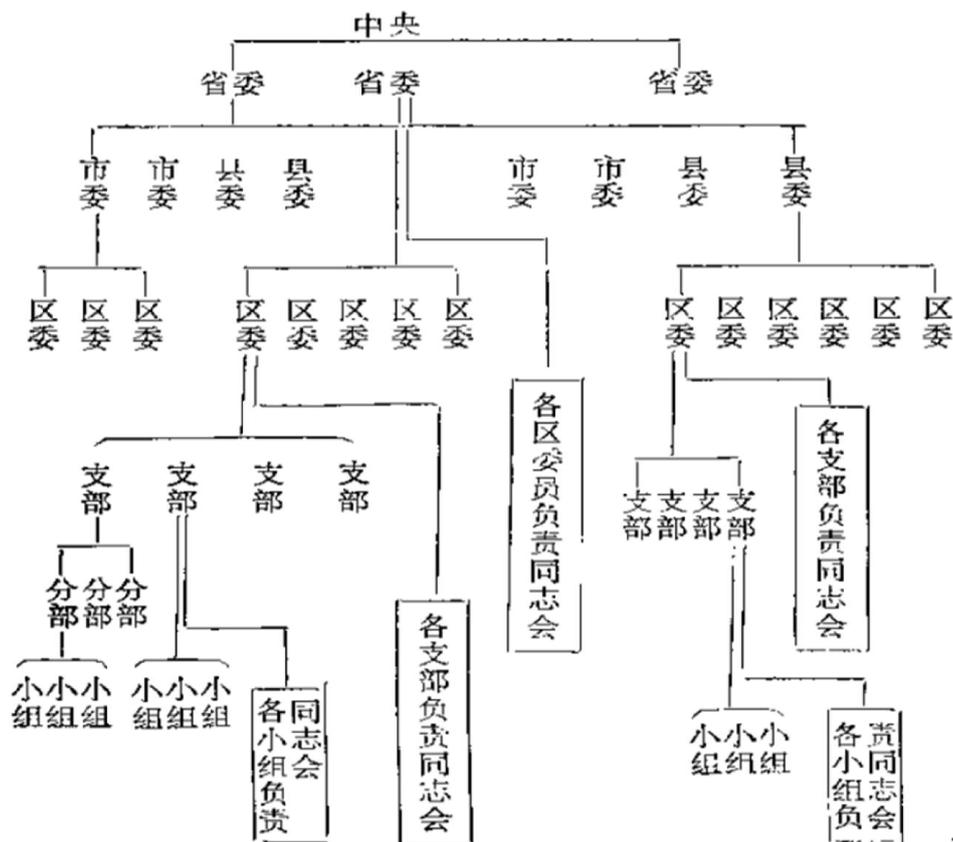
^③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作用，王奇生认为有四点：一是在于它对每个个体党员的笼罩性，二是在于它对个体党员的平等性，三是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凝聚性，四是在于它深入民间的渗透性。此观点参见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④关于党团的规定，可以参见1926年《组织问题议决案》、1927年通过的党章修正案第10章以及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第14章。《组织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中国共产党第三次章程修正决案》（1927年6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中国共产党党章》（1928年7月10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1～482页。

^⑤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系的同时，也加强了党对非党群众的影响，更实现了党对党外组织团体的严密控制。

中共学习苏联建立了党内的层级制，从上至下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状的结构，而且上级的权威下级要绝对服从，从而将组织的权力集中于最高层的一个小的精英集团。这就是共产党内所规定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权威等级秩序。这与中国传统的权威等级秩序不谋而合，如此一来这种组织安排很大程度上与民众的心理认知是一样的，因而能够较容易动员党员及民众，从而获得比其他政党更大的力量（见图 2-1）。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二期刊印

图 2-1 中共组织体系图

资料来源：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06 页。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发展。

中共发展党员范围的扩张意味着其势力的延伸，从而可能动员起更广泛阶层的力量。大革命失败后，它在农民中大量发展党员既是为了扩大群众基础，也是为了动员农民参加革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当1923年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员总数不过400多人；国民党则号称拥有党员20余万（比较松散）。^①因此，两党均面临着发展党员、扩充力量的难题。从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党员的构成和社会基础来看，两党的差异性并不大，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②中共早期，由于在青年学生中的吸引力比工人要大，所以在知识青年中发展组织工作比较顺利。在中共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工人党员人数并不多，特别是在五卅惨案之前。而青年学生被认为是最革命、最能奋斗的一群，也就成为了两党相互争夺的对象。此时期国共两党的有生力量正是这批中小知识青年。^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后“各种外来新思潮的涌入，促发了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的信仰，因怀着对主义的信仰而群相加入政党”。^④

中共自成立时就是一个开放型政党，但在它的发展早期有一种脱离工农群众的倾向，一方面是中共早期知识精英的理论宣传很难让文盲半文盲的工人农民读懂（甚至贫穷的工人农民买不起刊物）。但是很快中共就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开始采用一些新的手段和措施（比如建立工人学校、组建工人俱乐部等）来加强与工人的联系；^⑤在农村方面，中共党人则一直主持国民党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广州到武昌共举办七期），培养了一大批农运干部，从而也密切了与农民的联系。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只注重上层工作，中共则在基层占据了优势，与它建成“群众党”的目标不无关系，这种指向推动了中共走向基层，广泛联系群众。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上瘫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则更进一步下沉到基层，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并将党组织深深地

^①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②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页。

^③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2页。

^④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页。更详细的论述参见该书第415～425页。

^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8页。

植根于农民，从而获得了绵绵不断的力量。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之时，党员人数已经增长至121万。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1923年中共开始效仿苏俄的预备党员制，规定凡入党者须经过候补期：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①1925年10月，中共将候补期缩短为工人农民1个月，知识分子3个月。^②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次修正案则提出：劳动者（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兵士等）无候补期；非劳动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之候补期三个月；但市委员会或县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③更甚者，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更快的恢复元气，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则没有提预备党员制，则需一定的党员介绍由所在支部通过经县委批准（规定介绍人要负连带责任）。入党程序的进一步简化，是为了应付严峻的革命斗争需要，以便将更多的革命分子吸收进中共组织中来。伴随着中共政治斗争中心转移到农村，农民党员已经远远超过了工人党员。农民在中共的指导下，开始踏入政治舞台，从而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形式。

第三，党员的教育与修养。

入党标准的放宽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党员素质的下降。党员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党的力量的提升，还有可能涣散党的组织。在中共成立早期，党员数量少，在党内宣传共产主义纲领，并对党员开展教育是相对容易的。为了保障党员对党组织的服从，早期的中共还创设了严格的纪律，在约束党员的同时，也是对他们的现实教育。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由5万人减少至1万余人，除部分被国民党杀害外，尚有相当一部分动摇脱党，其中工人农民脱党的远比知识分子为多。^④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新吸收进来的工人农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还没有建立起来，党员缺乏对党组织的忠诚。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始注重党员教育与党员修养的提高。在1929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1923年7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② 《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4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章程修正决案》（1927年6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④ 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6页。为了保障红军的稳定性，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开始从军队中大力发展党员。

年12月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第一部分即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①。毛认为，红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妨碍了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这些不正确思想的来源，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所构成的；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错误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做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的重要原因。毛在这里提出了两大原则：党员教育进行的必要性是党员素质的低下；党员教育要由党的领导机关进行。这两个原则一直贯穿了革命年代的党员教育过程。

在党员的工作方法上，毛泽东强调了调查的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观点。^②毛泽东提出此种观点是为了防止党脱离群众。毛在《改造我们的学习》^③一文中，则进一步阐述了中共党员应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思想。这就提出了中共党员自身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文，还要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整顿党的作风》^④以及《反对党八股》^⑤一文中，毛泽东则指出目前党内存在主观主义（学风）、宗派主义（党风）以及党八股（文风）的问题，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所以他提出要反对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表现形式的主观主义、要消灭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建设统一集中的党、取缔空洞无物装腔作势的党八股来改善党的文风及加强党的宣传。毛泽东还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总结并详细阐述了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⑥这三大作风构成了党员教育和自我修养的基本准则，也成为中共的革命传统。

除了毛之外，中共的其他领导人也对加强党的建设进行了理论思考，诸如刘少奇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8月）、《答宋亮同志》（1941年7

①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6页。

② 《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18页。

③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803页。

④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829页。该文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⑤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0～118页。该文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

⑥ 《论联合政府》（第五部分），《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7页。

月）、《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1943年7月），朱德写就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1944年7月），陈云写作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939年5月），以及任弼时写成的《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1943年）、《论共产党》（1946年）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党员的教育，但是他们并没有摆脱毛泽东的思想框架，可以说是对毛党建思想的丰富。

中共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积极举办中共中央党校（其前身是1933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并将其作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部门。除了这种正规机构的设立，中共还非常注重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支部）的定期理论学习制度以及接受指导的小组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在加强党员学习、增进党员之间凝聚力的同时，也提升了党对他们的控制能力。还有颇具宗教色彩意味的入党宣誓仪式，也神圣化了党的组织与领导，强化了党员对党的忠诚。

第四，党内意识形态的统一。

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一种有理解性的想象、或是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比如世界观）。马克思则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态形式。马列主义政党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政党的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作为马列主义政党控制其党员以实现本党目标的有效手段而被使用。马列主义政党为了实现本党的奋斗目标与使命还大张旗鼓地向周围民众宣传它的意识形态，以求获得更多人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既有来自于苏联模式的舶来成分，又有结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化”因素。从革命时期中共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看，“苏联共产主义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更难以估量。一方面，其基本意识形态的起源是西方的，并且大多通过苏维埃俄国而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共在实际上又经历了某种程度的与莫斯科的分离，在取得政权以前有一段长时期的革命实践，这使得中共能够检验和吸收这一学说，并在某些情况下把它‘中国化’。它实际上是两者的混合：其起源是外国的，但中国人在进行了长时的处理之后，以充分的

独立性使之成为了他们自己的东西。”^①

苏联共产主义替中国引进了重要的新概念，诸如共产主义、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等。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就断定中国共产党人将严格地、并且永远地看重这些新概念。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被迫转移到农村，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斗争导致具有中国特色的斗争策略、政治作风和领导集团的发展。^②于是，中共开始了结合中国实际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探索，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实际上，中共建党至延安整风时期，党内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实现统一，也反映在党内的斗争之中。^③最初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在如何开展中国革命的道路上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试图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应用到中国，且在1927年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时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进而致使中共遭受惨重损失。由此，陈独秀不得不独自承担责任（很大的责任在于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前面已有论述），在“八七会议”上被罢免了总书记的职务，1929年甚至被开除党籍。代之的瞿秋白，号称是斯大林的得意门生，依然继续执行斯大林的错误路线，一年后在中共六大上因“左倾偏离主义”而被罢免总书记职务，而后1930年8月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而此时鲁莽的“立三路线”也受到了共产国际的严厉谴责，其本人也被送往列宁大学学习以纠正错误。随后控制中共中央的是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人，他们被后人蔑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且熟读马克思列宁经典。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博古等人在1931年1月接管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尽管如此，在马列主义教条指导下的王明博古等人并没有挽救共产党于危亡，反而导致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并遭杀害。在1931年11月7日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受毛泽东邀请来到了瑞金，并且他们召集了一次党内会议，“会上通过决议，谴责毛泽东没有采取坚定的‘阶级和群众路线’、搞游击战术、在土地革命中持‘富农’思想等错误。他们指责毛的狭隘的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实用主义’和‘总体

①[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②[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③此内容可以部分参见[美]费正清：《中国新史》，薛绚译，台北：中正书局，1994年版第345～349页。

的理论贫乏’。会议结束时，他们号召无产阶级领导土地改革、扩大红军、开展正规战争以替代游击主义。”^①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完全摒弃毛泽东式的方法，并企图取代他建立的机制。^②然而，在之后的代表大会上，王明等人的企图并没有得逞。毛泽东依靠自己根据五个重要原则而发展起的一套非常现实的策略^③挫败了王明等人的阴谋。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因为政治局依然被“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把持，而毛本人依然被看作是与中共中央机关对立的“局外人”。^④此时，党内的布尔什维克与毛派在一些非常根本而难以调和的问题上存在分歧。^⑤毛派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隔阂非常之大，因此要达成“和解”似乎不太可能。1934年7月，在瑞金的博古与在莫斯科的王明合谋从共产国际处取得了一份指令，将毛泽东隔离起来，禁止他出席党内会议。自此毛泽东被软禁在瑞金以西六十英里处的雩（yú）都，直到是年10月长征开始时才被释放。^⑥在长征开始前的三年间，是中共党权大涨的时期，也是中央苏区弥漫“以俄为师”、全盘俄化的气氛的时期，而苏区的创造者、党与军队的元老毛泽东则倍受压抑和冷落。^⑦

①[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8页。

②John E. Rue.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1927-193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pp.247~248. 转引自[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8页。

③这些策略的内容有：农民大众的支持；他自己的党政机关；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一块远离国民党控制的稳固的根据地；自给自足。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189-190.转引自[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8页。

④[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8页。

⑤这些分歧主要有：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将各类土地一视同仁地平均分配给小地主、富农和贫农，而政治局委员们却坚持要彻底剥夺地主，并按牺牲富人偏袒穷人的原则重新分配土地。他们指责毛泽东持落后的农民思想，阶级意识动摇及薄弱。在军事战略上，毛泽东倾向于诱敌深入的灵活的游击战术，红军在根据地内“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之薄弱点”，确保“各个击破，每战务必歼灭敌军或大或小之一部”。通过“急速迂回包抄”，红军可以迷惑敌人，赢得战斗。相反，政治局则坚持打阵地战以保卫根据地，并向白区推进而非等待敌人入侵红区。在日本侵略的敏感问题上，毛泽东宣称他愿意结成统一战线，建立一支由有愿意抗击敌人的武装力量组成的联合军队，而政治局则拒绝与改良派合作，主张迅速扩大红军队伍，以便当需要来临时，红军能担当起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的崇高职责。[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9页。关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分歧的更为详尽的论述，可以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二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章。

⑥John E. Rue.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1927-1935*.Stanford: The press of Stanford University,1966,p.p.263~264. 转引自[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1页。

⑦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二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至此可以看出，党内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逐步演化成一种权力斗争。陈独秀依靠自身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而赢得中共领导人的地位并获得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而瞿秋白、王明等人则仰仗共产国际的支持而获得意识形态的掌控权进而获得党的领导地位。他们的共同点则在于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后来又有张国焘在长征之后另立中央的分裂，也属于党内权力斗争。在1945年以前，以路线斗争为外壳的意识形态与权力之争，业已成为中共内部亟需解决的主要矛盾。

党内意识形态统一，最终是由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实现的。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之后，他就开始逐步控制了军权，并获得在中共领导层的相对优势地位。^①随后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他的路线得以中共的承认，而对王明为首的路线进行了批判。这实际上为毛在今后统一意识形态并占据中共最高领导地位铺平了道路。直到1941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的权力扩张达到了高潮。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即1931年9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如何使全党干部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问题以及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真正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统一了党的高级干部对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认识，提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任务——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发动全党普遍整风奠定了基础。

为了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首先利用自己在军队和党内的相对优势，将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从王明等人的手中夺过来^②，提拔陈伯达、胡乔木等人作为自己的政治秘书，通过编集中共文献汇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树立自己的权威^③，并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政治结合，改变了自己以往孤立无援的

2002年版第72页。

①徐中约也对此持相同观点。他这样写道：“严格来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笔者注）的召开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不符合党章或党内规则和附则；但不管怎样，它是中共党史上和毛泽东上升到权力顶峰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页。另一篇较为详细的论述，请参见[美]本杰明·杨：《遵义会议：毛泽东的崛起》，载于萧延中：《从奠基者到“红太阳”》，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21页。

②关于毛泽东对于意识形态争夺的详细论述，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二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177页。

③中共宣称《六大以来》将毛泽东确立为正确路线的代表，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以中共党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为主线，并遵循这一主线对所收录的一些历史文献进行了删改。该书与《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1942年出版）、《两条路线》（1943年出版）合称为“党

局面。这一切均为整风运动做好了铺垫。在意识形态的宣传方面，与王明、博古等人引经据典的“洋八股”相比较，毛的另一优势在于他能够用中国化的语言来阐释较为深刻的革命道理，从而更能赢得缺乏理论修养的大多数工农干部的支持。毛对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解也缺乏系统的把握，但是他深刻掌握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大核心理论，也就为他夺取中共意识形态领导权提供了有利条件。

整风运动的发生也有其现实背景。“当时中共的组织散落在广阔的华北地区上，若要控制指挥，必须党员忠贞而有纪律，在乡村里有经验丰富的干部，各个基地能够自给自足，以及运用无线电传送讯息。中共组织的政权在遥远的延安运作，除了不甚可靠的无线电通讯之外，一切得靠自己。而在华北地区发展成功的‘边区’政府与‘解放地区’政府都以党的控制为首要目标。”^①延安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初，它以学习毛及其刘少奇等人的一系列报告文章和《六大以来》等文件汇编为主，尤以毛在整风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篇报告作为整风文献的主体，借此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毛泽东开创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路线，实际上是树立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为党的思想路线。同时，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消除了党内残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这就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与范式相沿成习，在1949年后改变了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②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对于当时党的文艺工作也统一了思想，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③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

书”。这三部文献集，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据高华的研究，毛泽东编集《六大以来》是因为受到《联共（布）党史》的启发，为打击党内政治对手、掌握中国共产党内意识形态解释权而炮制的。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二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174页。

①[美]费正清：《中国新史》，薛绚译，台北：中正书局，1994年版第362～364页。

②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二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6页。

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79页。

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做出积极贡献，也指出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而且政治标准成为文艺批判的首要标准。如此，党内的文艺工作也要服从于党的政治权威，为政治服务，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①历时三年多的整风运动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②而告终。在此运动中，毛泽东将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确立了以他本人为核心的中共党史体系，毛泽东思想成为了党内唯一正确的路线，从而也保证了党的意识形态的独立性。随后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树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正是在整风运动中，由于刘少奇等人的吹捧，而引发了对毛的日益高涨的个人崇拜。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为建国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不良影响。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总之，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通过自身的建设逐步壮大了力量，并成为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支柱力量。这与不注重内在建设的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然而，中共的党的建设以路线斗争为幌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党内权力斗争的工具，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2.2.2 动员主客体间的联系机制：群众路线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句诗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共与群众的联系。群众路线^③作为中共三大作风的具体体现，也成为了中共政治思想

^①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二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5～6页。虽说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利用自身的政治优势实施高压手段（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等手段）实现了党内的意识形态统一，进而确立了党内的绝对领导权，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中共处于革命年代的一种无奈选择，因为在此之前路线斗争一直困扰着中共，甚至曾一度削弱中共及其工农红军的力量。毛主义的最大弊端在于他的“人治”，他不是通过制度途径，而是依靠权力斗争和思想改造来提升个人威望进而获得最高领导权。这也许正是需要我们大力反思之处。

^②该决议内容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1003页。

^③群众路线一词最早出现在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该信专门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指出红军要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组织和政权，发展武装。肃反、筹款等工作要经过群众组织来做，“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同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一

传统之一，它表现了毛泽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此概念是由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阐释的，但是中共自诞生起就一直注意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并在1929年后渐次出现群众路线的关键概念和方法。

中共建党早期，工人、农民出身的党员较少，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因此，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加强与工人、农民的联系。为了加强与工人的联系，早期的中共党人通过组建工会、工人俱乐部、举办夜校等形式积极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还成立工人运动研究机构并通过一些出版物来号召工人起来追求自身的解放（此效果比较差，因为大部分工人读不懂理论性比较强的文章，贫困的工人也不愿意买这些有偿的出版物）。早期的中共即使将自己的重心置于工人运动，但也通过了农民运动的纲领，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诸如“主张从目前实际情况入手去宣传和组织农民，反对预征钱粮，反对苛捐杂税，地方政府订定田税税额时须经农民协会同意，武装农民以防匪患，以及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等”。^①

在国共合作阶段，中共则进一步密切与工人、农民的联系。工会等工人组织得以广泛建立，甚至在上海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工人武装）；在农民运动方面，由中共党员主办了七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的农运干部，在广东、湖南等地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在北伐战争中，中共的群众动员能力得以充分体现，有力地支持了战争。比如农民卖食品给士兵，充当间谍、向导和搬运工以及为伤员抬担架，甚至武装简陋的农民武装攻击敌人后方；铁路工人破坏

切工作在党内讨论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中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这段论述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形成理论形态的标志。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强调指出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刘少奇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关于群众路线问题”，他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党的七大将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和内容载入党章。1956年，群众路线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党的八大党章中：“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到毛泽东思想时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①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页。

敌人交通，约400名安源矿工参加了叶挺的独立团等。^①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早期由于重视联系并动员群众，尽管党员人数较少，仍然显现出不可小觑的力量。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国民党的大屠杀，遭受惨重损失，党员数量急剧减少。中共在城市的活动开始进入秘密状态，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一部分中共党人则被迫转移到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山林）地区，开辟根据地。受到严重削弱的中共此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存下去并逐步壮大自身的力量。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全面封锁，如果得不到根据地民众的支持，那么共产党将无法生存，更遑论发展壮大。在此种情况下，主要活动在农村地区的中共特别注重与当地农民群众的联系，由此还制订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②以密切军队与民众的关系。至此可以看出，中共早期“仅仅是为了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与他们在其中工作的群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③。中共可以依靠自己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动员农民提供资讯并补充人力与粮食（如中国人熟悉的小兵张嘎，还有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被群众用手推车推出来的等事例）。所以，从最初的求生存，到以群众为主体、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党人认识论的升华，正如毛泽东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④

如果将群众看作是创造历史的领导者，那就大错特错。因为“与人民在一起工作，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意味着在他们之中迷失方向，放任群众自发行事，也不应对延安传统幻想化，或感情用事，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相信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扩大民主’的人。”^⑤在毛泽东看来，群众路线作为一种领导方法，“这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

①[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63页。

②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为之订立了三大纪律。后来根据革命斗争发展的实际需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过多次调整。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最终确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涵。三大纪律的内容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的内容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③[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3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⑤[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35页。

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①换句话说，（中共党员或者党的干部，笔者注）要对群众做工作，使群众无法详细阐述的意见化为群众的意见。^②这与列宁的阶级觉悟只能灌输给无产阶级的观点有些类似。但是，也正是群众路线将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联的共产主义区分开。^③

从属性上看，群众路线具有三个特性^④：第一，它是中共在革命根据地依靠群众支援时产生的一种领导方法。它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仅仅依靠党员的运动是不能持久的，它还要依靠非党群众可以提供的智慧、粮食支援和新生力量，甚至还包括履行行政职责。党当然仍独掌领导权，但没有群众的支援，其领导就不能实现高效率或是取得长久的效果。第二，群众路线对于官僚和知识分子具有控制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对作为封建主义和压迫文化的代表的传统官僚的敌视中，还夹杂着对现代官僚的疑虑，这些现代官僚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同情国民党或外国强权。群众路线便是对这些方面的担忧做出的反应，它要求官员与群众接触，把许多行政职责交给民众团体去做，要求民众监督官僚和知识分子的行为。第三，群众路线表达了一种民众主义的倾向，表达了与人民相认同和对人民负责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在掌权之前的大部分岁月里与农民紧密相联，这与毛泽东的“农村导向”有关。毛泽东在早期已认识到，在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革命应当是一场农村革命。群众路线必然导致强烈地倾向农民，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讲农民，就无法谈论他们的大众基础或义务。^⑤

实际上，毛泽东阐述的群众路线暗存着一定的结构。“由于群众路线主要是由中共领导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信念和工作方法加以总结和概括的，因此主体的位置在相当程度上被事先假定和隐匿了。”^⑥施拉姆曾这样论述，强调由政治精英构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种特征乃是群众路线本身所不可缺少的部分。^⑦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② [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35~936页。

③ [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35页。

④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58页。

⑤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

⑥ 景跃进：“‘群众路线’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内涵、结构与实践”，《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6页。

⑦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编选辑》编辑组译，北京：中央文

由此说，群众路线中隐含着领导（精英）与群众的两分法。一般而言，社会发展规律是由少知数精英分子掌握并揭示出，群众是无法直接理解的。因而，需要由这些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将这些规律灌输给群众，使之产生革命的自觉性行为。

下面这段话比较生动地描述了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

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党和群众的关系，本来就是“骨肉相连”、“鱼水相依”的关系。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党是人民群众的政治领袖，又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革命工具；党需要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人民群众需要党的正确领导。党是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那么，党怎样才能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扩大与增强这种联系，而永远不脱离群众呢？那就必须贯彻群众路线，从而，党才能坚持正确的领导，而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同时，也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才能获得解放，获得幸福。^①

在革命年代，中共通过“群众路线”密切了党、军队和群众的关系，并使党的方针政策在根据地得以顺利实施，也受到了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拥戴。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常被比喻成“鱼和水的关系”就可窥视二者之间的亲密，也可发现中共对于根据地农民的广泛动员，从而也就寻找出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凝练而出的群众路线业已成为中共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3 动员手段：利益满足、政治鼓动与主体性塑造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面临的最困难的理论问题是，在一个与自己的封建历史如此贴近的农业国里，如何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在缺少无产阶级基础的情况下使这项事业获得成功？^②这个

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

①杜李：《论群众路线》，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②[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8～59页。

问题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便凸现出来。毛泽东根据自己的探索对此的回答是建立一支党领导的，由农民、以前的土匪、国民党兵和其他混杂的成分组成的红军，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将通过教育而得到提高（将支部建在连上，既有利于中共对军队的领导，也有利于党的思想工作的开展）。同样，党也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新加入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应用于其根据地的民众，并最终应用于整个中国人民。^①教育能够成为革命的有效工具，毛泽东认为还需要具备一个必要的成分：人的意志。它在任何特定的形势下都可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并应当受意识形态观念的指导；但人最初行动时的意志却是至关重要的，它通过在实践中检验和应用思想观念而使教育程序发生效力。^②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充分调动了根据地民众求解放的革命意志，使之成为深入农民心中的思想观念，加以意识形态引导，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从而取得了全国性政权。不容忽视的是，中共之所以能够动员农民并将其塑造成为革命主体，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特别是土地需求）是基础与前提。

2.3.1 利益满足与农民主体性发掘

主体性是一个哲学概念^③。第一个明确提出主体性理论的是哲学家康德。在康德看来，主体性理论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自我意识”，认为“自我意识”是认识的“最高点”，主体的“最高点”。^④但是康德的主体性理论在强调人对自我认知的同时，忽视了人相对于自然的主体性。马克思发展了康德的主体性理论。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实践，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出发，着重强调了人是劳动、社会关系的主体，肯定了人的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创造性，认为人的主体性是这四者的统一。此外，马克思在肯定了人是实践和认识主体的同时，又指出现实的人和主体不是等同的。他认为，只有现实的人具备了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后，并积极主动的投身于实践，才能成为创造历史

①[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②[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③此处关于主体性的界定主要参考李汉卿：《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与农民主体性的发挥——兼议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完善》，《爱知论丛》，2009年第87号，第172～173页。

④[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页。

和实践活动的主体，具有主体性。马克思的人的主体性概念是基于实践的，是人相对于自然的主体性。所以，人的主体性表现为两个层次：即人的自我认知和人相对于自然的主体性。

具体而言，人的主体性包括主观性、自主性和能动创造性。^①主体的主观性指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即主体是在一定的意识、精神状态下，带着某种意愿、目的，在一定的观念、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认识活动的。主体的自主性指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是有意志力、有自由的，总是处于主导地位，以一定的情感、意志作用来支配客体。主体的能动创造性指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是积极的、能动的，是有选择力、创造力的。同时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主体性和客体性是辩证统一的，即人的主体性要受到自然的客体性的制约。

结合主体性概念，农民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农民改造农村社会的主观性、自主性和能动创造性，即农民在改造农村社会的过程中是带有某种观念的、有目的的；并且是有意志力的、自由的，总是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在改造农村社会的过程中是积极的、能动的，是有选择力、创造力的。

革命年代，农民的主体性是被挖掘出来的，是在满足他们利益诉求的基础上，通过思想教育手段而实现意识形态的灌输，并作用于人的意志，从而动员他们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这种情况，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得以加强，因为中共的革命战略重心自此开始转移到了农村。

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中，李大钊是比较注重农民主体性的。毛泽东作为他的学生将此思想真正地付诸实践。毛泽东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始于1925年，特别是基于五卅惨案之后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他发现了蕴藏在农民中的力量。宣道华（斯图尔特·施拉姆）认为，1925~1927年是毛泽东的农民时期，并认为此时毛泽东确立了他的农民是革命的中心的思想。^②1926年3月，毛泽东主办了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间接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考察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并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又实际主持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些经历促使毛泽东将战略视线转移到农村。

^①陈金美：《论主体性与客体性、主体间性的关系》，《求索》，1997年第5期，第86页。

^②[美]宣道华：《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7页。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失败，被迫转移到农村（实际上是山区），一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大都生活在农村，与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农民的生活也有直接的体验。因此，此二十七年间是中共直接依靠农民、教育农民、动员农民的重要时期。也就是在此时期，农民的革命主体性被充分发掘，成为支持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

中共早期开展农民运动的杰出代表还有彭湃。他在海丰和陆丰（合在一起称海陆丰）这两个人口稠密的县里保持了苏维埃统治达数月之久（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而此时的毛泽东仍尝试在人口稀少的井冈山立住脚跟，但是共产主义者发动海陆丰农民所面临的困难预示着他们以后还将继续碰到这些困难，而他们（彭湃等，笔者注）所采取的方法预示着以后从江西到陕北他们将继续完善这些方法。^①可以说，彭湃在海陆丰调动农民主体性并建立苏维埃农民政权的尝试，是共产主义者开展农民革命的第一次试验。因而，在此先介绍彭湃开展农民运动的方式。它在行动步骤或者组织手段方面具有十个显著特征^②：

1、最初的怀疑

彭湃在最初的尝试中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它显示出农民和革命家之间的鸿沟——农民将其看作是上层社会的一员。^③例如彭湃初去海丰农村之时，身穿白色的学生洋服和头戴白通帽，被农民误认为是收捐、做官当兵、收账的，甚至关门闭户不敢相见等。当彭湃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时，农民则认为过这种困苦的生活是“命中注定”。^④

2、适应和实际利益

彭湃改变了以前的装扮和说话的方式，通过一个村民介绍，等到晚上七八点钟农民空闲的时候再去演讲，也不排斥农民信奉的神明。最为重要的是，他通过留声机、魔术等娱乐活动拉近了与农民的关系，逐渐融入到农民中去。可是让农民加入农会比什么都困难，一般农民都是说：“我是很赞成加入农会的，

①[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

②[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367页。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223页。

③彭湃：《海丰农民运动》，载于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编辑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

④彭湃：《海丰农民运动》，载于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编辑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148页。

等人家通通加入了，我一定是加入的。”^①努力了一个月，才有三十余人加入农会。但是彭和其他会员解决了一场童养媳（她的公公是农会会员）意外死亡的纷争，树立了农会的权威，吸引了更多的农民加入农会。农民还从农会获得了更多的实惠：低廉的医疗、纠纷的仲裁与调节、学会了简单地计算以及书写农具和农产品名称，甚至为会员提供人身保护，像秘密会社一样。随着会员的增多，为了便于识别会员身份及管理会员，农会还制定了会员证（见图 2-2），并规定凡入会者需自己申请并缴纳二毫的会费。

彭湃为了鼓动农民加入农会，他改变了自身的形象，采用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策略，努力使自己适应农民社会，乃至对农民做出让步（对他们封建迷信的妥协）。农会吸引人之处更在于它能够满足会员日常需要和急需的实际利益。而这些实际利益的象征，可能就是彭湃借给两个最初追随者的三块银元，以此可以平息他们父母对这二位不下地干活而追随彭湃说漂亮话的怒气。在此阶段，彭湃将自己变成农民的朋友，通过给农民提供一些日常的帮助而获得了他们对于农会的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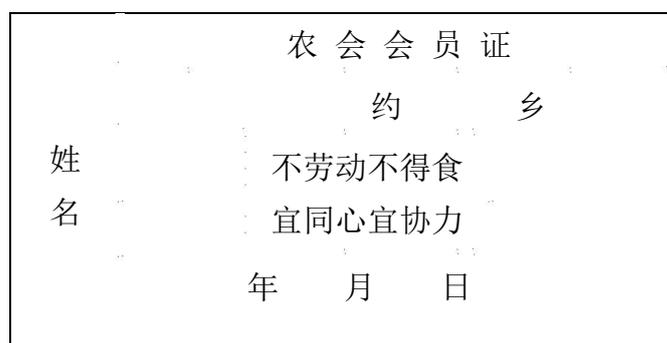


图 2-2 农会会员证

资料来源：彭湃：《海丰农民运动》，载于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编辑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55 页。

3、激起阶级斗争

实际上，比较早加入彭湃农会的会员不是为了银元（那些银元是彭湃借来的），而是基于一种信任而追随他。他们团结在彭湃周围，不是出于个人利益，要保护

^①彭湃：《海丰农民运动》，载于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编辑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52 页。

和增进他们的阶级利益（不仅是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①彭湃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称呼这些第一批改变信仰的为“同志”。对于其他农民，彭湃努力以他们不能自发想到的目标来动员他们，使他们投入到名副其实的农村社会革命中。

农会首先对控制各市的头面人物提出挑战，将各市的权力收归自己；制定了黑红混合的会旗，以团结联合大多数农民；择用区别于官厅四方形的圆形印章。这些措施加强了农民之间的团结，此时海丰县长是陈炯明的心腹，他不敢禁止和解散农会，因而海丰农会得以自由发展，提出了内外有别的口号，进一步团结农民。这种团结乃是执行进攻战略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把农民卷入新的冲突。^②

比如农会通过散布一种极简单的图表，夸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③农会善于抓住微小的冲突，并被故意加剧，导致少数剥削者与被剥削的农民群众之间的对抗。^④这样彭湃就将海丰地区的民众划分为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农会失败后，1925年2月和10月的两次东征引起的战争风云，最终将这两个阶级变成敌对阵营。1927年11月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得获益匪浅的农民更走上了“被动革命”的不归路。

4、恐怖而极化

除了农民由于废除了地租、取消了债务而害怕地主复辟统治之外，害怕复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曾卷入抢劫、杀人、放火等红色恐怖之中。^⑤有些红色恐怖不是出自苏维埃当局，而是来自农民的首创，比如“人肉宴”。这也说明农民运动失去了控制。革命活动已经蜕变成带有复仇性质的极化恐怖统治。

5、地方主义的动机

彭湃及其共产主义的同志们煽起的行动成功地激起了阶级仇恨。但是传统

①[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②[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③彭湃：《海丰农民运动》，载于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编辑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184页。

④一个事例就是，1923年7月一场台风造成的破坏被夸大，要求减少地租70%。大多数佃农可以接受传统的做法：减租与所受损失和减产程度成正比。一些地主同样准备协商，但是控制农会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和农民故意制造对抗。转引自[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

⑤关于海陆丰红色恐怖更详尽论述参见。[英]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6—1929年）：中国广东海陆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

的地方上冲突与邻里冲突^①并没有被“现代的”农民运动打断。宗族和社区的领导人通过恢复他们的传统组织，作为对共产主义者到来的反应，他们甚至利用这个机会来和对手或可恨的邻居算旧账。^②传统的宗族之间、旗派之间的冲突或者发泄私愤被赋予了革命的意义，引发了一系列杀害无辜民众的残忍行为。^③

6、农民的崇拜

对于共产党人而言，海陆丰当地的地方主义和宗族权力均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就像农民的宗教信仰和迷信习惯一样。彭湃在刚刚进入海丰时期，如果对于农民的神明还持妥协态度的话，那么进入苏维埃专政时期，这种谨慎就显得没有必要了。该政权开展了对“封建”思想和行为的攻击（现在很难对彭湃个人对此攻击应付多少责任做出评价），例如城镇和街道改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意味的名称，孔庙也被改称红宫；更有甚者赤卫队、先锋队和共青团的支队（青年农民）提前40年发动了一场小型的文化革命，摧毁了庙堂里的神像、烧毁了宗教建筑物，并向依赖农民的轻信而生活的一切算命先生、巫师或者风水先生进攻，将地主家的神像涂成白色，以表明这些是应该惩罚和破坏的。^④相反的，他们却保护以道教和佛教寺庙为代表的民间宗教，与此同时，在他们心中也开始树立了一位新的神——彭湃。因为，对这些农民来说，参加革命主要是盲目地追随一个领袖（就像先前追随陈炯明一样），只要能给他们带来利益或者新的秩序与和平。

7、依赖外部军事力量

1927年11月1日，逃亡到海陆丰地区的南昌起义部分义军，帮助彭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该政权仅仅存在了四个月（1928年2月28日灭亡）。苏维埃的诞生、生存和覆灭于是说明了那些控制地方或省周围的权力（或军事力量）的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⑤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能够开展

^①这些冲突主要指的是旗派、氏族之间的冲突，例如海陆丰地区的乌旗会和红旗会之间的冲突。

^②[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③例如，两个强大的宗族（侯姓在捷胜，林姓在梅陇）特别为他们所剥削和压迫的农民所痛恨。对他们的报仇没有什么可挑选的：不管他或她的社会地位多么地下，只要姓侯，在这个地方，或姓林，在另外一个地方，必然会被杀害。这些人都是地方主义的牺牲品。转引自[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358页。

^④[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⑤[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

起来，要么是由于有权势的人之间的对抗，要么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所采取的复杂策略。当那些在地区或省一级掌握较大权力的人认为威胁无法继续容忍下去之时，或它正有利于他们的对手，革命者的力量就会遭受扼杀。农民运动严重依赖外部军事力量的支持，自然使得它十分脆弱。

8、非农民的领导层

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彭湃等人，原本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而彭湃本人也曾东渡日本留学。这种出身和经历使得他们与农民分开，但是却让他们渗透到当地政界之中。彭湃年仅 26 岁时就担任了海丰县教育局长，他与陈炯明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还曾去司令部拜会之并为农会事业辩护。这些非农民出身的领导者可以从有影响的家庭关系网中获得好处。彭湃和他的朋友的革命倾向，是由同一源泉——民族的和意识形态的，而不是社会的，更不是农民的——激励起来的。可以说，中国革命开始于处于危机状态的上层社会的对立。然而，这些背叛自己阶级的家庭后嗣，在接受动员农民群众的战略以前，已脱离了自己的家庭。^①

9、组织

作为彭湃在广东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的罗绮园，曾直率地说：“利用他们（农民）作为基本力量，……给他们一些好处，让他们团结起来。”^② 这些来自农民外部的领路人给农民带来了有效地组织，但是农民参加这些组织只是着眼于具体的经济利益，他们并不知道这些领路人要把他们领到多远。共产党人提供的组织带来了农民运动的有效性，但也削弱了它的独立性，于是农民运动从属于中国革命的利益和总战略（1927 年以前是国民党，之后是中国共产党）。^③

10、地方的素质

这个特征决定了开创共产主义的农民运动为什么要发生在海陆丰地区，而

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60 页。

①[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63 页。

②[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63 页。

③在苏维埃专政的几个月中，海丰的农民（和陆丰的少部分农民）成群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据说他们曾占到当地党员的 85%，但是这 85% 的决定权比 2.5% 的知识分子党员的决定权少，而这些知识分子党员则受“东特”委（中共广东东江地区特委，彭湃任书记）指示严密控制。[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64 页。

不是其他地方。海陆丰地区与中国其他省份的区别有两点：一是该地区位处沿海，比其他省份更外向，也较容易受到外来的影响；二是本地有强烈的地方主义传统和尚武精神，这偶尔会使得农民起来反抗当局及其外来的代理人等。除此之外，在 20 年代早期，海陆丰农民和渔民的生活条件与同一时期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大多数农民相似，差别并不明显。^①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彭湃 1922 年以后的活动就是决定性因素。

以上就是彭湃 1922—1928 年在海陆丰地区开展的具有开创性共产主义的尝试，这些方法被后来的毛泽东等人加以修正和完善形成群众路线，成为中共革命传统的一部分。然而，彭湃采取的“冒险主义”（在苏维埃专政时采取恐怖主义，将敌人的范围扩大到地主队伍之外的商铺零售商以及一些丧失老主顾的手工业工人）和乐观主义（对农民数量和力量的迷信意味着对必不可少的军事力量的忽视）导致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失败。这也说明了中共处于农民运动的幼年期。海陆丰留给后来者的经验是：逐步排除共产党人的幻想、并激励（或强迫）他们改进对目标的选择，必要时接纳某个社会阶级（即使只是达到暂时结盟的程度），在农民的各个阶层之间少做概括，更好地做有根据的划分，并最终完善他们的著名的“群众路线”的方法。^②此外，彭湃能够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控制了该地区的社会交流网。控制交流网的一个途径是争取传统的社会关系网，并使之适应新的目的，例如，以种族为基础的党派通常都凭借现存的家庭、宗族和共同体的关系网来向集团成员传达新的政治目标并协调政治行为；另一种途径是，在那些旧的关系业已摧毁或本来就不存在着关系网的地方建立新的关系网的过程中，训练领导人并创建样板组织。^③他先是利用当地的熟人关系进入海陆丰地区，然后利用农会这一农民组织建立和控制了社会交流网。

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开展的农民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海陆丰模式的复制品，尽管其环境和规模有明显的不同。^④它们之间存

①[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66 页。

②[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67 页。

③[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小 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81 页。

④[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

在着特殊性也具有某些连续性。

特殊性之一就是民族主义的作用。共产党抓住了日本入侵这一天赐良机，在中日战争期间共产主义农民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共产党并没有改变农村苏维埃、中日战争和内战三个时期的基本连续性。在国内外战争时期，中共党人将注意力放在地方上，以试图满足农民最紧迫的需求。当中日战争开始时，农民对于国家的解放并不像对保卫地方安全那么看重，因为广大的农村地区并未受战争的影响。^①在与侵略者直接接触的地区，农民出于紧张和恐慌的心情而聚集起来支持第一个来到的斗士——坚决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共党人用重实效的办法，保护农村穷人的利益。

它们之间的连续性还表现在将保护当地农民反对剥削或者抵抗日本侵略者作为运动的第一步，这些行动共同取决于军事控制这一更基本的先决条件。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并在一定时间内生存下去，就在于它们处在统治和权力的空隙。共产党人将军事力量看作是取得政治权力和执行改革计划的先决条件。^②因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地区，主要不在那些剥削最严重和社会关系最紧张的地方，而在政治或战略有利的地方。^③海陆丰苏维埃的建立如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乃至陕北延安根据地的建设均如此。

它们第二个共性特点是，无论是海陆丰地区还是江西和以后的华北或西北的农民，贫农并不是首先被组织起来的。在早期，农民不愿参加红军。这些红军大都是由雇佣兵、哗变的士兵、从敌军来的俘虏和完全与土地没有任何联系的落魄者组成。^④当运动真正开始时，农民看到可以从中获益便开始加入进来。之后，共产党为了净化队伍就将那些掠夺成性的二流子，甚至地主和富农出身的地方干部清洗出组织。

它们第三个共同点在于，当农民一旦被发动起来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自己就会发现已经成为一部行政机器的零件。海陆丰短暂的苏维埃政权与毛泽东

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①[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②转引自[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

③转引自[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

④转引自[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在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毛主义的建设更为持久，从而能达到一个羽毛丰满的国家形态的新阶段。^①这些农民出身的革命精英在转化为统治精英的过程中，他既是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又是革命者，这种两难困境在江西瑞金时期就已经显现。他们不得不执行一些不得人心的指示，例如，强迫他们不情愿的同村人购买过多的公债券，甚至“自愿地”无偿交回他们已购的债券。^②对于干部是这样，然而就农民而言，1949年以前的革命运动与以后共产党的控制之间的连续性也保持下来了。^③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农民自发的骚乱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极少数知识分子在发动这些陷于怀旧或地方主义的农民进行革命方面取得了成功。^④尽管他们有着高超的动员技巧，但是农民遭受的剥削与贫困才是农民参与革命的真正动因。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足够的贫困和压迫，不满和疏远，使得共产党的组织者们一开始就有把握能找到许多农民接受他们的宣传。^⑤农民在为革命服务的过程中，发挥了他们的主体性，做出了许多无价的牺牲。这些举动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与他们的政策和榜样也不无关系。但是中共内部存在的矛盾与张力——中共上层对农民处境的关心是真诚的，并决心改善他们的处境，但他们把动员农民和盼望解放当作为一个目的服务的手段，而农民对于这一目的（国家独立、权力和权威）的兴趣要小得多^⑥——却造成了将农民阶级视为工具。因为在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曾经试图将这些蕴藏着不满情绪的巨大贮存库变成一个人力资源的巨大贮存库，并为了使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试图加以调动它，但远不够成功。^⑦因为农民参加革命并发挥主体性是

①[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②转引自[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页。

③例如，1946年豫鲁边区刚宣布红军的征兵活动，当地的农民便“送他们的年轻人去外乡投亲”，在1/3世纪后，被送到别的村子里投亲的是年轻的妇女；当时正值1979年加强计划生育运动，这次不是为了逃避“志愿”征兵，而是为了躲避强制流产。[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页。

④[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页。

⑤[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⑥[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⑦[法]吕西安·比昂科：《农民运动》（珍妮特·劳埃德译），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

基于利己主义的，共产党人的农村政治动员也是以此为基础的。当农民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之时，动员的力量就会变得很弱小甚至消失，农民的主体性也会被抑制。

2.3.2 政治鼓动与革命主体塑造

毛泽东在三十年代，曾经将军队与群众的关系概括为鱼和水的隐喻。诚然，人民群众对于中共领导的军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群众是红军的人力源泉、农民也给军队以物资上的支持。共产党人必须精心地培植人民支持的根源，使得维持他们的“水”不至于干涸。^①共产党人动员农民，从而获得的不仅是敌军移动的情报，还有其他好处，例如群众自愿担任运输队或辅助队的勤务。^②基于这点考虑，鼓动与宣传、满足农民最迫切的利益要求就成为中共获取农民支持的重要手段。诚如前面所述，中共巧妙的利用了农民的利己主义，通过政治鼓动发掘农民主体性，塑造了农民的革命主体地位。

在政治鼓动中，毛泽东相信通过革命斗争可以改变立场。在1933—1934年的查田事件中，表面上看是检查土地改革是否已经实施，但是这却为追求政治目的提供了一个框架。毛泽东深信，不管正式的财产结构有什么变化，这些过去的特权分子（地主、富农）仍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慢慢地在农会里取得权力地位，阻止这样隐蔽地恢复到旧秩序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基层不断地鼓动农民，鼓励贫农进行反对过去剥削者的斗争，以便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并让今后他们是社会的主人的信念扎下根来。^③下面就以标语宣传为例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鼓动。^④

标语是中国语言生活中比较重要的现象，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宣传的常见形式。它的语言简洁、通俗、形象、易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中共创造

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374页。

①[美]宣道华：《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37页。

②[美]宣道华：《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4页。

③[美]宣道华：《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8~949页。

④关于标语与口号的动员作用论述比较详细的参见韩承鹏：《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特别是该论文的附录，分类收集了若干标语口号。

了一系列的标语塑造了农民对革命的认同、鼓动他们参加革命的同时，也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灌输给了他们。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依据特定的形势和任务，中共创造了不同的标语以鼓舞农民的勇气和斗志。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为了顺利开展土地革命，以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为主线，开展了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在内的全方位的宣传。比较典型的标语有“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是领导工农群众的组织，解放工农的无产阶级政党”、“白军是土豪劣绅的走狗，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卫队”、“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房屋、财产分配给穷苦农民”、“国民党是土豪劣绅洋奴恶棍军阀官僚的集合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保护穷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勇敢的分子结合而成的，觉悟的勇敢的分子加入共产党来”^①、“苏维埃是普天下穷人自己的政权！”、“在苏维埃政权下，穷人不缴一文税！”^②这些标语一方面说明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另一方面则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如此带有强烈政治性质的标语将敌我截然分开，取得了动员穷苦农民积极参加革命的鼓动效果。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对农村社会进行变革，中共还打造了“打倒包办婚姻，实行婚姻自由”、“实行男女平等自由”、“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番民与汉族人一律平等”、“回番汉是一家人”等标语口号。^③这些社会性的标语及其蕴含的政策满足了农民最迫切的需求，与政治标语配合取得了更好的动员效果。这也说明了中共领导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凸显成为此时期的主要矛盾，抵抗日本侵略成为中国人的首要任务。此时期，中国共产党抓住了抗日救亡的历史时机，将抗日的大旗高高举起，提出了许多抗日救亡的标语。“白军兄弟与红军联合起来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誓死不当亡国奴”、“为民族独立而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标语随处可见。^④这些标语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也折射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了中共的

①王雪竹：《略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标语宣传及其启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2期，第72～73页。

②韩承鹏：《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附录第154页。

③王雪竹：《略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标语宣传及其启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2期，第73页。

④王雪竹：《略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标语宣传及其启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2期，第73页。

抗日主张以及渡过战争难关的手段与措施。除了对农民的宣传，八路军还创造性运用写、贴标语的形式开展对日军的宣传战。例如，“日本工农被压迫人民与中国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八路军绝对不杀俘虏，把你们当作弟兄待遇”、“家里的希望，不是勋章，而是你的笑脸”、“家里热望诸君回国”等标语。^①这些标语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敌军的士气，为八路军战胜日军提供了条件。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和平、民主、团结”已经成为中国人在经历八年抗战之后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适时推出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标语。随着内战朝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之时，为早日结束战争，中共又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标语^②。这些标语指向了中国革命的目标——国家统一、人民解放。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军民的斗志与勇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上述就是中共在革命年代的一些典型标语。那么为什么选择标语而不是其他形式来进行政治宣传，这是值得思考的。在中共发展早期，曾经以创办刊物的方式进行宣传，但是由于农民工人的知识水平较低而看不懂，况且贫困的工农群众无力购买这些刊物。中共的重心在转入农村斗争之时，标语这一宣传形式以其简洁方便、通俗易懂的特点得以广泛应用。实际上，早在孙中山时期，标语就已经开始在革命中应用，例如，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些标语口号发生作用的机理主要诉诸于人的情感、激起人的激情、其效果的实现必须通过“精神变力量”的转换。^③换句话说，这种转换是基于大众的社会心理而实现的。

根据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研究，大众心理具有激情盲从易感染的特征。^④“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为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

①王雪竹：《略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标语宣传及其启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2期，第73页。

②王雪竹：《略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标语宣传及其启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2期，第73页。

③韩承鹏：《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8页。

④[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1页。

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①这样在群体中便蕴含着有时候是无穷的力量。“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②正是群体与个人心理的差异，所以，“……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例如利用现代的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所借助的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也十分明确，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③“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④“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在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感染力。”^⑤“勒庞认为，从革命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很容易解释。一旦受到某种持续的刺激，大众的情感强度就会像不受控制的惯性运动一样，不断攀升。”^⑥基于上述群体心理特征，简短有力的标语口号不断地“重复和传染”，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农民内心，产生了巨大能量。

①[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②[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③[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④[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⑤[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⑥[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4页。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标语口号能够被农民接受并产生动员效果。中共创造的标语具有这样四个特征：一是标语口号契合了常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二是标语口号易于识记；三是标语口号能创设力量氛围；四是口号能凝聚人心。^①除了这四方面的特征，还有就是这些标语口号当中蕴含的政策，满足了农民的利己主义要求。因此，这些标语能够广为知识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接受。

在中国进行革命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将革命意识灌输给工农大众。现实是中国的工农大众文化水平很低，难以读懂和理解艰涩的革命理论。为了破除这一瓶颈，中国共产党人高超地选择了标语口号进行宣传动员。这些语言简洁、凝练、通俗易懂的标语，确实符合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它填补了共产党知识精英与农民大众之间的理论鸿沟，也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念成功地内化在农民的革命行动里，并且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转变了他们的立场，塑造了农民的革命主体形象。这与当年陈胜、吴广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口号号召农民起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4 局部实践：根据地土地改革中的政治动员

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最根本的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关涉到动员与整合中国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也影响着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资源的获取。正如毛泽东所言：“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②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农村，随之也开始实施土地革命，试图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发动广大农民。1931年春，毛泽东提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③。该路线赢得了农民对于中共及红军的信赖，为了保卫土地改革的成果，农民开始踊跃参军。但是在整个土地革命期间全国只建立了12块根据地，而且这些根据地大都在山区，因而此路线影响范围有限。此路线也存在着对富农的偏见。到了1941年，为了联合抗日力量，

^①韩承鹏：《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3~35页。

^②[美]路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王恩光等译，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③该路线的主要内容有：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又提出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体现了对地主的妥协。而到了国共内战的爆发，中共提出了明确的土地改革政策，并在根据地农村实行彻底的土改。此项改革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的土改。基于此，本文选取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①颁布以来）的土地改革，对中共动员农民的方式进行分析。

1947～1949年是国共两党围绕政权展开激烈较量的关键时期，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土地改革成功地动员起了农民这个冷漠保守、具有政治疏离感的阶级，并将其成功整合为一个具有强大内聚力的群体，使其成为政治运动中一支巨大的力量，迸发出摧枯拉朽的威力。^②而国民党的土地政策沿袭了其纸上谈兵的一贯作法，^③所以在战争中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也是它迅速丧失对大陆统治的要因之一。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克服农民的政治冷漠感、激发其反抗意识，就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共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有三个环节值得特别注意，即：“访贫问苦”与“诉苦”运动——面向底层的政治动员；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改写历史的权力结构大变动；“认同意识”的提升——塑造新人的政治社会化。^④这三个环节构成了根据地土改过程中农民动员的完整链条。下面就分别进行论述。

第一，“访贫问苦”与“诉苦”运动^⑤——面向底层的政治动员

①它的主要内容是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和乡村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以乡或村为单位统一分配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所有权归农户所有。土改前的土地契约、债约一律缴销；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他营业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本法公布前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农民不要求重分，可不重分。这是一个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

②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第22页。

③关于抗战后国民党的土地政策的简要介绍参见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328页。较为系统的研究有金德群：《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④参见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第22～33页。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动员还可参见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第15期。此外，关于土地改革的微观描述可参见[美]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第4章），陶鹤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60页；王友明：《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5章。

⑤关于土改中“诉苦”的研究可以参进程秀英：《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

亨廷顿曾言，“农民既可以成为维护现状的堡垒，又可以成为革命的突击部队。农民扮演何种角色，取决于现行体系满足其直接经济和物质需要的程度如何。这些需要一般集中在土地占有以及租赁、租税和价格。”^①由此可见，对于农民切身利益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能否有效动员农民。对此，毛泽东在内战初期也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②

在土地改革初期，由于在许多农民头脑中存有缴租虽然是负担但也是天经地义的意识。费孝通曾描述过这些由“习惯规定的约束力”对既有土地制度的维护作用，乡间的农民常常认为，除非遇到天灾人祸，否则好人是不该抗租的。^③这些表明，难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土改，只能是自下而上的深入、发动农民来诱发农民的土地诉求，从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面对这种情况，中共采用“访贫问苦”与“诉苦”运动两项技术来动员农民参加土改，引导农民形成阶级意识，成为革命的基本力量。这两项技术的共同点就是情感动员^④，通过让农民形成身份认同，进而提升他们的阶级意识。这也是中共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

“访贫问苦”是动员农民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派出土地改革的工作宣传队，主动与贫农接近，与他们吃住在一起，以了解他们的情况，并通过口头讲演、贴布告、写标语、演新剧等通俗的宣传形式，引导农民意识到自己在受苦，告诉他们受苦的原因不在于“命运”而是现行的制度不好。当时河北的土改情况表明，由于耕者有其田是一项新的工作，群、干对此多很模糊，不少的人认为是平均地权，致使富农恐怖，中农怀疑，贫苦群众也有的存有“正统”与“变天”思想，如有的说：“人家的肉安在自己身上长不住，穷富在命”；“斗争了人家，国民党过来了呛不了”。^⑤因此，中共通过派驻工作队“访贫问苦”，对农民

政治社会学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页。

②转引自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页。

③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6页。

④关于从情感角度对中国革命的梳理，可以参见[美]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载刘东：《中国学术》（第4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⑤《中共冀中九地委关于九分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初步经验》（1946年10月23日），河北档案馆：《河北土

实际利益的关怀及开展各种通俗的宣传活动，使农民意识到了自己才是土地的主人，广大贫民也要反对村霸、豪绅、地主的压迫剥削，并喊出了“出出冤枉气，要回祖爷地”的口号^①。

动员贫农的第二步就是开展“诉苦”运动。“诉苦”运动是以受地主剥削的贫农现身说法的方式，“揭发封建压迫为主”、“挖苦根、吐苦水”，以诉苦者自己的痛苦，说明“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以启发阶级仇恨。^②实际上，这种“诉苦”是利用怨恨激起阶级仇恨。在“诉苦”会上，为了更好地引导农民，中共又将该活动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许多村庄以“算剥削账”、“挖苦根”等为主题启发农民回忆自己受过什么苦及受地主剥削的经历，以此吐出心中的苦水。在河北省的土改中，定县土地训练班刘山祥同志在“翻心会”的诉苦，惹得全场痛哭，鼓励了整个训练班二百三十个人的斗争意志；安新同口群众翻身的火就以诉苦点着的：佃户陈铁诉说了自己被逼的报鼓还账^③，王 XX 诉说了父亲被陈家逼死的过程时，会场由悲静而骚动起来，一致高呼“我们要和狗日的算账去！”“血债要在今天还！”^④从诉苦中，发现了陈家的斗争对象，和以陈铁为首的斗争骨干，群众由摆不开面子和认为向地主主要土地没理，转为积极斗争与认为自己斗争的合情合理。^⑤

第二步，召开诉苦会，将农民聚集起来，让他们在各种会议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地主，借此增强农民对“苦主”的情感认同。“如在延安市西郊五个村举行联村大会，会场墙上贴着‘有冤申冤，有仇报仇，有气出气’的红标语。会上农民诉苦地主无理收租子和诬告好农民的罪行，余得清先诉苦，说‘地主折家收租子，用大斗，碾子在夜里闲着都不让我们农民用，还把我的磨子抬走了。’他指着折家，激昂地说：‘不还我的磨子，就拉你的小毛驴。’青年农民高银忠夫妇先后控诉说，地主惠思祥霸占他们刚开垦的荒地，还诬告他们不交租等。”^⑥

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

①《解放日报》，1946年4月11日。转引自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第24页。

②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第24页。

③即倾家荡产还账。

④《中共冀中九地委关于九分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初步经验》（1946年10月23日），河北档案馆：《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

⑤《中共冀中九地委关于九分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初步经验》（1946年10月23日），河北档案馆：《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

⑥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

第三步，让地主富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干部出面揭露旧社会制度的弊病，从反面教育群众，使他们明了封建阶级的本质及没落的前途。^①与此同时，组织那些遭受地主剥削和压迫最多的人开展“谁养活谁”的讨论，使农民认识到他们受苦都是由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造成的，进一步引导农民提出“土地还归种地人”的口号。^②

这三个步骤之间蕴含着一定的递进关系，前两步的诉说苦情、引发苦感是利用农民的忿恨激发农民群众的仇恨之情，第三步则通过“谁养活谁”的讨论等讲苦理、挖苦根的形式从逻辑上将这种仇恨引向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对手——国民党。当时的一份文件对此写道：“如果只是诉出苦，而不能认识苦的来源，诉苦便失去其意义。所谓‘苦根不挖，诉苦白搭’，‘挖的不深不净，哭瞎眼睛无用’。因此挖苦根实是诉运（即诉苦运动，笔者注）的中心环节。”^③挖苦根是一种借助逻辑推演的归罪策略。^④通过“访贫问苦”和“诉苦”，中共将革命的意识形态灌输给了农民，使他们在自己亲身体验的基础上提升了阶级认同意识，也让他们认识到了一个道理，即个人要通过阶级团结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应该说，这种动员方式适应了农民的社会心理，从而激发出他们自觉参与土改的革命热情。

第二，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改写历史的权力结构大变动。

在不断的“访贫问苦”与“诉苦”运动中，中共就将不同的阶级划分建构起来并内化在农民的意识中。农民革命的激情被调动起来，为了让这种激情保持下去并按照中共的设想发挥作用，就需要有组织保障。在土改中有两种组织发挥着作用：一种就是中共自身的组织体系，由于长期在农村工作，它已经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体系，在每个村里都有党员及其组织（党支部或者党小组），这样中共的组织体系自上而下地深深渗透到了乡村基层末梢，瓦解了

第 24 页。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11 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 年版第 187~189 页。

②马润凡：《1947~1949 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 年第 2 期，第 25 页。

③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怎样开展诉苦运动》（1947/01）。这份文件还在“挖苦根”之外进一步提出“挖甜根”，如“为什么共产党八路军来了穷人能翻身？”“我们不参加解放军，土地保得住么？我们对土改应报什么态度？”等，以把战士对地主、国民党的仇恨进一步转化为英勇作战和支持土改的行动。转引自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5 期，第 107 页。

④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5 期，第 107 页。

乡村原有的士绅统治架构，建立起基于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统治方式。^①这种趋势在土改过程中得以进一步加强。另一种就是在中共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由贫雇农做领导的农会组织。该组织将分散的个体转化成了有组织整体，扩大了土改过程中的农民的力量。中共也认识到，要使土改真正达到动员农民的效果，就不能将土地拿来直接分配给农民，而是要发动农民自己起来斗争，树立他们对于自身力量的信心。^②换言之，要充分调动农民在土改中的主体性。农会便成为了农民斗争的武器。在参与农会活动中，农民不仅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也改变了自己的思想意识，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革命潜力。随着土改的日益深入，乡村权力不断下移，农会地位逐步提升，逐渐取代宗族等传统组织，也提升了农民的地位。农村权力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农会中，各方的权力都掌握在贫农中农手里，他们实质的组织力量处于占绝对多数的地位，所以贫雇农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起来了。^③中共引导农民从政治（批斗）、经济（分财产）两方面打击地主，树立农会的权威，并最终形成了“一切权力归农会”^④的局面。

在土改过程中，中共通过发动农民以阶级标准对乡村社会进行了结构重塑，实现了“从根本上重新分配权力和地位，重新安排以前存在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⑤

第三，“认同意识”的提升——塑造新人的政治社会化。

伊斯顿与邓尼斯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人们习得其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⑥它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与改变的过程”。^⑦为了保障土改的胜利果实，中共就利用宣传教育将自身的思想和主张内化在农民脑子里，从而实现他们的政治社会化，以获取他们对革命的认同与支持。

①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341页。

②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第25页。

③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第26～27页。

④这里的一切权力指的是农村的社会管理权，农会要受中共的领导。

⑤[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页。

⑥David Easton, Jack Dennis.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rigi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9, pp7.

⑦[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由于农民文化水平低和保守的特性，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对其进行宣传就很重要。在这方面，中共党人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以办学（识字班、夜校等）、大众传媒（报纸、标语、传单等）和大众文艺（演戏、说书等）的方式，将学习、读报及文艺汇演与生产战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效果。在这些活动中，中共将革命的价值准则和意识形态灌输给了农民，提升了他们对自己的认同，也实现了塑造“新人”的目标。农民也开始关心政治，变得对政治有依赖感，他们的心理体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性并成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例如，河北省冀东区土改结束之后，取得了一系列的政治效果：一是大大巩固了根据地，给根据地的发展提出了空前有利的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二是军民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农民保护既得果实，参加武装斗争的情绪空前提高，只在秋前土地改革中，一次扩军，即有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名农民子弟入伍（这就是部队方面初步统计的数字，据各地数字，曾经动员出者一万九千多名），充实了部队的新血液，便利了我们建设和改造军队；三是巩固了与正在巩固广大农民坚决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加强了党与人民的联系而且正在加深这种联系；四是这一土地改革，大大帮助我们全体同志从思想上前进一大步，改进了无数党员干部的思想，使全党更加认识了五四指示^①的正确性，证明了毛泽东、刘少奇同志英明果断与远见，提示了我们必须时时研究与学习中央与毛主席指导群众的思想，来不断提高自己，使我们的思想真正与广大人民的要求完全一致。^②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土地改革并不是乡村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很大程度上是外力嵌入和政治动员的结果。就中共的动员目标而言，通过土地再分配使农民“翻身”并不是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启发群众“翻心”，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在于受剥削，进而激发其对地主的复仇心理。^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土改过程中不仅农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中共而言也是一次发展机遇。中共在根据地创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最基层的村层面而上直至中央的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使得原本非常松散的基层社会被

^①五四指示，指的是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里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②《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及土地改革初步总结（节录）——李楚离在冀东区党委十一月扩干会上的讲话》（1946年11月19日），河北档案馆：《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

^③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99页。

有效地组织起来，服从中共的集中统一领导，上传下达，运用自如，确保中共的指示可以在短时间内从上而下，通过层层组织系统付诸实施。^①实践证明，这套组织系统非常有效，使得中共在战争中得以充实的后勤保障，弥补了物质层面的弱势。该组织系统也将长期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政治生活。

2.5 革命时期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及评价

在本章中，笔者试图描绘中共在探索革命战略的过程中是如何逐步选择“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以及它是怎样动员农民来保障自己领导的革命获得成功的。从宏观方面看，以制度建设（党的建设及党领导下的社会经济变革）以及以意识形态为内核的政治鼓动成为了革命年代动员体系的两大支柱。实际上，中共在构建自己的动员体系之时，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威中的精英主义与等级制。中共建立不久就仿照俄共的模式完善了自身的等级体系（之所以能模仿，是因为俄共的等级制模式在中国也有存活的土壤，即中国政治中等级制的传统），且订立了比俄共更严格的组织纪律，来加强党的凝聚力。而对精英主义的继承则体现为党内与党外两方面。在党内，经过残酷的党内斗争最终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内精英集团（官方称之为领导集体）；而在党外则是针对群众而言的，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政治精英分子组成的，它既自立于群众之外，又与群众发生联系，它给群众以意志与方向。^②

另一方面，革命背景下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的基本目标导向是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与整合，以及社会经济变革。^③因为这三个目标吸纳了现代中国革命的主要精力，而作为革命一部分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得不对这些问题做出反应。

农村政治动员的核心是处理党、军队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发展出一套非常现实的策略：农民大众的支持；他自己的党政机关；

①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2页。

②[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

③[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一块远离国民党控制的稳固的根据地；自给自足。^①在动员过程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成为动员主体，农民是动员客体。前者的发展离不开后者的支持，而后者的支持能够成为前者的动力之源。

为了取得理想的动员效果，中共非常注重自身建设。党的建设先行的是党的组织系统的完善、党内思想的集中和统一（这个过程比较漫长，自中共成立起至1945年“七大”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止，历经二十四年，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实践的结果）。与党内思想的统一同时进行的是党员教育。大量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可能后果就是造成党内思想的混乱，严重影响到党的正常运行与发展。所以，中共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党员教育（既包括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包含遵守党的纪律等内容）。党的思想统一与党员教育互为表里，将中共打造成铁板一块。可以说，思想的灌输、纪律的加强以及严密的组织系统，使得中共内部的精英集团对党员的控制前所未有的加强了。这种控制在战时是有必要的，因为中共组织的政权在遥远的延安运作，除了不甚可靠的无线电通讯之外，一切得靠自己。^②

在动员手段上，中共基于社会经济改革满足了农民的现实利益，从而赢得了农民的拥护。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在将组织系统深入到每一个村庄的同时，也将阶级斗争的思想灌输给了农民。尽管农民“既非积极忠于现存的统治秩序也不反对它”，而是仅仅关心他们自己日常生活的事情，^③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向普通民众和精英灌输意识形态方面态度十分坚决，即使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的接受程度不同，但它的生气勃勃的传播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在共产主义制度的成员资格有了新的觉悟。^④在动员过程中，中共利用“群众路线”实现了农民的利己主义需求，也通过政治鼓动从思想上改造了农民，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帮助自己的，将阶级斗争的思想植进了他们的头脑。

对于作为动员客体的农民而言，当他们“看到一个意识形态明确或含蓄提

①[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8页。

②[美]费正清：《中国新史》，薛绚译，台北：中正书局，1994年版第364页。

③Hsiao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2533~2534.转引自[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3页。

④[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出的诺言和目标已经实现，那么，由此引起的满足将足以保证支持的继续输入，前提是他们一直渴望实现信仰结构中所包含的目标”。^①这点在国共内战中的土地改革表现尤甚，也进一步证明了农民的保守性。由于文化水平低，当农民被中共精英动员起来之后才会发现已经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了。在经过中共的政治社会化后，他们也许是出于“心甘情愿”，因为他们在土地的要求得以满足之后，已经认同了中共领导的思想精粹，“其宗旨无非是人们若肯以新的团结形式把力量组织起来，就可以为自己开创更好的未来。这种新团结体的领导力，将来自中国共产党”。^②或许，这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既然个人单独的力量什么事也做不成，何不牺牲个人的利益，把力量贡献给共同的目标？民主的中央集权原则被宣扬为一个人人可以发表意见贡献力量的办法，但是一旦党做了决心，每个人都要服从。在华北的乡村里，不接受这个原则，就要接受地主或本地以外的官吏统治，这个原则自然可以打动人心。”^③此外，针对动员的目的而言，农民对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社会经济变革可能并不感兴趣，但他们一旦被动员起来就会纳入到中共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安排中，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力量。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的基本模式可以用图 2-3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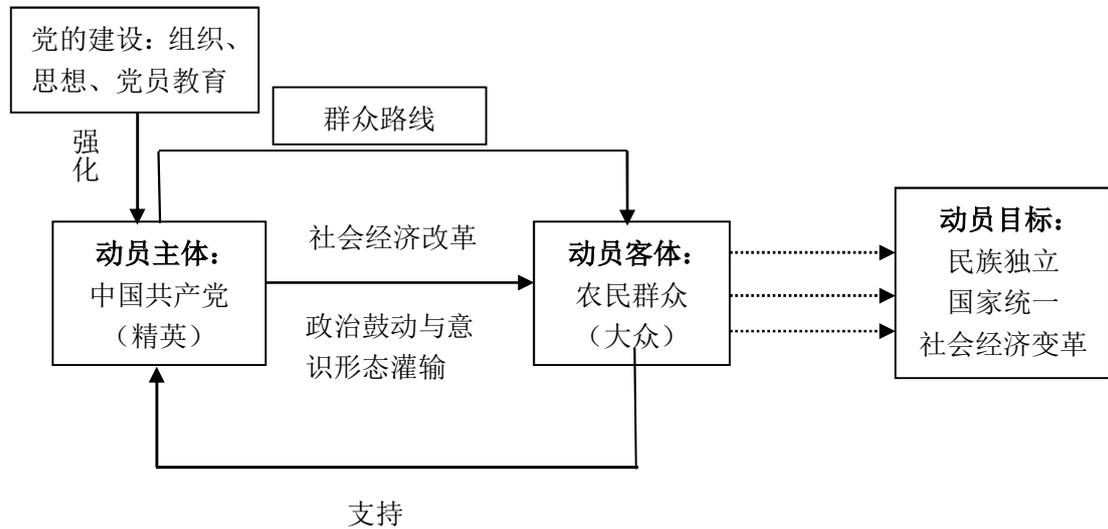


图 2-3 革命时期农村政治动员的基本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拟

①[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

②[美]费正清：《中国新史》，薛绚译，台北：中正书局，1994年版第365页。

③[美]费正清：《中国新史》，薛绚译，台北：中正书局，1994年版第365页。

该模式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实现对农民的动员。伊斯顿曾言：“从成员的角度来看，一个意识形态反应了他们的需求与渴望；但从领导者角度来看，同一个思想又是利用成员的能量以实现领导限定的特定目标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些意识形态是控制的工具，而不是自我表达的媒介物。”^①黄宗智也曾指出，“土改的实践并不是简单地依据村庄的客观结构。无论是在主体还是结构层面，都是由表达来完成客观行动和客观结构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共产党保持着阶级区分存在于每一个村庄的幻想。其选择的政策是在每一个村庄发动类似于善恶相对的道德戏剧表演的阶级斗争，并试图动员所有的农民和城市知识分子来支持党的决定。党建立了一套用以塑造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意识形态来实现这一目的。”^②这就是表达性政治^③的体现。换句话说，为了获取资源赢得战争，革命过程中共产党所表达的现实与客观现实有的并不一致。表达性现实就是中共用意识形态所描绘的。这种脱节之处主要在于“共产党将其宏观结构分析转化为每个村庄的微观社会行动所作出的决定，这一转化强调宏观策略分析对每一个农村社区都是有效的，每个村庄都要划分出阶级敌人，党要组织阶级斗争，发动贫农和雇农反对地主和富农。”^④在革命的不同阶段，这种表达性现实与农村社会客观现实之间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解放战争中，革命意识形态和农村现实之间的扭曲到达顶点。位于共产党和国民党拉锯争夺战的区域的村庄，不可避免地在战局的压力下发生村庄内部的激烈斗争和极端行动。从军事策略的角度来说，一个被阶级分化成两极的村庄，更易于提供种种战争需要的资源。阶级划分因此成为解放战争的一种武器。指导阶级划分的，也因此不再是土地改革法中的详细规定，而是粗略的、由上级下达的定额划分。”^⑤这种有意识建构的表达性政治，成为1949年之后的反右、四清乃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源泉。

①[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②[美]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载于[美]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2页。

③这是黄宗智首先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为了实现特定政治目的，政治精英不顾客观现实情况而建构出一种虚幻的表达性现实，这种建构的结果称之为表达性的政治。参见[美]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载于[美]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8页。

④[美]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载于[美]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3页。

⑤[美]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载于[美]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8页。

中共在政治动员过程中形成的“纵向的双重领导”制度，也对中国政治发展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它主要表现为“党政关系”。延安时期，“在精兵简政的过程中对权力关系做了新的安排，以削弱政府各部门的独立性。这一改革加强了县长及各委员会对各个部门的控制权，也增强了党对政府的领导权。其目标是使政府更接近人民，更能满足当地的需要。”^①这是因为之前的纵向权力网络使得政府各部门掌握在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手中，各部门各自为政，导致县或区政府很难进行部门间的协调管理，来应对当地的具体问题或者危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内在驱力：一是精英主义倾向，指向理想化的等级秩序或集权化的组织体制；一是民粹主义倾向，强调依靠觉悟的农民大众。^②精兵简政实际上抑制了官僚机构的权力，强调了党和政府对于农民的动员。毛泽东就是党内民粹主义的代表，他比较推崇动员型政治，以运动型政治和群众的广泛参与实现革命或者社会变革的目标，并借此来反对行政机构的僵化与官僚化。这在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中并不是鲜见的。

此外，这种动员体制带给人们的心理影响也不可小觑。张鸣曾经指出：“土改以后，明晰而细化的阶级分野，不仅深深地印在农民的意识之中，而且转化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等级身份的标志，‘土改情结’在很长时间内在农村难以消散（土改多少年以后，人们还会为出身是上中农、中中农还是下中农而斤斤计较），土改的运动模式也一直阴魂不散，反复地在日后的各种运动中借尸还魂。”^③“贫苦农民尽管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走到了前列，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无力在土地改革后，首先通过劳动致富，再经过劳动互助，带动全体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相反，他们惧怕土改后的自由发展会使他们丧失已得利

①[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此外，弗朗兹·舒尔曼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一书中，讨论了“垂直”领导与“双重”领导的概念。参见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Califor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88~99, pp102, pp188~210. 舒尔曼论述了在1958年大跃进中的垂直领导转向为双重领导的政治意义。关于文化大革命中通过简政的方式来解决行政中的官僚主义，参阅徐永英：《县革委会走“精兵简政”之路》，《北京周报》，1968年8月6日第38期。我们可以看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再现了1943年运动（精兵简政运动，笔者注）的一些突出特色。参见[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脚注。毛泽东对此的论述参见《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901页。

②[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

③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第15期，结语部分。

益，他们更乐于接受更集中的管理和用政治力量维持农村中的经济平均。^①这种阶级标签给某些人带来了利益，赋予给另外一些人的则是无情的灾难。

综上所述，中共利用政治动员建构了一个组织良好的、基础广泛的、复杂的政治体系，^②它是以阶级斗争为内核、以民族主义为外衫的，为赢得全国性政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最后，笔者愿以亨廷顿的论述作结，他的表述如下：

党最初是一个从达到一定高度的革命意识的人中精选出来的集团。随着它逐步赢得其他集团的支持和参与，而不断扩大。外围组织和先锋组织的区分，提供了一种组织阶梯，以逐步地动员和训练那些在一定时期会成为成熟的党员的人。如果政治斗争以革命战争的形式出现，动员就会随着一个个村庄不断从敌人手中转移到革命者手中，而逐渐发展。^③

2.6 本章小结

本章采用分析历史的方法，逐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走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并分析了中共在革命过程中是如何动员农民以获得革命胜利的。中共成立之初，其内部就存在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城市中心主义路线与李达的农村中心主义路线。由于当时陈独秀担任中共总书记，并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所以农村路线一直被压抑。尽管如此，以李大钊、彭湃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一直坚持农村革命的思想。特别是彭湃和毛泽东，前者在海陆丰农村地区建立了最早的苏维埃政权，而后者不仅从理论上探索农民革命，而且受到前者的影响，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开辟和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而开辟了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逐步探索形成了农村政治动员模式，即利用自身严密的组织体系，通过政治鼓动（意识形态宣传、民族主义号召等手

①刘一皋：《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与农村政权》，《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78页。

②[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页。

③[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32页。

段)和利益诉求的满足塑造了农民的革命主体地位以动员他们参加到革命中来,并逐步形成了群众路线建立了中共与农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加强了中共对于根据地农民的领导。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成为了中共进行农村政治动员的演练场,利用访贫问苦以及诉苦大会重新划分了社会阶层,从而提升了农民对于中共的认同意识,以动员农民参加革命。这样以阶级斗争为内核、以民族主义为外衫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就形成了。不论是从政治动员的主客体看,还是就政治动员的手段而言,1949年后的毛泽东时代继承和发展了革命时期的政治遗产,从而逐步衍生出了“一元化建构”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

第3章 一元化建构：全能主义时期的农村政治动员 （1949～1978）

——以河北省徐水县瀑河水库的修建为例

共产党国家在维持政治秩序方面之所以比较成功，主要在于给予政治组织的有意识行为以优先考虑。1949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党对整个中国控制的扩大和党组织的更新。只是到了50年代，经济发展才成为党的首要目标。

——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①

1949～1978年的三十年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有些西方学者将其称为继续革命的年代。从总体上看，此时期形成了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政治，一元化的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全民动员来实现近代以来历代中国人都没有实现的社会革命，并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理想。然而，从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革命领袖在成为国家领袖之后，由于思维惯性以及之前革命动员效果的鼓舞，仍然依靠群众运动来执行和贯彻其政策，比如土改、统购统销、农村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此时的农村政治动员可以称之为“一元化建构”模式。实际上，这种动员模式建立在村庄全能主义权力结构的基础之上，在动员过程中违背了农民利益和意愿，虽然维持了表面的秩序与统一，但是也积压了农民对此制度安排的怨恨，而成为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创新的动力。大跃进时期河北省徐水县瀑河水库的修建就是“一元化建构”模式的突出表现。所以，本章就以该水库的修建为例对此动员模式展开分析。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88、389页。

3.1 理论视角

中共取得全国性政权以后，在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方面效法苏联，将其组织体系以及意识形态散播开来，并继承了革命年代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权力运行体制，而逐步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随着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的形成，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也出现了重大变化，进入了全能主义政治时代。邹谠认为，“全能主义”仅仅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①同时，他也指出：“中国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政治的共同渊源是二十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案，全能主义政治是应付全面危机的一种对策，并且从事社会革命就必须用全能主义政治为手段。”^②从这种角度说，中共取得政权只是获得了政治革命的胜利，而社会革命才是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所以它就沿袭了革命传统并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主要是斯大林主义），而形成了全能主义政治来试图实现它的社会革命的伟大目标——四个现代化。全能主义政治建立在中共组织在全国范围的扩大以及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基础之上。

在城市，中共通过单位制将工人统合起来；在农村，中共把自己的组织体系延伸到村庄内部，随之而行的是党的意识形态在农民中间的传播，它利用党员干部以及意识形态对农民实施了组织动员与思想动员。通过对中共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它通过合作化运动将组织延伸到了每一个村，并培养了一大批党员干部作为村庄内的新兴精英，通过这些精英来贯彻党在农村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与此相应，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加之户籍制度的实施，农民基本上丧失了经济自主与人身自由，被牢牢地束缚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社会革命的伟大目标。在此过程中，为了实现四

①[美]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②[美]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个现代化，中共采取了倾斜式发展战略，这就意味着要牺牲其他行业的发展，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这种牺牲就可想而知了。对于这种牺牲，中共赋予它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贯彻实施党的领导，以农业支持工业，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目，振兴中华民族。因此说，中共将农民极力摆脱贫穷的心理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主义号召有机地统合在了党的领导之下，从而也就实现了对农民的政治动员。基于此，本文将改革开放前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的模式称之为“一元化建构”。

3.2 微观探究：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则始于1957年冬1958年春的兴修水利运动。^①在这场运动中，所采用的方法——军事共产主义、大兵团作战、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的提倡等成为大跃进运动的鲜明特征，也成为人民公社化运动^②的主要特征。河北省徐水县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华北小县，却在这场运动中表现的轰轰烈烈，在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短短七个月时间，兴修水库228座，打机井2462眼。^③徐水县瀑（bào）河水库就是在这场运动中修建的，它是徐水县兴修水利的标志。接下来，本文将对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进行描述并以政治动员的视角对此过程进行分析。^④

3.2.1 瀑河水库概况

瀑（bào）河，大清河支流，又名雹河、鲍河。在河北省境中部(河北省保

①详细内容参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第1版。

②人民公社在中国农村存在了近二十六年之久，学界按照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度变迁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958年4月~1962年2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也叫大公社时期），此时体现为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所有；一是从1962年3月~1983年10月的人民公社时期，此时体现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度。参见辛逸：《关于人民公社的分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③《河北徐水县成立人民公社》，《河北日报》，1958年8月22日。

④该部分内容笔者曾以《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政治机制分析——以河北省徐水县瀑河水库的修建为例》为题发表在《ICCS 现代中国研究ジャーナル》，第3卷第1号。

定市)。因源短坡陡流急，洪水暴涨暴落而得名。瀑河发源于易县狼牙山东麓，向东南流经徐水县，最后注入安新县白洋淀。瀑河水库就修建于瀑河中游（位于现在的徐水县瀑河乡）。^①

瀑河水库位于樊（fán）村村北、德山村西，库址西南北三面环山。1956年由河北省水利部门勘测，1957年12月河北省政府批准施工方案，1958年3月动工，6月底主体工程竣工。瀑河水库是一座以拦洪为主、灌溉为辅的中型水库，坝体为均质土坝，南起石龙山，北至黄山，坝长5843米，最高坝体21米，坝顶宽4米，库区11平方公里。大坝右侧建有明流输水洞，闸孔面积为4.5×4.5米，最大泄洪量232立方米/秒，引水渠进口设有小滚水堰1道，闸后洞身60米，洞宽5.9米，高6米，洞后建有消力池及海漫段；溢洪道位于输水洞右侧，与输水洞平行，宽32米，最大泄洪量770立方米/秒，水库总容量9750万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6850万立方米，兴利库容2900万立方米，工程造价540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10万元。自建成以来，经历过1963年大水时副坝扒口分洪、1964年水毁工程修复、1973年溢洪道衬砌和1977年大坝戴帽加高。然而，遗憾的是瀑河水库修建时没有防漏工程，近年来华北地区常年干旱，该水库已经干涸。瀑河水库示意图见图3-1。

3.2.2 瀑河水库修建的背景

徐水县是一个洪涝灾害多发的县。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1956年及1963年均发生了较大洪涝灾害，严重地影响了该县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瀑河，横贯徐水县境中部，因源短坡陡，每当降雨后，山洪暴发，水流勇急，泛滥成灾。“据1954年到1956年三年统计决口22处，1954年淹没土地18万亩，减产粮棉1134万斤。1955年淹没12万2千亩，减产772万斤。1956年淹没28万亩，减产1550万斤。三年统计共减产粮棉3456万斤。”^②为了治理瀑河，1951年3月，徐水县就成立了春天工作委员会，进行河堤整修，对险要堤段加固处理。1954年汛期，河堤决口，10月27日进行挖河展堤治理。1956年和1957年又分别对不同堤坝进行加固和复堤。除此之外，瀑河水库修建之前，徐水县

^①关于瀑河水库的介绍可参阅河北省徐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徐水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②瀑河水库施工指挥部：《关于施工前的工作安排意见》，1958年2月25日，徐水县档案馆。

起来。这就为瀑河水库修建之时征调大量劳力提供了可能。

全国范围内兴修水利的高潮也是瀑河水库修建的重要背景。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①。《农业四十条》提出了“四、五、八”的目标，“从一九五六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②为了实现纲要所提出的目标，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兴修水利的运动。^③这个决定认为，“积极广泛地兴修农田水利，是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单位产量，防治旱涝灾害的最有效的一项根本措施”；同时提出了“依靠群众兴修水利”的观点，“群众性的农田水利，主要是依靠合作社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且鼓励社员积极投资，国家只能作必要的补助。”10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④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这篇社论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⑤。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⑥的社论。该社论进一步肯定了大跃进，认为农业实现合作化以后，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这些文件和社论的发布，全国上下形成了讨论和贯彻《农业四十条》的热潮。农业增收，兴修水利是关键。所以，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也达到了一个高潮。在这种背景下，徐水县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讨论贯彻《农业四

①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第2版。

②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第2版。

③ 《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第1版。

④ 这个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提出的。根据两年来一些事实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对此草案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而形成了修正草案。具体内容参见中共中央委员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6日第1、2版。

⑤ 《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7日第1版。

⑥ 《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第1版。

十条》的同时^①，也开始制定修建瀑河水库的计划。

3.2.3 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

瀑河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原本列入了国家海河治理计划之中，因而它的修建受到了当时河北省委、省政府的重视。1956年4月，河北省政府委派了勘察设计人员进行地理水文勘测。此次勘测经历了一年多，直到1957年12月，河北省政府才批准修建瀑河水库。

瀑河水库的修建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库区村民的搬迁；二是坝堤及泄洪闸等的修建。徐水县委对此项工作很重视，在水库修建之前就建立起了有力的领导体系和严密的组织体系。为了统一指挥瀑河水库的修建，徐水县委成立了瀑河水库施工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该指挥部由县委委员三人组成，下设若干股。^②库区农民的安置工作则由盖房委员会负责。此委员会由7-9人组成，其中搬家村三至四人、包房乡社三至四人、工作组一至二人；另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二人，下设检查收验股、财务股、统计股、保卫股和宣传股。^③在水库施工建设方面，以村社为单位设立中队，村社干部担任中队长、副中队长和保卫委员；中队下设记工组、瓦工组、木工组、壮工组、大车组等若干组；每组各设正副组长一人。^④同时，在施工前训练干部。徐水县委还计划召开参加施工的乡的党委书记会议，专门研究劳力统筹安排，做到生产水利两不误。这一领导和组织体系是瀑河水库较快修建完成的保障。

1、思想动员下的库区搬迁

水库修建的首要工作是库区村民的搬迁。对于此次搬迁，指挥部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在此次搬迁过程中，范（樊）村、大牟（mú）山、小牟山的住户需要全部外迁，屯里、贾庄村需要迁出部分居民，共计926户，4214人。^⑤除此之外，还要在别处选址以安置库区移民，就需要建盖新房、猪圈、厕所等基本生

^①为了学习和贯彻《农业四十条》，1956年3月26日，在中共徐水县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第一书记张国忠做了专门的报告；1956年3月27日，中共徐水县委制定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执行一九五六一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规划（草案）》。这两份文件均存于徐水县档案馆。

^②瀑河水库指挥部：《徐水县瀑河水库工程计划方案》，1958年1月，徐水县档案馆。

^③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施工前的工作安排意见》，1958年2月25日，徐水县档案馆。

^④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施工前的工作安排意见》，1958年2月25日，徐水县档案馆。

^⑤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施工前的工作安排意见》，1958年2月25日，徐水县档案馆。

活设施。其中，新房要按照每人 0.75 间的标准建造，新建 3176.7 间；猪圈 1053 个；厕所 991 个。^①

为了做好库区居民的安置工作，保证水库工程正常进行，1958 年 1 月 2 日，徐水县委抽调了 30 名县级干部，其中 3 名县委干部，深入搬迁村庄做好安置和土地规划调查，并详细进行了房屋等级划分、登记和确定新村位置等工作。这些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②

第一，思想发动阶段。首先在党内统一了思想，层层解决思想问题；然后再召开队、总座谈会和社员大会，宣传修水库的意义，培养骨干发动大家，做到家喻户晓，最后统一社员思想。

第二，房屋登记阶段，划分旧房等级填表。

第三，审查、贴榜、公布、定方案。

对于建房的乡社，要与盖房委员会签订盖房合同。搬家社为甲方，包房社为乙方，一切行事均以合同为准。指挥部要求 2 月 23 日开始建造新房，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即 3 月 20 日完工。3 月 21 日—26 日，要求将猪舍和厕所修建完毕。此外，负责建房的木工和瓦工则要自带所需工具。

1958 年 1 月 3 日开始对搬迁村民进行思想动员。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于 1 月 15 日发动了八个乡大车^③1100 辆、3500 人开始搬运石头。截止到 2 月 25 日，已运石头 17 540 方。按照既定计划，2 月 21 日，小牟山开始向雁门村搬迁，大牟山、范村、屯里和贾庄并房腾房。2 月 17 日，开始向新村搬入一部分，3 月 6 日搬完。2 月 21 日，外迁村庄也要一并搬运建造房屋等所需的柁、檩、椽、门窗、条石、砖、石板等，并开始打房箔、圈箔。这两项工作均要求于 2 月 26 日完成。

1958 年 1 月 31 日，指挥部向徐水县委汇报了水库修建前准备工作的进行情况。主要内容如下：

在搬家思想动员阶段，召开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会议，健全组织，成立了由主要干部 7-9 人组成的搬家委员会。并听取了社员的舆论和对当前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召集的会议有乡党委书记会议、支书和社长会议及由各村召开的

^①瀑河水库指挥部：《徐水县瀑河水库工程计划方案》，1958 年 1 月，徐水县档案馆。

^②瀑河水库指挥部：《徐水县瀑河水库工程计划方案》，1958 年 1 月，徐水县档案馆。

^③大车指的是马拉的车或骡子拉的车。

支委会议、党团员会，首先在党内统一思想，然后召开了社员大会，干部负责分片做好宣传工作。通过会议也摸清了一些干部和社员的思想情况，主要是这样三种：一是怕搬远了（搬到内蒙古）；二是怕分散，见不着面；三是怕第一年生活有困难。其中，贫农愿意搬，相信政府；上中农房子好，则不愿意搬。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如，邀请怕搬远的干部社员到新村选址参观；有好房子不愿意搬的，不知道新房样子的，组织到釜山村参观，并说明好房子可以多补助；害怕分散的，则号召全村集体搬迁。同时，在思想动员的工作方面，注意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防止地富反右坏份子破坏。

在房屋等级评定方面，按照高岗少填土、贫苦户能盖起来、等级屋价、幅度合理的原则。其中一等房屋 52 元；二等 50 元；三等 48 元。

随着搬家工作的开展，与库区居民见面以后，针对社员思想混乱、生产情绪不高，搬家委员会采取了紧密地与生产结合、深入住户座谈、实施搬家安排措施、通过培养骨干典型发言表示态度、召开大小会议教育社员，逐步解决了思想问题。如范（樊）村有部分干部社员不愿意搬迁，经过会议的典型发言，带动了大家。其中六十岁的李洛为说“我开始是搞不通，不愿搬，有乡土观念，可是听同志们一说，水库修好后，全县水利化，还给盖新房，这样可以了，政府需要叫搬就搬”。^①

还通过结合实例，采取教育和辩论的方法打击“邪气”^②。屯里村民邢瑞青说：“政府叫搬家，还不定给盖什么样的小房呢？”^③这样一来，动摇了一部分不坚定户，据此组织去釜山参观（曲水水库搬迁户）后进行了讨论和辩论，树立了搬家的坚定信心，通过宣传教育，统一了社员思想后进行房产登记、审查和评议等工作。在房屋等级评定上，为了使得安排合理，在范（樊）村开展试点，组织搬家，村干部由现工作组直接掌握，组织就地讨论，按照标准，结合实际，划分等级，等级标准统一，解决问题，填完后均通过了社员大会、贴榜公布等过程。

在土地调查和新村土地确定方面，搬家委员会根据附近村庄、人口和土地，采纳了搬家村干部和社员的意见，进行了统筹安排。首先，召开了党委书记和

^①瀑河水库指挥部：《水库修建前准备工作进行情况的报告》，1958年1月31日，徐水县档案馆。

^②瀑河水库指挥部：《水库修建前准备工作进行情况的报告》，1958年1月31日，徐水县档案馆。

^③瀑河水库指挥部：《水库修建前准备工作进行情况的报告》，1958年1月31日，徐水县档案馆。

社长支书会议，进行献地并具体研究土地的基本建设的处理（如机井、砖和石井等）。组织搬家户去献地村参观，并由献地村介绍情况，并在生产上和一切物质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通过实地参观，搬家村的干部和社员都较为满意，解除了思想顾虑等问题。

土地确定后，1月14日召开了党委会议，有搬家村干部参加，在会上说明了修建水库的重要意义。同时指出对搬家村的拆石头工作，还确定了各乡大车和搬运石方的任务。^①

在发动各乡派出大车时，进行了思想发动工作和组织工作；采用依靠发动群众、社内自带草料、人送干粮的方法搬运石头。

在搬迁和修建新房的过程中，首先是由搬家户自报，搬家委员会审议，最后大家讨论的办法，以确定各社户应盖的房间数。将拆多盖少的赔偿款发给住户本人，木料问题原则上由各社统一处理，并提出因陋就简的原则，由搬家委员会统筹安排，适当进行了规划。最后，确定926户4214人搬迁，共需要盖房3176间，内有社队学校房308.5间，每人平均0.75间，盖猪圈1053个，厕所991个。这些工程大约需要石方17542方，根据建筑工地远近时间，要求各社于旧历新年（2月17日）前完成。最后确定发动8个乡，1100辆大车及4500人于1958年1月14日开始了这一工作（其中有两个乡是26日开始的）。截止到1月31日，共完成12000石方，占任务的70%，预计在旧历新年前能够完成。

在搬家盖房的过程中，指挥部还提出了一些口号，如“不怕寒风刺骨、大雪浇头”。工作开始十多天以来，社员情绪很是高涨。尤其是雪后，为了不延误工作，干部和社员甘冒零下二十度的寒冷，迎着六级大风进行架桥修建。大王店乡大队长周飞池向广大社员提出“服从领导听指挥、守纪律、注意安全、任务不完不回还”的口号^②，从而鼓舞了社员情绪。由此，库区搬迁工作也得以顺利完成。

2、竞赛式水库工程的修建

瀑河水库的修建始于1958年2月17日，工程基本竣工于6月底，仅有短短的近四个月的时间。此工程的修建完成，依靠的是军事化、竞赛式管理，在

^①分配拆石头工作是因为盖新房需要石头做地基，为了减少材料费需要将旧房的石头拆掉；而大车则是运送盖房材料所需。

^②瀑河水库指挥部：《水库修建前准备工作进行情况的报告》，1958年1月31日，徐水县档案馆。

强大的思想动员下，民工们以超强的劳动强度完成了这座中型水库的建设。

下面先介绍一下瀑河水库的工程情况。^①瀑河水库主体工程由大坝、溢洪道、放水洞、反滤层和护坡等构成。

（1）大坝长 5700 余米，有主坝和副坝之分。其中主坝长 400 米，高 18.2 米；副坝平均高 5 米。这项工程大约需要石土 450 000 立方，每工平均效率为一方，共需要用工 450 000 工。

（2）溢洪道开山，底宽 30.8 米，长约 104 米，共计 29 750 立方。平均效率 0.5 方，则需用工 59, 500（外有消力池陡坡尚未设计出来没有计算在内）。

（3）放水洞开山，底宽 10 米，洞长 99 米，工程量约 106 735 方，平均效率 0.4 方，那么需用 26 683 工。

（4）反滤层（尚未设计出来）。约计 5000 石方（沙子），平均效率 0.7 方，需用 7143 工。

（5）护坡。需要沙子 105 283 立方，平均效率 0.5 方，需要 210 566 工；卵石 54 160 方，平均效率 0.3 方，需用工 180 533。护坡外面需要砌石 20 000 方，平均效率 0.7 方，需要 28 571 工。运输石料 5 里（1 里=500 米）远，需 50 000 工。

此外，还需要修建护村埝，其中屯里村、贾庄村约 3000 米，约计 150 000 土方，平均效率 2 方，需用 75 000 工；围埝护坡需要沙子 1875 方，用工 3750 工；卵石 1875 方，用 6250 工；块石 1875 方，需 2979 工。漕夯、回填 100 000 方，平均效率 1.5 方，用工 66 700 工。河床铺盖长约 3000 米，平均宽 20 米，厚 1.5 米，用土方 90 000 方，平均效率 2.5 方，需用工 36 000 工。

按此设计的水库库容为：正常水位 71 米，蓄水 53 450 000 方；最大洪水 72.8 米，可蓄水 65 400 000 方。

为了及时地修建完成瀑河水库，指挥部还制定了较为详细的时间进度。整个水库的建设大致分为这样四个步骤^②：

第一步，溢洪道、放水洞的修建。闸门的安装等项工程计划投入 1200 个劳力，昼夜工作。溢洪道工程计划 1 月 25 日至 5 月 25 日完工；放水洞工程集中技术力量昼夜突击，计划 1 月 26 日至 3 月 6 日完工。

^①这部分主要参阅瀑河水库指挥部：《徐水县瀑河水库工程计划方案》，1958 年 1 月，徐水县档案馆。

^②这部分主要参阅瀑河水库指挥部：《徐水县瀑河水库工程计划方案》，1958 年 1 月，徐水县档案馆。

第二步，漕夯、修筑反滤层。漕夯土方 50 000 方，每人效率 1.5 方，需用工 33 350 工，这一工程大体上分两步来做：

(1) 土坝漕夯，计划 3 月 6 日至 3 月 10 日，大约 5 天的时间完成。

(2) 块石河床漕夯，3 月 10 日至 3 月 20 日完工。反滤层约计块石、粗细沙 5000 余方，计划 3 月 21 日至 3 月 25 日完工。

第三步，筑坝。计划 3 月 10 日至 5 月 10 日完工。

第四步，修建护坡（包括沙子、沙石和块石）。计划 4 月 10 日至 5 月 15 日完工。河床铺盖，预计于 5 月 15 日至 5 月 25 日完成。护村埝的修建计划于 3 月 6 日至 4 月底完工。

可以看出，瀑河水库虽然是一个中型的水利工程，但是预定的修建时间较短，且较长时间集中在冬季施工。这对于徐水县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此外，由于瀑河水库是在响应国家提出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下修建的，因而当时的水利建设遵循着以小型为主、大型为辅，民办为主、国家辅助为副的方针。基于此，瀑河水库的建设，国家只支援了一百万元的物料款。这与实际预算费用相距甚远，徐水县委决定除了依靠群众勤俭治水以外，不足部分由全县均摊。面临这样的困境，指挥部也指出了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①：

一是依靠合作化的优越性。社员们经历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全民整风运动，思想空前提高；同时也有去年冬天水利积肥的锻炼，社员们已经具备了相关的经验和知识。

二是有上级党政的正确领导和支持，有省水利部门的技术协助，再加上我们主观的努力，正确利用过去施工经验，虚心学习，以艰苦奋斗刻苦钻研的精神，可以找到克服困难的途径。

在工作方法上，指挥部也进行了说明，即要充分发挥我们领导的技巧，依靠贫农，发挥党团的核心作用。如发动群众，有事和大家商量，在工作中掀起一个急干、猛干、苦干的革命干劲；通过工地革命台，提出合理化建议，搞宣传使水库修建的意义人人皆知；休息时间广泛开展文化娱乐，活跃民工文化生活，以搞竞赛、评比参观，搞运动的方法，树立旗帜，带动落后，把工作推向高潮。指挥部为了鼓舞大家工作，交流经验，规定定期评比。对模范大队、中

^①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施工前的工作安排意见》，1958年2月25日，徐水县档案馆。

队给予奖旗奖励，模范个人要颁发奖状、物质和精神奖励。

在详密的安排和强有力的领导之下，瀑河水库的修建也得以加速，甚至跃进。如“瀑河水库工地于3月15日前，仅有六个乡的民工2300名进行崩山开始和搬家盖房；3月16日起，又有十四个乡的10584名民工开始筑坝。目前投入水库建设工程建设的共二十个乡，有13033名民工。”^①

同时，在县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以党团员为骨干，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指挥部在3月23日至29日开展了“跃进周”活动，并采取了四点措施^②：

（1）思想发动。结合工程质量优劣和工地效率的高低，联系思想生活，组织了不同形式与不同内容的辩论会、张贴大字报、刊登工地战报、漫画等。如通过思想摸底，部分民工埋怨“活累，生活苦”，认为在水库工地上劳动不如在社里干活清闲，因此劳动不积极。针对这种情况，指挥部立即开展了“小米是哪里来的，吃小米饭到底苦不苦”、“为谁修水库，怎样才能修好水库”的辩论。通过辩论，有8657人写了决心书，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服从领导，苦战三个月，不修好水库永远不回家”。

（2）开展双比，设立三台。在跃进周运动中，通过竞赛形式，根据评比条件，展开了石工与土工、土工对盖房工和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比干劲、比钻劲的劳动竞赛。先进工地飘红旗，后进工地挂黑旗。工地上还设立了跃进台、比武台、英雄台。工地遍地是跃进车、跃进篮、跃进坑和跃进父子车、夫妇车、姐妹车。崔庄村的青年突击队（18人）通过比赛跃进坑，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跃进周前为0.82个标准工，跃进周开始达到1.4工，最后提高到2.3工。

（3）参观检查，组织工地会议。跃进周开展起来之后，为了鼓舞先进、帮助落后，指挥部及时深入工地，组织干部相互检查，从中发现典范，就地开会，评议谁先谁后。并随即进行全面综合，书写大字报，领导亲自向先进队送喜报，给落后队提出批评、建议。

（4）总结评比，树立模范旗帜。在跃进周的末期，根据竞赛内容，依据工程质量、数量、安全、出勤等进行全面大检查。事后进行评比，共评出五个跃进大队，二十个跃进中队，先进模范人物991人，树立了单位和个人的模范旗帜。为巩固既得成果，鼓舞干劲，启发带动全盘，指挥部于4月1日召集全体

^①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瀑河水库施工情况的总结报告》，1958年4月4日，徐水县档案馆。

^②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瀑河水库施工情况的总结报告》，1958年4月4日，徐水县档案馆。

民工，举行表彰大会。

这种竞赛已经成为瀑河水库建设过程中的主要激励方法。期间总共开展了一个跃进周、三个突击旬、一个红五月、二个双周的竞赛活动。^①这些竞赛活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了工期。此外，工地的骨干积极分子，还开展了“双反、扫五气”运动。主要是针对工地上个别单位和个别人盗窃国家的物料财粮、投机捣鬼、欺骗领导等坏人坏事进行了检举揭发，开展斗争；对劳动纪律松弛、自由散漫、消极怠工分子进行了辩论。^②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也成为了瀑河水库按计划修完的保障。指挥部为了使得水库于汛期前竣工，1958年1月份就更加重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总共发动了二十个乡的13025名民工，其中党员735人，共青团员1140名；为了以思想的跃进保证工程的跃进，建立了工地党委会和团委会，以乡为单位建立了党、团支部，大力加强了思想政治的领导，紧紧掌握了“兵马出动，政治先行”这一有力的政治武器。^③具体来说，主要围绕这样几方面开展工作：^④

(1) 第一是掌握思想底细，及时思想站队。首先是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逐级进行思想摸底；然后，根据情况作具体分析研究，进行思想站队，将其分为思想进步、不甚进步、落后三种。通过调查摸底，民工的政治思想情况整体上是好的。但还存在着20%不甚进步的和10%的思想落后的民工。

(2) 第二是加强（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密切联系实际。为了提高干部和民工的思想觉悟，根据思想摸底中发现的问题与变化，及时召开骨干和全体民工大会，进行系统地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具体贯彻了农业发展纲要和全县农业生产跃进计划。例如，以回忆对比的方法讲解了过去、现在、未来农村的发展变化，并联系水库工程效益，说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大兴水利，根治千百年来水患。通过报告和讨论，起到了显著效果，如河庄村的一名民工薛辉就说：“过去是给地主干活，今天是为自己劳动，定可得加油干。”中所营村的民工李运，刚来工地时劳动不积极，听了报告后说：“早

^①瀑河水库施工指挥部：《瀑河水库施工以来的情况》，1958年6月8日，徐水县档案馆。

^②瀑河水库指挥部：《领导挂帅，骨干串连，人人立志宣誓，队队干劲冲天，群英大闹决战旬，奇迹迎接红五月》，1958年4月20日，徐水县档案馆。

^③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政治、文化、宣传工作的总结》，1958年4月30日，徐水县档案馆。

^④这部分主要参阅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政治、文化、宣传工作的总结》，1958年4月30日，徐水县档案馆。

是穷身汉，翻身分牛羊，参加合作社，生活又提高，从今积极干，回答共产党”。

（3）抓骨干闹运动，抓思想搞辩论。为了使工程、思想双跃进，指挥部依靠骨干，闹运动，通过运动，深抓思想，及时开展辩论。主要方法是适应不同时期的需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竞赛，并通过辩论，及时地解决问题，提高民工的思想觉悟。

（4）依靠群众，开展工地宣传。根据工区面广人多的特点，指挥部在全工地组织了一条宣传战线，从指挥部到小组，昼夜有专人负责。而且在群众中培养了 1158 名宣传骨干分子，划分宣传工区，设立宣讲台，结合典型事迹开展宣传。此外，宣传骨干还分头挑起宣传担子（内有麦克风、放音机），带上宣传品，日以继夜巡回工地，书写张贴大字报、画漫画、编数快板，开展小型多样的宣传活动。与此同时，还依靠群众，办起了《工地战报》，共发刊 28 期。

应当说，瀑河水库的修建离不开有力的领导。但是我们最不应该忘记的是民工们的辛勤劳动。瀑河水库的修建使用了大量的劳力，是民工们在付出了超强的劳动才得以完成的。民工们的昼夜施工，才是水库按时完工的重要保证。当时曾加过修建瀑河水库的一位老人这样叙述他们的劳动情况。

“瀑河水库修之前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只是在征调劳力的时候由村支部作了宣传说明。征用的民工年龄约在 18~50 岁，是从各个大队^①按指标强制征用的。参加修水库那年我 21 岁，曾参加过搬家村盖房和修水库两项工程。当时也没有大型的机械，如推土机、挖掘机等，基本上是全靠人力，挖土用镐头、铁锹，运土则是用土篮、独轮车，大坝夯基则用石夯，每四个人抬一石夯。这样一来，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各乡的壮劳力是有限的，这就导致了较高的劳动强度。我们休息的时间很短，每天大约只有五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早上四点就要起床、四点半集合，去工地劳动，八点在工地吃早饭，中午十二点下班，下午一点上班，就要一直干到晚上十一点，晚上下班后就只有十几分钟的吃饭时间。我们吃的饭大都是玉米面饼子，劳动也没有报酬。对于逃兵、怠工者也有很严厉的惩罚机制，如摇煤球、批斗等。也有的人为了逃避劳动和惩罚而装病。”^②

^①大队的说法是接受采访的老人所言。按照时间推算，当时还没有成立人民公社，所以那时也应该没有大队这一说法。可见人民公社对于农民的影响。

^②这部分内容是由笔者于 2009 年 8 月 24 日在徐水县户木乡户木村访谈村民赵某得知。

水库的修建始于1958年1月，工程基本竣工于当年的6月底。在当时建设工具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只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修建成一座中型水库。具体分析，其直接原因主要有这样三方面：

第一，水库修建过程中政治挂帅，充分发挥党团的政治优势，动员群众，做好民工的思想工作。

1957年冬开始的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是一场群众运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这个运动，应该成为随着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而来的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①徐水县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也在本县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瀑河水库就是在这场运动中修建的，也带有鲜明地政治色彩。同时，瀑河水库的修建规划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各乡统筹安排来水库的民工，应是身体健壮的青壮年（年在18至45岁），贫农成分要占绝对优势，党团员要占15%左右；地主、富农、反坏分子不要。^②将劳力划成分，这本身已经充分体现了瀑河水库的政治性，徐水县委、县政府将其看成了一项政治任务。

瀑河水库修建的过程中，开展竞赛活动也成为重要的工作方法。竞赛活动中的评比记分也表现出了政治挂帅的特点（表3-1）。

通过这个记分表，可以看出政治领导和工程效率的比重是处于前两位的，而工程质量则是处于第三位；在分值上，政治领导与工程质量等值，工程效率则大于工程质量。这就说明，指挥部较为重视政治工作，以确保工程效率和工程质量。

水库迁移和修建过程中，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思想动员会、辩论会、宣传等，也成为水库修建的重要保障。应该说，在生产建设手段落后的条件下，民工的思想发动对于水库的竣工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而之前的“农村全民性整风运动，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这也就为胜利地完成水库工程奠定了有力的思想基础。”^③

第二，凭借合作化的优越性。

瀑河水库是在徐水县合作化实现之后和在兴修水利的高潮中兴建的。当时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第1版。

^②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施工前的工作安排意见》，1958年2月25日，徐水县档案馆。

^③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政治、文化、宣传工作的总结》，1958年4月30日，徐水县档案馆。

大跃进已经形成，对劳力实行无代价平调，全县大部分村义务出工，成为修建水库的劳动力。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劳动力成本，实现了节俭治水。合作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整风运动，也使得农民的行为具有了表面上的一致性——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和上级的安排。据记载，此工程共调集民工 12 000 人，保定地区组织雄县、涿县支援 3000 人，固城驻军支援 1100 多人；^①

表 3-1 瀑河水库大队评比记分表

	政治领导 (20%)	工作效率 (25%)	工程质量 (20%)	扫盲宣传 (15%)	卫生出勤 (10%)	安全保卫 (10%)	总评分数 100%
中所营	18.3	25	17.7	13	10	9	93
遂城	18.7	19	18.3	11.7	8	9	85.7
六里铺	17.7	19	17.7	13	8	8	83.4
南庞山	17.3	16	19	12	9	9	82.3
正村	18	15	18	13	9	9	82
文村	16.7	16	18	11.7	8	9	79.4
南庞村	16.7	13	17.7	13	9	9	78.4
釜山	16.7	12	17.7	11.7	10	9	78.1
太保营	17	12	18	11.7	10	8	77.7
义合庄	17.3	13	17	13	6	9	75.7
小刘庄	19.3	11	17.3	13	7	9	74.6
大王店	16.3	12	17	11.7	8	8	74
团结队	13.3	14	18.3	12	7	9	73.6
户木	15.3	10	18	11.7	7	9	71

资料来源：瀑河水库施工指挥部：《不怕天长日晒，不怕狂风雨淋，胜利甸民工完成河床铺盖长十里，主坝上土一万六千方》，1958年7月4日，徐水县档案馆。

第三，建立了一个健全的组织和管理体系，这是政治动员的组织基础，有效地保障了工程进度。

徐水县政府成立了由县委委员三人组成的施工指挥部，专门负责瀑河水库的修建，这也就发挥了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指挥部下设若干股，负责具体事务。为了顺利完成库区居民搬迁，还成立了搬家委员会。在水库施工建设方面，也

^①河北省徐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徐水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设立了中队（以村社为单位），中队下设组。指挥部还组织了一千余名的宣传骨干分子，负责宣传典型，发挥带动效应。此外，瀑河水库的修建有一个较长的规划过程，是由河北省水利部门勘测一年半左右而形成的计划，因此具有科学的设计。并且每部分设计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都有着较为精确的计算。这些因素使得水库修建过程中，政治动员得以实现，促成了水库修建的按期完成。

3.2.4 瀑河水库修建过程的解析：一元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动员

1957年冬，中共中央发起的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拉开了全国性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序幕。徐水县作为兴修水利的先进县而得以闻名，瀑河水库的修建则将本县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引向了高潮，进而成为大跃进的典型。^①

瀑河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原属于海河规划，需投资700万元。后来河北省压缩至500万元。最后在民办公助的条件下，由国家辅助100万元，共用劳力170万人次，完成土方130万方。它的修建得以按期完成，主要在于这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而且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整个过程中，徐水县委发动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在设备手段极其落后的条件下，打破了按受益分摊劳动工日和物料资金的原则，采用全县统一规划，统一调配劳动力，按先后秩序进行施工，仅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修建完成了这座以防洪为主兼顾灌溉的水库，从而有效地缓解了瀑河中下游的水害。这对于“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具有促进作用。至此，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的政治动员何以实现，或者说，强大政治动员的背后是什么“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本文认为，那时的政治动员得以实现的关键要素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政治体制。在该体制下，中共通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提高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那么，一元化政治体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1、“国家控制社会”关系模式的形成

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和农村合作化的逐步实施以及整风运动、反

^①关于徐水县兴修水利和开展积肥运动的报道主要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推荐河北省徐水县的几个主要经验》，《中国农报》，1958年，第5期；人民日报社论：《徐水创造了好经验》，《人民日报》，1958年3月11日；《徐水县在生产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河北日报》，1958年4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人民日报》，1958年4月17日等。此外，全国各地还纷纷派人参观瀑河水库的修建现场。这都说明徐水县已成为兴修水利大跃进的典型。

右派斗争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初步建立起了一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不仅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全面国有化或者集体化，而且表现为反右派斗争中民主党派受打击和文化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化。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领域占据了绝对领导地位。此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表现为“强国家一弱社会”的“国家控制社会”的模式。在农村，借助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反右斗争，国家权力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渗透。

1949年之后的中国，在政治上，建立了中央集权体制，中央政府掌握着绝对的权力，这既包括资源的分配权也包括对地方政府的干预权；在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使得地方政府丧失了发展自主权。两方面因素相加就导致地方政府权力的空壳化，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各级地方政府就承担了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角色。同时，各级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考核权又都掌握在上级政府，这就加剧了地方政府的政治化倾向，它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完成上级政府分配的各项政治经济任务。地方政府活动是以其代理人角色为前提的，所以称其为“代理型政权经营者”。^①

基于此，徐水县委县政府亦是国家政权的一级代理人。当中共中央发出兴修水利的号召时，全国范围都开始积极响应，徐水县也“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典型”。瀑河水库就是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修建完成的。它的修建，尽管国家只拨款 100 万元作为物料款，与实际使用资金相差甚远，但是徐水县政府克服了重重困难，按期完成了修建计划。

2、社会主义教育与自我保护性顺从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的政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建国之后亦然，这也是它能够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社会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搞运动的手法。为了肃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和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开展了第一次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及其重要的一页，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②。这次整风在提高了党员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同时，

^①“代理型政权经营者”这个概念是由杨善华和苏红提出的，他们借鉴了张静的“政权经营者”概念，意在指出计划经济时期的乡镇一级政府（包括人民公社）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的代表，其活动的前提是代理人角色，因而称之为“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参见杨善华、苏红：《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20页。

^②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

也消除了党内指导思想的分歧，实现了党内的统一。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成功尝试。此后，在1947年冬至1948年，解放区的党组织结合土地改革运动，进行过一次整党运动；建国初期，1950年开始至1954年春，也进行过一次整党整风运动。这两次整党，也都比较好地达到了当时的目的，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水平，纯洁了组织，改进了党风。^①

鉴于前几次整党整风的成功经验，在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新形势下，为了让党员了解新情况和新任务，摆脱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27日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此次整风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而这次整风不再局限于党内，而且邀请民主党派帮助。由于有些民主党派人士批评尖锐，还有一些极右派分子趁机诽谤中国共产党，以及波匈等国际形势的影响，整风运动转为了反右派斗争，并且中国共产党错误地将其扩大化。在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后，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农村就合作社的优越性等问题举行一次大辩论。这次大辩论与反击右派及批判客观存在的反社会主义思潮有关，也是为了解决农村快速合作化中表露出的问题而进行的。^②

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就曾经出现农民大量宰杀耕牛的现象。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指出不少地区发生大量出卖耕畜、畜价猛跌和滥宰耕畜的严重现象，有的省估计至少杀了30万头，有的省估计耕畜减少了20%。^③到了1957年春，“因社员收入减少和许多干部作风不民主以及没有很好地贯彻互利政策”^④等原因，在农村地区，一部分富裕中农又开始出现闹分社、退社的风潮。中共中央也冷静对待，及时采取措施。这样一来，到了1957年夏，全国范围内的退社风潮得以缓和，但是在不少地方合作化的情势也不容乐观，夏粮统购也遇到了较大的困难。^⑤在这种背景下，“各地农村开始执行中央指示，普

①从进：《1949～1976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②详细内容可以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957年8月8日），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28～530页。

③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页。

④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55～656页。

⑤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647页。

遍进行了以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为中心题目，以‘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为实质的大辩论，其目的就是‘进一步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道路’”^①。

然而，这次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并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是采用了“以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所‘发明’的‘大辩论’（大鸣大放争大辩）的形式来进行，侧重于从反面批判个人主义思想、本位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②。应该说，在当时看来，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了两方面的成绩：一是‘资本主义’思想受到沉重打击，社会主义风气占了绝对优势；农业合作社得到‘巩固’，粮食统购任务超额完成。^③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亦称作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实质上是运用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压力等强力手段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击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并向其他阶层和人群展示了强大的威慑力，体现出共产党强大的专政能力，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强力控制。^④

徐水县也被深深地卷入到这场社会主义教育的大潮中，阶级斗争的“弦”也越绷越紧。1957年5月25日，徐水县召开了第一届党代会第三次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制定了本县的整风运动计划。此时的整风还是发动党内外人士揭露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到了7月中旬，随着中共中央对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发生变化，徐水县整风运动的主题就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了反击右派的斗争。7月15日，徐水县委召开了县、区、村三级干部2635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县委书记张国忠做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击碎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动员报告，掀起了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在这期间，“政府根据群众揭发和确凿证据处理了一批地、富、反、坏，其他地、富、反、坏也全部在大辩论中被辩的臭气熏天，不能不低头认罪；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也在大辩论中被辩的张嘴结舌，表示了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誓言”^⑤。除此之外，“在整党整社和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基础上，广大的党团员干部

①丛进：《1949～1976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②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652页。

③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665～666页。

④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672页。

⑤张国忠：《徐水县农业生产大跃进前后若干情况的补充说明》，载于徐水县委办公室编：《徐水县组织农

和全县人民从烈火当中锻炼得十分坚强，坚决走合作化道路，坚决拥护统购统销，巩固工农联盟和保卫社会主义法制”^①。

徐水县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不仅仅停留在思想方面，还贯彻到生产建设中去，通过整风和辩论达到促进水利建设和增产增收的目的。如1957年5月10日，徐水县委在向保定地委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了将政治思想工作与麦田点种间作相结合的优越性^②；1957年11月25日，史各庄平原水库动工，但是由于民工少，进度缓慢，县委书记张国忠就召集附近几个乡党委书记对修平原水库进行辩论，批判了“没钱不修，打破地界不修，不直接受益不修”的思想，形成了打破乡界、地界，农民自带干粮，义务修水库的劳动场面。^③在这种背景下，瀑河水库的建筑工地上就出现了政治挂帅、思想宣传活跃、施工竞赛活动火热的场面，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民工们的潜能，保障了工程能够按期完成。

民工们能够服从徐水县委和指挥部的领导、安排，除了思想鼓动的原因之外，农民采取了“自我保护性顺从”^④的策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前所述，参加过修建水库的老人说对于怠工者和逃兵，有着较为严厉的惩罚，也发生了批斗、摇煤球、熬鹰等粗暴行为。如此一来，在合作化过程中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的农民，只能听从上级干部的安排，加之阶级斗争方法在施工过程中的运用，虽有反抗但是遭到了严厉的惩罚。面对这种情况，农民为了保护自我，只能采取顺从的行为。

可以说，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及其阶级斗争手法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也有效地发挥了这种体制的作用。瀑河水库的修建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3、政党组织体系为政治动员提供了组织保障

“王政止于县”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状况，在县以下一般由乡绅来进行治理。而中国革命则打破了这一传统，国民政府时期开始在县以下设置乡镇和村。1949年之后，则是在设立乡镇和村级政权的同时，还设有乡镇党委和共产

业生产大跃进的典型经验》，北京：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第58页。

①张国忠：《徐水县农业生产大跃进前后若干情况的补充说明》，载于徐水县委办公室编：《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典型经验》，北京：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第58页。

②中共徐水县委：《关于在麦收前进行麦田点种间作和政治教育工作向地委的报告》，1957年5月10日，徐水县档案馆。

③河北省徐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徐水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14页。

④这个概念是由斯科特用来解释塞达卡穷人对富人的表面依附的。他认为，“对那些生计更为确定无疑地依靠村庄经济的人而言，顺从的压力无所不在”。参阅[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党的村支部，党的机构处于领导地位。这就意味着，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在革命胜利之后已经介入到国家政权体系中，并居于核心地位。鲍大可（A. Doak Barnett）曾这样描述中国共产党把中央政权的权限和影响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中国的传统中，中央权力经由完善的官僚机构传达到县一级，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效力——至少在强有力的政权统一国家的时候——但是在县以下，由传统的精英团体如“士绅”以及各种非官方社会机构治理的“非正式政府”，则往往支配着舞台。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他们基本上摧毁了旧的精英团体和大部分传统社会机构，代之以新的共产党精英和新的由共产党建立和支配的群众组织，并且把党和政府的正式官僚机构扩大到村庄一级。^①

就这样，“负责行政职能的政府和负责决策、协调和监督的党，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经过许多中间层次深入到每一个村庄、工厂、学校和居民区的、既独立又密不可分的层级组织”^②。中国共产党通过官僚机构将权力延伸到村一级，建立起了党国（Party-State）体制。这种体制是中国试图解决 20 世纪初以来全面危机的最终反应，也为巩固新生的政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恢复并加强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央政府丧失掉的对地方的统合能力。中国共产党具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组织体系，所以它具备了掌握一切国家资源的条件。与此同步，实现社会、政治与民族革命一体化的中国共产党，导致了政治权力与民间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通过建立与农民的有机联系以及一系列同心圆联盟中寻求与各种社会集团的合作关系，扩大了政治动员和参与的范围。^③在掌握全国政权之后，这种动员能力也随之得到了空前地加强。可以这样说，现代革命已经将农村民众带入了政治生活。^④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以土地为基础的地方权贵，建立起了党的控制，创造乡村一级的新秩序而得以生存和发展起来。^⑤而这种

①A.Doak Barnett.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428~429.转引自[美]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国家与社会革命》，刘北城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64页。

②[美]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国家与社会革命》，刘北城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65页。

③[美]邹说：《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④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⑤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党的控制又与通过意识形态教育而获得的支持相结合，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地深入到中国社会中去。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过程中树立的权威在最大程度上运用，特别是在让基层干部和农民大众做出决断方面。^①例如，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对于实施集体化持怀疑态度的基层干部，上级领导是这样鼓励他们的，“不要害怕，有共产党的领导，你是干部必须要站在前面”。^②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贫农在合作化政策实施时也发言，“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社会主义的道路咱们不走叫谁走？”^③另一方面，在领导方法上，重视“由上至下”的方式，并与在各个层级强化共产党书记的权力相结合，借此实施政策的渗透。^④

在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中，徐水县委可以通过党的三级组织（县、乡、村）来实现民工、施工材料的征调，并由指挥部（也建立了健全的组织体系）通过宣传教育、施工竞赛等方式，挖掘农民的潜能，将共产党的权威运用于水库的建设中，借以实现对于该县来说的浩大工程。此外，瀑河水库在修建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十分详细的规划，而能够有序地完成这些规划，同样离不开“官僚系统（政权体系）”的作用。所以说，1949年后的中国，由于共产党与政府的紧密结合，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政府的功能替代。中国共产党借助其严密完整的组织体系，再加上它娴熟的政治宣传、教育技能，有效地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建立起了全国范围内的一元化政治动员体制。

3.3 宏观透析：瀑河水库修建的制度、思想背景

瀑河水库的修建，是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这场运动的发起是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的。李锐认为，这场运

1990年版第52页。

①天児慧：『現代中国政治變動論序説』，東京：財団法人アジア政経学会，1988年第116ページ。

②竹内実：『人民公社史』，東京：平凡社，1972年第56ページ；天児慧：『現代中国政治變動論序説』，東京：財団法人アジア政経学会，1988年第116ページ。

③《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人民日报》，1955年9月20日第2版。转引自天児慧：『現代中国政治變動論序説』，東京：財団法人アジア政経学会，1988年第117ページ。

④天児慧：『現代中国政治變動論序説』，東京：財団法人アジア政経学会，1988年第117ページ。

动“是在批判反冒进的高压气氛下动员和展开起来的。”^①吴志军也指出，这次运动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是在当时中国既定的资金约束和资源禀赋条件下的最优策略，也是中国共产党以劳动力高度替代资本的方式，在乡村社会有效供给公共产品（如水利基础设施）的成功尝试，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深切关注，透射出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强烈愿望。^②傅作义指出，解放前，我们的祖先四千年开辟了两亿三千万亩的灌溉面积，现在四个月开辟了一亿一千七百万亩，四个月的成绩等于四千年的一半；通过整风、反右、社会主义大辩论，左派战胜了右派，积极的前进的思想压倒了消极、因循保守的思想，加上各级干部进一步克服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些成为农田水利建设迅速掀起高潮的重要原因。^③李葆华也指出：1957年冬出现水利建设高潮的形势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合作化在农村的全面胜利，如果没有整风、反右派斗争和反浪费、反保守主义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水利建设的新形势当然不可能出现。”^④在上述背景下，全国农村的水利建设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958年，全国共完成土石方580亿公方，扩大灌溉面积48亿亩，初步治理洼涝面积21亿亩，初步控制水土流失面积32万平方公里。^⑤

上述各种说法均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该运动的开展是在农村合作化、整风反右运动等基础上进行政治动员的结果。在这场运动中，中共的政治动员能力再一次得以显现。下面，本文就从制度与思想两方面论述中共何以获得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

3.3.1 单极制度的构建与稀缺资源控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共继承传统权威政治并效仿苏联逐步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政权。这种政权将党、国家、社会同构化，党处于至高无

①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②吴志军：《试论1957年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北京党史》，2007年第1期。

③《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畅谈农村中兴修水利的高潮》，《人民日报》，1958年2月7日第3版。

④李葆华：《水利运动的新形势》，《人民日报》，1958年6月23日第2版。李葆华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⑤傅作义：《印度扩张主义者在西藏叛乱中扮演了很不光采的角色》，《人民日报》，1959年4月24日第3版。

上的地位，因此，本文将此称之为“单极制度”。^①此制度在1949年后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控制稀缺资源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实现社会经济变革的目标，兑现中共在战争年代的承诺，也进一步提升其合法性。

1、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立

党的一元化领导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它形成于延安整风时期，由毛泽东系统阐述。为世人熟知的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是群众路线。应该说，群众路线暗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党的领导（采用集中统一的原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开创了群众路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怀疑列宁的原理——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输入工人阶级，更明白地说，共产党必须给整个社会提供思想指导。^②毛泽东关于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的思想，是他在从秋收起义到整风运动的十五年间的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方法的表述为“集中领导，分散经营”。此方法意味着毛泽东既要求下面的参与和一定的主动性，又要求上面的坚定的集中领导。^③

毛泽东在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时，他主要关心的就是使得中共的政策能够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相适应。“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法便适应了这样的环境：中共中央机关驻在延安主根据地，其它根据地散落在华北地区，各个根据地的经济技术水平都很低下，它们的联系主要靠的是无线电通讯。尽管如此，毛认为也不能强调职责和工作的连续的、完全的分散，相反，某种程度上还需要加强集中领导，以便党的工作统一有序。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这样表述“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

同一自给工业，为什么要这样地分散经营呢？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例如，我们奖励三五九旅开办大光纺织厂，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纺织厂，就是因为大光

^①正如亨廷顿所论述的，17世纪的现代化推行者将国王神圣化，而20世纪的现代化推行者则将政党神圣化。但同专制君主制相比，政党是一种更具有灵活性和雄厚基础的制度，它能更好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它不仅能够集中权力，而且能够扩张权力。[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②[美]宣道华：《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85页。

^③[美]宣道华：《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85页。

厂的数百职工大部分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大，如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又原料分散、交通不便，也是分散经营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些原故，我们利用各部门为着解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也集中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的集中起来，无限制的分散是不利的。这种集中，我们也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也许是不可免的。分散所以利用各部门的积极性使之建立起来，集中所以使各部门得到更好的供给。但尤其重要的是分散经营不应该忘记集中领导，……总起来说，我们的方针就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①

在谈到如何集中管理之时，毛泽东指出：“在应该集中领导的农工商业里也不是全边区都集中一个唯一的机关手里，而是由这样的一个机关（现在是边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办事处），根据全体及各部分的需要与经营的可能条件，做出统一的计划，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的经营。”^②这段话也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党、政、军关系问题，1949年以后，也是经常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在延安提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表达了当时所想到的党的统一的指导作用的实质，用语是“一元化”。^③

“一元化”一词，较早出现在中共中央于1942年9月1日发布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一文中。它这样表述党的“一元化”领导：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地区最高的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因此它的成份，必须包括党

^①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沂水：大众日报社，1943年版第58~59页。

^②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沂水：大众日报社，1943年版第60页。

^③[美]宣道华：《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87页。

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同时，党委与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的关系，必须明确规定。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主力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建设根据地与支持斗争的有力柱石。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党的领导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①

上述文字表明，此决定强调了中共在根据地政权及社会中的最高领导地位。它所极力维护的，一方面是党和政军民的横向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组织内部的等级结构。这也意味着中共将以一个整体的力量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及社会发展，也即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然而，这种领导并不是党包办一切事务，而是要实现分工基础上的统一以及一般与个别、领导和群众的结合。毛泽东在1943年6月1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他如此表述领导方法^②：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① 《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7、429、431、433页。

^②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7、899、900～901页。

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由上可以看出，“一元化”两次用作“分工而又统一”的同位语，意思是只要整个体制有以党的形式出现的统一力量渗透进去，并由它来控制，各个机关间必要的分工不会危及活动的统一性。^①这实际上是一种“垂直双重领导结构”（在第2章已有所论述），它的优势在于既能保证党在各层级的领导，又能发挥各个层级的自主性。同时，此结构也注重一般与个别、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以免党的领导流于口号并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而后，在国共内战时期，中共中央又陆续出台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②和《关于健全党委制》^③等决定，把党的一元化领导进一步强化了。

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在1940年代初期根据地常常处于分割、独立的状态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强调那些分散的机构成为一体（一元化）的必要性。1949年以后，尽管中共已经夺取了全国性政权，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实际的原因（地域辽阔、民情差异巨大等），分割和各自为政的问题绝没有烟消云散。^④为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各级党委，中共还在政权机构（政府、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及各人民团体中设立了党组^⑤。

^①[美]宣道华：《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88页。

^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4～1266页。

^③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0～1341页。

^④[美]宣道华：《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89页。

^⑤在中共七大上将党章中的党团改称党组。现行中共党章（第九章第四十六条）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

于是，政府官僚机构处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之下，以此来保障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得以顺利实施。而党的外围组织（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组织）的建立则巩固和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中，党的一元化领导表现的很明显，除了县党委委员担任指挥部成员，还有共青团员和妇联干部在动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党的一元化领导业已成为中共建国后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产生于布尔什维克似的动员体制下，即“力求自上至下地进行动员，因此，他们坚持扩大中央对地方党组织的权利和权力”^①。它的合法性依据也许正如斯大林所言，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它的任务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所思所为，它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党”；党通过一组传送带（工会、合作社、青年团和苏维埃）与群众保持联系；国家机构只是党的行政从属物；无产阶级专政在本质上是其“先锋队”的专政，即作为无产阶级主要领导力量的党的专政。^②

2、合作化运动、统购统销制度与农村资源分配

合作化运动是由中共推动的并对中国农村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1949～1957年，^③它历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④三个阶段而宣告结束。这次合作化运动是在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基础上进行的，也是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与农民思想的改造过程。在运动中，中共采取了政治动员发动群众运动的办法，以极快的速度短时间内实现了农业的合作化。^⑤由于这部分是作为

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可以成立党组。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组的任务主要是负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做好干部管理工作；团结非党干部群众，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指导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工作。这些组织包括：国家机关各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以及各人民团体；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机关厅局，以及各人民团体；省辖市国家机关的委、办、局和各人民团体；州、县人大、政府、政协机关和政法部门，以及各人民团体。

①V. I. Lenin.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 (The Crisis of Our Party)*, in *Collected Works of V. I. Leni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1, pp.396~397.转引自[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

②Joseph Stalin. *Problems of Lenin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4, pp.34; *Foundations of Lenin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2, pp.105~106.转引自[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

③农业合作化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10月～1953年12月，以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合作社；第二阶段为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第三阶段为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的合作化。

④在互助组里，农民合并或出借农具，并在春耕和秋收季节合伙劳动；初级合作社中，合作社社员不仅合并农具和劳动，也合并土地，尽管他们名义上还保留着各自的土地所有权；高级合作社则是所有社员集体拥有土地，与苏联的集体农庄类似。

⑤关于合作化运动较为详细的研究参见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

政治动员的背景分析，在此，笔者不想详细讨论合作化运动中中共是如何进行政治动员的，而是针对合作化的动因及其影响进行探讨。

关于合作化，早在毛泽东 1940 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有体现。毛泽东这样论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土地政策：

这个共和国将要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①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建国后的土地政策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并在 1949 年后的土改及合作化运动中付诸实施。毛还将合作经济看作是农业中的社会主义要素。

农业合作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所以，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规模生产的农民个体经济改造成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大规模生产的社会主义集体农业。^②这也反映出中共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教条式理解。从性质看，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以合作方式来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变革，兼具合作和革命的双重特征。^③然而，尽管它成功地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合作化运动中，由于迷信“一大二公”和将阶级斗争引入破坏了合作的自愿、互利原则，从而导致了合作化运动的失误。可以说，它是一次较为成功的革命，却是一场并不太成功的合作运动。^④因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根本动因。

社，2006 年版。

①《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78 页。

②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版第 789 页。

③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版第 783 页。

④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版第 783 页。

那么，粮食供给的短缺以及统购统销制度^①的建立则是农业合作化的助推器。据薄一波回忆，“新中国诞生伊始，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十分尖锐。如果说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是促进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一，那么 1953 年实行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②在土改基本完成之后，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升。但是到了 1953 年下半年，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从 1952 年 7 月 1 日至 1953 年 6 月 30 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 547 亿斤，比上年度增长 8.9%；支出 587 亿斤，比上年增加 31.6%。收支相抵，赤字 40 亿斤。6 月 30 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 145 亿斤减为 105 亿斤。”^③有的学者分析认为，农业发展的缓慢步伐导致了整个 1953 年食用粮等的供应危机。^④基于这种情况，扩大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就是当务之急。因此，中共中央采取的办法就是建立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以及进一步推动农业合作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将此二者作为改造个体农业的一翼。毛泽东在 1953 年 10 月 2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做了《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发言，内容如下：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

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

①1953 年开始的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继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之后，被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第二次大战役（加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财经战线的“三大战役”）。到 1985 年改行粮棉合同定购制度为止，这个在特定条件下开始实行的农产品统购制度，持续时间长达 32 年之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55 页。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55 页。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56 页。

④关于这场危机的论述还可以参见[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72～174 页。也有的学者认为，此次粮食危机是 1949 年后的土地改革破坏了农村向城市提供商品粮的机制而导致的。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18～421 页。关于这场危机的原因，官方的解释是小麦减产和上年丰收后收购有所放松，以及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而使销售量大幅度增加，由于农民生活改善而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56～257 页。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粮食出口来换取工业品。参见《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陈云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06 页。

造)。……今天讨论的问题，就是涉及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欢欣鼓舞的人的问题，也涉及缺粮户的问题，这就是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制的问题。实行粮食征购依靠谁呢？主要依靠党员，他们是乡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贫农、中农、缺粮户中都有这样的积极分子。光靠缺粮户是不行的，缺粮户可以作我们的同盟军，也可以作中农的同盟军。……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因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至于名称，不叫配售也可以，可叫计划供应。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是农民不满，第二是市民不满，第三是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报纸一字不登。”^①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指出了农民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认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克服农民生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以及扩大农业生产，在意识形态合法性前提下，只能选择统购统销^②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合作化，将农业生产纳入到国家计划中。如此，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就突显出来，而且毛泽东将粮食的统购统销与互助合作视作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两条重要原则。毛泽东正是遵循着这样的思路把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相联系。^③毛本人“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仅看作一项解决当前粮食供求困难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改造个体农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他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以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又有利于粮食统购工作的进行。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的多。”^④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16日发布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中指出，“实行上述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笔者注），不但在现在的条件下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的矛盾，更加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

① 《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297页。

②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页。

③ 毛泽东认为，后面这一翼（对农民的改造——笔者注），如果没有粮食征购这一项，就不完全。他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275页。

④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

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①。那么，统购统销政策如何能引导农民呢？中共中央提出，“既然基本上取缔了粮食的自由市场，就能够削弱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联系和影响，加强农民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和合作，引导农民抛弃资本主义的道路，积极地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的道路”^②。

中共中央在肯定了粮食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并将其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于1953年12月16日，又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开始用国家的力量推动合作化的发展，结束了其试办时期。应该说，毛泽东在将统购统销政策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毛之所以这么做的思想基础，是他此前所接受的前苏联以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中心的过渡时期理论。^③

合作化运动、统购统销制度将农业生产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系之中。这种变革对农村资源的分配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为汲取农业资源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积累。例如，作为中央政府经济问题的主要决策者之一的陈云，在统购统销政策方面与毛泽东的侧重点不同，他认为“只有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工业化建设资金来源的可能才能变成现实性”^④。所以他力主实行统购统销的侧重点在于稳定物价与市场，为工业化建设筹集资金。^⑤此外，有些论者也认为，国家工业化初期最突出的问题是资金的短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0～70美元，靠这个低水平无论如何发动不了国家工业化，不可能启动经济起飞。那么，怎样积聚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金呢？“当时出路只有一条，实现农业合作化，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体系。苏联的经验证明，国家通过这样的农业体制可以推行集中而统一的计划和向工业化倾斜的购销制度和价格政策，从而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的积累。这也是我国土地改革后‘趁热打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8页。

③田锡全：《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④朱佳木：《陈云与中国工业化起步过程中若干基本问题的解决》，《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9页。

⑤田锡全：《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铁’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根本原因。”^①正如金观涛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的自耕农农业结构和双轨制工业结构均是不稳定的，它只能转化到与强大意识形态指导下国家控制相适应的新形态中去。”^②

综上所述，中共通过合作化运动、统购统销制度乃至后来的人民公社改变了农村资源的分配方式，借助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产经营自主权，将他们强迫纳入到国家计划体系之中，从而为中共及其控制的官僚进行精英统治、开展政治动员提供了经济条件。显而易见，瀑河水库修建过程中的农民可以被无偿征调充作劳力，与这种经济制度不无关系。

3、目标导向：农业支持工业

1949年后，中共所建立的单极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动员体系，其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化。换句话说，它的目标导向是农业支持工业。尽管农民在革命年代为获取政权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是要想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就必须依靠强大的工业体系。列宁宣称，“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真正的基础，那就是大工业”；中共认识到工业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不遗余力地争取这个目标。^③在1950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第一章总则中就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④

基于此，中共采取的农业集体化等政策也是配合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如前所述，当时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也将农业的统购统销制度视作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重要渠道。另据邓子恢说，“我刚来时（来到北京——笔者注），毛主席告诉我：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些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完成这个任务，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就应开

^①牛若峰、郭玮、陈凡：《中国经济偏斜循环与农业曲折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转引自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脚注。

^②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页。

^③[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1页。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始。……要知道，工业化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农业要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开辟市场。”^①

1953年是个特殊的年份，中国刚刚实现了物价的稳定和财经工作的统一，农村的土地改革也已经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进一步发展。于是，中共制定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②，并在此基础上规划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③。这个五年计划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制定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之时，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的关系做了较为系统的表述：

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并且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工业变为社会主义工业，使我国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导力量。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以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因为在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和政

①《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2～453页。

②毛泽东曾经对这条总路线做过比较完整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参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8月），载于《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9页。

③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有：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并以此为中心，进行财政、信贷、市场三大平衡和安排人民生活。这项计划是在1953年开始实施，但是最后确定下来是在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全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568页。

治上的前提”。……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有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①

通过这段话可以得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直接目的是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而间接目的则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保障国家独立和防止反革命复辟。如此的表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革命年代的政治动员：党预先设定一个目标（有时这些目标可能是与农民的长远利益一致），然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实现之。在战争年代，“认同于抗日的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给予中共超出自己区域范围内的相当的合法性，这非常有助于建立其权威，但并不能保证群众的能量可以类似地发挥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新领导相应做出决定：支持政治整合和前期社会改革的彻底的动员必须先于新体制的制度化。”^②在政治动员制度化的过程中，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如波涛般汹涌而至（如土改运动、抗美援朝运动、贯彻婚姻法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等），这些运动都指向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双重目标，在其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挥了枢纽型的作用。

如何实现农业对工业的支持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着眼于农业的积累。1955年7月31日，毛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

^①《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702页。

^②[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7页。

积累了资金”。^①在当时农业占据国民经济的很大比重，这也导致工业化建设资金必然要依赖它。农业为什么可以为工业提供资金支持呢？对此，黄宗智曾经指出，“通过土改，国家能够以税收和低价收购的办法，获取原来属于地主、又被地主消费掉的那部分农业剩余。这些农业剩余在分给贫雇农一部分后，全部被国家投入城市工业化进程。像中国这样一个面对着敌对的国际环境，只有很少可以选择的资本积累方式的新生国家，土改事实上成为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令人惊讶的工业化进程也因为土改的顺利进行而得以实现。土改帮助中国保持了从1952年到1980年的工业产出的11%以上的年增长率。”^②综合毛和黄的观点，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通过隐蔽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剥夺农业生产的剩余以进行工业化的资金积累。统购统销制度和合作化运动则配合了此种资本的集中。

有关研究表明，整个“一五”计划期间，在国家预算收入中，5亿农民所交农业税约占10%左右，由于农业及其副产品收购、加工、销售、运输等的利润和税收，间接构成财政收入的约为40%左右（其中包括了工人所追加的价值）；然而，“一五”期间对农业的投资的比重仅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7.1%，加上对受灾农民的救济经费、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改良农业技术的经费，合计约等于农民缴纳税款的1/3。^③由此可见，农业积累了工业化初期建设所需的资金，但是农民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足够的生活资料。这正是导致农业“集体主义内卷化（collectivist involution）”^④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以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支持工业为导向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元化领导的前提下利用党政官僚机构，将党的意志输出给农民的结果。这种输出与苏联的直接暴力强制不同，而是带有鲜明的战争年代的政治动员的色彩。同样，建国后土改这场全国范围内的私有化运动中也铸入了国家（中共）的意志，是中共依靠国家力量组织大规模群众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2～183页。

②[美]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载于[美]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2页。

③转引自董凯志：《三大改造对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的两重作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59页。

④这个概念是由黄宗智提出来的，指的是在农业集体化的条件下，单位劳动力产出停滞或下降了。参见 Philip C.C.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6~17, 199~251.

阶级斗争直接重新分配原有土地产权的运动。当国家意志改变之时，农民的私有制也就随之改变。^①可是，农民在强大的国家动员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一味地顺从，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对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国家行为进行着反抗。^②这种无声的反抗为共和国的政治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例如，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偷偷地签订了土地包产到户的责任书，该行为后来得到政府的认可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反观之，此时期中共在农村的政治动员说明了它已经超越了以前的动员水平，并从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目标转向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上来。^③水利建设作为农村地区重要公共物品，中共通过发动农民兴修水库以提高粮食产量，正说明了它的政治动员目标转向了经济发展。

3.3.2 政治动员的思想背景：封闭性意识形态的塑造

意识形态把共产主义体制与其他正在寻求“政治上强制发展”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区别开来。^④中共自建立起就标榜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属性以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1949年后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封锁以及苏中关系的交恶，中共的意识形态也随之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从而试图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1、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属性

在本文第2章曾指出，中共的意识形态是以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为主，而又兼具中国化的要素。从总体而言，中共的意识形态实现了中西合璧的效果，一方面中共在苏共处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列宁主义）的相关学说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另一方面，毛等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例如王阳明的心学以及知行合一思想等^⑤），又使之中国味十足。这种意识形态既表明了中共的

①该观点主要参考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上）——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第182~183页。

②论述中国农民的这种无声反抗的著作参见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而较早论述该问题的著作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③[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④[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⑤关于毛的思想来源的论述参见[美]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特别是其中的第4章。

正统性，又与中国本土文化较好地结合，从而成功地引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大特征就是人们的主观作用有着巨大的重要性。这与康德以及王阳明等人的思想有着类似之处，但是也有着迥然相异的地方，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并不脱离客观存在而言主观能动性。因而，毛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高度概括为“实事求是”。毛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探索，正是他实用主义哲学的具体体现。从这个角度看，毛将意识形态作为武器工具，服从于获取政权改造社会的革命总体战略。

总体上看，我们可以把中共的意识形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为中共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意识形态，另一部分则是支撑中国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意识形态。首先来看作为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正如本文第2章所述，意识形态为一个政党控制其成员并获得合法性基础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统一了党内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在那时逐步建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获得全国性政权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局限于党内，而且将其意识形态国家化了，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思想乃至信仰，例如文化大革命中所体现出来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思想狂热的表现，同时也瓦解了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共利用意识形态工具，为中国老百姓建构了一个乌托邦（在农村地区，这种乌托邦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就已经破灭了），也为自己的统治提供了一个不太牢固的合法性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关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中共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意识形态。尽管“一五”时期大部分项目是由苏联援建，但是随着中苏交恶以及苏联专家的撤走，且受到全面封锁的情况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就越发突出。据此，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口号，借此鼓舞中国民众为国家富强而奋斗。在1949年之后的三十余年中，中国在这种精神和发展方针的指引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研发成功“两弹一星”，改变了中国受压迫、受歧视的历史。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毛在革命时代较为成功的探索有关（包括延安时期的自给自足经济），他走出了一条与苏共不同的道路。这种胜利一直在很大程度上鼓舞着他。但是此种意识也堵塞了中共吸收其他意识形态先进成分的道路，从而形成了封闭性的意识形态，进而导致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后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综上所述，出于生存的需要，以毛为代表的中共在农村革命战略中采纳了实用主义，此主义成为了1949后中共乃至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核。正如，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不是要片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内容，而是要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同时，毛在战争时代树立起来的巨大威信，使他在1949年后高居于其他同事之上，他的思想也成为唯一正确的，此时中共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较强的封闭性。

2、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挂帅”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以和为贵”的思想，斗争的思想一直被潜藏。然而，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来，阶级开始被广为人知，阶级斗争也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武器。可以说，贯穿中共革命时期的思想的一条主线就是阶级斗争、阶级分析以及无产阶级的领导。但是这一舶来的概念，对于早期的中共党员而言并不熟知。结合中国实际的、比较系统的阶级分析是以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为标志的。阶级斗争与中国人强调社会和谐、节制冲突的传统相悖^①，可是正由此概念而激发了中国人的革命激情。1949年后的近三十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就经常按照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和联盟来分析国内和国际政治。譬如“三反五反”、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四清”运动、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等等这些运动无不是基于阶级斗争理论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中共中央预先设定一个目标，通过阶级斗争的思想和理论发动群众而实现这些目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动员。此一时期，阶级斗争成为中共实现既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的有力工具。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官僚机构已经建立起来，这种精英主义的治理方式得以可能，但是毛根据自己建立起来的权威屡屡通过群众斗争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在农村集中表现为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这两种发展模式里，精英主义的路线受到了压抑，而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方式则大行其道。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毛所说的阶级已经与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概念大相径庭。可以说，“阶级分析构成了毛的斗争、

^①参见 A.F. 莱特：《斗争与和谐：现代中国相互竞争着的价值符号》，载《世界政治》，1953年第1期，第31~44页。

矛盾统一战线，甚至群众运动理论的基础。他的阶级观念的后果之一是在中国形成了一个等级社会——即具有与个人经历和前途吻合的永久世袭地位的社会秩序。”^①出身论（传统的血缘关系的翻版）使得一些人陷入了无休止的阶级压迫之中。当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党内高级领导被打成“资产阶级代理人”时，阶级斗争最终也威胁到了政治精英的统治。在水库的劳力征调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阶级斗争的影子。

与阶级斗争相匹配的是意识形态，因为毛泽东信奉“知行统一”^②并相信正确的思想是正确的行为的先导。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宣传视为他领导的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③在第2章的论述中可知，毛在党内地位的最终确立正是基于他对党内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掌握。这种局面一直到他去世时止。毛深谙意识形态的作用，早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就非常注重对党员及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及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观点，而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毛认同列宁关于革命和阶级意识的思想需要从外部灌输的观点，所以从革命年代起在党的建设方面就着重强调党员教育与意识形态的灌输。这种做法效果是显著的，确实空前地加强了对党员的控制，中共“真正地”拧成了一股绳，并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尝到甜头的毛泽东，在1949年后也很乐于继续采用这种方法，通过向人民灌输某些原则、使他们信奉某些权威，如此就既方便巩固政权，而且可以改造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比如建国后毛在不同场合不断重申对农民的“再教育”。当然，这与他相信人民的意志可以迸发出极大的力量有关，意识形态就是激发人民意志力量的催化剂。这也是意识形态挂帅的最终目的。在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中，指挥部所提出的在建设跃进之前实行思想跃进，正是要利用政治与意识形态挂帅的动员力量。

毛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也与他怀疑单纯依靠正式的政府官僚机构能否管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关。除此之外，在一种技术与人才的不足极大地

^①[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②关于这方面的思想参见：《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298页。特别是该文的最后一句话，“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明显可以看到毛泽东受到了孙中山等人关于王阳明的知行关系讨论的影响。

^③[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限制了领导者获取信息以及分析政策选择后果的能力的政治体制中，意识形态将成为确保下级干部服从的重要工具。^①徐水县委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兴修水利的号召，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意识形态对党员干部的控制作用。

3、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神化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及其同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共同留给中共的政治资源，其载体就是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目前学界公认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它的军事战略思想以及如何获得政权，它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引领中国人实现了国家独立，为现代化的迅速开展铺平了道路。中共曾这样评价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②此种评价也暗含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的分离，因为中共认为毛在晚年所犯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因而是一直在发展和变化的。中共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以及独立自主。^③此三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毛泽东思想的结构特征有哪些？按照詹姆斯·汤森等人的观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两点是革命的民众主义和实践性，然后是辩证法、过程的重要性和通过斗争达到联合。^④李侃如亦对毛泽东思想的特色进行了概括，诸如意识形态挂帅、人民意志论（群众路线、运动和斗争等方法）、反对知识分子的做法、矛盾与统一战线、阶级和阶级斗争、自力更生等^⑤。综合两位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得知毛思想的首要特征就是阶级分析以及与之匹配的意识形态的挂帅，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第二个特征就是毛的民众主义倾向，他相信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的巨大能量而反对专业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因而在方法上采取群众路线和大众动员

①[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②中共中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③中共中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59页。

④[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115页。

⑤[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86页。

的方式；第三个特征是毛所强调的“知行统一”思想，也即它的实践性，从具体实践出发，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就成为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支撑；第四个特征表现为运用辩证法通过阶级斗争达到联合一切力量实现既定目标，例如国共合作时的统一战线、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观点、乃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论述^①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的辩证法特征；第五个特征也许是毛毕生追求的理想——独立自主，国家独立是毛本人从事革命的出发点，也是他进行国家建设的目标之一，影响到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或许，这五个特征依然不能囊括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特征，但是它的主要特征已经基本显现了。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五个特征均形成于1949年以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是在用革命时期形成的却早已与时代不合拍的游击战思想来管理国家^②，并没有实现从革命者向执政者的角色转变。

无论如何，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无疑大大提升了他在党内和群众中的威信，从人们把毛比喻成心中的太阳和大救星就可以窥见一斑。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被神化了，成为老百姓心中的“神”（譬如现在的农村地区还流传着一些毛泽东去世时的神化传说）。这与毛在党内拥有巨大的权力有关，他的地位部分地可视为中国长期存在的帝制传统的产物。^③毛的被神化与对他的个人崇拜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对毛的个人崇拜与刘少奇等人对于毛的过度吹捧也不无关系。^④1949年以后，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新的信仰。毛的领袖地位的确立以及被神化，在缺乏权力制衡机制的条件下，给中共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以权威自居而不能容忍

①毛是这样论述的：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页。

②[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5页。

③[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相近的论述还可参见[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是党的领袖还是“天子”——论毛泽东个人权力的基础和意义》，王应一译，载于萧延中：《从奠基者到“红太阳”》，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179页。关于毛泽东政治权威来源的论述参见[美]弗里德里克·泰韦斯：《毛泽东权威的来源及其合法性问题》，宫力译，载于萧延中：《从奠基者到“红太阳”》，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64页。

④关于刘少奇对于毛泽东的吹捧参见《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刘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301页。

其他权威，以权威取代法制进而削弱了中共党内以及中国的法制建设。毛可以借助自己的权威，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将所有显示出赞成传统文化、代表政府权威和对毛本人和毛泽东思想不“忠”的人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①。

在 1949 年后的二十七年间毛作为全国最高的领袖，不仅拥有事实上的最高权力，而且在当时人民的心中树立起了对他的信仰。这种信仰反过来又增进了他的权力。同时，对毛的个人崇拜也导致了一种特别的政治氛围与压力，迫使人们去遵从毛泽东与党的号召。也有一些在土地改革中翻身的贫下中农，充满了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将其视作恩人、大救星和太阳，并主动学习毛泽东思想接受再教育。^②这种对领袖的依赖和感激为农村的政治动员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

3.4 一元化建构：金字塔式动员体系的形成

通过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我们能够得出“一元化建构”的政治动员模式的特征主要有：（1）在全能主义政治时代，中共（包括它的外围组织）通过严明的纪律以及意识形态控制加强了党的凝聚力，并继承了革命年代的政治动员体制，主要体现为党的一元化领导、组织与意识形态动员；（2）中共通过组织渗透（党在村庄内部建立组织、选拔以党员为代表的新的精英治理村庄）、稀缺资源控制以及意识形态的宣传，对农村实施了全方位的掌控，体现为国家控制社会的关系；（3）中共动员农民手段的强制性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政治挂帅、领袖崇拜以及阶级斗争为动员手段的内核；（4）此时期的动员客体——农民没

①[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②例如，在1967年一位53岁的农民大娘在谈到毛泽东时这样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是我们心中不落的太阳。我们贫下中农热爱和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也最关心我们贫下中农。生命离不开血液，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我们离不开毛主席，我们的心和他一起跳动。他老人家是我们带路人，是我们的恩人和大救星。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贫下中农靠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做他老人家的好社员和好学生。我们要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我们全村，全国都变成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大课堂。顾阿桃：《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北京周报》，1967年第33期第15～17页。转引自[美]弗里德里克·韦克曼：《从革命奠基者到“红太阳”》，田松年、石肇域译，载于萧延中：《从奠基者到“红太阳”》，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241页。关于这段话，我们无法判断是否是她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从她的出生和生活的年代来看，通过1949年前后生活的对照，可能真的会对毛泽东产生感激之情和依赖感。在笔者的家乡，也经常听到老人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人们茫然不知所措，认为天是不是都要塌下来，还产生能不能活下去的顾虑。由此可见，农民对于毛泽东的信仰与依赖。

有什么自由；中共通过意识形态建构他们的主体性，凭借自上而下的政治沟通来宣传党的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以鼓动他们为中共既定的目标努力，这就违背其意愿，因而导致农村地区长期发展缓慢；（5）此时政治动员的导向是“以农业支持工业”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革命目标，以复兴中华民族，这是一种兼具经济发展与民族主义属性的政治动员。综合这些特征，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金字塔式的动员体系”，它是一种强制性政治动员^①。下面，本文就对该动员体系的基本内涵与特点进行阐述。

3.4.1 组织动员：“支部下乡”与农民动员

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是“王权止于县政”。然而，随着近代国家的建构，国家权力与政党开始向农村渗透、扩展，最终形成了党组织主导农村治理的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是由中国共产党实现的，由它通过“支部下乡”而逐步建立起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并依靠组织体系动员农民实现既定目标。^②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是由少数知识精英建立起来的城市政党，因此它的工作重心也着眼于城市。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开始进入农村，中共的工作重心也随之转移到农村。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农民党员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工人党员数。不过，此时农村的党组织建设仅限于根据地内。

1949年，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全国性政权。然而，中共面对的依然是松散的农民，加之长期缺乏政治参与的传统与意识，在农村地区建立的国家政权（乡政府、行政村及后来成立的人民公社等）对于农民而言仍然是外部性的，因为传统农村社会是依靠家族、户族、氏族或其他自然因素维系的。面临此种情况，仅仅凭借外部性的国家政权是很难动员起农民的，于是中共将自己的组织延伸到农村，改变了传统的以士绅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建立起了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性社会。因而可以说，“支部下乡”是通过改变农村社会传统结构而实现党组织对农村地区的渗透、吸纳与控制，从而实现了中共对农民的重新整

^①强制性政治动员是由政治权力主体强制力或命令推动和实现的政治动员。参见徐彬：《论政治动员》，《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第21页。

^②关于中国共产党向农村渗透的研究可以参见：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吴素雄：《政党下乡的行为逻辑：D村的表达》，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黄晓龙：《“支部下乡”：建国初期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以鄂东C村为分析对象》，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合与聚集，为动员农民提供了组织与社会基础。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政党的整合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例如，亨廷顿就认为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常常是一个“多元社会”，“将原生的各种社会力量融合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难。现代化还将产生传统社会不存在或在传统社会政治范围之外的社会和经济集团，使它们立足于存在并拥有政治意识以及参与政治活动。这些集团或者与政治体系同化，或者成为政体革命的温床。因此，在一个现代化社会中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包括公共群体‘横向’的整合和社会及经济阶层的‘纵向’同化。”^①对中国而言，在全面土改完成后原来的地主阶级已经消失及传统社会维系系统渐趋瓦解的情势下，共产党就发挥了社会整合作用，同时它还吸纳农民参与政治活动，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对此情景，亨廷顿曾指出：“‘动员’和‘组织’，这两个共产党政治行动的口号恰恰确定了加强政党力量的道路。能够综合这二者的政党和政党制度便可以使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协调一致。”^②所以说，“支部下乡”一方面形成了农村现代化的新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共产党组织和力量的增强。同时，党的外围组织的普遍建立进一步强化了党在农村地区的领导，这些外围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政党的整合及动员的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共获得了向全国的农村地区延伸组织的先决条件。譬如黄宗智认为：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当然在与国民党斗争时期已经开始，双方的斗争促使各自向社会的基层纵深发展，但是只有1949年共产党获得最终胜利后，它才能在新解放区充分建立党的机构。^③但是，在革命胜利的初期，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人出于防止投机分子入党的考虑，做出了在农村地区谨慎地发展党员的决定。在1950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在老解放区，一般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④在土改运动中，国家意志的传达主要依靠国家政权机关以及土改工作队向农村传达。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如果仅依靠缺乏农民认同的政权体系组织动员是远远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页。

②[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页。

③[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程洪、李荣昌、卢汉超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页。

不够的，正是配合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中共的组织开始逐步深入农村。1954年5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中共中央作的《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指出，“新区约有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乡村没有党的支部，建议当地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按中央组织部所提要求制定发展计划，发展一批党员；……没有支部的乡及党员过少的乡，均应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支部。”^①伴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合作社及行政村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就全国而言，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是1956年和1958年”^②，正值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两次高潮时期。合作化运动的显著成果之一就是“将共产党的组织由行政乡一直延伸到村庄和生产单位；‘支部建在村庄’和‘支部建在生产单位’都是为了推动分散农民的组织化”。^③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之后，公社设立党委，生产大队设立党支部，生产小队设立党小组，由此建立了中共在农村地区的组织网络，确立了党在农村地区的一元化领导。于是，中国共产党就随着正式的国家机构的建立而发展，因为党组织是与国家机构平行设置的，特别是在行政村一级（人民公社后是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代替了国家政权机构，而党支部书记成为了解放后的村长，过去对村长尊称某村长（例如李村长），现在则变成了某支书（例如李支书）^④。此时期，县及以下的党政机构的设置如表3-2。

表3-2 1949~1983年县及以下的党政机构设置

1949~1955年	1956~1957年	1958~1983年
县（县委员会）	县（县委员会）	县（县委员会）
乡（乡支部）*	乡（乡党总支）	公社（公社委员会）
行政村（党支部）**	高级合作社（高级社支部）	生产大队（大队支部）
	初级合作社	生产小队（小队党小组）

注：*在县与乡一级之间还设置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区公所；

**此时期只有部分村庄建立了党支部。

资料来源：依据[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程洪、李荣昌、卢汉超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8页修改而成。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②景跃进：《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③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第15页。

④[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程洪、李荣昌、卢汉超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8页。

伴随着“支部下乡”，还有“行政下乡”、“政策下乡”、“法律下乡”、“宣传下乡”与“服务下乡”^①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在以党治国的国家建设中，政党及其控制的国家政权向农村下沉的过程。可以说，“支部下乡”使得一盘散沙的农民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也赋予了农民以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动员农民参加到党的目标中来，实现了农村社会的改造。通过支部下乡，中国共产党打破了农村地区原生的“权力文化网络”^②，树立起以党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将农民置于人为的行政单位中，进而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国家权力与村庄的关系——国家全面控制和干预村庄生活。农民前所未有的感受到了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存在，农村社会的政治性也空前增强了。

3.4.2 农村党员的发展与精英培育

拉斯韦尔认为，“权势人物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取最多的那些人们。可望获取的价值可以分为尊重、收入、安全等类。取得价值最多的人是精英(elite)；其余的人是群众。”^③在传统中国农村，获得这些价值最多的是族长、士绅阶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切地说是1952年底土地改革结束之前。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革命将农村社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了改造，与之同时消解的还有中国农村传统的治理架构。1949～1952年的土地改革对于中国阶级关系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徐中约曾经这样评价这场土地革命：

理论上讲，政府允许地主在重新划分土地时拥有自己的一份田地，也

①相关论述可以参见徐勇的一系列文章《“行政下乡”：动员、任务与命令——现代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行政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宣传下乡”：中国共产党对乡土社会的动员与整合》，《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0期；《“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兼论乡镇体制改革的走向》，《东南学术》，2009年第1期。

②这里借用的是杜赞奇提出的概念，文化网络意指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内容十分广泛。文化网络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是正统和权威产生、表现及再生的发源地（因而称之为权力的文化网络，笔者注）。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33页。

③[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页。

规定富农自己耕种的那部分土地不在没收之列。但在实践中，各地方的“控诉大会”做出了许多不公正的和暴力的举动，这些控诉大会受头脑发热的党员干部和急于报仇的农民引导，对地主和富农进行了严厉地指责。地主和富农在这些大会上遭受了可悲的损失，许多人在草草公审之后就立即被枪决了。在以往传统社会中充当统治精英和主干的士绅阶层，现在被摧毁了。^①

上述文字表明，接受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动员的贫雇农延续了革命时代的狂热，不仅从生产关系上而且部分的从肉体上消除了存在了二千余年的地主阶级，同时也摧毁了传统农村精英治理体系，从而为中共在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基础。在大规模的社会改造的同时，新的农村精英的选取就成为中共在1950年代合作化运动开启后的重大课题之一，因为只有吸纳更多的社会精英才能保证党在农村地区方针、路线和政策的贯彻实施。

既然旧有的士绅阶层已经作为一个阶级消失了，那么由取得政权的中共填补农村权力真空就顺理成章了。如前所述，中共通过“支部下乡”不仅建立起了党在农村地区的组织网络，更为重要的是建构了一个新兴的农村精英集团，他们大都加入了中共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构建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新型的权力网络。虽然革命年代的中共为了壮大自身力量而大力吸收农民入党，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初，为了防止投机分子入党以保证中共的纯洁性，中共曾经暂缓农村党员的发展。1954年，中央农村工作部曾向中共中央建议有计划地发展农村党组织及党员，并提出了发展党员的四项标准：根据阶级成分、过去的斗争表现、对社会主义互助合作的态度及其与群众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的情况加以挑选，经过训练教育后，自愿接受党员标准八条者^②，再个别吸收入党。^③

根据张乐天针对海宁县盐官镇党的建设研究，可以得知当时发展党员的标准

①[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0页。

②此时党员的标准是：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必须下定决心终身英勇地坚持革命斗争；一切共产党员的斗争和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执行；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私人利益之上；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常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自己工作当中的错误和缺点；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老爷；一切党员必须努力学习。此八条标准体现了党员的政治要求。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准有三个^①：首先是阶级成分和个人历史。一个积极争取入党的农民必须向党组织详细地讲清自己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同时党组织也会组织力量调查“发展对象”的情况；假如家庭出身“高”或者个人有点历史问题，即使他表现积极，主动靠拢组织，也很难加入组织。其二是政治立场，即是否接受党的纲领和理想，能否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是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政治立场是最重要的标准，它保证党员能够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而确保了党中央的指令能够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畅通无阻地、有效地得到贯彻。其三是对党忠诚老实。党组织要求入党积极分子忠实地向党汇报情况，经常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汇报的内容包括政治、思想、经济、工作以及个人生活等等各个方面。

可以看出，中共在农村社会的扩展并不是简单地扩大数量，而是高度选择的结果，对入党的农民有着鲜明的政治要求。从阶级成分看，党在农村地区的阶级基础主要是没有土地的农民。这部分人在传统社会中属于精英以外的人群，但是他们人数多，特别是因缺乏土地而有改变传统秩序的强烈政治要求。^②从属性看，只有那些在各种运动中表现突出并且能够和党保持高度一致的农民“积极分子”才能得以入党。这些“积极分子”都是在完成党的中心任务中涌现出来的，并因此得到党的信任，同时也能够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戴。^③

“支部下乡”造就了以中共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为主体的农村新兴精英，他们与传统精英的重要区别体现在这样两方面：一是社会基础广泛性，他们来自于农民，与农民有着相同的生活习惯与思想意识，能够获得农民的信任，并能以农民熟悉的方式传达党和国家的意志；二是在活动中体现其地位，与传统精英通过功名获取社会地位不同，新兴的农村精英要在各种活动中有突出的“政治表现”，并且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群众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与保持其社会地位，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是农村动员中的“积极分子”。这些农村新兴精英一方面代表党和国家掌握了农村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也将国家政治权力延伸到每一个村庄，为此时期工业化的社会目标提供了精英基础。但是此种精英替代的模式也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取代了原有的乡

^①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多》，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39～241页。

^②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第17页。

^③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第17页。

村精英的出身贫苦的党员干部，由于缺乏文化资源，不得不过度地依赖政权和政治话语的支撑，从此以后，中国农村开始了政治权力无限扩张的年代。^①

3.4.3 毛泽东卡理斯玛型权威的统摄

马克斯·韦伯曾经把权威划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传统的、通过世袭而得来的权威，如昔日的家族长制和世袭君主所实行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支配；第二种是卡理斯玛（*charisma*）型（又称超凡魅力型）权威，它来自极端的个人献身精神，个人对救赎、对英雄业绩的信念，或其他一些个人领袖的素质；第三种是法理型权威，是依靠“法制”，依靠对法律条款之有效性和客观性的“功能”的信任而实行的支配；这些法律，则是以理性方式建立的规则为基础。^②从韦伯的划分，我们可以得知：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起到支配作用的是卡理斯玛型权威（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尽管此时也具有了官僚制架构以及相应的“法制”型权威，但它从属于毛泽东个人权威^③。

无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贡献以及1949年的国家独立给毛泽东带来崇高的威望。“毛泽东的同事们，作为革命的创业者，他们认识到了毛在全盘战略方面的‘特殊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信念同对毛的‘特殊才能’的信任结合起来；作为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感情为毛所吸引，在他们眼里，毛泽东使得民族复兴成为可能，实际上，毛泽东同整个民族是融为一体的。”^④所以说，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已经被他的同事们认可和服从。

从时间上看，对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尊崇始于延安整风时期，1949年建国之后毛的个人威信达致一个新的高点，而“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则将毛的权威抬到了顶峰。伴随着毛个人权威的提升而至的是对他的个人崇拜。应该说，个人崇拜在1949年后的一系列运动中发挥了其政治动员的作用，也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领袖的合法性。但是个人崇拜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群众运动，

①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②[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6～57页。

③按照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泰韦斯的观点，毛泽东的权威既有基础既有超凡魅力型、法定—法理型，还有传统型的特色。参见[美]弗里德里克·泰韦斯：《毛泽东权威的来源及其合法性问题》，宫力译，载于萧延中：《从奠基者到红太阳》，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64页。

④[美]弗里德里克·泰韦斯：《毛泽东权威的来源及其合法性问题》，宫力译，载于萧延中：《从奠基者到红太阳》，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

却给政策的连续性、官僚体系以及法制、民主等制度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也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心理因素之一。此外，毛试图运用自己的卡里斯玛型权威消除官僚主义、打破等级制规则（如文革的开展），但是国家治理是需要官僚体制的，此种权威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不可逆转的张力。这就为邓小平及其同事们提供了极大的改革空间。

就农村而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于权威的依赖感，因为剧烈的社会变革打破了既有的文化网络，消弭了农村社会原生的权威，因而毛以及共产党的权威就是农村传统权威的替代，从而维系了农村社会的平衡。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对毛的个人崇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基层干部推进国家政策执行的不当工具，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为了强迫群众加入互助组，有些干部对农民采取政治威胁，“互助是毛主席主张，不互助就是不爱国”；有的说：“不参加就是不拥护毛主席”。^①与此相关的，是否拥护毛泽东权威成为了判断农民阶级立场的重要标准。最后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对毛的个人崇拜造成了农民主体性的迷失，在充分动员农民的同时，也抑制了他们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就像鸦片一样，它一方面兴奋着农民的神经，鼓动他们参与形形色色的运动，另一方面则在悄无声息地损耗着农民的肉体与精神，让他们除了相信毛泽东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3.4.4 自上而下的政治沟通及社会、心理控制

政治沟通理论，是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它强调政治系统（主要指政府）如何通过有效的信息沟通，实现对人类行为的操纵和控制。^②政治沟通依照路径可以分为三种：上行沟通、下行沟通以及平行沟通。在集权制国家当中，政治沟通一般是以下行沟通为主^③，即自上而下的沟通，通过政治

^①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1949～1952）》（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8、1057页。转引自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217页。

^②关于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可参见 Karl W. Deutsch.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New York: Free Press, 1966;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how people decide their f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ress, 1974.

^③在建国初期，政务院于1951年6月颁布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国务院又于1957年11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均属于国家信访制度的

机构依次逐级地进行信息传达。在毛时代的中国，政治沟通还体现为领袖与群众之间的信息交换，当然这种沟通也是单方面的，群众唯领袖马首是瞻，自愿服从他的意志，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致顶峰。同时，毛泽东笃信列宁关于阶级意识需要外部灌输的观点，更直接地加强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沟通体制。政治沟通中政府与民众的信息传递大都通过政治传播的形式，从总体上，毛时代的政治传播体现为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政治传播媒介和内容都受到政治权威的控制。此时期，政治传播的媒介主要有党报、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工业和大部分出版事业，这些传播媒体都是由国家进行管理的，传播内容也需要经过政治审查。担负此重任的就是中共中央的宣传部（简称中宣部），该机构的责任就是确保所有媒体在以书面和口头文字传播信息与观念的过程中遵循党中央的政策。^①

第二个特征为政治传播要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要求以官方意识形态的语言进行宣传。政治传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其目的是为了提升党和领袖的权威，同时也将不使用这套话语的人排除在人民范围之外，从而成为了阶级划分的基础。

政治传播风格的教育性则成为第三个特征。政治传播通过先进典型的塑造和坏典型的批判进而说明应该如何贯彻政策，这在合作化运动、大跃进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尤甚。通过让人们模仿某种行为、摒弃某种行为而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也为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心理基础。这也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使得特定的人们接受一定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态度，并内化成心理，进而影响人的行为，以加强党和国家的合法性。

从党政机构内部看，自上而下的政治沟通保证了中央或者上级机关的权威性，能够整合具有分散倾向的官僚系统（这些官僚机构是按照分工原则设置的，他们按业务各分管一项事务，因而具有分散性）。

与这种政治沟通相呼应的是，毛时代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心理控制机制。^②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依靠诸多的群众组织而将中国人凝聚起来（比如，

雏形，意在让人民群众有向上级反映意见的渠道，但是囿于时代的限制，这些制度形同虚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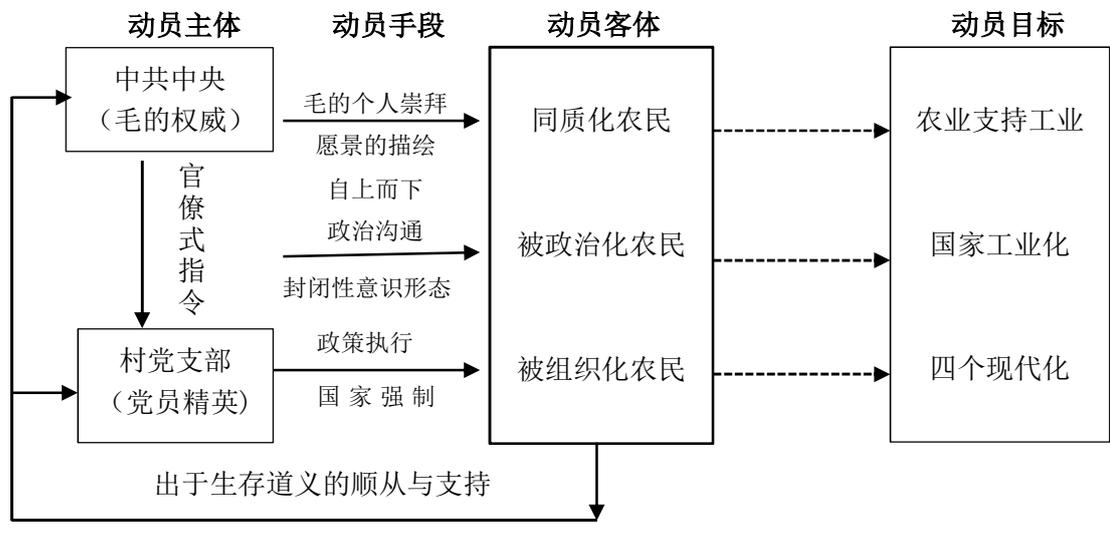
①[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②[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5～667页。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工会、妇联、共青团、少先队等），中共通过庞大而复杂的组织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参加各项运动。这些群众组织实质上已经成为半政府团体。与此同时，中共还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要求人民主动关心政治而不能仅关注自己的事情，相互督促思想和行动，参加学习班和批斗会，将国家置于家庭之上，要自始至终地完全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同此相适应，中共还采用“洗脑”式的思想灌输方法，来加强对人的心理控制，改变个人意志，重塑个人性格，借此改造他们而为国家服务。

至此得出，自上而下的政治沟通和社会、心理控制机制，使每一个中国人紧紧依附于党和国家而没有什么自由；党和国家也利用这种依附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汹涌的群众运动，改变了中国人形如散沙的状态。正如徐中约所言：“通过群众组织、秘密警察、大众通讯媒介和思想灌输，政府成功地控制并改造了社会和人民，其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曾经是个个人主义色彩很重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上最受节制的民族。”^①

“一元化建构”的政治动员模式如图 3-2 所示：



经济社会基础：国家掌控土地资源与农村干部任免、农村社会同质

图 3-2 “一元化建构”的政治动员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拟

^①[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7页。

3.5 本章小结

本章的研究时段是1949～1978年，恰好是中共建国至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该阶段中国形成了全能主义政治。基于此，笔者提出了在全能主义政治时期中共农村政治动员是一种“一元化建构”模式的观点，并通过大跃进时期河北省徐水县瀑河水库的修建为个案进行了阐释。本文先是对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进行微观探究，发现该水库的修建反映了一元化政治体制下政治动员的特征；随后从制度与思想两方面对水库修建过程进行了宏观透析，此时期单极制度的创立、稀缺资源的控制以及封闭性意识形态的塑造构成了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一元化建构”的动员模式，亦可称之为金字塔式动员体系。它的主要特征有：（1）在全能主义政治时代，中共（包括它的外围组织）通过严明的纪律以及意识形态控制加强了党的凝聚力，并继承了革命年代的政治动员体制，主要体现为党的一元化领导、组织与意识形态动员；（2）中共通过组织渗透（党在村庄内部建立组织、选拔以党员为代表的新的精英治理村庄）、稀缺资源控制以及意识形态的宣传，对农村实施了全方位的掌控，体现为国家控制社会的关系；（3）中共动员农民手段的强制性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政治挂帅、领袖崇拜以及阶级斗争为动员手段的内核；（4）此时期的动员客体——农民没有什么自由；中共通过意识形态建构他们的主体性，凭借自上而下的政治沟通来宣传党的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以鼓动他们为中共既定的目标努力，这就违背其意愿，因而导致农村地区长期发展缓慢；（5）此时政治动员的导向是“以农业支持工业”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革命的目标，借以复兴中华民族，这是一种兼具经济发展与民族主义属性的政治动员。从动员的性质看，它是一种强制性政治动员。

第4章 嵌入式管控：后全能主义时期的农村政治动员（1978~2012） ——从广东省“乌坎事件”谈起

政治现代化包含着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正如在集权国家一样，它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力；或如在一些民主国家中那样，它可以增加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力。

——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①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意味着中国开始与毛泽东时代的继续革命的路线告别，并逐步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亦开启了后全能主义政治时期。诚如在革命和工业化建设中发挥主体力量一样，改革的号角仍然首先由农民吹响。土地家庭承包制、村民自治的实施以及农村社会的分化和开放化，都是农村改革的结果。然而，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与农村的多元化发展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冲突，直接表现为“村两委”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表现为以党员为代表的体制内精英与社会民间精英的竞争、以及农民组织的兴起对基层党组织的挑战等。而开放性意识形态则加剧了这种冲突与挑战。这与中共对农村实施“嵌入式管控”的政治动员模式不无关系。在村民自治制度虚化的情境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和民主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农民采取了制度外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广东省“乌坎事件”就在此背景下发生，它集中反映了“嵌入式管控”模式所面临的压力，也催生了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的重构。基于此，本章就以“乌坎事件”^②为例对“嵌入式管控”的动员模式进行探讨。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②本文选取“乌坎事件”为个案，是因为彭湃曾于1927年11月在海陆丰农村地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并维持了四个月。由此引出的一个思考是，中共曾经最早建立政权的地区，为什么在其执政六十多年后会发生反抗其基层统治的事件。

4.1 研究视角

邓小平设计主导的改革开始被称为中国的“二次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有些好的制度得以恢复和落实，同时也创新了一些新制度，从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中国社会也显现了生机勃勃之景象。从宏观角度看，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重大变化就是党和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开始调整，党和国家的权力有所收缩，社会自主力量开始增强。在农村地区，具体表现为伴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与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农民创设了村民自治制度。这意味着，毛泽东时代党政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转变，政治权力全面控制农村社会的情势已经成为历史，开始步入学术界所称的“后全能主义”^①时代。

所谓后全能主义，即处于全能主义与治理之间的国家治理的过渡形态。从国家权力看，它对社会的控制开始逐步放松，社会发展出现多元化倾向，与之相应，国家控制和管理社会的形式也在调整之中；从意识形态看，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并作为一党组织整合的基础，但是它日渐淡化而且日益受到其他价值标准的挑战；从政治动员看，执政党仍然具有较强的政治动员能力，但是由于制度惯性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全实现向执政党的转型，尽管它依靠基层组织实现了对社会的组织嵌入，可是它的政治动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其他社会组织和精英团体削弱了。

在后全能主义时代，农村地区的国家—社会关系开始出现变化，国家权力收缩，社会权力开始增长。例如，村民自治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党政经社合一的体制，在村庄一级也突破了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以及村财务会议的权力结构，村委会的成员开始由农民投票选举，农村基层权力运行开始出现自下而上的制度设计。于是，在基层社会出现了与国家权力结构不一致的情况（即具有

^①此概念借用了萧功秦“后全能体制”的提法。后全能体制的社会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后全能体制”的社会，存在着有限的多元化；二是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一党组织整合与党内凝聚的基础；三是后全能体制社会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在理论上仍然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变革的动员能力，以及抗非常事件与危机的动员能力（这一点在应付九八年夏季全国性大水灾过程中仍然显示了出来）。参见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第3～4页。

自上而下权威结构的村党支部与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之间的权力冲突)。农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使得农村的社会治理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产生了一定的挑战。

基于上述研究视角,本章提出这样的观点: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基于村民自治制度形成了“嵌入式管控”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此种动员模式是一种过渡型的。因为这种动员模式的形成并不是中共有意为之,而是在一系列改革基础上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倒逼式的制度变迁。“乌坎事件”作为当代中国农村治理失效的典型代表,表现出中共“嵌入式管控”政治动员模式遇到的挑战,而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也说明了中共还具有较强的政治动员能力。下面,本文就借用广东省“乌坎事件”来剖析这一观点。

4.2 微观解析:“乌坎事件”的来龙去脉

2011年9月21日,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爆发了一场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本日上午,大约三四百名乌坎村村民聚集到陆丰市政府进行上访,下午部分上访村民在村里及村周边企业聚集、打砸、毁坏他人公共财物和冲击围困村委会、公安边防派出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而被列为2011年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之首。接下来,本文将对“乌坎事件”的经过及独特性进行阐释和分析。

4.2.1 乌坎村村情

乌坎村,行政上隶属于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关于乌坎村,《汕头日报》曾经登载过一篇对其高度颂扬的报道——《乌坎村——一颗璀璨的“滨海明珠”》。^①该村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边陲渔村。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乌坎村已经成为富甲一方、名闻遐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该村曾先后两次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光荣称号,并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建设先进单位”。该村由七个自然村组成(新一村、一村、二村、三村、四村、五村、六村),

^①林胜淡、陈春火:《乌坎村——一颗璀璨的“滨海明珠”》,《汕头日报》,2008年11月21日。

共有村民约一万两千人，下辖七个村民小组，是陆丰市最大的一个村，共有党员 133 名。该村经济以渔业为主，同时发展农林牧副工等产业，也有部分村民外出经商或务工。村民的收入连年增长的同时，该村的集体经济规模也日益壮大。2008 年，乌坎村的集体经济纯收入 300 万元，超过了好好乡镇（街道）的财政收入，因此被称为“汕尾第一村”。

然而，乌坎村村集体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土地收入。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乌坎村就通过发包 3000 多滩涂海面而获得几十万元的年收入；1996 年，乌坎村将 450 亩土地以折价入股的方式，与港商陈文清办起了丰田畜产有限公司，此项村集体年收入达 30 万元；2002 年，乌坎村投资 1000 多万元兴建厂房 25000 平方米，出租给港商兴办“富荣针织厂”，年收入租金 60 万元。村集体收入增加，也改善了乌坎村基础设施建设。村的道路全部实现了水泥硬化、建设了自来水厂、公厕和垃圾池，改变了村容。2001 年，乌坎村被确定为省生态示范村。正在施工的“乌坎生态文化公园”则是总造价 4500 万元，共分三期的建设项目。

乌坎村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富起来的代表。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该村的集体收入一直依赖土地，也就暗藏着一些危机：农村土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农民将以何为生，失地、少地的农民能否得到妥善安置；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能得到多少赔偿；集体收入的分配是否公正等等。正是这种长期依赖土地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而成为了“乌坎事件”的导火索。

乌坎所处地区的人民，具有反压迫争解放的革命传统。乌坎村所处的汕尾市的海丰市的桥东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彭湃（1896-1929）的家乡。当年的彭湃为了农民获得土地，摆脱剥削，烧毁自己的田契，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与毛泽东、方志敏一起担负起领导全国农民的重任，并于 1927 年 11 月，领导农民在海丰、陆丰县建立苏维埃政府，即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彭湃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当地人民以彭湃为骄傲，继承了彭湃反压迫争解放的革命精神。

4.2.2 “乌坎事件”始末

“乌坎事件”^①是 2011 年 9 月 21 日以及之后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的总称。

^①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笔者对此事件经过的描述大多采用相关新闻报道或者网络资源。对此，笔者

该事件持续时间较长、有起伏，影响极大。据官方报道，“乌坎事件”是由于乌坎村村民因土地问题、财务问题、选举问题对村干部不满的上访而引发的。这可以视作此事件的导火索。

1、“乌坎事件”的背景

该事件的诱因是土地征收补偿问题。^①近年来，村民委员会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陆续转让 3200 亩农用土地，卖地款项达七亿多元人民币，而补助款每户只有 550 元。其中村民委员会此前已经转让给丰田畜牧场的一块土地，存在与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洽谈合作以及转让土地的问题。取得村民土地使用权，准备兴建滨海新区碧桂园的开发商为祖籍乌坎的港商陈文清，他于 1980 年代成为香港的广东海陆丰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广东省人大代表。乌坎村村民中有二十几位青年，从 2009 年 6 月 21 日至 2011 年 3 月底之间，十数次组织村民代表到陆丰市信访局以及广州的广东省信访局上访均无果。近期仅存的一块土地也被卖给地产开发商，此举引起村民蕴酿 2011 年 9 月 21 日及往后的历次示威抗争行动，22 日政府派出军警镇压而最终引爆骚乱。在上访多次无果之后，这些青年中有部分人自发成立“乌坎热血青年团”^②（后改名“乌坎爱国青年团”）。

2、“乌坎事件”的经过

（1）上访演化成暴力冲突与外媒介入：“乌坎事件”的初期阶段

2011 年 9 月 21 日上午，乌坎村三千多名^③村民因土地问题、财务问题、选举问题对村干部不满，手持横幅前往开发地块、村内存在土地争议的企业、村

做了大量的甄别工作，力求做到客观公正。此外，本文还参考了两篇期刊文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 年第 2 期；熊伟：《亲历乌坎选举》，《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 年第 2 期。

①“乌坎事件”的背景介绍主要参考：《乌坎民选村代表薛锦波遗体已安葬 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经过回顾》，载于“华讯财经网”，http://finance.591hx.com/article/2012-02-20/0000123344s_1.shtml，2012 年 2 月 20 日。

②据报道，该网络社交平台早在 2009 年 2 月就成立了，经过两年的发展，乌坎热血青年团的成员已经有上千人了，一些在校中小學生也暗地加入。参见张建锋：《乌坎密码》，《经济观察报》，2012 年 6 月 11 日第 034 版。

③此为记者采访村民得知的数字，官方数字为 400 人。据清华大学课题组成员访谈得知集会人数远不止 400 人，而是官方为了淡化处理而做的宣传。关于“乌坎事件”经过的主要报道有：《乌坎事件经过、乌坎事件起因、乌坎事件详细解析》，载于“华讯财经网”，<http://money.591hx.com/article/2011-12-23/0000097216s.shtml>，2011 年 12 月 13 日；《陆丰市乌坎事件情况》（中英文版），载于“汕尾党政信息网”，<http://www.shanwei.gov.cn/163747.html>，2011 年 12 月 16 日；《乌坎民选村代表薛锦波遗体已安葬 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经过回顾》，载于“华讯财经网”，http://finance.591hx.com/article/2012-02-20/0000123344s_1.shtml，2012 年 2 月 20 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 年第 2 期。

委会以及市政府游行请愿，当天政府并没有表态。当日下午，部分上访村民（主要是年轻人）在村里及村周边企业聚集，并发生了打砸、毁坏公私财物和冲击围困村委会、公安边防派出所等行为。

9月22日上午，一百多名汕尾武警特警进驻当地，武力驱散正在集会的市民包括妇女儿童，10多人受伤其中有两个儿童被打重伤急救，随后矛盾激化。当地人围攻派出所与市政府、投掷石块和推翻警车，有10多名警察受伤，当地香港人物业亦遭破坏。警方施放水炮驱散，并拘留4人。对此，汕尾、陆丰两级党委政府启动应急预案，赶赴现场协调。与此同时，汕尾派出工作组到陆丰督导，陆丰市、东海镇组成工作组进村做工作、回应诉求、维持秩序。

9月22日中午，香港记者率先进入乌坎。香港“本港台”和“翡翠台”当天的晚间新闻开始报道乌坎事件，翡翠台的报道是：“广东省陆丰乌坎村过千名村民不满征地赔偿问题，连续两天到市政府和派出所抗议，期间发生警民冲突，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村民。”而汕尾市人民政府发言人在接受本港台记者电话访问时，则如此解释警民冲突的原因：“（警民冲突）任何死伤都没有，部分村民不明真相，受个别人的煽动，对外来的投资情况不明，也不了解。”^①外媒的介入，使得“乌坎事件”进入了世界公众视野，也形成了对此事件的不同声音。

9月23日上午，当地人再度聚集派出所外，促交代征地赔偿，要求当局释放4名被捕村民，及交代征地赔偿问题。同日隔壁的龙头村也发起同样的抗议事件，千名村民拆毁围墙夺回自己农地。同日，英国、日本、美国等多国媒体记者进入乌坎，在这些外国媒体的报道中，事件的关键词主要有“土地赔偿”“官员腐败”“冲突”“骚乱”等。^②

9月24日，由乌坎村全体村民推选的13位代表与陆丰市和东海镇多次沟通并向政府提出三项诉求：查清乌坎村改革开放以来土地买卖情况；查清村委换届选举情况；公开村务、财务。陆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邱晋雄代表市委市政府作了答复：市、镇两级将组成强有力工作组进驻乌坎村，调查核实村民代表提出的问题；工作组于9月26号进入乌坎村，每7天公布一次工作进展；乌坎村“两委”干部要全力配合市工作组开展工作，村民代表参与监督。此外，

^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第29页。

^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第29页。

邱晋雄还要求村民代表配合政府做好工作，以及村民绝对不能组织过激行为等。村民代表对以上答复表示满意。^①但这工作组没真正开展调查，镇政府委派至乌坎的党支部代书记陈润基与陈文清为舅侄关系，加上之前历次上访均无下文之情况下，村民对此并不信任。

9月27日下午，原定于9月28日的乌坎选区的陆丰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和东海镇第十五届人大代表选举提前进行了，在乌坎的七个村小组流动发放选票和回收选票。发放的选票有白色和粉红色两张，其中白色的是东海镇人大代表的选票，候选人是陈舜意、林爱兰和李权，粉红色的是陆丰市人大代表选票，候选人是薛昌和郑兰孙。28日上午7时至11时乌坎村委大院内除了数名干部人员之外，前来投票的村民寥寥无几（根据村民提供的见证材料，当时参与投票的村民只有黄玉和陈知仔两位）。29日，东海镇选举委员会发布选举结果公告，确认乌坎村的市、镇人大代表选举有效，其中薛昌当选陆丰市人大代表，得赞成票3551票，得票率84.9%；陈舜意（得赞成票2173票，得票率87.9%）和林爱兰（得赞成票1912票，得票率77.4%）二人当选东海镇人大代表。^②这种选举结果再一次说明，村支书薛昌和村主任陈舜意再次违法操纵了村民选举。

9月29日，村民在仙翁戏台上组织村民见证之下，以姓氏规模比例推举出117名有投票权的村民代表，再由每个姓氏挑出一人，共38位候选人，然后在其中选出“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13名成员，选举结果是由林祖恋（原名林祖釜）任理事会顾问，理事长杨色茂（78票），副理事长张德家（73票）、薛锦波（63票）、孙楚浩（63票），理事成员包括：黄金奇（60票）、庄汉碧（57票）、蔡礼绸（56票）、曾昭亮（49票）、李永平（48票）、林水清（43票）、刘水森（39票）、洪锐潮（39票）、张建城（38票）^③，以其为核心成员带领村民发起示威游行。理事会的职责在于监督与配合陆丰市政府的调查工作，其后召集村民发起村民大会；财政来源来自于向村民募捐款项，每笔捐款与支出都在村内主要庙宇张贴公开。

^①《陆丰9·21乌坎事件基本平息 村民代表终获满意答复》，载于“南方网”，http://news.southcn.com/d/2011-09/24/content_30399798.htm，2011年09月24日。

^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第30页。

^③张洁平：《呼啸村庄——乌坎的死亡与反抗》，载于“阳光时务周刊网”，<http://www.isunaffairs.com/?p=2063>，2011年12月16日。

（2）再次上访与政府回应：“乌坎事件”的中期阶段

进入11月，事情又出现了波澜。11月1日，根据审计结果，东海镇党委对存在违纪问题的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①、副书记陈舜意予以免职处理，并接受陈舜意辞去村委会主任的申请。11月17日，陆丰市纪委对薛昌和陈舜意进行了立案查处。11月中旬，少数村民在互联网上贴出《“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计划组织村民于11月21日游行上访，并请中外记者报道》的帖子。^②11月21日10时35分，400名左右的乌坎村村民聚集到陆丰市政府门口上访，打出“打倒贪官”、“还我耕地”、“惩治腐败”、“官商勾结·扼杀民主”等标语。至11时26分，上访村民自行离去^③。但庄烈宏^④接受《阳光时务》访问时表示当天有4000人游行，他的父亲庄松坤表示在该次上访后，陆丰市政府有人前来村内散发“陆丰市委书记杨来发回复村民代表的讲话要点”传单，并派匿名人员（不配工作证）前来让老妇孩童签名确认。^⑤当天下午及第二天，发生几次数百人在村内的聚集活动以及村民罢市、罢渔。三天后，村民于11月24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至26日，村里的白布标语、大幅宣传画已自行拆除。事态得到平息。

12月9日，汕尾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就陆丰市处置“9.21”事件作情况通报。公安部门已经抓获“9·21”事件中打砸为首分子庄烈宏、曾昭亮、

^①薛昌于1970年～2011年11月1日担任乌坎村党支部书记，共计41年，被当地村民称为“薛昌王朝”。据清华课题组调查得知：薛昌能够当政41年，与乌坎村的行政建制有关。改革开放后，乌坎村虽然从原来的生产大队转变为“行政村”，但并没有同时实行“村民自治”。自1982年宪法以后直至1999年以前都没有建制为由村民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而是由东海镇人民政府派出管理区办事处，全而负责乌坎村级层次的工作。1999年1月1日，《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正式施行。此后，广东省进行农村基层组织改革，采用“改体制不改建制”的方式，撤销管理区办事处，改设村民委员会，并将村民委员会设在了管理区（原生产大队）的基础上。但乌坎村在1999年5月12日仍然以“东海镇乌坎管理区”的名义与“东海镇民营企业区管委会”签订《东海镇民营区第九期用地协议书》，由此推断，“乌坎管理区办事处”改制为“乌坎村民委员会”应是1999年以后的事情。换言之，乌坎实行“村民自治”也就是十年左右，而薛昌和陈舜意等人的“官职”有30年的时间是通过上级任命而非村民选举获得的。至于乌坎转制之后，薛昌和陈舜意仍能继续“当政”的原因，大致有四点：一是上级政府的支持；二是没有强有力的竞争者；三是村民对原体制的“路径依赖”；四是存在选举舞弊。参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第5～7页。

^②1927年11月21日，彭湃在海陆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村民们选择在这天游行颇具深意。

^③洪继宇、陆宣：《陆丰迅速妥善处置村民上访》，载于“南方报网”，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1-11/22/content_7028389.htm，2011年11月22日。

^④庄烈宏系乌坎村热血青年团成员，2011年12月9日被刑事拘留。

^⑤《乌坎在行动》（视频），载于“阳光时务周刊网”，<http://www.isunaffairs.com/?p=1668>，2011年12月2日。

薛锦波、张建城、洪锐潮等人，并将继续追捕事件其余犯罪在逃人员，加紧推进取缔“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等非法组织的工作。汕尾市市委书记郑雁雄在发布会上称“有境外势力对今次事件推波助澜”。^①陆丰市代市长邱晋雄（9月28日任代市长）在发布会上表示，“乌坎事件”的起因，主要是村民对村内利益等问题提出的诉求，为此陆丰把解决村民诉求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抓，从9月25日，陆丰市成立解决乌坎村村民诉求工作领导小组，制订解决乌坎村村民合理诉求工作方案，全力做好村民诉求解决工作。目前，乌坎村村民提出的五项合理诉求已全部得到落实。这五项诉求分别是：财务审计问题、土地问题、选举问题、扶贫助学、污染问题。^②

财务审计问题。通过对乌坎村所属的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1993年至2011年9月的财务情况、乌坎村委会2008至2011年6月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发现存在违纪违规问题。根据审计结果，11月1日，东海镇党委对存在违纪问题的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副书记陈舜意予以免职处理，并接受陈舜意辞去村委会主任的申请。11月17日，市纪委对薛昌和陈舜意进行了立案查处。

土地问题。调查组根据群众的反映，重点调查了丰田畜产有限公司、亿达洲集团公司、合泰实业、南海庄园、富荣纺织厂5家企业的用地情况。通过调查，合泰实业、南海庄园、富荣纺织厂等3家企业的用地符合规定并已办理了手续；亿达洲公司存在着欠缴土地补偿款的问题；丰田畜产有限公司虽已办理了国有农用地使用证，但村民要求收回土地使用权。当地政府目前已落实完成了相关工作：

1、经核实，亿达洲集团公司欠缴土地补偿款432万元，目前该公司已将欠款432万元汇入到市国土资源局的账户。

2、陆丰市委市政府已决定暂冻结丰田畜产有限公司与碧桂园项目的合作事宜；由市政府主导进行规划并征得大多数村民同意后再调整其农用地性质进行开发；由汕尾、陆丰两级监督该土地的处置，确保群众利益不受损害。

3、宅基地问题。根据村民的新诉求，村民关注的宅基地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由市政府牵头，市国土局和东海镇落实，在该村北侧，规划了10万平方米

^① 《汕尾通报“9·21”陆丰乌坎村事件处置结果》，载于“南方网”，http://news.southcn.com/dishi/shanwei/content/2011-12/09/content_34742612.htm，2011年12月09日。

^② 《汕尾通报“9·21”陆丰乌坎村事件处置结果》，载于“南方网”，http://news.southcn.com/dishi/shanwei/content/2011-12/09/content_34742612.htm，2011年12月09日。

作为宅基地。目前，已经完成了选点、测量和规划等前期工作，市国土局制定了《乌坎村农村宅基地审批有关规定及做法》发放到村民手中，并已接受住房困难群众的申请。

4、关于村民反映的其他违法用地问题。由于涉及的时间长、宗数多、资料不全，目前正在加快进度、加大力度进行调查取证，再加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选举问题。根据调查组调查，乌坎村今年的换届选举工作基本按程序进行，同时，从2月24日选举至9月21日近七个月来，省、市、镇各级选举机构都没有收到任何来信来访或以其他方式反映该村选举过程中存在违法问题。市民政局按规定对当选的村委会成员已发了当选证书。由于村民对村委会部分成员意见较大，陆丰政府将对村委会部分确实有问题成员依法罢免后，按程序进行缺额选举。

扶贫助学。针对村民提出的贫困学生上学难问题，市政府已向社会各界筹集资金200万元，并已拨到乌坎学校，建立乌坎村教育基金会，制定了扶助的条件和标准，乌坎村党支部已向村民发放了《乌坎村贫困家庭子女助学金申请审批表》，接受群众的申请登记。

污染问题。村民反映丰田畜产有限公司生产对乌坎港造成污染，调查组已查清丰田畜产有限公司的污水有经过处理，符合环评标准，同时经过处理的污水也没有向外排出。

（3）冲突再现、全面封锁与省委介入：“乌坎事件”的末期阶段

12月11日凌晨，乌坎村村民通过微博发布的图片和内容显示：12月11日村民因不满政府解决事件的手法再度与警方爆发冲突。其中有人高举写有“反对独裁”、“还我人权”、“开放全国选举”、“还我耕地”、“打倒官商勾结”、“打倒贪官”、“反对做假事”、“反对造假人”等横幅。大批手持盾牌的武警在乌坎村村口附近的丰田牧场戒备，并向手持棍棒的村民发射水炮，民众于当天中午陆续散去。但风波显然未就此平息，村民代表薛锦波^①猝死狱中

^①薛锦波是“乌坎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他作为村民代表是组织者之一，并且在“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任副理事长。关于他从被捕到死亡的过程的官方报道是：薛锦波作为该事件的主要组织者，薛锦波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和妨害公务罪，于12月9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关押于汕尾市看守所。并且在当日，薛锦波家属已经给薛锦波送去治疗心脏病、哮喘等疾病的药物。12月11日上午10时51分，薛锦波突感身体不适，公安干警接报后第一时间将其送往附近的汕尾市逸挥基金医院（汕尾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经连续抢救无效于12月11日上午11时40分死亡，医院诊断死因系心源性猝死。11日下午，省、市检察机关和中山大学派出的专家组已对薛锦波做了尸表检验。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的尸表检查称

后，再度引爆大规模抗议与封村行动。^①自薛锦波死后，原来的村民大会改成了每天都进行的哀悼会。每天下午三点，理事会在旧电影院门前的广场召集村民，由临时代表理事会会长杨色茂向村民报告事件的最新进展，报告完毕后，大家会为薛锦波默哀三分钟。每天都有上千人聚集在这里。有人打出标语“民主要求竟是非法集会”，还有人打出“血债血偿”。默哀结束后，上千村民高喊口号，“薛锦波冤枉啊！”“求中央申冤！求中央救救乌坎！”许多村民披麻戴孝，跪拜在地，喊着喊着，就哭成一片。从12月12日开始，截止发稿，天天如此。小广场旁边就是昔日的村委会，如今这里播放哀乐、悬挂白花、贴着「忠良」薛锦波的讣告，成了挂满标语的民意呐喊之地。在村委会门前的马路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每隔十几米都飘扬着横跨街面的横幅，白布墨字写着：“小小村吏毁田卖地六千亩”、“泱泱官场会心放手十九年”、“敬请媒体尊重职业道德报道真相”、“保护耕地守土问责”、“强烈要求民主选举”……薛锦波死后，马路上的横幅一条累一条，迅速增加，旧的还来不及揭下来，新的叠着又挂了上去。村委会正对面，“民主选举是广大人民心声”和“誓死捍卫耕地，乌坎人民决不妥协”两条横幅之上，新悬挂的两幅白布墨迹未干：“请中央救救乌坎人民吧！”“乌坎人民冤枉啊！”不少村民把乌坎村正在发生的故事叫做“起义”。“我们就是要推翻一个腐败的村政府，薛锦波是烈士”，他们认真地说。乌坎的年轻人申请了微博账号、QQ账号，不停地在微博和QQ空间里发来自乌坎的各种消息：薛锦波的照片、村民哀悼的景象、号召乌坎村在外务工的人都回村支持的召集信，都是通过这些社交网络传播出去。“我们在打一场新闻仗”，薛锦波15岁的侄子每天通宵熬夜，一边追踪发自政府的被和谐的消息，一边发他们认为的乌坎真相出去。一个账号被删除了，就换一个继续。他们相信，更多的人看到，中央看到，乌坎的命运就会有转机。^②此时期，

薛锦波之死可以排除经由外力导致的死亡。而与此相对的是，薛锦波的长女薛健婉则坚称父亲绝无心脏病史，而且发现父亲尸体伤痕累累。因为当时没有留下照片，真实情况便无人得知。因此，薛锦波的死也留下了争议。参见：《广东乌坎民选代表薛锦波遗体归还》，载于“四月网”，<http://app.m4.cn/print.php?contentid=1152560>，2012年02月17日。

^①之所以要封村，是因为村民们认为，薛锦波的被抓和内奸通风报信有关。在他9日中午吃饭的人民餐馆，动手抓人的也不是制服警察，而是社会青年。六十年代就当过村委会干部、七十年代任东海开发区负责人、而后下海经商的林祖恋对记者表示，确信这一点，他说：“很早以前，村官和市镇一些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在这个村豢养了一批打手。他们当时还想拉我入伙，所以我知道。”参见张洁平：《呼啸村庄——乌坎的死亡与反抗》，载于“阳光时务周刊网”，<http://www.isunaffairs.com/?p=2063>，2011年12月16日。

^②关于薛锦波死亡之后乌坎村村民反应的描述，均引自张洁平：《呼啸村庄——乌坎的死亡与反抗》，载于“阳光时务周刊网”，<http://www.isunaffairs.com/?p=2063>，2011年12月16日。

汕尾市政府，声言要严惩集会组织者，村民担心政府人员潜入村中捉人，所以在村口设置路障，检查入村人士。年轻村民在夜间，手持竹竿巡逻，更有人爬树站岗，防止政府人员入村。^①同时，陆丰市特警在进出乌坎的路段设立了两三道哨卡，名为“打黑除恶”，盘查来往车辆人员的身份证。有记者试图进入村庄被拦回，也有村民外出时，被强行带至派出所，要求签名与“村内势力”划清界限。^②

12月13日，广东省针对“9·21事件犯罪嫌疑人羁押猝死”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积极做好“9·21”犯罪嫌疑人羁押猝死后续工作。

12月15日，汕尾通报“乌坎事件”嫌疑人死因调查结果，排除薛锦波外力致死可能。^③

12月17日，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乌坎村举行村民大会，要求在5天内交出薛锦波的尸体，否则将到陆丰市政府进行游行示威。

12月18日，双方对峙之下，警方采取封村、断水、断电、断粮等方式，粮车不许进入，渔港也被封锁，渔民无法出海捕鱼。^④当日晚，台湾《苹果日报》指出，解放军第41、第42集团军紧急向乌坎村方向移动，预计将对乌坎村形成第2道和第3道武力镇压的包围防线，村民恐怕将面对解放军血腥镇压。^⑤

12月19日，村民在村子的各大小出入口设置哨岗，又砍倒大树作为路障，出入车辆和人员都要经过查问。其中一个关卡有30人把守，大部分为80及90后青年，部分手持棍棒戒备。本村存在无政府状态已有8日之久。全部政府人员撤走，村政府及派出所已是人去楼空。该村已被断粮多时，村民表示，目前，粮食仍可维持7天左右。不过最新消息称，临近村民自发送去了食物和水。不过，这也不起太大作用。目前，乌坎菜市场仍有少量交易，有村民自种的菜蔬

①《公安机关开展清障行动，推进乌坎维稳工作》，载于“汕尾党政信息网”，<http://www.shanwei.gov.cn/163493.html>，2011年12月11日。从这篇报道，可以得知村民确实设立了诸多的路障。

②张洁平：《呼啸村庄——乌坎的死亡与反抗》，载于“阳光时务周刊网”，<http://www.isunaffairs.com/?p=2063>，2011年12月16日。

③辛均庆：《汕尾通报“乌坎事件”嫌疑人死因调查结果：排除薛锦波外力致死可能》，载于“南方报网”，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1-12/15/content_7038295.htm，2011年12月15日。

④《存粮有限广东乌坎村警民继续对峙》，载于“BBC中文网”，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1/12/111218_wukan_update.shtml，2011年12月18日。

⑤《中国广东乌坎村面临解放军镇压》，载于“苹果日报（网络版）”，<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international/20111218/101580>，2011年12月18日。这是网络上的传闻，后有《明报》记者向陆丰市新闻办主任黄贤嘉求证，被否认。

和自己养殖的鱼类出售。然而有村民表示，孩子生病也不敢出去镇上看病，怕被当局抓捕。同时，外国媒体也发布了12月19日被封锁的乌坎村的生活图片。

汕尾市委书记讲话视频再引波澜。^①12月19日，乌坎村村民收到12月18日由汕尾市委举行的“乌坎事件”媒体见面会的录像光盘，市委书记郑雁雄提出让步方案，包括保证军警不会强行入村，但当场他公开说道：“做干部不容易，手段一天比一天少！”、“你以为请武警不用钱吗！”、“对着干没有好下场，怎么收场？”，更将村民接受境外媒体报道称作是“借外力打自己兄弟”，又说“有问题不找政府，找几个烂媒体！”，而当天周边二十一条村的政府领导，突然集体入村“了解情况”，由乌坎村民选临时代表理事会会长杨色茂接见并向其宣明立场。下午二时，乌坎村临时村民代表理事会发起集会，号召翌日再度游行，要求当局释放三名被拘留代表并归还薛锦波遗体。杨色茂即场号召100名年轻人成立维安队，另募集500人作预备队。^②

12月19日，乌坎村再次举行集会，要求归还薛锦波尸体。临时代表理事会理事长杨色茂讲话，村民高举“还我民权”，“共产党万岁”，“中共有青天”等标语。对此，上级政府对乌坎村实行全面封锁，既包括信息的封锁，也有对村庄的包围与断粮。

信息封锁。广东省陆丰县乌坎村的相关讯息遭官方封锁，中国国内的常规媒体完全没有相关报道，中国境内的互联网，以关键字“乌坎”、“薛锦波”和“陆丰”等关键字，于各大入口网站查询微博和相关网页已全面封锁，只会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这个结果，相关报道与消息只能见于中国境外媒体。可见，对境外的网络并没有封锁得那么严重，至今还能找到相关资料。但官方新闻仍未见报。

包围与断粮。乌坎村对外交通已被军警团团围住封锁，警方采取封村、断水、断电、断粮等方式对付，粮车不许进入，渔港也被封锁出海，渔民无法出

^①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的讲话中的个别词句，被有些媒体断章取义地剪成视频放在了网站上，引起了一时的骚动。该讲话的全文参见《郑雁雄乌坎讲话实录》，载于“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476.html>，2011年12月22日。

^②《政府突愿赔 村民指分化拒接受 保证不派军警 未肯归还薛锦波遗体》，载于“香港雅虎网”，<http://hk.news.yahoo.com/政府突願賠-村民指分化拒接受-保證不派軍警-未肯歸還薛錦波遺體-212338626.html>，2011年12月20日。

海捕鱼，乌坎村内网络被断，电话、手机均遭监控，乌坎村被军警围村多日之后，民选村代表说，储备之粮食七日后恐难以为继。

当地人呼吁在外的乌坎人前去支援。与此同时“乌坎事件”得到香港媒体的关注，境内外一些媒体成功进入村内采访。当地官方和官员称只有警察受伤，并没有民众受伤。可是根据外国媒体采访村民和拍摄的视频来看，当地村民有多人受伤，其中受伤的还不止成年人和男性。其中有一位女士坐车回家，称被警察拿枪指着威胁。

12月19日，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表示：原先已冻结的丰田畜产有限公司用地，由政府出面协调、赔偿征地者损失，收回404亩事件所涉用地，通过征求规划部门和村民意见后再重新开发，并充分保障村民利益；郑雁雄亦称，乌坎村事件是群众不满村党支部和村委主要负责人连续任职时间过长，在村务管理、土地出让和已出让土地面临升值或转让的情况下，出于对利益变化的关切，要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事件性质属于村内利益纷争，相信一定能处理好。^①

12月20日，汕尾市官方代表进入乌坎村，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杨色茂等向政府代表提出多项要求作为取消游行的条件，包括停止与收回涉及以前不合法的土地买卖，由政府赔偿被征地者损失，未来开发前先征求村民意见，另给陆丰政府五天时间交还薛锦波遗体^②，由此原定之游行也没有举行。当日，由中纪委委员、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队的省工作组进驻汕尾陆丰，调查处置乌坎事件，根据群众要求，省工作组设村集体土地问题、村财务问题、村干部违纪问题和村委换届选举问题等项目工作组，每个项目工作组都公布联系电话（在12月20日当天已分发到乌坎村内），方便听取村民要求。当日晚，广东卫视播出上午广东省工作组在陆丰市政府召开的干部群众大会，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发言称：“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部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大多数群众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党和政府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要有诚意和政府一起来解决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谈，都可以找到出路；政府承诺村内只要不再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不再组织与政府对抗，不再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不会进村抓人；林祖恋和杨色茂等组织者和挑头者，只要在两个

^①辛均庆、洪继宇：《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通报“乌坎事件”有关决定：政府收回并赔偿404亩涉事用地》，载于“南方报网”，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1-12/20/content_7040024.htm，2011年12月20日。

^②《汕尾市参与解决乌坎危机，村民筹划大游行》，载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版”，<http://chinese.wsj.com/big5/20111220/bch144837.asp>，2011年12月20日。

月内，多做促进问题解决的事情，不再组织村民妨碍进村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公务，用实际行动悔过自首和争取立功，政府可以考虑从宽处理，不抓捕。若再有重大立功行动，可既往不咎。”^①晚上八时左右，陆丰市警方与村民双方筑起的路障均撤除；晚上11时，林祖恋召开记者会称翌日早上九时与朱明国会面，决定将预定12月21日发起的示威游行顺延至22日。^②村民连日来集会游行告一段落。这是打破“乌坎事件”僵局的一个转折点。

12月21日下午，省工作组村干部违纪问题专项调查组进入乌坎村，村民代表几十人积极向工作组反映问题。村民说，20日晚他们听了朱明国的讲话后，已自行把设置了十来天的村口所有路障拆除。村里路边有一红色横幅，上写“热烈欢迎省工作组进驻我村开展工作”。^③村民表示他们会全力配合省工作组进行调查，并希望省工作组能够让他们公开公平公正地投票选举村两委，查处涉及违法违规、有腐败行为的干部，并向村民公开乌坎村自1992年至2011年的账务收支明细表。^④

12月22日下午，在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陆丰市委书记杨来发、副书记邱晋雄等陪同下，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进村与林祖恋会谈，受到村民们的欢迎^⑤，当天中午，被拘留村民张建城被获释回村，取保候审，另外两位被捕者庄烈宏、洪锐潮亦于翌日下午获释回村。新华社在23日发稿称“羁押期间能够主动坦白交代犯罪事实，有悔改表现，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全案。公安机关依法取保候审”^⑥，曾昭亮因涉嫌其他犯罪行为而没有获得取保候审资格。

① 《认真落实朱明国副书记讲话精神 加快平息乌坎事态》，载于“汕尾党政信息网”，<http://www.shanwei.gov.cn/163919.html>，2011年12月20日。该发言又被称之为“朱五点”。原讲话中还有一点：林祖恋和杨色茂等组织者和挑头者明知政府已经在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如果仍顽固不化，继续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死心塌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必当追究。此点由于仍把林与杨定性为组织起对抗事件者论，被村民认为是没有诚意的表现，在村内以至微博上引起过讨论。后被删除。原讲话内容参见《广东汕尾传达朱明国讲话 声称乌坎挑头者再闹必追究》，载于“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12/20/11453989_0.shtml，2011年12月20日。

② 《乌坎村事件最新进展：乌坎村代表林祖恋将与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会面谈判》，载于“IBTIMES 中文网”，<http://www.ibtimes.com.cn/articles/8319/20111221/wukancun-linzulian-zhumingguo.htm>，2011年12月21日。

③ 《乌坎村民欢迎省工作组进村》，载于“汕尾党政信息网”，<http://www.shanwei.gov.cn/164022.html>，2011年12月22日。

④ 《乌坎村民欢迎省工作组进村》，载于“汕尾党政信息网”，<http://www.shanwei.gov.cn/164022.html>，2011年12月22日。

⑤ 《朱明国走访乌坎村 称给村民的承诺不会变》，《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23日，AA10版。

⑥ 《陆丰公安机关：乌坎被刑拘三村民取保候审》，载于“星岛环球网”，http://society.stnn.cc/anjian/201112/20111224_1683777.html，2011年12月24日。

至此，历时三个月的“乌坎事件”得以平息，乌坎村的生活秩序得以恢复。综观整个“乌坎事件”经过一波三折，先是当地人和平游行请愿，后遭到当地政府的武力镇压，进而演变成骚乱，五名村民被抓与薛锦波的猝死进一步恶化了事态，警民之间发生冲突与对峙，最后省委工作组的介入给“乌坎事件”僵局的化解带来了转机。

（4）法律落实与村民选举：“乌坎事件”的后续发展

时间进入2012年，广东省委开始落实先前的承诺，回应乌坎村村民的诉求。

1月15日，省委组织部王叶敏在乌坎村的党员大会上宣布，村党总支部正式成立，由民选代表、临时代表理事会顾问林祖恋担任书记，同时兼任村委会重新选举筹备小组组长，负责领导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原村党支部解散。^①在此之前，2011年12月28日上午，广东省工作组村委换届选举问题小组在乌坎村委会通报调查情况，宣布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2011年2月举行）被认定为整体无效。^②随后，林祖恋与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开始筹备村委会的选举工作。

2月1日，在乌坎学校举行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由全体村民（七个自然村的村小组）按照一人一票的规则选出。^③选举采用“无候选人直接选举”办法（亦称海选），为了保证选举公平，选委会成员不得参与村委会竞选，避免让选委会成员“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④同时，采用“自荐与他荐相结合”的方式，自荐参选“村选举委员会”的选民需签字声明不参选村委会，他荐则需要每人征集50名选民签名支持。^⑤经核票，乌坎村具有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

①《广东乌坎村成立党总支部及村委会重新选举筹备小组》，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1/15/c_111439905.htm，2012年1月15日。此时官方对于林祖恋的评价为：林祖恋具备胜任村党总支书记的基本条件，能站稳群众立场，组织能力较强，多数党员群众认可。虽然在乌坎“9·21事件”中面临复杂形势，但他能够保持理性平和行为，坚持反对搞打砸抢，对工作组进村开展工作予以支持配合。选配他为村党总支书记，是组织上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民主推荐，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和党员的意愿，并综合考察了解他的条件和表现，慎重做出的决定。参见李强：《官方：林祖恋9·21事件中保持理性 胜任乌坎党总支书记》，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01/16/c_122589732.htm?anchor=1，2012年1月16日。

②《乌坎村今年2月第五届村委会换届 选举整体无效》，《南方日报》，2011年12月29日第A15版。

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10月28日修订）第12条规定，选举委员会的产生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会议推选产生。

④《乌坎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载于“中国青年报”，http://zqb.cyol.com/html/2012-02/02/nw.D110000zqnb_20120202_2-01.htm，2012年2月2日。

⑤《乌坎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载于“中国青年报”，http://zqb.cyol.com/html/2012-02/02/nw.D110000zqnb_20120202_2-01.htm，2012年2月2日。此外，关于村选举委员会成员与村委会成员不得兼任的规定可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二条；《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

资格的村民 8222 人，有 6180 名村民投了票，超过具备资格人数的半数，选举有效。^①此次选举产生了由 11 名代表组成的选举委员会。^②选举委员会产生后，将具体负责组织村民委员会的重新选举工作，通过宣传动员、制定重新选举工作方案、审查登记并公布参加选举的村民名单等，相继选举产生村民代表、村民小组组长和村民委员会。^③

2 月 4 日，乌坎村党支部与村民选委会决定，于 2 月 11 日通过村民不记名投票的方式推选村代表以及七个村民小组组长，其中村民代表名额为 107 人。

2 月 11 日，村民代表及村民小组选举大会召开，选举过程参照 2 月 1 日的选委会推选大会进行。“据统计，乌坎全村登记参选村民共 7923 人，发出村民代表选票、村民小组长选票各 6676 张，分别收回 6475 张和 6466 张，选举合法有效。根据计票结果，因出现 2 个村民小组各有入围的最后两名竞选人得票数相等的情况，村民选举委员会最终确认 109 人当选村民代表。同时，各村民小组长竞选人得票数均未超过半数，按照相关规定，将另行选举产生。”^④乌坎村村民代表推选产生后，将在乌坎村党支部和村民选举委员会的召集下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制定乌坎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决定乌坎村委会选举日、选举方式、投票方式等事项。在今后日常村民自治活动中，村民代表将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参加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反映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向村民传达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和动员村民认真遵守、执行等职责。^⑤

举办法》（2010 年 12 月 1 日修订），第九、十二条。当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接受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其村民选举委员会职务自行终止。

① 《乌坎村昨推选出村民选举委员会》，载于“南方报网”，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2-02/02/content_7053120.htm，2012 年 2 月 2 日。

② 选举委员会的具体分工为：主任：杨色茂；副主任：孙焕松、洪天彬、张水妹；委员：杨金朝、杨银桥、李炎森、蔡义涛、吴炳枝、卢本秋、庄汉深。2 月 29 日，杨色茂因参选村委会一职，主动辞去选委会主任；主任一职由洪天彬接任，副主任一职由李炎森递补，委员一职则由陈炎宗递补。该名单摘自维基百科：“乌坎事件”词条。<http://zh.wikipedia.org/zh/%E7%83%8F%E5%9D%8E%E4%BA%8B%E4%BB%B6>。另据清华大学课题组成员调查可得知：选举结果出来后，11 名当选人当即开会，内部无记名投票，推选杨色茂为选委会主任，孙焕松、洪天彬、张水妹为副主任。参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 年第 2 期，第 61 页。

③ 《乌坎村昨推选出村民选举委员会》，载于“南方报网”，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2-02/02/content_7053120.htm，2012 年 2 月 2 日。

④ 《乌坎村推选出村民代表》，载于“南方报网”，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2-02/12/content_7055675.htm，2012 年 2 月 12 日。

⑤ 《乌坎村推选出村民代表》，载于“南方报网”，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2-02/12/content_7055675.htm，2012 年 2 月 12 日。

2月16日，民选代表薛锦波的遗体正式归还家属，并定于在陆丰县殡仪馆召开追思会，限参加人数100人^①，政府发放90万元作为抚恤和殓葬费用。^②

2月29日，参加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及委员竞选的22名自荐者，在乌坎村仙翁戏台进行竞选演讲，吸引了大批村民观看。^③

3月3日，村委会选举在乌坎学校进行，过程与前两次选举大致相同。在此次选举的前夕，曾有《东方日报》报道说，“目前参选人和村民已分裂成温和与激进两派。一些人认为村官当选后要继续抗争，追回被贱卖土地，这些大部分是老人和年轻人。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当选后先交接现有的土地和资产，其他应容后再议。该名村民说，目前村民出现分歧，再加上宗亲势力介入，担心村民最终会因利益出现分裂。”^④同时，也有村民透露，见到省工作组以及汕尾、陆丰和东海镇的官员，近日都有到乌坎村巡视，并与村民或参选人私下接触，低调监视村民。^⑤此时，乌坎村宗族势力也开始活动，“村选委会获悉，村内有宗族昨午大摆宴席，邀本姓氏的村民吃饭开会，动用宗族关系拉票。对于这些现象，林祖銓（恋）表示，作为一个大村庄，有不同的声音这是正常的，特别是乌坎的宗族势力较大，但他认为是好事，‘起码他们对于民主选举是参与了，也动员起来了，民主这东西，不是切得整整齐齐，参差不齐才是民主。’”^⑥本次选举在村党总支指导下由村选举委员会主持，采取不设候选人、本村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村委会主任1名、副主任2名和委员4名。^⑦根据当天的投票结果，“党总支书记林祖銓当选村委主任，杨色茂当选村委副主任，其他5位村委委员将在明天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另行选举。今天乌坎登记选民8363人，发出选票6899张，收回6812张，投票率81.45%，选举

①《广东乌坎民选代表薛锦波遗体归还》，载于“四月网”，<http://news.m4.cn/1152560.shtml>，2012年2月17日。

②《乌坎村民为薛锦波举行追思会》（视频），载于“香港有线电视台网”，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news_video/index.php?news_id=378038，2012年2月17日。

③熊伟：《亲历乌坎选举》，《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第74页。

④《乌坎内讧》，载于“东方日报网”，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20302/00178_001.html，2012年3月3日。

⑤《乌坎今选村委 官方监视村民》，载于“东方日报网”，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20303/00178_008.html，2012年3月3日。

⑥《乌坎终极选举 中央派员观察 宗族摆酒拉票 气氛诡异恐有人捣乱》，载于“香港雅虎网”，<http://hk.news.yahoo.com/烏坎終極選舉-中央派員觀察-宗族擺酒拉票-氣氛詭異恐有人搗亂-211518843.html>，2013年3月3日。

⑦广东政法微博，<http://e.weibo.com/2176235777/y8cqSgKdx>，2012年3月3日17:18。

有效。林祖銮获票 6205 张，杨色茂获票 3609 张，其他人得票均未过半。”^①

3 月 4 日，乌坎村进行了其他五名委员的选举，此次村委会另行选举中，“乌坎全村登记参选村民 8363 人，发出选票 6259 张，收回 6185 张，投票率 73.96%，选举有效，成功补选村委会 1 名副主任和 4 名委员。7 个村民小组的小组长也全部选出。”^②其中：洪锐潮得 4196 票当选副主任，庄烈宏得 4115 票、张建城 3168 票、陈素转 3604 票、孙文良 2773 票^③当选委员。^④

至此，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成员为：主任：林祖恋；副主任：杨色茂、洪锐潮；委员：庄烈宏、张建城、陈素转、孙文良。3 月 4 日，同时进行各村民小组长的竞选，参与者如下^⑤：

新一村：蔡富忠※、黄汉钗	一 村：朱仕沛※、李木雄
二 村：张水妹※、庄金填	三 村：薛流彝※、吴 真
四 村：薛庭波、柳进兴※	五 村：洪汉卿※、黄两平
六 村：杨银桥※、陈永育（注：带※号者为当选）	

以上就是“乌坎事件”的轮廓，这只是事件真相的冰山一角。随着乌坎的选举落下帷幕，“乌坎事件”也暂告一段落。在新的领导架构下^⑥，乌坎村村民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时也将继续追讨仍未收回的土地，保护自己的生存利益。

4.2.3 “乌坎事件”的解构：政治动员的视角

“乌坎事件”作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典型事例而备受中外关注，诸多官员、学者、媒体对其进行了解读，他们或从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角度，阐

①广东政法微博，<http://e.weibo.com/2176235777/y8ebO3cTM>，2012 年 3 月 3 日 21: 47。

②《乌坎村选举出新村委会》，载“南方网”，http://news.southcn.com/g/2012-03/04/content_39534528.htm，2012 年 3 月 4 日。

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另行选举的，第一次投票未当选的人员得票多的为候选人，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所得票数不得少于已投选票总数的三分之一。所以，孙文良的得票也符合法律条款。

④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 年第 2 期，第 63 页。

⑤参见维基百科“乌坎事件”词条，<http://zh.wikipedia.org/zh/%E7%83%8F%E5%9D%8E%E4%BA%8B%E4%BB%B6>。

⑥乌坎村村委会选举结束以后，乌坎村逐渐形成“三委两会”的治理制度框架。“三委”即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两会”即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会议。日常管理机制则实行“三委”联席会议制度和“三委”办公例会制度。而涉及村民自治的问题，须经过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提交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转引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 年第 2 期，第 63~64 页。

述了该事件对于农村社会治理的借鉴与意义，或从事件本身出发展开了对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思考。^①基于此，本文并不着眼于民主选举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而是试图从政治动员的视角对此事件进行剖析。

1、党的一元化领导与政治动员失效

乌坎村的权力架构是以“村两委”为主导的，而其中村党支部则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原乌坎村的村委会主任陈舜意兼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由此可见，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并没有改变乌坎村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情况。由于村委会的弱势，乌坎村长期处于以薛昌为书记的党支部控制之下。“乌坎事件”就是要求惩处以村支书薛昌为首的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班子成员，控告他们私卖土地、操弄选举和贪占村财，要求整理村务、得回选举权和收回土地。^②

在薛昌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四十一一年间，他权力独大，被村民称为“薛昌王朝”。^③现任的村党总支部书记林祖恋曾经这样说：“乌坎有海港，又有大片土地，薛昌既有钱，又有光环，是全国劳模，又是陆丰、汕尾、广东三级人大代表，全国先进党支部的书记，多年来倚靠威权治村，9月21日上访游行事件发生前，没有任何人敢公开对他讲一个‘不’字。”^④

此时期，乌坎村的治理架构如下所述^⑤：

两委班子、村民小组长和聘请的人员负责村务和镇党委、政府分配的党务、政务事项。两委班子成员为实际上的领导者，且这些成员为薛昌等人的亲宗和追随者。组织发展也比较缓慢，自薛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40余年间，党员只发展到130人^⑥，多为薛昌和两委成员的亲属、朋友。村民代表也多为两委指定。如此一来，乌坎村的权力为薛昌及其他两委成员掌控。

①有关“乌坎事件”的探讨主要有：《“乌坎转机”的时代意义和国家样本意义——北京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乌坎转机”》，载于“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zonghe/zuixinshiliao/2011-12-26/28051.html>，2011年12月26日；张严冰、曾志敏：《“小乌坎，大中国”——论“乌坎事件”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启示》，《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梁惟：《透过乌坎事件看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党政干部学刊》，2012年第4期；王赐江：《处置群体性事件需要新思维——广东“乌坎事件”启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2期；陈强、李诗雅：《从“社会冲突正功能”观点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以广东陆丰乌坎事件为例》，《学术论坛》，2012年第8期；何光伟：《“乌坎转机”开启地方治理新思路》，《理论参考》，2012年第1期。

②刘建峰：《乌坎密码》，《经济观察报》，2012年6月11日第034版。

③刘建峰：《乌坎密码》，《经济观察报》，2012年6月11日第034版。

④刘建峰：《乌坎密码》，《经济观察报》，2012年6月11日第034版。

⑤该内容主要参考刘建峰：《乌坎密码》，《经济观察报》，2012年6月11日第034版。

⑥此处数字有些出入，省工作组村委换届选举问题小组组长王叶敏在乌坎村党支部成立大会上称，乌坎村有党员133名。

乌坎村的财政来源主要倚靠卖地和办公司，通过创办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进行引资招商、出卖土地、划卖宅基地、创办企业收取租金或分红。薛昌和村委会主任陈舜意长期轮流担任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法人（主要是薛昌），并在以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名义与港商合办的公司里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职务。近20年来，两委班子成员采用低价划地、转卖或者盖商铺出租等手段共卖地近万亩（准确数字尚待官方核实公布），村民仅获得两次的少量补偿，数额分别是：每人500元和50元，为开发地产，村两委共破坏了1310亩稻田和3000余亩旱地，致使村民丧失基本生产资料——土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将集体所有的财产转化成个人财产，是一种变相的剥夺。

村里治安的维护，除去村里的武警边防派出所外，村委还专设了一个治安队，有近30人。此次事件中的维权组织者庄烈宏、张建城、洪锐潮等声称他们曾多次将欲状告薛昌的村民堵在家里殴打或威胁，也曾在广东省政府门前守候和恐吓、驱赶上访村民。该治安队实际上沦为了薛昌恐吓村民的打手队。这是薛昌变得肆无忌惮的重要基础。

在乌坎还是管理区时，薛昌担任党支部书记主要是依靠上级党政任命。在变革为乌坎村后，村支部形式上由全村党员选举产生，但是村里党员大都是村两委成员的亲属或朋友，而薛昌本人与上级党委官员利益关系密切，实际上是权力自相授予。换句话说，针对乌坎村的党支部权力没有形成制衡机制。从法律上讲，村委会的选举也应该公开选举，但是这种选举大多是走过场。而村委会主任长期由薛昌指定陈舜意担任，实际没有办过公开选举。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乌坎村虽然实行了村民自治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在强大的政治原则——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反而成为了个别人以权谋私的工具。相应地，中共基层干部的形象也遭到严重损坏，失去了农民的信任，很难再发挥政治动员作用。当农民敢怒不敢言的负面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一旦遇到某些事情的触发，便迸发出来，造成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在2011年12月19日的讲话中提到，乌坎村事件是群众不满村党支部和村委主要负责人连续任职时间过长，在村务管理、土地出让和已出让土地面临升值或转让的情况下，出于对利益变化的关切，要

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①面对这一问题，中共做出的选择就是罢免了薛昌与陈舜意，提议重新选举，借此来赢得农民的支持。

反思“乌坎事件”，它与中共的管控思想亦不无关系。在革命年代形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建国后通过“支部下乡”运动延伸到村一级，实现了党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掌控。改革开放后，虽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了，但是村党支部并没有撤销，并继续在村务管理中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得以顺畅实施，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管控农村社会的考虑，特别是加强对“民选”的村委会的领导。如此，中共就通过村党支部对农村社会实现了组织嵌入。然而，从“乌坎事件”看，这种嵌入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传统上强势的党支部控制了弱勢的村委会，导致了村民自治制度的空洞化，进而严重削弱了中共在农村社会的动员能力。

2、能人治村、官僚化与卡里斯玛型权威

从某种程度上说，薛昌是一个致富能人。2005年，薛本人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进入2006年的广东省年鉴。在年鉴中，这样介绍他：

薛昌，男，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中共党员。1944年生，广东陆丰人。他结合实际，提出“依港兴村”口号，以市场为导向，创办了“乌坎实业开发公司”，通过开发海水和滩涂养殖，发展养蚝基地，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2004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1.3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285万元，人均年收入6418元。他多方筹资兴建村基础设施，村里修筑了水泥大道，加固了防潮大堤，建了自来水厂，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支部多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镇先进单位、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文明单位。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②

由此得知，薛昌在乌坎村能够长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与他自身能力是分不开的。这就是改革开放后的“能人治村”现象。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因此，在村庄治理层面，干部的选拔不再以政治标准为先，而是要考察干部本身的经济发展能力。在此，我们不能否认，薛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村容村貌。“能人治村”现象的出现，意味着村级治理中精英的

^①辛均庆、洪继宇：《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通报“乌坎事件”有关决定：政府收回并赔偿404亩涉事用地》，载于“南方报网”，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1-12/20/content_7040024.htm，2011年12月20日。

^②转引自《广东年鉴2006·人物》，载于“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d.gov.cn/govinc/nj2006/rw.htm>，2013年6月10日访问。

多元化，从而对建国后建构起来的党的一元化动员体制进行着重构。

与“能人治村”相联系的是基层干部的官僚化倾向。村党支部作为最基层的党组织，其领导人本来应该体现草根性，即来自于农民。但是，在中国传统官僚文化的影响下，村级党组织的领导人日益官僚化，变得愈加脱离群众。或许，这种脱离群众与他创造了一定成就而自大有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农村政治动员的基础。

最后，农村治理中的卡里斯玛型权威的主导，则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农村法治化进程，也遏制了农民的民主化之路。反观“乌坎事件”，薛昌周围不乏追随者，尽管这些人追随薛本人能够获得各种好处与利益（比如入党、进入村两委等），但是这也说明了薛昌运用的是一种卡里斯玛型权威，而他及他所在的党支部获得的各种称号也增添了薛的光环。当薛昌想达到某种目的时，完全可以绕开法律的规定，而凭借自己的权威实现之。久而久之，薛昌不仅藐视法律，而且变得独断，进而利用职权进行以权谋私。所以说，卡里斯玛型权威的运用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之时，就会导致阿克顿勋爵所言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与毛晚年的行为逻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然而，并不是说，农村治理中就要将卡里斯玛型权威剔除掉。恰恰相反，在农村地区这种权威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缺乏法治传统，依靠的是士绅阶层的自治，士绅阶层的权威显而易见属于卡里斯玛型。村民自治的实施，是中共试图将法治贯彻到村级努力的表现，然而，它却忽视了实现法治的重要基础——公民意识。当前，具体的实践路径之一是采取组织吸纳的形式，即将威信较高的人安排一定的职务（譬如乌坎村新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祖恋被村民称为精神领袖^①）。但是，这种手段的效果之差广为人诟病。因此，在现阶段的农村，如何将卡里斯玛型权威纳入制度规范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②换言之，如何构建农村新的文化权力网络，才是改善农村治理，重建

^① 安卓：《乌坎转机：精神领袖任村党支部书记》，载于“第一财经网”，<http://www.yicai.com/news/2012/01/1360229.html>，2012年1月16日。

^② 关于“乌坎事件”，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对此说：“乌坎的民主选举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是落实过程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对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做了纠正，如此而已。当时决定省委工作组到这个村里去，省委副书记当组长，副省长任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村子本身的矛盾已经复杂到要出动这个阵容，而是我们有这个想法要解剖麻雀，而且要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的建设，改进我们村这个执政的基层单位能够更好地体现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理念。”参见《汪洋：乌坎选举无创新 纠正了走过场形式》，载于“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2012lianghui/content-3/detail_2012_03/05/12977573_0.shtml，2012年3月5日。

农村动员体系的基础与关键。

3、农民分层、利益和政治诉求与生存道义

乌坎村是个宗族势力很大的村庄。乌坎村有7个自然村，47个姓氏，人数较多的姓氏大多有各自的理事会，平时操办家族的红白喜事，调解宗族矛盾，百年来都是如此。^①由此在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选举过程中，是先由每个姓氏推举村民代表候选人。农民以宗族为基础，实现了社会分化与分层。在乌坎，特殊地缘下的经济基础（以渔、农为主，兼林、工、副多种经济结构的城镇化程度较高的行政村）、一个“主政”了41年的村领导及其班子、富有潮汕地区鲜明特色的宗族势力，这三个因素使得乌坎村的社会形态异常复杂。^②

根据掌握的资源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乌坎村民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官、绅、侨、商、民五个阶层。^③所谓“官”指的是以薛昌为代表的村两委成员，他们虽然从法律上不是官，但是乌坎村的农民认为他们是官（显然，村里的官已经与民脱离了，而且在当地布下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通过东海镇镇人大代表和陆丰市人大代表选举就可以看出）。“绅”，指的是乌坎村众多姓氏理事会里的宗族元老，以及村里一些凭借个人品德、能力、事业、地位、年龄、家族等因素而受村民敬重的年高德劭的老者（如林祖恋就是其中的型代表）。“商”，分为三部分：一是因集体经济兴起的官僚商人，如薛昌、陈舜意等；二是在外经商的乌坎人，如庄烈宏、杨色茂等；三是在乌坎村内经商的农民。“侨”在乌坎村内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乌坎的经济发展有很大部分要依靠侨民投资，他们与乌坎村的利益多有牵连，而且其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如此次事件中涉及的港商陈文清，他在1983年就与家乡开始了生意往来。“民”，是比较纯粹的“老百姓”阶层，总体比较分散，主要以农、林、工业或者以外出务工的方式谋生。相比于其他阶层，他们的生活比较艰苦。在此阶层中，有一个由“80”后、“90”后的年轻人构成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比较庞大，他们能熟练使用QQ、微博、

反观汪洋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已经在关切农村基层的治理问题，但是构建一个实现农村权力运行正常化的有效机制还需要再探索。“乌坎事件”表明，村民自治法的落实是实现权力运行正常化有效手段之一。那么，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的法律能否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

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第32页脚注。

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第8页。

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第8～12页。

博客等一系列新媒体工具。“乌坎事件”中“乌坎热血青年团”就主要是由他们组成的。乌坎村由七个自然村构成，加之农民的分层，使得乌坎社会形态异常复杂。先前的村两委利用宗族势力扎根于这种复杂的社会结构中，而新的领导集体声称为全村百姓谋福利，那么他们面临的难题则可想而知。至少诸如此类的难题在新的村委会选举之时就已经碰到：有的宗族摆酒试图影响选举。虽然在“乌坎事件”中，这些各自为政的宗族空前的团结起来了，但是新的秩序形成之后，如何统合分化的村民依然是个很严峻的话题。

“乌坎事件”的直接诱因是村两委要将村里仅存的 404 亩土地变卖给港商做房地产开发使用。特别是 1993 年以来，村里大量卖地，而村民却只得到每人 550 元补偿，与之相随的是少数贫困者甚至没有自己的宅基地建房，只好租房居住而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由此可得知，此事件的性质是农民的经济利益诉求。在事件进展过程中有些人提出了“反对独裁”、“还我民主”等政治口号。然而，这些政治口号的提出是针对薛昌等人长期当政而言的，村民提出政治口号的目标仍然是要求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内实现自身的民主权利，进而保护正当利益。正如裴宜理在关于造反与革命的分析中指出，中国有历史深远的造反文化，都是针对人的，而不是针对规则（制度）的。^①所以，在乌坎警民进入对峙状态之时，有人也打出“还我民权”、“共产党万岁”、“中共有青天”等标语。这充分说明了，农民对于中共依然信任，并没有推翻现有政权的意思。当然，农民打出这些标语，也表明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觉醒了，渐渐萌发了公民意识。从总体上看，“乌坎事件”是一场村内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纠纷。这也可以从“乌坎热血青年团”核心成员庄烈宏的表述中得知：他得知自己生意所在地（顺德伦教镇三洲村）和他年纪相若的年轻人，每年土地分红的收益有近百万元。这强烈地刺激了他，“他们的地是集体出租，有集体收入，有分红。我们乌坎从来没有。……为什么别人有，我们没有？我不是嫉妒。村里人打工打了半辈子，就住个破房子，我为村民不服。我们应有的利益被侵犯了。……而且顺德村里都有公开选举，在乌坎，选票都是假的。几年前有过一次，村干部拿着箱子，走到人家门口，说我们都选薛昌了啊。这就叫选举。”^②由此可以推知，事

^①关于中国农民造反与革命的关系研究参见：[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 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②原文出自《阳光时务报》记者对庄烈宏的访谈。转引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第18~19页。

件是由土地利益纠纷而起，并将土地收益分配不公归因于村委会选举舞弊，因此在“乌坎事件”中，农民不仅提出了利益诉求，还表达了通过改变村委会选举而维护土地利益的政治诉求。

关于“乌坎事件”的讨论，比较多的是“维权模式”和“权利论者”^①。“维权模式”认为农民因为合法利益受到了侵害，主动或被迫维护自己权利进行抗争；有些人则从中发现农民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要求的增长，这是“权利论者”所强调的。前一种观点无法解释村支书长期卖地而没有发生群体性事件（卖地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成规模的抗争始于2009年4月^②），而后一种观点则有拔高之嫌。应该说，此次事件中农民提出了一些政治口号，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农民的民主要求提升了，从事后结果看，乌坎村依然建立了以党总支部为领导的权力架构。或许，农民的政治权利意识开始萌发更为准确一些。所以，本文认为农民是出于生存道义而参与此次事件的。事件的组织者之一杨色茂曾这样说：“农民没有土地真是天大的笑话。村民牵牵连连的，相互之间总是有一些亲戚关系，平时没有足够的动力把人都发动起来。我们每个人家都有好几个孩子。1998年村里分过一次宅基地，但孩子长大以后要结婚，要盖新房，现在村里已经没有土地了，村民的生存空间在压缩，想到未来，我们为下一代担忧。平时都不想多事，可一旦发动起来，谁都不甘示弱。”^③如前面庄烈宏所述也可以得知，农民是出于生存压力才参与到冲突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一直遵循着生存道义，虽然这种道义和物质利益紧密相关，但是它并不能用金钱和物质多少衡量出来。仝志辉认为，与生存道义相关的利益有着以下特点：第一，利益受损后，再无机会获得，也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弥补，比如宅基地，因为土地不可再生，数量有限。第二，利益受损后，危及自己在社区内的地位和面子，有些利益代表成员权，在社区共识中是根本利益；

^①仝志辉：《乌坎事件中的道义政治》，载于“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236.html>，2012年1月14日。仝志辉认为，“乌坎事件”的爆发完全是出于农民的生存道义，本文也赞同这个观点。

^②2009年4月3日，一张题为《给乌坎村乡亲们的信——我们不是“亡村奴”》的传单，一夜之间撒遍了乌坎村的大街小巷。传单上称，乌坎村从1993年开始出现土地贪污，多年来村内土地对外租用，但村民仅领取过两次分红，分别为人均50元、500元，之后村内多次变卖集体土地，但村民从未见过分红。传单呼吁乌坎全村人守土问责：“试问这样的政府能让百姓信赖、依靠吗？真正的党啊，请给予重视吧！”传单落款是“爱国者一号”，并留下了QQ号。参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第17～18页。

^③吴丽玮：《乌坎土地纠纷与宗族之争》，《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49期（总第660期）。

第三，利益受损后，危及子孙后代的幸福。^①

综上所述，已经分层的乌坎村村民提出利益和政治诉求，是出于生存道义考虑。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通过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而将其动员起来，而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伴随着城镇化日益扩张的今天，农民的生存空间变得狭小起来，不仅是乌坎村，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农民被迫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的情况。^②农民的道义是以生存道义为基础的政治道义，中国共产党如果想借此扩展农民的信任、获得动员的社会基础，就要勇于承担这种道义责任。

4、多元化沟通与政治动员之间的冲突彰显

在“乌坎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前以自上而下为主导的政治沟通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除却传统的传播途径（电台、报纸）之外，网络媒介业已成为现时代的重要政治沟通途径之一。可以说，现在的政治沟通是一种扁平化的、多元化的网状化沟通模式。在这个网状化的沟通模式中，先前的等级化的信息传播渠道日益削弱。

如果说，革命年代建构起来的政治沟通模式就是基于上级权威而自上而下传播的，这种沟通模式服务于向群众灌输阶级意识、发动群众的需要；那么，传播媒介多元化的今天，农民获得信息的渠道也多种多样了。其中网络也开始进入农民当中，特别是青年农民的生活之中。这就大大拓宽了他们的信息来源，由此亦受到多种政治意识的熏陶。诸如，早在2009年4月，就有人在传单中留下QQ号进行联系；在“乌坎热血青年团”的QQ群里，热烈地讨论着土地贪污问题，并分享他们从不同渠道得到的证据，而且群里置顶了两个文件：《国际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③热血青年团的成员都是年轻人，而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则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

在事件过程中，外界媒体入驻乌坎村，使得“乌坎事件”备受世界瞩目。而且这些媒体的报道出现了与官方媒体（比如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不同的声音，且相对客观与中立（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阳光时务周刊的报道）。因

^①全志辉：《乌坎事件中的道义政治》，载于“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236.html>，2012年1月14日。

^②参见梁鸿：《出梁庄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这是一部文学作品，它阐述了梁庄的打工者为什么要进城以及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和角色塑造等问题。

^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第18页。

而，热血青年团成员开始与这些外媒积极联系，打响了一场“新闻宣传战”。林祖恋家的二楼就是青年团负责的“新闻中心”所在地。^①当然，外媒也散步了一些留言，如《苹果日报》报道的解放军第42、43集团军向乌坎集结就有所失实，但是这种消息无疑对“乌坎事件”起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

政府的应对就是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及利用官方媒体进行报道，然而，乌坎村村民对于这种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已经失去了信任。村民们利用境外媒体建构起了人们对于“乌坎事件”的最初印象，因而获得了外界的踊跃支持。例如，在警民对峙时期，广州一部分人进行了声援乌坎村村民的集会，18日在广东省省会广州市发起示威活动，大约有12人在广州市内的广场上发放传单，后来传单被警方没收，这也成为乌坎村抗议行动开花的首例，而三名声援乌坎村村民之抗议人士遭广州警方刑事拘留。^②

至此，从“乌坎事件”中可以看到，多元化的政治沟通日益消解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动员能力，二者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如此，中共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构建一个应对多元化沟通的政治传播机制。

5、官僚制动员与民间精英动员的博弈

官僚制动员（Bureaucratic mobilization）是与卡里斯玛型动员（Charismatic mobilization）相对的。按照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官僚制动员有这样几个特征：以职位为基础的官僚制权威等级、动员主体为正式组织、动员要凭借正式的决策程序、以专业技术知识为基础的晋升；卡里斯玛型动员的特征有：以个体为基础的卡里斯玛权威等级、因共同的使命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地方领袖聚集一批追随者、非正式的网络与决策程序。^③

在“乌坎事件”中，中共及其领导的政府活动，可以称之为官僚制动员；以林祖恋为代表的民间精英及其追随者的行为，则可以称其为卡里斯玛型动员。

^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第33页。

^②《声援乌坎村 大陆出现零星示威活动》，载于“中央广播电台网”，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mid=332755，2011年12月19日。除此之外，陆丰市龙头村12月15日有村民示威。参见《陆丰龙头村过千村民效乌坎抗争》，载于“自由亚洲电台网”，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lufeng_followup-12152011103326.html，2011年12月15日。同时，汕头市澄海溪南镇上岱美村也爆发农民示威，一千多名村民星期日上街游行，抗议官员出让土地。参见《受乌坎村事件启发 邻市村民站起来》，载于“自由亚洲电台网”，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china_procession-12192011095722.html，2011年12月19日。

^③关于官僚制与卡里斯玛型权威的特征，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7、351～354页。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此两种动员模式中存在着博弈关系。

先来看当地政府的行动。应该说，当地政府反应是很快的。在事件爆发的第二天，汕尾市就派工作组到陆丰市进行督导，而陆丰市和东海镇也派工作组到乌坎村进行调查；9月26日，陆丰市和东海镇再次委派工作组，调查与回应村民代表所提出的要求；12月9日，汕尾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汕尾市委书记、陆丰市委书记和市长均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回应村民的诉求，但是此时郑雁雄的讲话将“乌坎事件”定性为“有境外势力对今次事件推波助澜”，还要加紧取缔“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等非法组织；12月19日，郑雁雄在通报“乌坎事件”处理决定时，又改称此事件为村内经济利益纠纷；12月20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乌坎事件”调查组组长）在陆丰市干部群众大会上重申“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部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从政府的这一系列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官僚制中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的运行，政府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以上级派驻“工作组”的方式对其进行调查核实。这具有典型的官僚制色彩，对革命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工作方式也是一种继承，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表现。官僚制动员具有理性、权威性、规范性等特点，但是它能够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是动员客体对动员主体的信任。在“乌坎事件”中，村民已经对汕尾市、陆丰市和东海镇政府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因而这种动员模式的效果也就差强人意了。直至再高一级政府——省政府派驻“工作组”时，才重新获得村民的信任与欢迎。

再来看乌坎村里的民间精英动员。乌坎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林祖恋、杨色茂、薛锦波等。他们有的是阅历丰富德高望重的老者，有的是外出经商见过世面的人。他们在乌坎村的文化权力网络中凭借自己的资历获得了村民的认可，从而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因而，此种动员我们称之为卡里斯玛型动员。当然，他们动员能力的获得还通过了村民的授权，即在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中担任一定的职务。这个机构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实现了卡里斯玛型动员，也将各自为政的宗族力量整合在一起，实现了空前的内部团结，从而实现了“民与官”之间的博弈。除了这个机构之外，乌坎村还陆续成立了“乌坎村妇女联合会”、“老年联合会”等，再加上早就成立的热血青年团，在乌坎村就形成了如图4-1（见下页）的自治性组织架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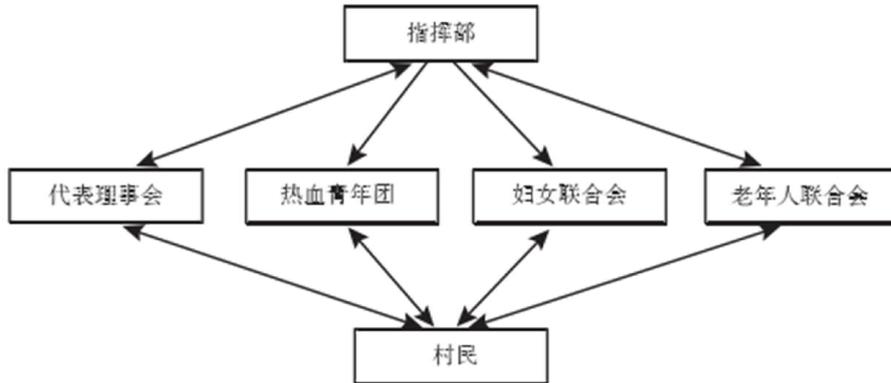


图 4-1 乌坎村的社会自治结构

资料来源：转引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第34页。

通过上图可以得知，归属于不同姓氏宗族下的乌坎村村民已经变成了组织化的人，乌坎村也被高度组织化：“一方面‘指挥部’的决定可以最快速度传达到每一个村民，从而形成符合特定意志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村民个人的行为会受到组织规范的约束，从而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村民本身也构成了监督理事会等各种组织的主体，村民与组织之间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①指挥部的权力也是通过村民授权的，即由临时代表理事会召开村民大会，来贯彻实施指挥部的意志。随着一次次村民大会的召开，村民行动的一致性也愈来愈高。村民大会大致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揭露和批判原村两委的贪污腐败罪行；第二类是强调村民抗争的组织纪律，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暴力行为，坚持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第三类是“部署与动员”，即部署“指挥部”决定的行动安排，动员全体村民坚持抗争到底。^②最为关键的是林祖恋会在村民大会上发表演讲，利用自身的威信动员村民。这里颇具戏剧意味的是，中共在土改过程中发明的通过召开大会来统一群众行动的办法，反而被村民们充分利用。

通过对当地政府的应对与民间精英的动员的描述，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认

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第34页。

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第35页。

识：政府采取的官僚制动员虽然具有理性、规范以及权威性的特点，但是这种动员容易脱离农民，从而丧失农民的信任并削弱了动员效果；卡里斯玛型动员模式由于深深地扎根于农村社会文化网络之中，也就获得了强有力的动员力量，但是它的弱点是对秩序与规则的挑战与冲击（然而，林祖恋用选举的办法将其个人权威嵌入到了乌坎村村民社会行动中，避免了卡里斯玛型权威的盲目性与破坏性）。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官僚制动员需要与农村民间精英动员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不能仅依靠组织的嵌入，还要融入到农村权力文化网络之中，并与其达致新的平衡。

4.3 宏观透视：“乌坎事件”的制度与思想根源

“乌坎事件”发生在中国南疆边陲一个小村庄，是现实中国的一个缩影，它发生发展于广东的小气候，但是与中国时代的大环境也密不可分，其根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下面，本文就从制度与思想的变革，剖析“乌坎事件”生发的根源。

4.3.1 农村改革进程中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变迁

1978年以来的农村改革，虽然是从经济开始的，但是它给农村地区带来的变化不仅是经济层面，还有政治与社会的变迁。可以说，对农村地区而言，这次改革是全方位的。

1、土地承包制：农民经济自主权的获得

1978年，安徽小岗村18名村民出于生存道义（被饥饿逼出的抉择）签订了“生死文书”，实行了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土地的大包干。此次土地制度的变革是自下而上的，后被中央政府承认而在全国推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改革开放后农村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先由局部农民进行政策或制度尝试，中央总结经验之后再推向全国。村民自治制度亦是如此。

土地实行家庭承包制之后，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公社体制开始瓦解。尽管承包之后农民获得的依然只是土地的使用权，但是较之人民公

社时期，他们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已经大大扩展了。当时有句谚语比较生动地描述了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即“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农民的兴奋之情不言自明。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也就从此时起，农业生产获得了飞跃式发展，不仅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中国人口，而且给工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例如，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40 731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10 254万吨，增长幅度为33.6%；1979～1984年的六年间全国增产的粮食，相当于从1957年到1978年21年增长的粮食；1984年全国的棉花产量也相当于1978年的2.89倍。^①

但是这种制度曾经给农民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损害，亦可以称之为此制度的负外部效应。一方面就是，在农业税未取消之前的一段时间，农村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通过“三提五统”以及各种摊派提取了一部分农业生产的剩余，造成了1990年代以来至2006年农业税取消一段时期内的农村赋税沉重，限制了农业的扩大再生产；^②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获得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而政府或村集体可以用各种名义征收土地，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这种趋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愈演愈烈。后者的损害是破坏性的，因为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伴随着城市化的“圈地运动”是“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型发展模式。正是基于这种发展模式，才引致了“乌坎事件”的爆发。加之既有的土地制度潜力已经被挖掘殆尽（大量的土地抛荒现象可以说明），所以，当前学者们开始深入讨论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土地制度改革。^③

总之，土地承包制的实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潜力，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发展。^④虽然此项制度发展到今天又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问

①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②关于中国农民沉重负担的论述可参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关于未来的土地制度改革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土地的私有化，以秦晖为代表，他们主要从市场经济角度谈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土地资源；一种观点则认为土地不能实行私有化，以温铁军、贺雪峰等乡村建设学派为代表，他们认为从中国发展的国情看，既有的土地制度支撑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某些地区农业收入还占有重要地位。参见秦晖：《农民地权六论》，《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9期；温铁军：《“土地私有化”不是中国农村的未来方向》，《环球企业家》，2008年7月5日第13期；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在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重要的一项决议就是“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句话表明，中共已经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承包权，即学界所称的“永佃权”。这对农民而言是一颗定心丸，但是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使所有权在国家、集体和农户之间发生分割，农村政治权力结构又使乡村干部成为土地所有权的人格化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农

题，但是对于农民自主性与主体性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此项制度激发出的农民的主体性才是未来农村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关键。

2、“乡政村治”：农村政治格局的演化

土地承包制赋予了农民经济自主权，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民的主体性。由于农民要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因而也就有了自主管理农村事务的诉求。1980年，广西省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果作屯^①村民出于管理村务的需要^②选举产生了中国第一个村委会，拉开了农村政治改革的序幕。在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1条明确了“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这也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对于农民首创的肯定。1987年11月24日颁布的《村委会组织法（试行）》，将村民自治的性质定为“三个自我”，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后来民政部把村民自治活动概括为“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召开，村民自治的基本内容——“四个民主”首次写进了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至此，村民自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在农村地区的基本制度之一。

村民自治的实施，打破了全能主义时期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渗透与掌控，国家权力开始在农村地区有所调整，逐步进入后全能主义时期。与之相随，“乡政村治”^③的政治格局开始形成。此种政治格局从理论上赋予了农民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权利，应该说是中国农村地区政治发展的重大进步。如果村民自治能够真正地落到实处，那么选举性民主就会在农村基层落地生根。然而，囿于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冲突（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和与乡镇政府之间的角色冲突，导致该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村两委”间的矛盾^④以及乡村基层政权建设^⑤的诸多问题。从村庄内部看，村委会是受村党支部领导的，这服从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从村庄与乡镇政府关系看，村

民的土地权益保护仍然显得很脆弱。

①果作屯在当时还是生产队建制。1984年人民公社瓦解以后，原来公社体制中的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

②张周来：《走进“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40期。

③“乡政村治”是对村民自治制度形成后农村地区国家——社会关系的概括与总结，是由张厚安首先提出的。参见张厚安：《乡政村治——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政策》，1996年第8期。

④关于村两委关系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景跃进：《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⑤关于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党支部与村委会又成为了乡镇政府在村庄的代理人。甚或可说，村委会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形式，村民的民主选举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尽管部分村庄可以真正地实行选举）。这种民主的虚化已经部分地威胁到了农民的生存，例如乌坎村（该村1999年开始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十多年并没有举行过一次真正的选举，一直持续到“乌坎事件”爆发和广东省委介入之后）。

从某种程度上看，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央政府顺势而为的权宜之计。因为当时人民公社已经开始瓦解，在短期内难以找到更好的制度模式。所以，中国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属于渐进式改革。中央政府直到1987年才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而后则不断完善之。因此，村民自治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比它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当前，村民自治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村两委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村庄内党的领导、村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村的关系。^①

如前所述，中共通过“支部下乡”，在村庄内建立起了党的支部，即使在实施村民自治制度后，党支部的控制能力虽然相较改革开放前下降，但是在村庄内部权力结构中依然处于核心地位。此时，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一般是有威望或者有能力的卡里斯玛式人物，如乌坎村的前村支书薛昌以及现任的村党总支书记林祖恋。如果现行制度对党支部书记的权力起不到有效制约作用，那么村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就会成为一句口号。乌坎村的事例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现代化力量，而农民则可能成为现代化的支持力量，也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反对力量，关键在于中共如何有效整合农民。改革开放前，中共过于强调通过政治手段（阶级分析、阶级斗争）整合农民力量，而改革开放后，在利益主导的市场原则下，先前的政治手段的效果已经大打折扣。尽管中共实现了组织嵌入，但是它的功能嵌入与文化嵌入还远远不够。所以，在村民自治的制度背景下，中共还要积极探索如何实现对农村的功能嵌入与文化嵌入，重构它对农民的政治动员体系，以提升自身的合法性，进而引导中国建设现代化。

3、农民分层与主体意识觉醒：农村社会的转变

革命年代，出于打赢战争的需要，中共利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农民划分出

^①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做报告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其实也涉及这三个方面。

若干个阶级。^①阶级分析的方法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可以称之为身份社会，主要表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就的各种政治身份、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部身份和单位身份、“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②相应地，农民也被身份化了，其中有地富反坏右的划分，也有公社干部、大队干部与农民群众之分。此时期农民分层的显著特点就是建构性，他们的身份都是人为划分的，因为这些农村阶级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早在土改完成之后就已经消失了。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的改革则改变了以阶级分析划分农民阶级的方法，变成了以职业或占有资源（包括财富、权力和声望等）的多少来进行社会阶层的区分。

土地家庭承包制的确立、以及人民公社的解体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构成了农民社会分层的制度基础。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实施不仅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农民自身。农民不仅可以种地，而且可以在农闲时节进城务工。村民自治制度赋予了农民更多的自由，农村干部的管理范围也比之前缩小。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199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都加剧了农民的分化。

就乌坎村而言，农民可以划分为五个阶层。如果从职业的视角看，农民已经分化成九个阶层^③，分别为：一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承包土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是农民的主体；二是农民工，他们长期在城镇居住，在厂矿或商店从事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劳动，工资是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他们没有城市户籍，不能享受城市工人的正式待遇；三是私营企业和小型外资企业的雇工，很大部分农民工在这里工作；四是农村知识分子，他们主要从事教育、科技、医疗等工作，属于农村中的工薪阶层；五是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六是私有企业主，他们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雇佣相当数量的工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他们在农村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七是农业经营大户，如养鸡大户、养猪大户、

^①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毛泽东在1925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以及1933年发表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这两篇文章分别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127～129页。

^②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5页。

^③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115页。除了按照职业对农民进行横向分层之外，有的学者也根据问卷调查从纵向对农民进行了分层，将农民分为上层（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乡村管理者）、中上层（农村智力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中下层（雇工和农民工）、下层（农业劳动者）。参见林坚、马彦丽：《我国农民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特征——一个基于全国1185份调查问卷的分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种田大户等；八是乡镇企业管理者，如乡镇企业的经理、厂长等，到了 20 世纪末，他们中的部分人把乡镇企业收购而变为了私营企业主；九是乡村干部，他们掌握着一定的政治行政资源和村内公共资源的支配权，是村庄内部的主导者。

上述九个阶层的农民，实际上已经构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社会分层的基础上，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的数据显示，如果将家庭收入按照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和高收入户分成五组的话，那么在 2011 年最高收入组的人纯收入是最低组的 8.39 倍。^①

因此，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农村的熟人社会^②被打破，农民有了各自的利益诉求，他们的自主性和民主意识也有所觉醒，尤其是经过选举村委会的历练之后。其中那些有着外出打工经历并且见过世面的年轻人，他们的公民意识已经开始萌发，并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与政治意识。“乌坎事件”中的庄烈宏就是代表。

然而，农村社会分层所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村内部形成了强势与弱势群体，并对农村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例如，相对于普通的从事农业的农户来讲，农业公司、种粮大户无疑是强势群体，但恰恰是农业公司或种粮大户引起媒体关注，引起政府关注，这些农业公司或种粮大户容易得到国家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受到农业部门的表彰，得到更多的农业补贴（比如对万头养猪场的补贴，比如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业补贴向粮食生产大户倾斜的政策），甚至更多地成为各级人大、政协委员，但是，这些农业公司和种粮大户的处境显然要远好于一般农户，且他们并不能代表一般农户的利益。^③在“乌坎事件”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如前村支部书记薛昌多年来被授予各种荣誉称号，而且当选汕尾市人大代表乃至广东省人大代表，其领导的党支部也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以薛昌为代表的村两委成员已经成为乌坎村内部的强势群体，并且控制着乌坎村内的土地资源分配。那么，多数村民作为弱势群体，则对村两委偷卖土地的行为束手无策，直至以暴力冲突的方式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2》（网络版），十、人民生活，“10-23 按收入五等份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2011 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2013 年 6 月 15 日访问。

^②此概念是由费孝通首先提出来的。熟人社会的特征是注重亲情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了一张关系网。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③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土地制度向何处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326～327 页。

保护自身的利益。同样，乌坎村内部关于讨回来的土地如何使用，富人和穷人之间意见也不统一，因为富人不仅有房子还有宅基地，而穷人有的卖掉宅基地而租房住。^①因此，中共在制定农村政策之时，需要健全利益表达机制，以平衡各方面利益诉求。如此，中共才能充分动员农民。

4.3.2 开放性意识形态的形成

较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意识形态呈现出开放性特点，在改革策略上也开始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可以说，开放性意识形态的形成是改革开放的思想保障，是中共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探索的结果。

1、真理标准大讨论与思想解放：意识形态的弱化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改革开放前的一次思想解放，它针对的是华国锋所提出的“两个凡是”^②的执政思想。这场讨论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党内毛主席忠实支持者和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务实派之间的辩论，反映出文化大革命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之间的斗争。最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确认为党的执政指导思想，从而打破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路线，意味着与毛路线的决裂。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曾言：“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③这体现出中共开始逐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并逐渐走上中间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78年5月10日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的文章——

①参见观察者网对林祖恋的采访。《社会观察》：大家想把这些地要回来是为了造房子还是其他什么目的？林祖恋：村里富人和穷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富的人不单单有房子，还有宅基地。穷的人不单单住得不好，连宅基地都卖了。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村里分过一次宅基地，穷人就给卖了，一间房子卖了几百块，一两千块。现在反而是富人闹得比较厉害，他们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我总是觉得老实的人会比较穷，弱势的人一定是穷的，但这些弱势的人绝不闹事，我们应该要扶持弱势的人。《社会观察》：当时这些宅基地是怎么卖的？林祖恋：当时老村委办了一个公司，也就是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通过它把村里的宅基地非法转让给了村里的富人。我们现在把这些地要回来，但是还没决定怎么处理，原来的土地证还在个人的手上，村里的富人不愿意把土地证交出来。唐逸如：《当民主理想照进乌坎现实——独家对话乌坎村支书林祖恋》，载于“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tang-yi-ru/2013_04_02_135874.shtml，2013年4月2日。

②“两个凡是”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因此，“两个凡是”被看作是毛泽东路线的继续。

③《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的几天时间内，先后被《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全国多数省级党报转载。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于是，此篇文章就将人们的思想从阶级斗争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把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到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与此相随，邓小平借用的“猫论”^①也体现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淡化，以及向实用主义价值取向的转化。“邓小平认为，搞理论争论，就会贻误时机，错过发展机遇。空洞的争论无济于事，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应该大胆地实践，大胆地试，先不要下结论，干了再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②。“猫论”充分地表达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预示着改变了过去凡事都要先以意识形态考量、凡事都要先从政治着眼、凡事都要先问问教条的思维习惯，也号召着人们要从实际出发努力发展生产，从而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在面临改革开放徘徊不前的状况，邓小平对此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三个“有利于”标准成为了评判工作的是非标准，进一步破除了意识形态的框架，解放了人们思想，

在关于计划与市场之争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通过邓的论述，可以看出他

①对于邓小平的“猫论”，曾经在文革中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而遭到批判，1976年前后毛泽东也曾经批评道：“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从毛的批评可以看出邓本人是一个务实派，而不为意识形态的争论所束缚。

②《“白猫黑猫”开启了思想之门》，《信息时报》，2008年12月12日A27版。

③《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④《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不再将意识形态的差异看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而是依据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标准来阐述社会主义。邓的讲话彻底厘清了人们的思想误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

可以说，源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也提升了中共的经济合法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念后被江泽民继承和发展，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思想，于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成为中共的思想路线，它们的共通之处就是要坚持实践标准，以实践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可以说，乌坎村 1980 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与侨资的进入，以及从“一穷二白”的小渔村成长为远近闻名富甲一方的新农村，与此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不无关系。正是经济的快速发展，支撑了薛昌能够长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因为经济上的富裕对于保守的农民而言是最具诱惑力的。^①

2、四项基本原则：意识形态的承继

如果说，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了人民的思想，破除了人们的意识形态束缚，并且中共也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就已经抛弃了意识形态呢？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中共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意识形态工具。这可以从它的历届工作报告中看出。

尽管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刻意淡化意识形态，但是并不能由此说明邓不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是他不再将意识形态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将其看成保障性力量。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充分反映出邓对意识形态的继承与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 1979 年 3 月 30 日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就讲到：“现在，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所欠下的帐和留下的毒，各地的负担很重。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

年版第 373 页。

^①参见观察者网对林祖恋的采访。《社会观察》：您觉得村民们从选举之初一致支持您，到如今有人反对，村民们的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林祖恋：心态的改变就是利益上的改变。去年选举的时候，应该说利益一致，主要是三点——土地清偿、账务清理、违法选举罢免。而现在的利益和原来的要求有差别，现在绝大部分群众都是为了土地补偿。但作为我个人，还是强调依法依规地处理问题。这和我们的想象是两码事。想象、目标和现实是两码事，解决问题需要双方都妥协。《社会观察》：有的人能办事，但是贪污，有的人不贪污，但是也不办事。这可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林祖恋：我也这么总结。（2012 年）年底就有人提出来了，老村委什么都好，就是卖地不好；新村委什么都不好，就是不卖地。一切标准都是为经济服务，有这条就好。这是个矛盾。我说好人不一定会办事，好人都太老实，老实的人如果按照我的说法，就是没有用。唐逸如：《当民主理想照进乌坎现实——独家对话乌坎村支书林祖恋》，载于“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tang-yi-ru/2013_04_02_135874.shtml，2013 年 4 月 2 日。

政府主义的流毒，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相结合，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①同时，邓在会上还讲到现在各级领导力量和党内外的组织纪律性都不如以前好。

所以，在谈到实现中国四个现代化时，邓提出了在思想政治方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因为他看到“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②同时，邓认为这两种思潮都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的，要坚决加以反对。所以，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邓小平坚持了他自己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原则已经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的内核，而被邓及以后的历代中共领导人继承，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一项。

在农村建设过程中，尽管实施了村民自治，但是党的领导依然是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③党的一元化领导已经根深蒂固为中国的社会制度，也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的内核。因而，从这种意义上看，四项基本原则不但没有削弱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反而继承和发展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传统，并且将其制度化了。

3、与时俱进与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的调适

邓小平的继承人江泽民在执政期间，提出了“与时俱进”的理念，并在中共十六大上写入党章，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起成为党的思想路线。

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是这样表述与时俱进的重要作用的：

^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166页。

^③参见观察者网对林祖恋的采访。《社会观察》：那您觉得民主选举、村民自治本身有没有问题呢？林祖恋：选举这个方向是对的。这里面不管方法怎么样，选举了之后都要认命。一般的情况下，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我看要健全。但是村民自治这种提法不是那么科学。我认为我们国家现在的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要在党的领导下，法律规范下，有上级政府的支持下进行。如果是村民自治，连选举费用都拿不出来，还算什么自治？肚子都不饱，还能自治？我说肚子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唐逸如：《当民主理想照进乌坎现实——独家对话乌坎村支书林祖恋》，载于“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tang-yi-ru/2013_04_02_135874.shtml，2013年4月2日。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①

通过这段文字描述，我们可以发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三者之间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并且以实践作为检验标准。“与时俱进”则更加强调了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实践。所以说，与时俱进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继承与发展。

“与时俱进”要求确定好党的历史方位，江泽民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②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演变成为一个执政党，而且执政的背景正处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时代。那么，江的报告中暗含的意思就是中共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需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以推进党的事业向前发展。

“三个代表”的思想就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与时俱进，它将中共的历史地位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时，也给中共提出了永无止境的发展目标。因为，这三个方向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的。总体上看，它继承了邓小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发展出了先进文化以及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内涵。

^①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54.htm，2002年11月17日。

^②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54.htm，2002年11月17日。

与此相随，中共的意识形态结构也进行了调适。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江泽民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体制改革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①政治文明被写入党的工作报告中这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与调适性。

中共意识形态的另一重大调适体现为对于普世价值的认同。十六大之后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普世价值，并高度认可之。2006年4月，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②他在2008年的新年贺词中又说：“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共享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成果。”^③2008年5月7日，胡锦涛和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在东京共同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有一句话是：“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④这里的“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指的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

温家宝的阐述更加具体和明了。2006年9月，他在接受五家海外媒体采访时说：“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

①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78.htm，2002年11月17日。

②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4/22/content_4460879.htm，2006年4月22日。

③《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2008年新年贺词：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ldhd/2007-12/31/content_848071.htm，2007年12月31日。

④《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jrzg/2008-05/07/content_964157.htm，2008年05月07日。

民主建设特别是直接选举，要根据国情循序渐进。我们坚信，群众通过基层的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体现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①

2007年2月，温家宝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写道：“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②

从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中共高层领导人已经承认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然而，中共主张普世价值的实现模式多元化，在中国就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普世价值的承认，表明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在进行重大调适，也体现了中共适应民主化浪潮的与时俱进。

中共意识形态的调适，亦对农村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能使用网络的农村年轻人，他们能够通过QQ、微博、网络社区、新闻等多种途径了解这些普世价值，并利用这些价值导引自己的行动。在“乌坎事件”中，“乌坎热血青年团”的QQ群中置顶了《国际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两个文件，足可以看出普世价值对年轻农民的影响。而在事件中，村民打出“反对独裁”、“还我民权”、“官商勾结·扼杀民主”、“强烈要求民主选举”等标语，则进一步证明了普世价值对村民的影响。在普世价值渐渐深入人心的时代，中共调适意识形态无疑具有必要性，但是如何将这些普世价值通过制度实现之，则是中共在重构农村政治动员体系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4.4 嵌入式管控：内涵及其挑战

在下面的内容中，本文将对“嵌入式管控”政治动员模式的基本内涵及其

^①《温家宝接受欧洲媒体采访 纵论国内外政经大事》，载于“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other/news/2006/09-06/785483.shtml>，2006年09月06日。

^②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2/26/content_5775212.htm，2007年02月26日。

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共的回应进行论述。

4.4.1 嵌入式管控的基本内涵

在本章的开篇，笔者提出改革开放后中共在农村建构了嵌入式管控的政治动员模式，并借助“乌坎事件”对其展开了分析。那么，在此需要对“嵌入式管控”的内涵做一总结。

制度与思想背景。此动员模式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制度与思想基础。制度上，主要表现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和村民自治的实施、以及这两项制度衍生的农民分层以及农民主体意识觉醒。思想方面，中共的意识形态做出了重大调适，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转向了以“生产力标准、先进文化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标准”的意识形态，并承认了“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中共的意识形态愈发地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因此，基于这两大方面的变化，中共不能再像人民公社时期全面掌控农村，而只能通过它的基层组织——村党支部对农村社会实施嵌入。然而，这种嵌入仅仅是组织上的嵌入，功能嵌入和文化嵌入还做得很不够。至今，农村内部的文化权力网络仍没有得以重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共的合法性。

基本内涵。“嵌入式管控”的动员模式与全能主义时期一元化建构的政治动员模式不同，它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在村民自治体制下，中共仍作为主要的动员主体而继续发挥作用，但是以中共为主体的官僚制动员与以民间精英（有声望之人、先富能人）为主体的卡里斯玛型动员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第二，中共不再能够全面控制农村社会，与之相应，中共是通过组织系统嵌入^①农村社

^①关于嵌入(embeddedness)的概念最早是由卡尔·布兰尼提出，并用于经济理论分析。他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他提出：互惠、再分配和交换这三种经济活动形式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嵌入形态不同；在工业革命之前的非市场经济中，市场交换机制尚未占据统治地位，经济生活以互惠或再分配的方式为主，是嵌入在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中的；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仅由市场价格来决定，人们在这种市场上按照金钱收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此时的经济体制是“去嵌入”(disembed)的，即不再受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影响。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随后这个概念又被诸多学者阐释和借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彼得·埃文斯，他用“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概念描述国家与社会、市场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表明，国家机关在具有自主性的同时，也必须与市场有适当程度的连接，国家机关对经济发展才能担当“当家主政”与“助产者”的角色。他还区分了国家与社区之间关系的两种模式：一是互补性，国家为社区居民提供有形或无形的公共物品，以此来增强双方合作与互补的关系；二是嵌入性，政府官员为社区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进而形塑自己作为社区成员的身份，在社区居民中获得较高的

会的，它的基层组织——村党支部仍然在村庄内部发挥领导作用，并且依然遵循管控的思想管理村务；第三，中共动员农民手段的强制性与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淡薄，更多的是采取利益诱导的方式，例如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制定“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等措施；第四，随着土地承包制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此时期的动员客体——农民的自主性提高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分层，不同阶层的农民利益诉求相互冲突，随着传播媒介的扩展，他们的思想变得多元化，公民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萌发；第五，此时政治动员的直接导向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间接目标是提升中共的合法性，终极目标依然是实现国家现代化，重新复兴中华民族^①。

“嵌入式管控”的政治动员，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共通过基层组织——党支部（有时也包括乡镇党委）嵌入多元化和分化的农村社会，利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实施，对农村事务实施管理控制的一系列活动。这也是由后全能主义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的。应该说，此动员模式具备了更多的官僚制理性成分。

4.4.2 挑战与回应

然而，这种政治动员模式正日益面临着诸多的严峻挑战，中共也对这些挑战做出了一些回应与调适，主要表现为：

1、农民组织发育与政治动员的网络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进入后全能主义时期。国家权力在农村地区开始收缩，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国家对农村的控制较之人民公社时期大大减弱，农民组织也开始发育。^②1980年四川省郫县成立的养蜂协会、1980年广东省恩平县牛江镇成立的杂优稻研究会，这些以技术协会面目出现的农民经济组织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最为迅速。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出

认同和肯定。“嵌入性自主”概念一方面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同时认为国家作用的发挥也会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参见 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本章的嵌入就是借用彼得·埃文斯的概念，特别是国家与社区的嵌入性关系。
^①2012年11月，刚刚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带领其他六名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去了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参观了名为《复兴之路》的中国近现代史展览。这是他们首次在人民大会堂以外的地方集体亮相，大有深意。

^②关于农村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详细论述参见吴新叶：《农村基层非政府公共组织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现，表明农民走上了新型合作化道路。2006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业合作社法》获得通过，意味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开始制度化与规范化。而之前的农协技术协会中的一部分也转变成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民经济组织的主体之一。还有部分经济较发达的农村，以村委会为主导成立了开发公司^①，也成为农民经济组织的一种发展趋势。当前，农民经济组织已经出现了技术协会+农户、龙头公司+农户及专业合作社+农户等多种组织形式。

除却这些正式组织之外，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宗族已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村民事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案例中的乌坎村就是一个宗族势力比较强的村庄，它的力量可以左右村里的民主选举。这些宗族以比较有声望的人来主持事务，它不仅可以调节村民纠纷，还可以帮助宗族内部村民举办一些集体事务（如红白喜事等），甚至还担负起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如修路等）、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亦能产生较大影响。^②所以，这些以血缘为基础的、能够为村民切身利益服务的宗族，与其他组织相比更能获得农民的信任与支持，从而以它为核心在村庄内部形成了一个小的共同体，影响着农村的治理格局。

农村宗教亦是不能忽略的一种组织。^③随着农民的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比较容易接受宗教来弥补现实的不满足感，加之农村本来就有宗教信仰的文化根基。例如，1999年前法轮功之所以能够在农村地区得以迅速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练功可以强身健体、祛除疾病。这就迎合了一些农民看不起病也怕生病的心理。改革开放后，农村文化的衰败，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的增多，都给农村宗教的复兴提供了社会温床。所以，加入农村宗教的主要是妇女和老人。农村宗教能够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提供一种精

①庾康、徐明泽：《村级“公司化新政”的价值追问》，《新华日报》，2009年11月2日A2版。

②相关研究可参见孙秀林：《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肖唐镖：《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肖唐镖：《宗族政治：村治权力网络的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王朔柏、陈意新：《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贺振华：《转型时期的农村治理及宗族：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1期；

③相关研究可参见何慧丽：《农村宗教生态：“多元一体”关系的动态发展——以河南农村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2期；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刘志军：《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张店镇个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吴理财、张良：《农民的精神信仰：缺失抑或转化？——对农村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反思》，《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张友庭：《市场化进程与小农的风险规避：基督教传播的社会功能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神世界的支持，因而也成为了凝聚农民的组织。特别是农村宗教良莠不齐，有的是合法宗教（比如基督教），大部分都是非法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共在农村地区的动员能力。

所以说，人民公社时期，被中国共产党高度整合的农村社会瓦解了。改革开放后中共面临的是一个日益组织多元化的农村社会。因此，中共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将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动员转换成网络化的政治动员。对此，中共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在两新”组织中发展党组织^①，比如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开始设立党支部。然而，这种方式仍然属于一种组织嵌入。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效甚微的时代背景下，此种组织发展是否能够真正地发挥其吸纳与动员作用，还有待于实践的验证。

2、“先富能人治村”：新时期农村精英的录用

邓小平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他是就中国而言的。那么对于农村地区，对于一个村庄而言也是如此。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实施，以及中共意识形态向生产力标准的转向，均激发了农民的致富潜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那么，如何让这部分先富群体^③带动后富群体，则是共同富裕目标引导下继续思考的问题。

这些先富能人由于致富能力比较强，可能会在村庄内拥有比较高的声望与权威，对于村民的影响也就比较大。在农村，他们已经形成一个特殊群体，由于手中握有较多的政治经济资源，他们的参政意识也日益提高。将他们吸纳进

^①“两新”组织，是指新经济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简称。新经济组织，是指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内地公民私人、港澳台商、外商全部所有或绝对控制的新出现的经济组织形态。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外商经济控制企业、港澳台经济控制企业、非国有控股股份制企业等。新社会组织是相对于政党、政府等传统组织形态之外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等是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统称。中共中央指出，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探索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方法和途径。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09月27日第1版。

^②《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③所谓“先富群体”，主要指企业主、工商户或种养殖大户等农村相对富裕阶层。该提法最早由义乌市有关领导提出，认为它较日常的“老板”说法更贴切。这些“先富群体”大多数仍是当地“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但其财富规模大大超出了普通农民，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也脱离了传统农民的主要特征，属于受益于政府富民政策的新型农民群体。

政治体系内，使他们更好地为村民服务，进而带动村民共同富裕，就成为新时期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共面临的挑战之一。

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实施，给先富能人参政提供了一种制度性渠道。依此，中共开始鼓励和培养先富能人，吸收他们入党、让他们参加村委会选举等，来满足他们的参政需求。^①这些举措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与许可。^②与此同时，农民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认为只有能够带领他们发家致富的干部才是好干部，例如，乌坎村选举之后，农民由于不能增加收入而产生失落情绪。^③所以说“尽管权力不等于资源，但缺乏资源的权力往往是没有影响力的。”^④先富能人在经济上的成功以及农民心理的微妙变化，支持了他们能够参与农村事务。

与人民公社时期以政治标准（强调农村干部又红又专）录用农村政治精英相比，改革开放后的新兴精英——先富能人的录用标准则强调能力标准（又专又红）。先富能人治村一方面符合了中共生产力标准的意识形态，有利于实现发展农村的目标，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先富群体的参政要求。可以说，中共的此种调适与回应给农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活力。从积极方面看，先富能人治村带动了农民致富、推动了集体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了村务管理水平。

然而，先富群体参政也给农村治理带来诸多问题。据浙江省民政厅调查显示，先富群体参政的动机有三个：谋求经济利益、谋求政治利益、为民办事。^⑤

①相关介绍和研究可参见肖菁、岳海智：《先富群体竞选村官调查报告 浙江富人治村占30%》，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9/20/content_1091309.htm，2003年09月20日；张旭光、任强：《“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现象的调查与思考》，《资料通讯》，2003年第9期；谭飞、赵锋：《老区“富人治村”现象解读》，《瞭望》，2004年第25期；顾正喜：《我国农村先富群体参政的激励结构及规范之道——以先富捐资竞选为例分析》，《探索》，2004年第1期；胡序杭：《先富能人治村条件下村党组织发展经济的新模式探究》，《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程珂：《先富能人治村绩效探析——以浙江省临安市板桥乡为例》，《黄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②朱江平：《需重视“先富能人治村”——访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原巡视员曹国英》，《农村工作通讯》，2011年第16期。

③林祖恋在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说：乌坎和外面的接触少，它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都不高。村民认为自己的意见说出来，达到自己的要求就是民主。民主是你能给我找条好的出路，民主是你能让我发财。参见《乌坎村主任：民众只认为民主是能让其发财》，载于“战略网”，http://observe.chinaiiss.com/html/20132/28/a5bb20_2.html，2012年02月28日。

④[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⑤其中，在第一类谋求经济利益的人中又分两类：有的主要为个人“捞一把”，有的是“保护既得利益”，前者较少；谋求政治利益的动机相对复杂，既有保护既得利益的潜在动机，也有“求名”的社会心理，多数是各种动机相互交织；也发现部分“先富群体”确实是出于公心，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和造福邻里，甘愿作出经济上的牺牲。肖菁、岳海智：《先富群体竞选村官调查报告 浙江富人治村占30%》，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9/20/content_1091309.htm，2003年09月20日。

他们参政动机的多元化一方面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新的考验，一些党支部通过发展党员形成党内利益群体；^①另一方面也对农村的选举造成冲击，比如“天价村主任”、贿选等情况发生，乃至成为先富能人获取私利的政治工具，对村民自治的法制建设产生新的挑战。^②

亨廷顿曾言：“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兴起，以及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力图产生影响的尝试，造成了腐化的产生。当政治体系不能及时地适应需要，提供公认的、合法的渠道，把新兴集团纳入政治体系时，腐化可以成为达到此目的的非正常手段。”^③那么，中共通过“先富能人治村”的方式，利用村民自治制度将此群体吸纳进政治体系，腐化依然不可避免，说明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不彻底性以及农村文化的不适应性。也许，这才是中共在新时期农村政治动员中面临的重大难题。

3、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沟通的多元化

关于政治沟通的多元化与政治动员之间的张力，本章前面已经有简单的论述。在此，本文就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沟通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做出阐释。

罗伯特·达尔曾指出，构成影响力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操纵性说服。^④很显然，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人们的信息传播就属于此。那么，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政治沟通亦属于操纵性说服。

改革开放之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开启了社会声音多样化的时代。与改革开放前单一的传播模式不同，不同的媒体可以相对自由的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不同观点之间的争鸣也很激烈。现时代的大众传播媒介不仅包括传统的电台、广播电台、报纸等，还包括互联网、微博、QQ、手机等社交平台。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对年轻人影响为甚。农民也受到此潮流的影响而改变着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

大众传播媒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入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也将一

①胡序杭：《“先富能人治村”：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及其对策》，《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先富能人治村”条件下发展党员工作的调查与思考》，《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樊平：《“老板村官”日益增多》，《当代广西》，2004年第11期；

②黄俊尧：《先富能人参政背景下的村庄政治生活——从选举与治理的维度》，《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顾正喜：《我国农村先富群体参政的激励结构及规范之道——以先富捐资竞选为例分析》，《探索》，2004年第1期。

③[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④[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8～59页。

些不同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以及政治价值观输送给了每一个人，政治沟通渠道亦多元化了。同时，还深刻地影响到了民众的政治社会化。农村地区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由先前的一种声音的灌输转变成为现在不同声音的传播，特别是农民能够接触到外部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农民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它将不同的政治观念、政治意识以及政治价值观引入到农民的思想观念中，造就了政治观多元化的农民。同时，农民不再是单纯的信息受体，他们的信息来源也多元化了。这就在价值观念方面消解了中共的政治动员体系，给中共在农村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带来了新的挑战。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及其领导的政府系统并没有消极对待，而是积极回应。它们除了利用传统媒体宣传主流政治文化之外，也积极利用新媒体（如网络）、来应对政治沟通多元化的发展。例如，政府通过政务微博加强与公众的互动^①、2012年十八大之后掀起的网络监督风暴致使一批高官落马^②等。此外，中国政府还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强与公众的沟通。然而，这些沟通渠道仍存在介绍性信息多、实质性信息少；注重内容发布，轻视民众回馈；重视结果的宣布，忽视过程的公开等问题。在农村地区，由于会利用网络的仍属少数年轻人，中共还会利用普及率较高的电视台来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报道。如，在农村地区收视率比较高的“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栏目，在较大程度上发挥了引导农民思想的作用。^③在政府公开自己的一些信息以及接受网民监督之时，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中共为了良性发展，不得不接受民众监督，加大违法犯罪的惩处力度；但是政府不良信息和非法行为的揭示，有可能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降低中共的动员能力。“乌坎事件”中的农民就表现出了对汕尾市政府及以下各

①目前，中国已经在腾讯微博平台上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公报矩阵”。参见《国务院公报开通腾讯微博 首个“公报矩阵”将诞生》，载于“中国广播网”，http://www.cnr.cn/gundong/201303/20130329_512254428.shtml，2013年03月29日。

②例如原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非法事件被曝光就是由网民举报，从曝光到免职仅有63小时，成为2012年网络反腐的典型事件。参见《雷政富曝光到免职63小时 创正厅级官员落马纪录》，载于“北方网”，<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2/12/15/010407009.shtml>，2012年12月15日。

③相关研究可参见景跃进：《如何扩大舆论监督的空间——〈焦点访谈〉的实践与新闻改革的思考》，《开放时代》，2000年第5期；李小艳：《电视媒介中农民话语权的缺失与重建——以〈焦点访谈〉的“三农”报道为例》，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吕岩梅：《社会转型期新闻框架真实建构新探——以〈焦点访谈〉为例》，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程玲玲：《〈焦点访谈〉的政治传播学分析》，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王斐弘：《法律的底色——以〈今日说法〉案例所作的法社会学分析》，《中国司法》，2006年第5期；杨彩云：《十年法治的记忆——从〈今日说法〉透视中国法治进程》，《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7期；张桂娜：《“法治中国”的主流叙事——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为例的考察》，《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17期。

级政府的不信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政府的非法行为被农民不同程度的了解。今后，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政治沟通的多元化将是一种越来越强的趋势，也是中共必须要正视的。

4、基层政权低效、权威碎片化与组织动员效力消减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确立了现今的央地关系。因为分税制的确立不仅重新划分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关系，也明确了双方之间的事权。为了改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日趋下降局面而实行的分税制，将税收的一大部分收归了中央，而承担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地方政府只占有一小部分。特别是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更显微薄。

财权与事权的倒挂，加之压力型行政体制^①，致使地方政府形成了“公司化”运营方式^②，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处于农村社会的乡镇政府，由于它在地区经济发展限制，它的经济收入也受到限制。为了扩大税源，乡镇政府（包括党委在内）的公司化倾向更为明显。伴随着农村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乡镇政府为了更好地满足其财政需求和缓解经济发展的压力，逐步演变成了“谋利型政权经营者”，^③乡镇政权也演化成了“悬浮型”政权模式。^④不论是从经济人假设提出“地方政府公司化”，还是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提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悬浮型”政权模式，均表达了这样一种事实：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包括其控制的村两委）已经偏离了它的真正职责所在，而不能有效地为农村发展

①压力型行政体制又称压力型体制。“压力型体制”是对地方政府运行的形象描述，强调地方政府的运行是对不同来源的发展压力的分解和应对。压力型体制是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它对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全面动员能力受到了限制，动员方式和手段有所改变，但却扩散到经济领域之外更广的领域。参见荣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②这是一种经济学的视角。地方政府公司化具体有两种理解：一是学者说的“政府公司化”，指一些地方政府像公司一样，把追求利润最大化当成行政目标，运用手中的权力，大干与民争利的事情；二是另外一种现象：某些政府或部门的领导，把自己“管辖的地盘”当成自己的私营机构，肆无忌惮地通过这个“公司”或谋取私利、或恣意胡为。参见吴皓：《人民时评：“最后疯狂”，给政府“公司化”添加新注脚》，载于“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0112933.html>，2009年09月25日。关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相关研究，可参见赵树凯：《农村发展与“基层政府公司化”》，《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10期；赵树凯：《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优势还是劣势？》，《文化纵横》，2012年第2期；宫希魁：《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及其治理》，《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

③杨善华、苏红：《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④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提供所必须的公共物品，从而也就难以获得农民的政治支持与信任。基层政权面临着公共服务与垄断经营的角色冲突。^①

与基层政权低效相伴生的是基层政府权威的碎片化^②。这种碎片化，从内部看根源于预算制度导致的部门化^③，而从外部看，则起因于农民的分层与农民组织的兴起，形成了多个权威中心，将乡镇政府及其控制的“村两委”权威分割。基层政府权威体系的碎片化所提出的巨大挑战就是：政府难以控制其自身组织运行并进而无法对农民提供有效的公共物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中共实施组织动员的效力。同时，基层政府权威碎片化，导致了官僚制动员与民间精英动员的博弈，这种博弈可能会推动也可能会阻碍基层政权建设，关键在于二者之间的博弈能否限定在法律框架之内。可以说，基层政权的低效与权威体系的碎片化，导致了国家政权出现内卷化发展。

中共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时，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从村庄内部建设入手，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具体体现就是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④于是，在村庄内部形成了村党支部——决策权、村民委员会——执行权、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权的三权并立的局面。这是从制度上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尝试。正所谓，“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⑤如何提高村民对于村两委的监督，已经是关涉到村民自治制度能否落到实处关键。二是增强农村发展的活力。比如省直管县体制的改革，^⑥国家试图通过强县扩权，增强县域经济的实力，带

①相关论述可参见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86页。

②“碎片化权威”(fragmented authority)是美国政治学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奥森伯格(Oksenberg)在《中国的政府决策》(Policy Making in China)中提出的，主要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有关决策过程的考察，特别是能源部门的政策过程。他们认为，造成碎片化权威政治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治的人治化色彩过浓而制度化不足，而改革过程中的决策权下放则加剧了这一问题。其主要特征是具有碎片化的分层结构特征的国家，在离心的官僚机构中形成一个谈判的政策过程。参见 Kenneth G. Lieberthal,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转引自赵树凯：《基层政府的体制症结》，《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11期，第45页。

③赵树凯：《基层政府的体制症结》，《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11期，第45页。

④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10月28日修订)，第32条。

⑤[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⑥“省直管县”体制是指：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省—市—县”三级管理转变为“省—市、省—县”二级管理，对县的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市领导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实行“省直管县”。“省直管县”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借此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动农村的发展，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①包括以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扶持新型农业组织带动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加大支农资金的投入力度、取消农业税等；还规划化了新农村建设的远景目标，试图彻底改变农村生活的面貌。^②此外，国家制定新型农民合作医疗，并开始试点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政策、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等，也是中共“多予少取放活”政策的一部分。这一系列扶农政策，体现了中共开始实施发展共享与利益诱导的政治动员模式。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境况，因而也巩固了农民对中央政府的支持与信任。^③但是，近年来以新农村建设为名侵占农民土地的事情屡屡发生，也体现出“以工促农”发展战略在农村地区的不适应性，问题在于农民在土地管理方面没有发言权。由此看出，中共的农村政策落实的关键依然是改进农村的治理，尤其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建设。

综上，“嵌入式管控”的政治动员模式可以用图 4-2 表示（见下页）。

4.5 本章小结

本章的研究对象为 1978~2012 年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农村政治动员。从国家—社会关系看，此时中国逐渐形成了后全能主义政治。因此，笔者认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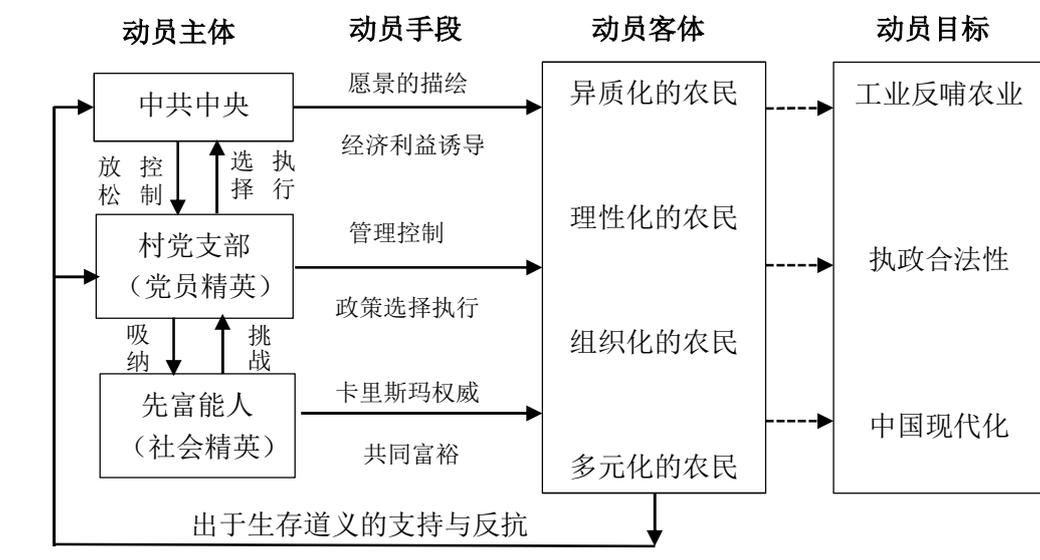
①这是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他认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此成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基础。2005 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中正式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

②这是在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5 年 10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新农村的建设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③这里涉及到农民对政府的差序信任，指的是当前中国农民对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市级政府以及县级政府和乡级政府的信任度逐级下降。相关研究可参见张厚安、蒙桂兰：《完善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制度 推进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湖北省广水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调查》，《社会主义研究》，1993 年第 4 期；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3, No.4,2001；李连江：《差序政府信任》，《二十一世纪》（香港），2012 年 6 月号，总第 131 期。“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干部）是仇人”这首民谣反映了农民对于政府的差序信任。转引自张厚安、蒙桂兰：《完善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制度 推进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湖北省广水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调查》，《社会主义研究》，1993 年第 4 期，第 42 页。

后全能主义政治时代中共农村政治动员为“嵌入式管控”模式，且通过广东省“乌坎事件”对该观点进行了阐述。总结起来，它的特征有：（1）在村民自治体制下，以中共为主体的官僚制动员与以民间精英（有声望之人、先富能人）为主体的卡里斯玛型动员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2）随着土地承包制和村民自治的实施，中共不再能够全面控制农村社会，但是它的基层组织——村党支部仍然在村庄内部发挥领导作用，并且依然遵循管控的思想管理村务；（3）中共动员农民手段的强制性与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淡薄，更多的是采取利益诱导的方式（4）此时期的动员客体——农民的自主性提高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分层，不同阶层的农民利益诉求相互冲突，并且伴随着传播媒介的扩展，他们的思想变得多元化，公民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萌发；（5）此时政治动员的直接导向是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间接目标是提升中共的合法性，终极目标依然是建设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国的复兴。

然而，这种动员模式日益受到多重挑战，例如农民组织发育与政治动员的网络化、“先富能人治村”、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沟通的多元化以及基层政权低效与组织动员效力消减等，中共面对这些挑战也做出了一定的回应，效果也不甚明显。所以说，农村政治动员体制亟需重构。



经济社会基础：土地家庭承包、村民自治、农村社会分层

图 4-2 “嵌入式管控”的政治动员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拟

第5章 改革开放前后两种动员模式的比较及其评价

在本文的第3～4章分别论述了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的两种模式：一元化建构与嵌入式管控。接下来，本章的主要内容就是将此两种的动员模式分别从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手段以及动员目标四个方面进行比较，还将从议题建构、认同聚合和动员效果三个维度评价这两种动员模式。

5.1 两种动员模式之比较

依照政治动员的定义，它包括四个要素：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手段及动员目标。接下来，本文就围绕这四个要素对两种动员模式进行比较。

5.1.1 动员主体

“一元化建构”的政治动员模式，它内在要求一个高度统合的政党、以及组织集权与个人集权的结合，所以，中共就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不二之选。从组织原则方面，中共奉行的“民主集中制”将其变成为一个权力金字塔体系，其内部运行遵循着由下至上的权力集中原则，^①而毛在革命战争及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成就造就了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从而实现了中共的组织集权与个人集权的结合。从组织纪律看，中共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保障党员个体对于党组织的忠诚与服从；中共对于政治教育的重视，加强了它对党员的思想控制。这也就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统合。除此之外，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中共

^①这种权力机制可见于《中国共产党党章》（2012年11月18日修订）第三条党员义务“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的表述以及第十条“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表述。

外围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它的政治吸纳与渗透的能力。这些组织都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进行着农村政治动员。在农村地区，党政经社高度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与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村庄内部（生产大队）建立的党支部、以及共青团、妇联组织的组建等均为中共在农村的政治动员奠定了组织基础。所以说，此时期政治动员的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及其所属的外围组织。

进入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在农村地区形成了“嵌入式管控”的政治动员模式。在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即在村庄内部党支部处于权力的核心，其外围组织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也依然依附于它并按照它的意志开展活动。但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日益受到冲击。比较明显的就是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之后，自上而下任命的村党支部与自下而上村民选举产生的“村两委”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与此同时，农民的分化与农民组织的兴起也对中共的一元化领导产生了严峻挑战。中共的官僚制动员与民间精英动员的博弈现象突显。而此时期，中共内部的统合程度亦不像改革开放前。从横向看，中共内部产生了持不同观点的派系；而从纵向看，由于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地方党组织的利益主体意识颇为增强，中共已经被自身的官僚制结构分割，尽管形式上仍保持着统一。更为严重的事情就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涣散，^①甚至在个别村庄，由于无利可图、村庄内部势力的斗争以及青年人外出等原因，村党支部书记长期处于空缺状态（为了解决此问题，中共开始在实施“跨村任职”，扩大村级党组织的人选范围^②）。农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基层党组织的诸多问题致使中共在农村的政治动员能力大大消减。^③尽管如此，此时期农村政治动员的主体依然是以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为主体，同时出现了农村新兴精英群体与之竞争。^④

①曾德斌：《“三剂妙药”诊治村党组织“涣散症”》，载于“全国党建网”，<http://www.cpc1921.org.cn/jiceng/nongcun/2012/0730/25160.html>，2012年07月30日。从这个报道可以得知，村党组织处于涣散状态。杜春华：《关于对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的思考》，载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117092/117104/7270066.html>，2008年05月20日。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分析了村党组织涣散的四个表现：一是“不团结”，村两委之间争斗；二是“不办事”，村两委人员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三是“不公正”，表现在村干部民主意识不强，办事不公开，处事不公正；四是“不廉洁”，表现为有的村干部以权谋私、不能很好地自律。

②钟美兰：《村支书跨村任职 越西“问题村”有了带头人》，《四川日报》，2013年06月27日第19版。

③在此需指出的是中共内部的动员能力并没有消减，上级对下级的动员依然很强势，这与压力型体制有关。新近流行的“被”字自体现了中共组织内部的动员能力，比如被增长、被小康、被代表等等。中共的内部动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社会，而成为自说自话。

④中共为了应对此种挑战，采取的措施是将新兴精英吸纳进党组织，并让其中有能力者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5.1.2 动员客体

从动员客体看，两种模式均以农民为对象。在“一元化建构”模式下，中共继续了革命年代阶级斗争的方法并利用农民改善生活的迫切愿望动员他们参与国家建设。此时期的农民分层是由中共主观建构的，即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划分。如前所述，土地改革之后，地主、富农等阶层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合作化运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中共认为先前的阶级立场会影响到他们（包括他们的后代）对于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态度，当一些政策执行遇到阻力的时候，便是这些原地主、富农遭受批斗之时，这是阶级斗争思想和血统论在政治动员中的运用。农民也变得日益政治化了。总体上看，除却这种人为的划分之外，农民并没有出现明显分层。如果说分层的话，此时期村庄内部的农民主要分为握有一定权力和资源的生产大队与生产小队的干部、以及丧失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自由的农民两大类。此时期的农民属于一种同质化的群体，他们的经济活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计划经济体系，他们的思想是由中共从外部灌输的，他们的行动自由也被土地制度及户籍制度束缚。同时，农民的生活也大都处于贫困状态，他们直接追求的目标就是生活的更好一些。最重要的此时的农民表现为个体化，他们只有参加公社组织才能获得基本的生产资料。因此说，此时期的政治动员客体是同质化的、原子化的且被政治化的农民。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开始分化，按照职业和占有资源的多少可以划分为几个阶层（参看前文）。这些分化的农民不仅体现为利益的多元化，也体现为思想的多样化，这与中共生产力标准的意识形态及其开放性不无关系。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激发了农民的利益自主性，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唤醒了农民的政治自主性，户籍制度的松动赋予了农民行动自由，大众传播媒介的多元带来了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多样性。除此之外，各种农民组织的兴起，使得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子化的状态，从而促进了农民利益的组织化，尽管大部分农民还没有加入任何组织。同时，在农村还活跃着年轻农民群体^①，他们有着与外界接

等，如前文所述的“先富人治村”。此时期，新兴精英的动员力量不容小觑，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是卡里斯玛型的个体动员与中共组织化动员之间的竞争。由于中共握有组织 and 行政资源，一般而言，这些卡里斯玛型人物会被中共吸纳，并为其农村发展目标服务。

^①美国学者阿普特认为，“青年人不仅仅受到普通政治利益的动机所驱使。所有的社会均面临着青年人这

触的经历，他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对于农村而言是冲击性的。例如“乌坎事件”中的乌坎热血青年团成员。总之，随着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等的变迁，农民的主体性^①萌发了，各种利益也交织在一起，农村社会以及农民之间的关系复杂起来了。所以说，中共面对的不再是被政治化、同质化的和原子化的农民，而是异质化、相对组织化和理性化的农民。

5.1.3 动员手段

改革开放前，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中共由于领导全国群众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就自然地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者。而在此阶段，中共的领导人大多是由战争年代的革命干部转换而来，他们的执政方略烙下了深深地革命色彩，这在毛泽东的政治领导方面表现尤甚。所以，此时期被称为继续革命时期。因而，在“一元化建构”模式下，基于全能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共采取了控制型和建构型的政治动员手段。这包括单极制度的建立与稀缺资源的控制和封闭性意识形态的塑造，前者是中共可以采取控制性手段的基础，而后者则成为中共建构动员农民的条件。党一元化领导确立了中共政治动员的主体地位、合作化运动与统购统销政策则实现了中共对于农村资源的控制；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和卡里斯玛型人物的权威则建构了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危险和困难，并通过批斗、诉苦等手段和号召忠于领袖等口号发动贫雇农团结起来参与各种各样的运动，实现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可以说，该模式建立在国家对社会全面控制与渗透的基础之上，它虽然起到了规范思想、约束行为、动员力量的作用，但是也扼杀了农民的现代性、民主意识和主动精

一政治亚文化的困扰。在现代化社会中，意识形态在青年人中采取一种激进的形式，是因为他们的认同问题被夸大了，他们的认同选择通常导致文化连续性的中断，并导致多变的、误入歧途的行为。不满于在寻求认同和角色中产生的焦虑，新兴国家中的青年人通常通过对政治体系的反叛来寻求认同。”[美]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青年人如果在政治体系中不能取得认同感，那么他们可能会对既有政治体系持反叛态度。乌坎热血青年团的成员的行动充分表现了这一点。

①农民主体性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农民能够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能充分享受到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和同等的国民待遇；根据自己的需要能够有意识、有目的地自觉地从事生产劳动，有权支配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以主人翁的姿态能动地参与和管理日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务，并与社会其他群体和组织能够取得良好的互动平台；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他们必须获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机会，是社会的创造主体和受益主体的统一。参见王国敏、邓建华：《重塑农民主体性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现代经济探讨》，2010年第9期，第64页。

神，从而达到了一种超高压下的形式上的稳定^①。这种稳定是以牺牲农村发展为代价的，也遏制了农村内部现代性的生长。此为该模式的一大弊端。同时，另一不容忽视的弊端是，该模式由于强调卡里斯玛型领袖的权威，当领袖能够正确决策时，对农村社会发展而言是一种推进；如果领袖决策失误，将会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譬如 1958 年大跃进及其引发的 1959~1961 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是由毛泽东的错误决策导致的。换言之，该模式缺少一个纠偏机制。至此，可以说中共在“一元化建构”模式下的政治动员采取的是控制型和强制性手段，它强调“政治”二字。

改革开放以后，自治、自利与分化成为农村社会的三大特征。农村地区的国家—社会关系进入了后全能主义时期。笔者将此阶段的动员模式称之为“嵌入式管控”。基于此，中共动员农民的手段有所调整，从强制性动员逐渐转变为诱致性动员（即以利益诱导为主要手段），^②它强调“利益”二字。但是，管控思想依然是中共在农村的执政理念。农村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和由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带来的农民思想的多元化，使得农民能够以平等、自由的身份参与农村事务的治理，因此，诱致性政治动员不否认农民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并且还使之公平地表现出来，体现出“平等”与“参与”的特性。所以，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共对于农村地区总体上采取了“少取多予放活”的政策，诸如取消农业税、加大支农资金的投入、实现义务教育免费、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等等。这些经济性措施，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利益需求，从而也就提升了中共在农村地区的合法性。

5.1.4 动员目标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就担负着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双重任务。中共党人通过武装斗争实现了国家独立，但是 1949 年以来国家富强之梦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以，中共在建国之后的政治动员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①周政华：《当代中国乡村政治动员研究——从人民公社到村民自治的历史之旅》，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27 页。

^②诱致性政治动员是社会政治主体为响应获利机会而自发推动和实现的政治动员，是社会的、经济的和心理的旧的束缚的瓦解，以及人们逐渐适应于新方式的社会化和行为的过程，是一种自发的政治动员。参见徐彬：《论政治动员》，《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 年第 1 期，第 21 页。

以及国富民强，这个目标至今也没有改变。但是如何实现现代化，中共的农村政策选择形成了鲜明的前后对比。

“一元化建构”模式下，当时中共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实现民族复兴。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中共实施了“赶超战略”，并仿照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的资金主要就是从农业汲取的。所以当时农村政治动员的目标就是“农业支持工业”，其目的是实现“以农养工”的发展战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通过合作化、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化、支部下乡等措施实现了对农村地区的全面控制。与之相随，国家权力、阶级意识以及中共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也都渗透到农村社会，加之土改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共在农民中的威望空前加强，因而，动员农民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制度和社会心理基础就形成了。这是全能主义政治在农村的具体表现。

随着改革的推进，农村地区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中共虽然通过村党支部实现了组织嵌入，但是它的强制性动员能力减弱，并遭遇着农村新兴精英、农民组织等动员力量增强的挑战。尽管国家政权已经收缩到了乡一级，然而它并没有放弃对村庄的管理与控制，而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利益主体的农民则通过权益斗争和自主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形塑着国家行为，并试图影响国家政策。^①这就是“嵌入式管控”政治动员模式产生的社会基础——国家与社会相互形塑。农村社会的权力权威结构正在重组过程之中，也考验着中共的执政地位。基于此，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开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希图改善农村经济水平和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借此巩固中共在基层的执政地位。然而，这仍然是以经济发展作为获取其执政合法性的措施。如前所述，这些政策并没有落到实处，与中共村级组织的涣散不无关系。可以说，“嵌入式管控”模式下，中共的政治动员终极目标依然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已经发展起来，然后，中共试图通过先发展的工业带动后发的农业，破解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从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其中也暗含着中共对于在农村执政地位日益式微的隐忧。^②

^①周政华：《当代中国乡村政治动员研究——从人民公社到村民自治的历史之旅》，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52页。

^②早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就明确提出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

两种动员模式的区别可以用表 5-1 表示。

表 5-1 改革开放前后两种动员模式之比较

动员模式 比较项	一元化建构	嵌入式管控
动员主体	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	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但受到新兴精英及农民组织的挑战
动员客体	同质化、原子化 且被政治化的农民	异质化、相对组织化 与理性化的农民
动员手段	强制性政治动员 控制型和强制性手段	由强制性政治动员向诱致性政治动员转变，利益诱导性手段为主
动员目标	农业支持工业	工业反哺农业 中共在农村的执政合法性

资料来源：作者自拟。

5.2 两种动员模式的评价

下面，本文将从议题建构、认同聚合以及动员效果三个维度^①对此两种动员模式进行评价。

5.2.1 议题建构的维度

两种政治动员模式的共通之处，就是每一次政治动员都是以某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核心展开的。这无论是在毛时代的土改、三反五反、合作化或是人民公社运动，还是改革开放后农村政策（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与贯彻等都有所体现。

ntent_632254.htm, 2002 年 11 月 17 日。2004 年 9 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 年 09 月 27 日第 1 版。江泽民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文件均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共的执政地位有可能被撼动。

①在此本文借鉴了孔繁斌的研究，参见孔繁斌：《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 年第 5 期，第 80~82 页。

全能主义政治下的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治理方式，主要目的在于提取人力资源，为领袖设定的政治议题服务。改革开放前的毛时代，农村政策一般是由政治精英（以毛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根据群众路线制定出来，然后再凭借党及其控制的官僚系统发动农民贯彻之。在这种政策议题建构过程中，农民作为一般性群众，由于他们知识文化水平的低下而无法参与到政策议题建构过程中。政治精英则力行群众路线，以求发现群众最关心的和他们的利益诉求，进而形成政策议题。所以说，革命年代形成的政策路径依赖以及在毛时代缺乏民主参与机制的情况下，“人民是被动员来执行党的精英人物已经制订好了的政策，而不是参与制订政策”^①。因而，在“一元化建构”模式下，农民只能是政策的被动执行者。那么，为什么农民会甘愿扮演政策执行者的角色呢？在此时期，政策议题的建构经常采取的方式有：宣传鼓动、受训控制、典型示范、组织控制、蒙蔽性诱导等，但这些形式往往以独创性的象征符号提供给群众。^②党的执政精英也会采取一些惯常的行为利用象征符号的资源，比如，“圣化”动员议题、制造偶像崇拜、强化舆论管制。^③议题建构中的象征符号一般会以崇高的道德作为标榜，例如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政治领导人可以通过给政策增加上一个道德范畴而使政策变得激进”。^④这种激进的政策容易诱发农民的政治热情，再加上中共的组织控制与舆论压力，农民只能充当政策执行者角色。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共的政策基本上得以实现了（譬如合作化运动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完成了），但是这掩盖了农民出于生存道义的斗争^⑤，也累积了农民对这些政策的不满。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的政策议题建构依然有着先前精英决策的路径依赖，突出表现为群众路线的反复强调。但是，随着中共建立村民自治制度、及在思想方面淡化意识形态，它对于农村的控制力已经下降，使得农民的行动、思想

①[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 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46页。

②孔繁斌：《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81页。

③孔繁斌：《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81～82页。

④[美]雷蒙德·塔塔洛维奇、拜伦·W. 戴思斯：《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⑤关于农民对与中央政策的反抗，可以参见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也更加自由。农民开始有了自主管理村务的意识与行为，比如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一事一议”制度^①。此时期，政策议题的构建开始形成一种趋向：不再以牺牲农村利益为代价，而是以推动农村发展为引导制定公共政策，^②并且政策的道德标榜也淡化了。与此同时，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单纯的政策执行者，而是具有了影响政策制定的意识，虽然他们的能力还不足以影响决策。^③在村庄内部，作为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和宣传者的党支部，无可争议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它仍然影响和控制着村内事务的管理。村民自治制度的虚化，使得农民并没有更多的渠道能够影响到村务的管理，由于掌握政策信息的不对称性，他们往往是受精英群体的影响较大，村庄公共决策实质处于一种行政主导和精英控制的逆选择状态^④。所以说，在“嵌入式导控”模式下，政策议题的建构依然受制于党支部等精英团体，虽然以农村发展为导向的公共政策议题出现了，但是农民依然缺乏影响农村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和能力。

5.2.2 认同聚合的维度

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动员客体对于动员主体意识、观念及权威的高度认同。认同度与政治动员效果成正相关关系。如果说，政治精英的政策议题建构是自上而下的，那么政治精英预期目标的实现还需要自下而上的认同聚合的集体行动的支持。认同聚合意指具有不同思想和组织身份的人能够就某项议题达成一致和同意。聚合行为的形成过程一般有五个阶段：聚焦、第一次冲动、社会助长、循环感染、群体激动；同时，动员中认同聚合行为受权威、说

①相关报道和研究可参见李存才：《公共服务解民忧 一事一议暖民心》，《中国财经报》，2012年04月14日第1版；陈潭、刘祖华：《迭演博弈、策略行动与村庄公共决策——一个村庄“一事一议”的制度行动逻辑》，《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6期；刘祖华：《农村“一事一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②1982年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发布有关农业的第一号文件，这体现出中共对于农村发展的重视。

③在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地方政府的政策，这在农村土地政策方面表现尤甚，像乌坎村村民是以游行示威、暴力冲突寻求收回盗卖的土地，有些农民则采取了自焚等自残行为。这些虽然不是常规化的方式和手段，但是这也对现今的政策议题构建起到了警示作用，督促政府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地吸纳民意。

④相关论述可参见陈潭、刘祖华：《迭演博弈、策略行动与村庄公共决策——一个村庄“一事一议”的制度行动逻辑》，《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6期。

服和交易三种机制的影响。^①对于农村社会而言，认同聚合指的是农民能够围绕某项政策或者事情解决方案达成一致和同意；集体行动则指向农民认同政策议题、服从权威并改变自己行为以贯彻政策的活动与过程。下面就两种动员模式下的认同聚合进行分析。

在“一元化建构”模式下，其政治动员建立在“党与群众”关系下的各种运动。卡里斯玛型的领袖借用共产党内部的官僚制架构充分发动农民群众。由此，该模式下中共的认同聚合分成两种：对于官僚系统的认同聚合与对于农民的认同聚合。由于两类群体的人员构成不同，因而两类认同聚合的方式方法迥然相异。在政治动员体系中，官僚群体是组织、发动群众的主要力量，因而提升他们的认同度，让他们进入运动就很重要。建国后，中共通过一系列的整风整党活动^②加强了党的领袖对于整个党组织的控制，不仅体现为思想控制，还表现为组织控制，同时也就形成了党内官僚制下的压力体制^③。在这种压力体制下，

^①孔繁斌：《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82页。

^②整风，即整顿党的作风。是在全党范围内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的一种形式，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干部或党员的思想和工作作风进行的全面整顿。通过整风，纠正各种不良作风和现象，统一思想，进一步实现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整风，是1942年到1945年初毛泽东倡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有1950年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整风运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不久发展成为整风反右运动）。各次整风，除了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整顿外，一般也包括对领导机关的思想作风进行整顿。整风的内容，主要是反对和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要错误思想倾向，纠正不正之风，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整风的方法是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总结检查思想和工作，纠正错误的思想倾向和作风，提高思想，端正思想作风。载于“人民网党史百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73273/10415310.html>。

整党，即整顿党的组织。建国后，我们党主要经历了三次整党活动。分别是1951年至1954年的整党运动、1969年至1971年的整党建党运动和1983年至1987年的整党运动。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整党的步骤，一般是从中央到基层组织，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整顿。整顿党的组织有两种情况，一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如1951年到1954年进行的整顿党的基层组织运动；一是对从党的领导机关到基层组织的各级组织的整顿，如1983年到1987年在全党范围内自上而下分批分期进行的全面整党。整党与整风的区别在于，整风主要是整顿党内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风，而整党则除了整顿思想工作作风外，还要进行组织整顿，纯洁党的队伍。整党的方针和做法同整风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整党整风都要贯彻执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都要以学习文件、提高思想作基础。但是一般说来，整风除特别突出的问题外，不对党员作组织处理，而整党则要讨论并决定对不合格党员的处理问题，借以纯洁党的组织。载于“人民网党史百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73273/10415313.html>。

^③此种压力体制不同于改革开放后自上而下的官员考核压力，而是出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权威以及严密的组织纪律的压力，如果你不听毛及党中央的指示，轻则会被纪律处分，重者则会被看成是阶级敌人乃至清除出党。比如大跃进运动中，基层官员为了迎合党中央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而不得不浮夸粮食产量，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现象。当然了，这种压力体制也为官僚人员提供了升迁的机会，也是激励官僚们认同聚合的重要因素。

中共得以凭借官僚群体发动农民。从规训^①视角看，中共采取了主义—思想的规训、组织—身体的规训、指标—行动的规训。^②而对于农民而言，中共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政治社会化、政治管制和隐蔽性诱惑。^③不论是对官僚群体的规训，还是对于农民的“教化”与管制，这都基于全能主义体制下的中共对于官僚系统和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在动员中权威、说服的手段被频繁使用。在该政治动员模式下，由于缺乏真正体现公民权的参与和代表，因而也就缺乏对整个制度的忠诚。^④可以说，在全能主义政治下群众的认同聚合具有双重效应：统治集团暂时获得了革命或激进发展所需要的资源配置模式；大众则为免于身份剥夺带来的边缘化、异质化的恐惧，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政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⑤“在极权的社会中，政治冷漠可能是阻止这种制度完全成功的主要障碍。……缺乏参与和代表也反映缺乏有效的公民权，因而也缺乏对整个制度的忠诚”。^⑥这种重视义务而忽略权利的体制，特别是暗含暴力色彩的阶级身份管制机制，虽然形成了动员议题下的高度一致的认同聚合行动，但是这种一致性却具有难以摆脱的脆弱本性。例如，当小岗村 18 名村民实施土地大包干之后，人民公社制度

①规训一词是由福柯提出的。在西文中，这个词既可以作名词使用，也可以作动词使用；它具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训戒等多种释义，还有“学科”的释义。福柯正是利用这个词的多词性和多义性，赋予它新的含义，用以指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福柯认为，规范化是这种技术的核心特征。福柯关于规训的论述请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元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三部分第一、二章。关于规训一词的释义参看该书的译者后记。

②主义—思想的规训指的是用意识形态规训思想；组织—身体的规训指的是威权（集权）组织形成了从中心向边缘扩张的二重结构，越是靠近组织中心，就越是不能直接接触到外界的现实感觉，同时，组织的纪律网络也形塑着官员的身体：忠诚权力核心的指令和来自晋升竞争的相互监视，迫使科层网络中的官员在政治动员中卖力完成动员的落实；指标—行动的规训是指：动员中官员完成指标的状况总是评价其政绩的依据，也是经常被用来作为考验其政治信仰的依据。一旦官员由于抵触情绪或动员执行不力，来自权力核心的惩罚足以使其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相反，如果民众不能被真实动员起来实现动员议题规划的目标，而又要规避纪律严惩，制造虚假动员成效也就成为动员压力下官员惯用的策略。孔繁斌：《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83页。

③政治社会化：是一次在政治文化中剔除世俗性、多样性，进而谋求“划一化”的同质社会的规训活动，它提倡道德化的意识形态；政治管制，实现了“对所有人在所有方面不断进行支配”，有效地政治管制造成了最有利于政治运动的政治生态；对政治组织的绝对垄断和迫使群众原子化；隐蔽性诱惑，是指在政治动员中，总有种种针对大众社会心理的隐蔽性诱惑——政治领袖提供给大众的“想象性公共品”，而农民为了生存下去，极易被诱惑触动，加上政治精英的操纵，时常被卷入政治动员之中。孔繁斌：《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83页。

④[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⑤周政华：《当代中国乡村政治动员研究——从人民公社到村民自治的历史之旅》，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页。

⑥[美]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迅速地瓦解了。

在“嵌入式管控”模式下，中共不可能再像改革开放前对农村社会实施全面控制。由于选举制度的建立，村庄内部的精英与群众之间出现了一种平等的趋向，至少从法律上出现了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民意必须大体上被看作一种潜在的权威”^①的相关规定^②。此时期由于政策议题建构主要是以利益为导向，农民主要是根据自身生活条件和福利的改善，来做出是否认同政策议题的选择，因为“人们所有持有的政治理论，都是他们的财产利益的情绪反映”^③。“乌坎事件”中的村民提出民主、保障人权的政治口号就可以充分体现之。从某种程度讲，此时期农民认同聚合的实现依靠的是混合权威。既有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官僚制权威、也有村民自治法的法律权威，还有先富能人新兴精英的权威，以及宗族等农民组织的权威等。此四种权威杂糅在一起，共同作用于农民的认同聚合，外在表现就是农民在某些问题上越来越难以达成一致。^④伴随着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的收缩，中共虽然还有控制农村的路径依赖，但是它已经不能再对农村实施全面掌控，因为村党支部的权威日益受到来自村庄内部的挑战，其中包括日益萌发公民意识的农民、新型农村精英，还有宗族等农民组织。面对如此复杂的利益格局和治理情势，中共越来越多地采取交易的方式聚合农民的认同，^⑤因为保守的农民对于眼前利益的得失比较敏感。这就赋予了此时期农村政治动员中利益的讨价还价的色彩，提升了农民的自主性。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共对农民的认同聚合愈发困难，但是在党内的认同聚合能力依然很高，这源于中共内部官僚的压力型体制以及升迁的激励，但是该情况很容易导致脱离群众的政治动员。

①[美]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0页。

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曾这样阐明该法的立法目的，为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就体现了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要体现农民意愿，由农民自主管理。

③[美]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0页。

④乌坎事件中被村民选举出来的林祖恋在当政一年后就非常后悔，因为村民在如何收回被盗卖的土地问题上基于各种考虑开始分化，甚至再一次冲击村委会。参见唐逸如：《当民主理想照进乌坎现实——独家对话乌坎村支书林祖恋》，载于“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tang-yi-ru/2013_04_02_135874.shtml，2013年4月2日。

⑤例如，乌坎村的前任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就通过在村内兴建基础设施而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村民的认同。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工业反哺农业”、“新农村建设”等政策的出台，也都体现了中共中央希图用经济发展换取农民的认同。

5.2.3 动员效果的维度

不同的政治动员模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主要表现为对农村社会的塑造、政治过程的建构以及农村政治文化的培育。

在“一元化建构”模式下，政治动员造成的结果就是农村组织、舆论宣传、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高度同质化。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无一例外地实施人民公社制度。高度同质化的结构标示着社会的模式化与样板化。中共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贯彻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农民个体就变成了国家实现宏观远景的一个工具。比如中共为了实现钢产量的赶超而发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有些村民甚至把生活中用的铁锅铁盆拿来炼钢。由于强制性政治动员的集中统一性，道德和行为的要求已经有了明确性要求，即遵从领袖和党中央的指示。对此，农民无法也无需进行比较和选择，因此该模式下的政治动员结果比较统一。当然，这种统一是一种形式上的。而这种动员结果的出现正是基于农民是“工具人”的基本假设与全能主义政治。从政治过程看，由于动员是由中共单方面发动的，相对于农民而言它是外在的、被动的过程与行为，因而农民不能够发挥其主体性，从而造成了单向、被动的政治过程。由于农民在政治动员中缺乏主体性，积极性也被抑制，他们的行为受制于党的领袖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与政策，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出于生存道义而选择了从众，因此也就造就了一种“臣民政治文化”^①，这是该模式对于农村政治生态的影响。

“嵌入式管控”模式下，农民的同质化特性正在消解，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政治意识等业已出现了快速的分化，从而在农村公共生活中呈现出选择性与多样性。这与农民自主性的提升、社会的开放性是分不开的。此阶段，政治动员的内容和方式也开始变得多样化起来。从表象上看，政治动员结果不统一，其效力亦在消减，但是这种政治动员的复杂性有可能成为制度变革的根基。^②进入后全能主义时期，在农村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格局，中共也开

^①阿尔蒙德和维巴首先划分了政治文化的三种纯粹形式：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参与者政治文化，然后他们认为三种文化是相互融合与渗透的，又区分了村民—臣民文化、臣民—参与者文化与村民—参与者文化。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8、21~24页。关于臣民政治文化的含义参见该书第18页。

^②在浙江温岭有着一项制度创新，即民主恳谈会。温岭民主恳谈会的雏形，是1999年的“农业农村现代

始调整全能主义时期的做法，在尊重农民首创的前提下推行制度变革，并且采用利益导向的诱致性政治动员来发动和号召农民，以实现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此时期政治动员结果显现出异质化的特征，这源于农民的分化，也符合了农民作为“经济人”的基本人性。同时，此阶段，政治动员的主体和客体均开始多元化，而且中共及其他动员主体主要是以诱发农民的“利益需求”来激发他们的主体性，此时的政治动员对农民而言是内在的和主动的，因此，双向、互动的政治过程就开始显现。“乌坎事件”中的重新选举就体现出了这一特征。在双向、互动的政治过程中也就促成了农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农民中的一部分基于经济自主有了民主参与意识，但是大部分农民还“继续取向于命令主义的政府结构并具有一套相对消极的自我取向”^①，于是农村政治文化开始由臣民政治文化向臣民一参与者文化^②转变。两种动员模式的评价可以用表 5-2 表示。

表 5-2 两种动员模式的评价

动员模式 评价项	一元化建构	嵌入式管控
议题建构维度	精英主导、群众路线，农民作为被动接受者，积压了对政策的不满	精英主导的路径依赖，农民有了参与意识，但是村庄公共政策仍处于一种行政主导和精英控制的逆选择状态
认同聚合维度	对官僚干部的规训、对农民的“教化”与管制，政策的道德标榜，常采用权威、说服的手段，导致农民对制度的不忠诚	精英与农民之间出现了平等的趋向，农村政策议题建构以利益为导向，四种权威聚合着农民的认同，党组织内部官僚化的动员能力依然强劲，导致了脱离群众的政治动员
动员效果维度	中共凭借国家权力塑造了农村社会，形成了单向、被动的政治过程，培育了臣民政治文化	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之间相互形塑，出现了双向、互动的政治过程，促进了臣民政治文化向臣民一参与者文化的转变

资料来源：作者自拟。

化教育论坛”，其创意在于变“干部对群众的说教”为“干部与群众的对话”，现在已经扩展到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了温岭恳谈模式。关于温岭模式的介绍和研究可参见慕毅飞、陈奕敏：《民主恳谈：温岭人的创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①[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②此种政治文化的含义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4页。

5.3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是围绕着前面所述的两种政治动员模式进行了比较。首先，本文从政治动员模式的构成要素——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手段及动员目标比较了两种动员模式。通过比较发现：动员主体方面，两种动员模式中均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并作为动员主体，在“嵌入式管控”模式中党的一元化领导正受到挑战；从动员客体看，“一元化建构”模式面对的是同质化、原子化且被政治化的农民；“嵌入式管控”模式面对的是异质化、相对组织化与理性化的农民；在动员手段方面，前者属于一种强制性政治动员，常采用控制性和强制性手段，后者属于由强制性政治动员向诱致型政治动员转变的过渡阶段，开始以利益诱导性手段为主；从动员目标考察，前一种动员模式以“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战略为目标，后一种动员模式则以“工业反哺农业”为动员目标兼具提升中共在农村的执政合法性。

然后，本文从议题建构、认同聚合以及动员效三个维度对两种动员模式进行了评价。从议题建构维度看，“一元化建构模式”表现出精英主导、群众路线，农民作为被动接受者，积压了对政策的不满等特征，“嵌入式管控”模式则体现了精英主导的路径依赖，农民有了参与意识，但是村庄公共政策仍处于一种行政主导和精英控制的逆选择状态等特点；从认同聚合维度看，前者的特征主要有对官僚干部的规训、对农民的“教化”与管制、政策的道德标榜、常采用权威与说服的手段、导致农民对制度的不忠诚；后者的特点为精英与农民之间出现了平等的趋向、农村政策议题建构以利益为导向、多元化权威聚合着农民的认同、党组织内部官僚化的动员能力依然强劲，导致了脱离群众的政治动员；从动员效果看，前一种动员模式下中共凭借国家权力塑造了农村社会，形成了单向、被动的政治过程，培育了臣民政治文化；后一种动员模式中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之间相互形塑，出现了双向、互动的政治过程，促进了臣民政治文化向臣民一参与者文化的转变。

第6章 从革命到治理：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的重构

现代化中国的政党和政治体系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动员农民提供制度化的框架。

——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①

不管未来的社会是根据什么路线加以组织，它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最终仍会存在下来的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②

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面临着重构。因为在党、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农村社会的分化与自主力量的增强，已经对中共“嵌入式管控”的政治动员提出了挑战。日本是东亚地区较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自民党“一党独大”时期，成功地实现了城乡同步发展，并且保持了农村地区的基本稳定；而且从政治结构上看，中共的一党执政体制与日本“五五体制”的党政关系有着类似之处，这就为两党之间的比较与借鉴提供了可能；除此之外，中日两国的农村社会均是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基于上述三点，自民党的农村动员体制可以为中共重构农村政治动员提供一定的经验与启示。未来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关键是实现国家对社会的“嵌入性自主”，达到国家与社会共治的局面，而这需要中共在向执政党转型的基础上，培育农民组织以形成农民利益共同体并进行农村公民文化建设，建构政策合议机制以形成协同治理的格局。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页。

②[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6.1 自民党的农村政治动员——以“不买《读卖新闻》运动”为例

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城乡同步发展，避免了经济增长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日本实现均衡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自民党将农民有力地整合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一方面利用农民，另一方面也为农民服务。其中，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自民党就是通过农协的组织机制将农民紧密地团结在它的周围。

下面本文就以“不买《读卖新闻》运动”为例，分析农业政策领域中自民党与农协之间的协同机制以及它的农村政治动员机制。^①

6.1.1 “不买《读卖新闻》运动”概述

“不买《读卖新闻》运动”是战后日本米价运动中的一个插曲，与该国的粮食管理制度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先对战后日本的粮食管理制度做简要介绍。

1、日本的粮食管理制度

大米作为日本国民的基本食粮，在农业生产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1922年4月（大正十年）就颁布了《米谷法》，此后历经1933年11月（昭和八年）的《米谷统制法》、1939年的《米谷配给统制法》、1942年的《粮食管理法》。1942年1月24日，当时的井野农林大臣关于《粮食管理法》做出了这样的提案理由说明：“米麦的国家管理绝不单单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我深信将其制度化是当务之急。为了能让农民安心生产主要粮食，他们生产的米麦必须由政府购买的情势亦需明确，进而保障国民的基本粮食和国民经济的安定。”^②1942年起，出于战争的需要，大米已经完全由政府收购和销售了。政府企图借统制政策来保障粮食生产供给和粮价的稳定，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①关于“不买《读卖新闻》运动”的介绍参见田中豊稔：『生きている農協史』東京：家の光協会，1976年第108～115ページ。同时，该部分内容已经刊载于李汉卿：《日本农业政策过程中的协同机制——从“不买《读卖新闻》运动”谈起》，《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3期，第37～43页。

^②桜井誠：『米価政策と米価運動』，東京：全国農業協同組合中央会，1977年第1～2ページ。

自此直到 1969 年大米自由流通制度产生时，种植大米的农户负有将大米出售给政府的义务，而其他人或者组织不得私自购买销售大米。在战后初期，由于日本国内粮食极度短缺，粮食统制政策进而加强，先有农业会承担粮食统制政策，后有农协负责实施该政策。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特别是 1967～1968 年连续两年实现了粮食年产量 1445 万吨的高峰。与此同时，日本国民对大米的需求也日益减少。因此日本国内出现了大米生产过剩的情况。政府由于要对农业生产者提供大量的种植补贴，日渐不堪财政重负，开始考虑制定大米的自由流通制度。1969 年开始实施大米自由流通制度。虽然从字面上是自由流通，但是这种流通体制仍要受到政府规制，每年生产的大米只有一部分可以自由流通，而且实行政府管制价格与自由流通价格的双轨制。直到 1995 年《主要粮食的需求供给及价格稳定法》（简称《粮食法》）出台以后，大米才真正成为自由流通的商品。至此可以得出，日本的粮食管理体制可以分为：1945～1967 年的米不足时期、1968～1995 年米过剩时期及 1995 年粮食法时期三个阶段。

“不买《读卖新闻》运动”发生在 1968 年，处于从米不足到米过剩转变的时期。自从 1947 年农协成立执行粮食管制政策始，农民及农协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米价一直处于高位。按照粮食管理法的规定，米价实行年审制，即由政府参考每年的家庭支出、物价及其它经济情况并出于稳定家庭支出的考虑而通过政令的形式确定。政府在制定米价时，并不是单方面的行为，而是要召开依据法律组建的米价审议会^①（1949 年第一次），听取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之。随之在每年的米价议定过程中，农协积极参与并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买《读卖新闻》运动”就发生在 1968 年的米价审议过程之中。

2、“不买《读卖新闻》运动”的基本过程

“不买《读卖新闻》运动”事件^②可以看作是 1968 年米价斗争的副产物。1968 年 8 月 12 日，恰逢米价斗争陷入僵持阶段之时，《读卖新闻》的晨报用一整版面刊发了一篇题为《收拾农业团体的机会》的文章，报道了农协中央部的“软弱”。据其报道，有关阁僚、自民党党首以及农业团体干部之间斗争的结果是农协放弃每石 21000 日元的米价，转而接受上涨 5.8%（20 650 日元）的妥协

^①1949 年举行的第一次米价审议会有 32 名成员，分别是农业团体代表 11 人、消费者代表 5 人、经济届的代表 2 人、国会议员 8 人以及大学教授 6 人。按照规定，米价审议会接受物价厅长官和农林省大臣的监督。

^②该事件的内容参见田中豊稔：『生きている農協史』，東京：家の光協会，1976 年第 108～115 ページ。

方案，自民党“米对策协议会”也改变了自身的意见。^①

因这篇报道而起的激愤传到了地方实力集团（以农协为主体的农业团体，笔者注），全国中央会（简称全中）的宫胁会长等十几名农协干部也到《读卖新闻》本社提起抗议，并要求面见小林副社长，但是该社的政治部长和经济部长均回答副社长与编辑局长都不在。农协要求“订正没有根据的报道”、“明确报道的出处”以及“与记者和我们对话”等；反之，读卖新闻则认为“不能公开材料来源”、“因为是取自于可信的材料，确信之后才刊出”、“意见作为建议可以接受，但是进一步调查则需依据社会权限处理”而拒绝修改报道。第二天，全中的吉田农政部长打电话给《读卖新闻》报社要求回答之时，中村政治部长则不客气地回复道：“这是基于事实的报道而且也有证人，不能取消报道。”对此，农协决定采取不买该报纸的强硬措施与其对决。

然而，问题在于政府、执政党与农协米对策中央部举行高层会谈时，内阁官房长官木村也在场。这条消息即出自此人，并且他言明可以出面作证。这也是读卖方面如此强硬的原因所在。实际上，事实的真相是一种抽象说法，即有关会谈的内容与会方都表示接受。日本各大报纸都在报道宫胁会长是受佐藤首相的邀请而与其会见，并极力批判“综合农政”。但是，《读卖新闻》则报道宫胁会长向首相陈情希望能推进综合农政，好像要与其他报纸做相反的报道。偏信于政府官员的《读卖新闻》报社显然有失公正，进而招致农协的不信任。甚者，如此偏向政界、财界的有关米价的报道，不仅限于《读卖新闻》一家而是渐渐成为大众媒体共同的倾向。特别是在此次米价审议会的成员中，与媒体有关系的委员占了22名委员中的9名，而被称为“媒体米审”。各大报纸开始宣传抑制米价、修改废止粮食管理制度等。

与此相对，农协“与媒体对决”的态度迅速地强化起来。在米价决定后的8月21日召开的都道府县米对策本部部长会议上，农协决定了发动“不买《读卖新闻》运动”的几个方针：第一，中央和地方的农协组织从9月1日起不再订阅《读卖新闻》；第二，动员农家从10月1日起不再订购《读卖新闻》；第三，农协系统组织从9月1日起终止在该报纸的广告。还要动员系统内的企业也不在此报纸上登载广告。^②此次“不买《读卖新闻》运动”，由都道府县农协向基

^①田中豊稔：『生きている農協史』，東京：家の光協会，1976年第108ページ。

^②田中豊稔：『生きている農協史』，東京：家の光協会，1976年第111ページ。

层农协发布指令，基层农协再动员农家。尽管在宫城、长野、广岛、大分等县的运动比较强烈，但是由于有些府县农协未能将运动指令执行到末端，因而没有形成强势的全国性运动。

与此同时，作为对抗的手段，《读卖新闻》在各个支局组成了“农协特搜班”专门搜集农协的弱点及其不公之处，并准备反农协的纸面宣传。“特搜班”甚至调查全国联、县联干部的女性关系等，开展对农协干部的精神战。农协与《读卖新闻》面对此情况，双方又走向了妥协并缔结君子协定而达成了和解。

“不买《读卖新闻》运动”表面上看是农协与媒体的对决，实质上是农协与媒体背后财界的对决。以此为契机，农协明白了不买运动虽然是米价斗争的一环，但是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大众启蒙运动渗透到农村的末端是很有必要的。不是直接执行中央和都道府县米对策本部的指令，而是要通过所有与农协有关的集会——部落座谈会等让一家一户明了不买运动的意义。所以，此次运动中农民不是出于对农协讲信义而不买《读卖新闻》，而是被赋予了“批判的眼睛”自觉地不买。加之此次运动不是依靠自上而下的指令，而是由于自下而上的团结形成了强大威力。因而可以说，农民的团结使得农协系统组织获得了超乎一般的力量。

3、农协参与农业政策何以可能

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农协已经成为农业领域最重要的压力集团。“不买《读卖新闻》运动”只显示了农协实力的冰山一角。那么它何以能够拥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呢？农协内部完善的制度设计与体系化的组织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农协的内部制度设计

农协的内部制度是依照《农业协同组合法》（简称《农协法》）设立的。^①依据该法的规定，农协相对独立于政府，其正常经营活动不受干预。从权力配置看，农协内部遵循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权分立制约原则而设立组合员大会（社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其中组合员大会既是农协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农协重大问题的决策机构。从事业运营看，按照是否兼营的标准，农协又分为专业农协和综合农协。目前来看，绝大多数的专业农协也都加入了事业兼营的综

^①相关规定参见『農業協同組合法』（最終改正：平成二四年九月一二日法律第八六号），第十条～第十一条の三十二、及び第四節管理。

合农协。因此，日本的农协是以综合农协为主体的。综合农协围绕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为农户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包括生产资料的购买、产品的销售、信用贷款、农业保险甚至医疗等社会服务。综合农协的多元化事业运营，既满足了农民的需求，又团结了农民壮大了自己。农协的内部制度可以用图 6-1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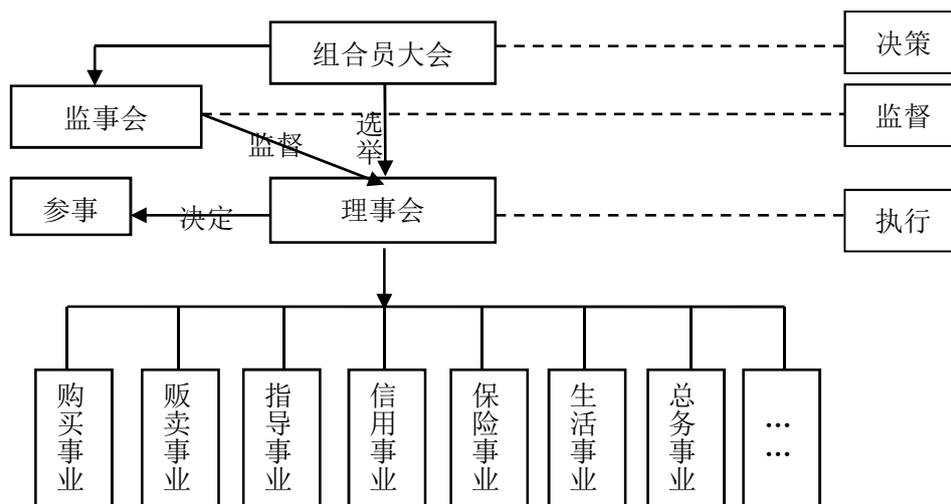


图 6-1 农协的组织制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拟

（2）农协的系统化组织

通常而言的农协是指基层农协，亦称之为单位农协。如果从全国范围看，农协已经形成了市町村—都道府县—全国的三级组织体系，即基层农协（单位农协）、县级联合会以及全国联合会。农协的组织体系可以用图 6-2 表示（见下页）。

在此需指出的是全国联合会。它是农协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组织。农协全国联合会的机构设置可以划分成两类：一类是以行政指导业务为中心的“农协全国中央会”^①，另一类则是以某一特定的业务为中心的各种“全国联合会”。^②县级联合会与之相对应设置。农协全国联合会的活动范围是全国，代表着全国的农业生产者和农协组织，也是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服务机构。

特别是 1954 年成立的农协中央会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农协系统组织的力量，

^①1954 年之前，负责指导农协事业经营及与政府联系的是县级和全国指导联合会（简称指导联）。然而，指导联的作用发挥并不明显。1954 年 6 月，经过长时间讨论，日本政府决定设立中央会以取代指导联。

^②章政：《现代日本农协》，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年版第 9 页。

使农协三级组织成为一个有力的整体。因为农协全国中央会有权协调各县级联合会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作为全国农业生产者的代表参与或影响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这样农协通过各种联合会组织，在向各级成员提供多元化服务的同时，也将政府和农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农协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农业政策的压力团体。作为压力团体的农协，开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农政活动就是米价运动。^①“不买《读卖新闻》运动”就是农协在全国中央会的领导下参与米价审定过程中的小插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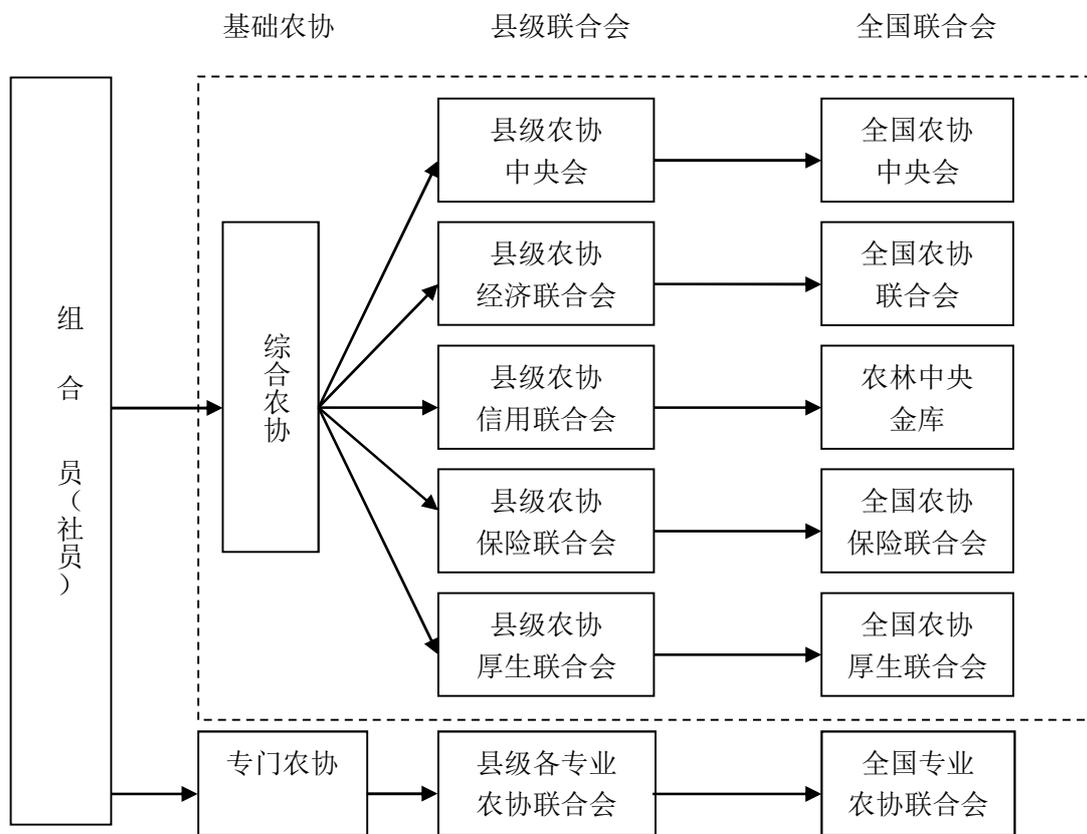


图 6-2 农协组织体系图

资料来源：依据章政：《现代日本农协》，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7 页及刘多田：《日本农协概况》，《合作经济与科技》，2001 年第 9 期，第 4 页修改而成。

^①日本战后米价运动是农协农政活动的重要内容。相关的研究可以参阅：小倉武一：『食糧管理の彼方』，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81 年；桜井誠：『米価政策と米価運動』，東京：全国農業協同組合中央会，1977 年；田中豊稔：『生きている農協史』，東京：家の光協会，1976 年；田中豊稔：『日本の農協——農協二十年側面史』，東京：社団法人農協協会，1971 年；大森真一郎：『米価政策史』，東京：三一書房，1960 年；全国販売農業協同組合連合会編：『昭和二十四年産米に対する米価運動の経過：米価審議会活動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全国販売農業協同組合連合会，1949 年等。

6.1.2 农业政策过程中农协与政府、自民党的协同机制

在战后汹涌的米价运动中，农协与政府、自民党之间曾经出现激烈的冲突，却并没有出现政治失序的情况。这是因为它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协同机制，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三者之间进行着利益博弈与力量的交锋。

1、农协与政府之间的协同机制

1954年6月，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农业委员会法修正案》和《农协法修正案》并获得通过，设立全国农业会议所和都道府县农业会议^①，同时在全国和都道府县的农协组织中设立中央会制度。农协参与农业政策过程的主要途径是：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之时，通过其农业政策机构——农业委员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审议会”，将农协吸纳进农业政策过程中。

日本政府通过全国范围内的三级农业委员会系统组织实现了与农协三级系统组织的对接。在制定农业政策时，日本政府一般要先通过具有行政色彩的农业委员会系统与农协等农业团体共同协商制定，再由农协等农业团体负责实施。这种制度加强了政府与农协、农民的联系，又大大降低了政府政策执行的成本，从而能够有效地获得农民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农协参与政府政策的途径可以用图6-3表示（见下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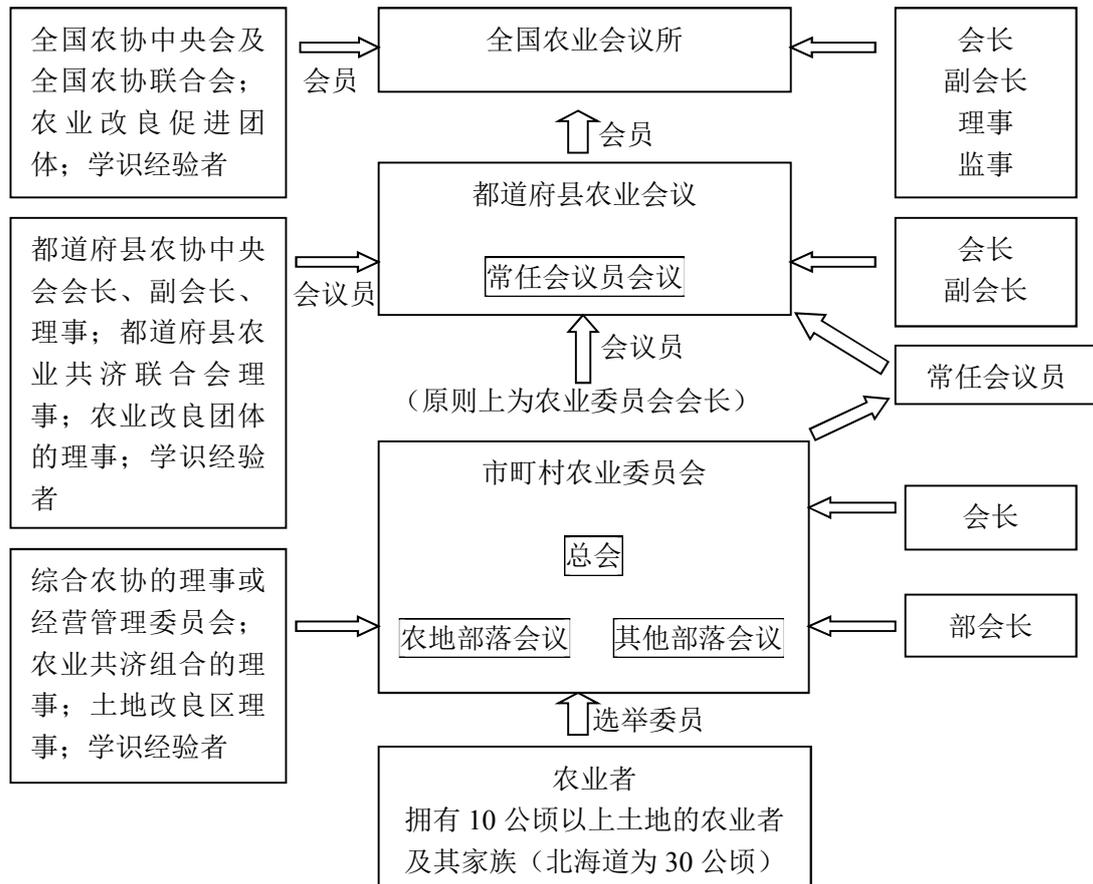
此外，农协还通过参加政府咨询机构——审议会对政策过程施加影响。审议会是日本政府省厅的重要咨询机构，政策课题大都由这些审议会提出。在农业政策方面，农协经常派代表参加“米价审议会”等农林省的政策咨询机构。除审议会这种政府咨询机构外，农林省大臣的私设咨询机构（例如农林大臣的“农业生产对策中央会议”）^②也成为农协参与政策的一个重要途径。农协还采取大众宣传、大众动员（集会静坐、游行示威）、个人联系以及政治捐款^③等方

^①1946年7月，依据《农业委员会法》将农地委员会、农业调整委员会和农业改良委员会三个委员会合并而形成了具有行政性质的农业委员会，首先在市町村建立，而后设立都道府县农业委员会。这次法律修改后，废除了都道府县农业委员会设立了都道府县农业会议，在全国层次新设了全国农业会议所。这样农业委员会就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三级组织，由农业和农民的代表组成而展开活动，其业务范围主要是农地法的实施、农地的有效利用和支持优秀农业经营者，促进农业结构的改善。农协全国中央会是全国农业会议所的会员之一。

^②王新生：《日本的利益集团》，《日本学刊》，1993年第1期，第49页。

^③按照日本法律规定，农协接受政府财政补贴，所以不能对政党或国会议员进行政治捐献。但是农协总是以各种方式（比如以农协为主体组成某政治联盟）提供政治献金。

式参与农业政策过程。这种多元化的政策参与渠道，为农协进入农业政策领域及表达农民利益提供了有效途径。



注：部落是日本农村地区构成市町村的基本单位。

图 6-3 农业委员会制度的结构

资料来源：依据日本全国农业会议所网站制作 网址：<http://www.nca.or.jp/organization/index.html>，2013年4月2日访问。

2、农协与自民党之间的协同机制

在“五五体制下”，农协与自民党基于选票关系形成了政治联盟，进而影响农业政策的制定。

日本农民的集体意识比较强，与农协职员有着固定的联系，而且在生产和生活中有求于农协之处也比较多，所以一般都不敢得罪当地农协，会按照它的暗示去投票。因此，农协在政治选举时号召力很大，而且选票相对集中，可以

称之为“农协总动员式选举”。^①早在1950年代的县知事选举中，农协推荐的候选人几乎全部当选，显现出了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②“五五体制”形成之后，作为日本最大的保守性政党——自民党开始了长达38年的执政，为了稳固农村地区的选票，它与农协之间结成了政治联盟。在选举时，农协动员农家将选票投给自民党；而执政的自民党在制定政策时会向农业和农村倾斜。现如今，农业人口虽不足全国人口5%，但其选出的议员却远超这一比例。^③在日本的众议院，“农林族”议员已经成为特殊的政治集团。^④发展至今，已经与“厚生族”（掌握医疗和养老保险）、“建设族”（掌管各类重大建设项目）共居前列，远强于所谓军工利益集团的“防卫族”。^⑤当选的农林族议员在制定农业政策、农林预算以及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时给予大力支持。日本每年巨额的农业补助金预算就说明了这一点。“如2000年，日本对农业补贴达6.4万亿日元，但同期农业产值只有9.12万亿日元，对农业的补贴率达70%。据统计，日本农业生产者收入总额中有一半以上来自政府补贴。”^⑥日本政府还公开实施农业保护的关税壁垒，例如日本为大米进口制定的关税标准高达750%，这基本上断绝了外国大米进口的可能性。^⑦通过利益返还机制，自民党在一段时期内牢牢把握住了同样具有保守性的农民选票，使得农村成为它重要的票田。

在机构设置方面，自民党总部与农业相关的有两个：政务调查会的政权政策委员会下属的农林部会和组织本部的团体总局下属的农林水产关系团体委员会。前者的主要职能是针对农业政策进行提案，后者的主要职能就是与农林水产团体进行联系，倾听农林水产团体的意见，以取得它们的支持。战后日本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与农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一方面自民党加强与农协的联系，

①徐万胜：《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②关于日本1950年代县知事选举的情况，请参阅功刀俊洋：『1950年代の知事選挙（1～5）』，『行政社会論集』，13（3）、14（3）、15（1）、16（1）、16（4）。

③《日本：自民党执政得靠农协帮忙》，载于“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o/2008-11-09/020714700184s.shtml>，2008年11月09日。

④农林族议员是指因受到农协等农业团体支持而当选的国会议员。他们在竞选过程中受到了农村地区选民的支持，当选后为了保住政治地盘便在国会中为农村和农民利益展开活动。在日本政治生活中，族议员是比较普遍的。相关的研究可参阅猪口孝、岩井奉信：『「族議員」の研究——自民党政権を牛耳る主役たち』，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87年。

⑤刘华：《日本农业罹患“富贵病”》，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1期第85页。

⑥《日本：自民党执政得靠农协帮忙》，载于“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o/2008-11-09/020714700184s.shtml>，2008年11月09日。

⑦刘华：《日本农业罹患“富贵病”》，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1期第85页。

倾听农协等农业团体的意见和要求，另一方面利用执政党的地位，通过自民党的农林部会影响农林省的农业政策和通过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向国会提出相关的农业政策提案，以满足农业团体的利益需求，从而获得农协等农业团体的政治支持。由于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的特点，实际上日本政府的农业政策更多时候是首先在自民党内部讨论决定，再由中央政府的农林水产省负责制定实施。所以，自民党利用这种特殊的体制，在与农协等农业团体加强联系的同时，也获得了长期执政的地位。农协与自民党的密切关系可以从其用语看出，在农协的农政担当部署之间谈到党就指的是自民党，如“递交给党”和“与党协商”等。^①

时至今日，农协仍在日本政治生活以及农业政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以农协为主体的熊本县农业者政治联盟（农政联）是一个拥有 9 万 1 千户的特大组织。由于民主党出身的野田佳彦首相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晚宣布，日本有意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②，农政联在 2012 年 12 月众议院大选之时便推荐了自民党候选人。该联盟认为“我们无法支持积极主张参与谈判的民主党和日本维新会”，联盟干部也表示“我们期待自民党阻止参加 TPP 谈判、阻止减少农业预算，培养新的能挑大梁的人。”^③2013 年 3 月 15 日，当自民党系的安倍晋三首相宣布参加 TPP 谈判时，农协以及一部分自民党党员持强烈反对意见。特别是农协，在全国中央会的领导下，不仅向全国发表了抗议声明，而且召开了反对参加 TPP 谈判的紧急全国集会（4000 人规模，还邀请 184 名国会议员列席），中央会的万岁章会长也召开记者招待会表明农协的态度。与此同时，自民党内部对 TPP 持消极态度的势力也十分强大。自民党内部的“TPP 对策委员会”早在 3 月 13 日晚间就举行了全体会议，并整理出了一份决议。该决议从农产品、工业产品等不同方面，对日本政府在参加 TPP 谈判时提出要求。决议书要求，政府必须“最优先确保”大米、小麦、乳制品等 5 种农产品的利益，而且，如果一旦这些利益得不到满足的话，政府应“不惜退

①大野和興：『農協と選挙』，石渡貞雄：『日本農業年報第 32 集 農民と選挙』収録，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4 年第 71 ページ。

②“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作为在投资、服务等广泛领域追求自由化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框架，原则上要求取消全部关税。由于日本的农业以及保险等行业是受到政策保护的，加入 TPP 后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行业。如果顺利的话，日本将于 2013 年 7 月加入 TPP 的谈判。

③张立：《日本大选：各业界团体均支持自民党》，载于“中国日报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2-12-13/content_7759187.html，2012 年 12 月 13 日。

出谈判”。^①自民党内部反应如此激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加入农协的农民手中握有选票。诚如日本学者山下一仁所言：“尽管现在农家数量日益减少，但是农协仍有近 1000 万的组合员；在实施两名候选人竞争的小选区，农协纵使没有让候补者当选的能力，也拥有使其落选的力量。”^②

综上所述，在某种程度上讲，战后日本的农业政策就是以自民党、农林水产省和农协（农协中央会）三方为主体共同推进的。自民党对官员有力、官员对农业团体有力、而农业团体因为握有选票而对自民党有力，这种关系稳固了利益三角关系。换言之，在农业政策领域，农协与政府、自民党之间业已形成了协同机制，在推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之时，也实现了政治的基本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用图 6-4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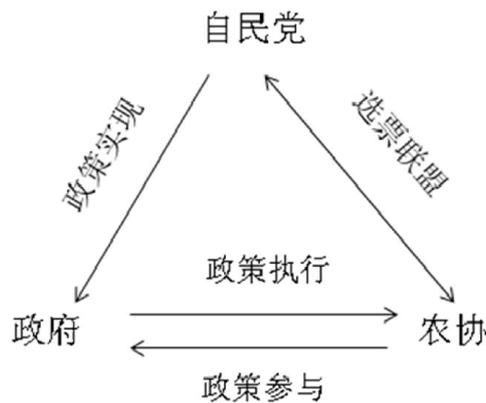


图 6-4 农协、政府与自民党之间的协同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拟

6.1.3 自民党的农村政治动员及其借鉴

“不买《读卖新闻》运动”折射出了自民党的农村政治动员，即基于政治选举与政策过程领域的协同机制，通过利益交易对组织化的农民实施诱致性动员。它的基本特征有：自民党及其主导的日本政府与农民政治参与已经制度化、农民基于民主自愿原则结合成了利益共同体、自民党的农村政治动员属于利益交

^①黄立俊：《日本明日宣布加入 TPP 谈判 农业利益最敏感》，载于“第一财经日报网”，<http://www.yicai.com/news/2013/03/2553351.html>，2013 年 3 月 14 日。

^②山下一仁：『農協が TPP に反対する本当の理由—農業人口 250 万人なのに異様な政治力』，『WEDGE Infinity』（ウェブ），<http://wedge.ismedia.jp/articles/-/2619>，2013 年 03 月 08 日。

易的诱致性动员。下面，本文就结合这三个特征进行分析。

1、制度化的政治动员

昭和宪法的颁布与实施奠定了日本战后民主化的基础。日本农协作为维护农村民主化的主体之一，^①它的建立促进了农民的组织化与政治参与。在民主框架下，自民党为了获取农村选票就刻意拉拢在1950年代县知事选举中初露锋芒的农协，自民党农林族议员的强势就与农协的支持有关，与此同时，它还利用“五五体制”的优势通过其控制的政府向农民提供政策扶持。政府在落实自民党政策之时，并不是单方面的决定而是要通过具有行政色彩的农业委员会系统将农协吸纳进政策过程，除此之外各种各样的政府审议会或者农林大臣审议会制度，均为农业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政策参与的平台。政府官僚和农业利益相关者就凭借农业委员会及审议会的平台，形成了农业政策过程中的“合意空间”^②，它们在这个合意机制中讨价还价、相互斗争与妥协以制定政策。农业利益相关者参加农业政策制定，也有利于他们积极推行该项政策。而对于农协而言，建立之初就已经成立的指导联合会和后来改设的中央会制度，均为农协参与和贯彻农业政策提供了制度渠道，特别是中央会制度的创设促成了农协迅速地成长为有力的压力团体。

自民党农村政治动员的制度化就体现为政治选举和农业政策两大领域。在政治选举中，自民党农林族议员依靠农协获得连续性当选，自民党则凭借农协的支持获得执政党地位；在政策领域，自民党领袖可以在制定政策时向农业倾斜，并在议会表决时由农林族议员提供支持，当政府的农林部门实施农业政策之时通过农业委员会和审议会制度提供了政策参与的渠道，而农协成长为压力团体则会对自民党和政府的农业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并负责某些政策的执行。基于此，自民党、政府与农协之间就形成了协同机制，它们之间相互形构、博弈而推动了农村地区的发展。由此可以说，虽然中日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但

^①农协是在占领军司令部（GHQ）主导下建立的，其目的就是要维护土地改革的目的，保障获得土地的农民以免再次沦为佃农。参见協同組合経営研究所：『農業協同組合制度史（第1卷）』，東京：不二出版株式会社，1967年第177～227ページ；合田公計：『GHQ 占領史の農業協同組合』，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8年。

^②这个概念是由景跃进首先提出来的。所谓“合意空间”是指在政治改革过程中，利益牵涉的各方对于改革的程序与目标达成某种最低程度的共识，在此基础上依次通过互赢、帕累托最优、损失最小化及利益补偿等策略来实施改革举措，最终达致一种互动结果和为大家接受的局面。参见景跃进：《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释与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是政策过程中的“合议空间”的建构和协同机制的形成是可供中国发展借鉴的。

2、民主化的农民利益共同体

作为战后民主化重要内容的土地改革，亦是在占领军司令部（GHQ）的主导下实施的。土地改革将日本幕末以来的地主阶级瓦解了，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同时也对农村的社会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战前日本村落的身份阶层制度随着土地改革而最终解体。土地改革后，地主与自耕农、半自耕农之间的经营差距显著缩小，从经济力量来看二者甚至可以比肩。这样以地主为顶点的金字塔式的农村阶层结构就逐渐解体。^②土地改革后在村落形成了基于土地规模的社会阶层结构，因为土地改革是将地主土地出售给租种的佃农，作为佃农的贫农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土地，但由于其土地经营规模较小可能依然处于贫农的地位。然而，这种差异仅仅是经济水平上的差别。因为地主制的废除和自耕农的创设，使得农民获得了平等地位。这为町村自治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随着村落领导者的遴选由世袭改为从有能力者中选出，而且伴随着村落与诸多农业团体（如农事实行组合等）的分离，村落领导权也在村落和农业团体之间分散，打破了村落权力的一元化。^③

自耕农的形成、农民之间平等关系的出现以及权力的分散化，均为农协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农协成立的初衷就是要维护土地改革的成果，防止自耕农再次沦为佃农，巩固农村民主化的成果。为了实现此目的，GHQ在主导农协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坚持了民主自由主义原则，将农协建构成为基于民主、自愿、互助等原则的经济合作组织。如前所述，农协内部已经形成了决策、监督和执行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民主化运行的制度保障，加之政府对其的有力监督，因此农协的民主化运营能够得以贯彻实施。从纵向看，农协的组织体系也形成了，分别与不同层级的政府相对应，从而发挥不同的功能。随着覆盖全部农家的农协事业的全面性及其发展壮大，农民不仅获得的利益增多，而且愈发地离不开它。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农村社会已经以农协为组织载体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它不同于战前的以身份、血缘和租佃关系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以民主化为原则运行的。这种新型的利益共同体就为政治参与的发展提供了

①相关论述可以参见合田公計：『GHQ 日本占領史——農地改革』，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7年；福武直：『日本の農村』，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

②福武直：『日本の農村』，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第168ページ。

③福武直：『日本の農村』，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第168ページ。

组织基础。加入农协的农民也受到了民主化的训练，从而为农村的政治动员与政治空间的成长提供了社会基础。至此，可以说，强有力的民主化的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是日本农村发展的关键与基础，这方面亦可以成为中国农村建设与发展的借鉴。

3、利益交易的诱致性动员

战后的民主化改革使得日本的国家—社会关系发生了改变，即由战前的国家控制社会模式转变成了国家嵌入社会的模式。^①这种转变就使得日本的国家权力由无限国家转向了有限国家，它对于农村社会的统治也转化成治理机制。在政治选举和农业政策领域，自民党及其主导的政府与强大的农协组织之间进行着利益交易，自民党获取所需的农民选票，而农民获得农业发展的政策。在“五五体制”时期，农林省每年的大量农业补助金预算就是显著表现之一，^②而更使农民受益的则是大米的国家管制政策（由农协统一收购大米再按照米价审议会的价格卖给国家，再由国家销售给消费者）。^③

在日本，保守力量的支持基础原本是处于传统社会的名望家族。战后的农地改革，使得名望家族在村落的支配体制土崩瓦解，代之的是有权力者阶层和干部职员阶层，诸如町村长、町村议员、区长、农协干部、农业委员等等。各种各样的干部和职员通过村落推荐或选举而任命，承担农协和町村的行政工作。反过来，农协则通过部落推举出的农协理事和实行组合长实现对部落的渗透，町村行政则通过区长和自治会长将村落整合进末端统治机构。自民党面对这种情况，则采取经由农协和市町村向农业领域发放大量补助金的手段，重新整合了支持基础。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自民党的集票机制都是如此。^④

①关于日本二战前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可参见李汉卿：《自主与参政：日本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研究（1900～1975）》，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在该书中，笔者以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分析了日本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的不同轨迹，并提出日本国家—社会关系由战前的国家控制社会模式转变成战后的国家嵌入社会模式。

②在日本农业补助金并不是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而是交由农民组织来执行相关的农业政策。关于农业补助金的研究可参见農政調査委員会：『農業補助金の構造』，東京：不二出版株式会社，1965年；広瀬道貞：『補助金と政権党』，東京：朝日新聞社，1981年；升味準之輔：『現代政治1955年以後（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

③关于日本粮食管理制度的论述可参见北出俊昭：『食糧制度と米価』，東京：農林統計協会，1986年；協同組合経営研究所：『農業協同組合制度史（第2巻）』，東京：不二出版株式会社，1968年。

④这种机制在政府政策中被体系化始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1960年代。二战后，日本的农业补助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50～1959年的补助金形成时期；1960～1972年高度增长基础创设和补助金激增时期；1973年高度成长停滞，政府为了缓和对社会的冲击而补助金激增的时期。如在池田内阁的所得收入倍增计划开始的1961年年度预算中，农林水产业的振兴费比前年增加57.6%。参见広瀬道

日本学者山本英治总结出了农民支持自民党的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长期一贯地向农村提供大量的农业补助金，也就是说利益返还系统机能在持续发挥作用。第二就是农业的分散性和农民生活的困窘，使得农民极力想摆脱贫困提高自身生活水平和经济社会地位，这也就促使农民具有了只要能获得好处而不顾政治主体的现实性态度。第三就是日本农村社会还存在着共同体的特性，农民仍然受到村落的共同体关系和统一性的支配。村落作为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只要处理好与村落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关系就容易使得村落全体从属于政治行政，农村传统的文化尤其是价值体系对这种从属关系的稳固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作为官僚机构延伸的自民党通过利益分配控制村落也就不是什么难事。第四，农民具有生产工具所有者和农业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因而具有较为强烈的私有意识，从而体现出较强的保守性。^①山本英治总结的这四个原因是准确的，但是他却忽略了农协在农村票集结过程中的作用。栗原百寿提出了“代理人理论”，认为行政只要掌握了村落经营的上层人物就能确立对村落的支配权。^②综上所述，自民党政府凭借着利益交易机制，通过农协来动员农民以获得农村选票。这是一种典型的诱致性动员，是在民主化基础上的常规动员方式。实际上，在中国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共提出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就说明它开始采用诱致性动员的手段。但是，中国动员效果之差的原因就是缺乏政治动员的制度化途径（抑或说这些制度无法得到有效实施）。随着中国农村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诱致性政治动员将会成为常规模式，但是中共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将诱致性政治动员制度化并贯彻之。

进入“五五体制”以来，在自民党的动员之下，日本的农民实现了高度的政治参与。尽管农民广泛地参与政治，在战后掀起了波涛汹涌的米价运动，然而农村地区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与动乱。日本学者蒲岛郁夫曾对此种的农民政治参与进行了解释：“相对而言，较少受益于经济增长（相对于工业而言农业增长比较慢，笔者注）的农民的高度政治参与非但没有妨碍政治体制的稳定，反而促进了其稳定，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参与不是反体制的而是支持体制的。农民支持体制的政治参与缓和了战后的混乱和伴随经济增长而至的各种对立的要求，

贞：『補助金と政権党』，東京：朝日新聞社，1981年。

①山本英治：「戦後農村票の歴史的分析」，石渡貞雄：『日本農業年報第32集 農民と選挙』，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4年所収第40～41ページ。

②这个论点请参见栗原百寿：『現代日本農業論』，東京：青木文庫，1961年。

进而促进了政治的稳定。”^①战后的民主化和农民更多地（且谨慎地）利用了政治参与的机会，从而促使日本实现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均衡发展。由于农民支持自民党，促进了政治稳定，从而也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了政治所得的再分配，进而形成战后日本的“支持发展参与模式”（supportive participatory model of development）^②。

日本农民具有天然的保守性、被动地接受权威的特点，他们高度参与政治，但并不具备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关心度和信息。他们容易形成被操纵的活动家集团，因而毋宁说，他们是在他人的动员下参与政治的。^③从实际的政治活动看，日本农民高度的政治参与正是通过农协实现的。在“五五体制”框架下，农民借助农协与自民党、政府（确切地说是农林省）之间在农业政策领域形成了协同机制。这种机制保证自民党能够获得大多数农村选票的同时，也实现了农村地区的相对稳定与发展。

实际上，日本自民党、政府与农协之间的关系已经构成了一种国家法团主义^④模式。在国家制度框架内，农协与政府、自民党之间进行着利益博弈与协调，三者之间的合力促进了农村的发展。所以说，“日本政治参与中的社会经济平等和农村政治参与的倾斜度”^⑤才是发展中国家得以实现“经济平等稳定地高速增长”的表率，是值得他国进一步学习的。

6.2 中共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思考

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的重构就是要实现由“革命范式”向“治理范式”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挑战就是中共要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向。可以说，时至

①[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解莉莉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

②[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解莉莉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

③[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解莉莉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④法团主义此一概念，依据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的差异，有两个次级概念，“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前者指的是在自上而下的组织关系中，国家的作用是主要的；后者是指在自下而上的组织关系中，社会力量主导着关系的秩序。参见张静：《法团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在日本政府的农业委员会决策过程中，日本政府与农协的关系体现为一种国家法团主义的模式，体现为国家的制度化。

⑤[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解莉莉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

今日中共内部“以阶级斗争”为内核的革命意识依然存在。^①尽管如此，农村社会的多元化给中共执政地位带来的考验依然存在，中共执政体制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张力。适应农村社会的变迁，进行自我调适以提高执政能力是中共当前在农村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6.2.1 中共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内在要求

对于中共而言，农村政治动员的重构具有双重目的：其一是提升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其二是推进农村的现代化发展。然而，中共领导现代化建设是农村政治动员重构过程中的核心原则。因而，农村政治动员的重构首先需要从如何改进中共的领导着手。应该说，1949年以来中共执政体系中存在的秩序与变革的张力以及它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都提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改进党的领导的问题，这也是中共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内在要求。

1、秩序与变革：1949年以来中共执政的张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的说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以此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早在1945年，黄炎培曾经向毛泽东提出如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理解，此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处理执政过程中的秩序与变革的问题。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表明了中共试图从民主建设入手来构建政治秩序的思考。

1949年后，毛并没有按照回答蔡炎培时的设想来进行国家建设，而是仿照苏联模式（实际上是斯大林模式）建立了集权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的新生

^①例如在“乌坎事件”中，汕尾市市委书记郑雁雄在该事件发生早期就认定有境外敌对势力支持，这说明在中共地方干部中阶级斗争的思想依然很严重。此外，中共在强调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时曾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09月27日第1版。胡锦涛在十八大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中共面临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的考验。这些都表明了中共时刻存在着的阶级斗争的警惕。不可否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可能还将继续存在，但是这种意识对于社会治理会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

色彩，它亟需证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自建立之时就确定了赶超型发展战略，而且这种发展战略的主要手段就是利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手段实施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然后有选择地倾斜发展。当然这种发展模式的前提与基础就是建立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即全能主义政治。建国之初，中共通过国家政权建设、群众运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以及社会的重构（单位制以及人民公社的建立）形成了对国家、社会的全面控制，成功地组建了对中国的领导机制。由此，也就形成了高压下稳定的政治秩序。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并没有什么自由可言，更多的只是响应和服从党中央号召。尽管这种政治秩序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稳定，但是由于其制度化水平低，所以维持成本也是巨大的。仅从人员看，农村地区的党员干部数量成倍增长。建国之后，“仅仅是新增的乡（公社）政府官员即已经使领薪官员人数成几何级数上升。1982年全中国有54325个公社，每个公社10名干部即意味着全中国在这一层次就有55万名国家干部，超过19世纪上半期朝廷任命官员人数的16倍以上。当时每个公社平均辖有13.2个大队，国家机器下伸到这个层次，即使每个大队只有一名官员，其总数将超过百万。”^①这时候的农村秩序维持主要依靠的是基层的党员干部，这种党员干部的控制也有其好处：避免官僚机构的膨胀，并可把行政费用的负担转嫁给当地社会（在公社和大队里，人们常常清楚地区分“吃国家饭”和“吃集体饭”的干部）。^②

进入改革开放，针对当时自由化的思潮，邓小平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提出了“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的观点。^③秩序问题被提到最为重要的地位。再加上中共秩序维护的路径依赖，低制度化、强制性政治秩序的维护机制被保留了下来，一直延续至今。^④党的一元化领导与市场经济建设带来的社会分化的

①[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程洪、李荣昌、卢汉超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7～178页。

②[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程洪、李荣昌、卢汉超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9页。

③《压倒一切的是稳定》（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285页。

④当前有一种“维稳”的提法，即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一些超出法律范围的反抗持不支持甚至强硬打压的态度和行为，主要表现为利用官僚系统控制人们的“非法”反抗。现在维稳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而且表现优秀的可以破格提拔，江西省委组织部在《关于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的通知》中就提出在维稳工作中表现特别优秀的可以破格提拔。参见魏星、叶娜：《十举措筑牢稳定“第一道防线”：我省要求在维稳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江西日报》，2012年02月27日第A01版。相关的研究可以参见谢岳：《维稳的政治逻辑》，香港：清华书局，2013年版；

加剧，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是秩序与变革的张力的外显。为了解决此问题，中共试图构建“学习型政党”^①来适应执政环境的改变。在农村地区，秩序与变革之间的张力也愈加凸显，主要表现为党的一元化领导与农村权威多元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在“乌坎事件”中表现尤为明显。农村社会中的秩序与变革的张力可以用图 6-5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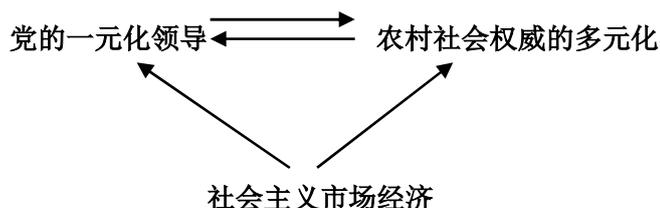


图 6-5 当前农村社会中秩序与变革的张力

资料来源：根据景跃进：《当代中国利益传输机制的转换——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逻辑之思考》，《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2007年第5辑，第73页修改而成。

如图所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分化以及权威的多元化，同时也作用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但是党的领导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原则不可动摇。由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中党的一元化领导与权威多元化的冲突与矛盾是促进中共重构农村政治动员以巩固执政地位的内在动力。

2、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共的现代转型

1949年以来，中共面临的重大变革就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可以说，中共自从夺得全国性政权开始就已经成为执政党，但是由于毛泽东思想观念里革命党思维的根深蒂固以及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中共并没有及时地完成向执政党角色的转换。因而，在建国的前三十年间，中共内部存在着执政党地位与革命党角色之间的错位与冲突。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错位与冲突至今依然困

唐皇凤：《“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应星：《超越“维稳的政治学”——分析和缓解社会稳定问题的新思路》，《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7月下；袁新华：《压力维稳机制下的社会稳定》，《求实》，2011年S1期；于建嵘：《压力维稳的政治学分析——中国社会刚性稳定的运行机制》，《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7/8期合编本。

①学习型政党建设，先是在2003年为了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而提出，而后在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举措加以强调，后来在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又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战略任务再次提出。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指的是在全党营造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积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创新能力，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学习型党组织、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学习型领导班子。其根本目的就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参见《中共中央加强改进新形势下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9年09月28日01版。可以看出，中共官方建设学习型政党目的是要促进党员和党组织的学习能力；但是作为一种学习型组织，学习型政党也应该具备适应外部环境挑战的能力。因此，学习型政党是一个能熟练地创造、获取和传递知识的组织，同时也要善于修正自身的行为，以适应新的知识和见解。

扰着中共执政能力的提升。

具体而言，执政党地位与革命党角色的内在冲突表现为：执政党地位与革命党观念、执政党地位与革命党体制之间的矛盾。^①先看第一种矛盾。中共内部革命党建设思想主要是由毛泽东在战争年代逐步发展而来。建国之后，由于毛泽东成为了中国的领袖，他的革命党观念进而影响中国政治决策，在农村土改、合作化运动、四清运动等群众运动中都可以窥探出革命党的阶级斗争观念。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以“解放”代替“执政”，如1957年3月10日，他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只造就二百多个地质人才，我们解放七年造就了一万多。”^②1962年，毛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等都是革命党思想的畸变。

再来看第二种矛盾。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在革命党观念的指引下形成了革命党体制，从而造成执政地位与革命党体制的巨大反差。在战争年代逐步发展而来的革命党体制，随着建国后阶级斗争的需要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得以强化，主要表现为党政领导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曾经这样分析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③因而，权力过分集中有三个层次的表现：一是横向关系上的权力向党委集中导致的党政不分、党企不分、党事不分以及党群不分；二是纵向关系上的权力向上级和中央的过度集权，导致党内民主发展的迟缓；三是在个人和组织关系上，党组织的权力往往集中于领导者个人，而形成“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④此三种表现有着一种内在的递进关系，即从“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开始并以此为基础，经过中央过分集权为中介，而最终导致党内最高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使党的领

^①该观点主要参考王贵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治成长中的地位转变与角色转换》，《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第26～29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29页。

^④王贵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治成长中的地位转变与角色转换》，《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第28页。

导变成一个人的领导。^①这也就成为了改革开放前“人治”的权力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共工作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并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以及在国家管理层面强调协调有序、和谐稳定的管理模式与采取民主法治的管理手段等诸多变化，成为了推动中共向执政党转型的客观要素。现在中共所提倡的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都属于实现向执政党角色转变的努力。概括起来，无外乎也就是实现与执政党地位相适应的思想理论以及制度机制的转变。

时至今日，中共已经从思想观念上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变。它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1989年6月23日）到十五大（1997年9月12日）以前，提出了强化执政意识，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思想；第二阶段，从十五大开始，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思想^②，随后不久使用了“执政能力”概念；第三阶段，从党的十六大（2002年11月8日）开始，明确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③应该说，中共观念的转变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这也说明它将摆脱革命党观念的束缚，开始走向执政党建设之路。

在关于执政党体制方面，中共也做了一些努力和尝试，主要表现为解决党内权力集中的问题（诸如地方党委副书记专职化与常委分工负责制）^④、党内民主的发展（比如党委决策的民主化、党代表差额选举和试行党代会年会制等）^⑤

①王贵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治成长中的地位转变与角色转换》，《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第29页。

②2000年5月，江泽民在上海进一步将“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明确为“两大历史性课题”。

③石仲泉：《“执政能力”概念是怎样提出的》，载于“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4/2004-09-20/26/486083.shtml>，2004年09月20日。

④2006年，在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过程中，根据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的要求，除民族地区外，各省、市、县三级党委基本上都以“一正两副”模式配备书记、副书记。如果除去担任行政首长的副书记外，常任的副书记基本上设置为一人，称之为“党委副书记专职化”。这种做法意指扩大党委的集体领导，防止党委书记的专断，提高决策的科学化等，因为副书记人员减少，党委常委人数相应增加，并且实施常委分工负责而不是副书记分工负责。参见中共潍坊市委组织部课题组：《常委分工负责 地方党委换届后的重要制度安排》，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9/13/content_5085235.htm，2009年09月13日。

⑤在中共十六大上，党内民主建设被认为是“党的生命”。它主要表现为：一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近年来，中共中央先后颁布制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等。此外还扩大党代表差额选举比例，以便做到好中选优。二是党委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的提高。三是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已经成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必经程序和基础环节。四是党内民主监督的有效性增强。五是基层党内民主形式多样，大多数基层党组织实行了直接选举。六是党代会年会制的试点与推行。尤其是第六点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框架的落实，各级党代会是各级党组织的权力机关，为党员权利的行使提供了制度平台。从十八大开始，中共开始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并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参见胡锦涛：《坚

以及执政能力建设^①等等。这些举措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共向执政党体制的转型，但是只有这些措施的贯彻落实并进一步大胆地制度创新，才可能真正地促成中共的执政党转型，进而成为重构农村政治动员的前提与基础。

6.2.2 协同治理：中共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策略取向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的重构就是它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面对着农村社会的分层与权威的多元化，并借鉴日本自民党的农村政治动员机制，中共也许只有建立协同治理体制，才能够有效地重构它的农村政治动员体系。其关键就是实现国家对社会的“嵌入性自主”，达到国家与社会共治的局面。所以，该体制的构建需要从观念和体制两方面入手，恰好与中共向执政党的转型相契合。这两方面在未来的策略选择上是高度融合、互相促进的。具体分析，它又可以细分为彼此关联的四个转向：一是实现由强制性动员向诱致性动员的转变；二是培育农民组织，塑造新的利益共同体；三是以公民文化建设推动农民主体性的发挥；四是政策合议与协同治理成为农村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

1、从强制性动员到诱致性动员：农村政治动员的变迁

综观 1949 年以来的农村政治动员，它历经了由强制性动员到强制性动员与诱致性动员二者兼而有之的过程。^②在建国的前三十年，中共秉承了继续革命的思想，利用民族主义和革命斗争主义以及群众的概念^③，凭借其严密的组织和强

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新华网”，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_12.htm，2012 年 11 月 19 日。

①执政党建设，其核心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 年 09 月 27 日第 1 版。

②强制性政治动员与诱致性政治动员是由徐彬借鉴了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而提出来的。关于这两种政治动员模式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徐彬：《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21～1966）》，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62～300 页。但是在书中，他将强制性政治动员的客体（人民大众）视作诱致性政治动员的主体，在此笔者不能认同此观点。无论在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种模式下，大众都是处于动员客体的地位。

③[美]邹说：《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4 页。

大的动员能力，将农民个体变成了中共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四个现代化乃至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与此同时，中共通过强制性政治动员发动了社会革命，试图解决1840年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全面危机。它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期望将具有现代性（相较家庭组织、宗族组织而言）但却忽视了农民利益诉求的农业合作社重构了农村社会结构，农村地区前所未有的被格式化了，农民也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整齐划一了。所以说，强制性政治动员利用思想灌输与行政强制等手段将名义上的集体利益替代了农民的个体利益，将农民看作是工具人，从而导致农民对于制度的不满与怨恨；而此种动员方式中的精英—大众二分法抑制了农民的创造性与主体性，也造成了农民的政治冷漠。这在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中可以得到验证。

土地的家庭承包给农民个体利益诉求提供了制度空间，农民的经济人特性被激发出来。在政治制度方面，村民自治的创设就是农民要求自主管理农村事务的反应。然而，与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收缩相伴，农民出现了急剧地分层，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利益需求日益变得多元。如前所述，农民已经分化成九个阶层，农村社会中四种权威交互作用，这就为中共在农村实施诱致性动员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诱致性动员以尊重个体的利益诉求为前提，通过动员客体对于获利机会的响应而实现组织发动。与强制性动员相比，此种动员对于农民的影响的深度与广度都是前者所不能比拟的，因为它是基于人性需求的动员。

从理论上讲，村民自治所建构的政治制度，应该“把价值源泉归结为个人，并成为个人自由地表达偏好，相互交易的场所”^①。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村民自治依然被少数农村精英所掌控，并不能充分地实现农民偏好的表达。这与村民自治制度的虚化、以及农民的大多数仍处于原子化状态和他们基于精英—大众二分的政治冷漠不无关系。随着农民利益需求不断地受挫，他们对基于虚化的村民自治制度选举出来的村两委干部以及他们成为既得利益者充满着严重的不满。“乌坎事件”就是由于少数精英控制村庄导致大多数农民利益需求受阻而引发的。

因此说，在依法治国已成为中共基本治国方略和农民法治观念^②日益强化的

^①[美]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2~380页。

^②关于农民抗争的研究中，李连江、欧博文提出的“依法抗争”概念和于建嵘所提出的“以法抗争”概念均佐证了农民法治观念的增强。徐勇则从国家建构角度，分析了中共法律下乡对农民法治观念的影响。参见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九七效应：香港，中国与太平洋》，香

时代背景下，诱致性政治动员将会成为未来农村政治动员的主导形式（这不意味着强制性手段的放弃，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应该让其成为最后的屏障），但是从目前来看，它依然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与制度机制。中共要想实现农村政治动员的转型，尤其需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2、新型农民组织培育：农村利益共同体的塑造

从世界范围看，农民的组织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家庭的个体经营以及建立在农民原子化基础上的农村社会是脆弱的，表现为：一方面农业生产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求，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农民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就面临着这些难题。从某种程度说，破解这些难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推动农民的组织化。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组织化主要表现为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但是这种组织很难衍生出现代性，它遏制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萌发，只是一种保守农民的自治互助组织。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宗族在一定地区和范围内复兴，并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组织能否衍生出现代性还有待于实践的考验。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种村落内部的“自然”共同体是日趋衰落的，而在国家的社会整合过程中会出现“传统政治社会之外的社会和经济集团”^①。当前，中国农村宗族的复兴，说明了农民再组织化的迫切^②，如果没有其他有效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它的力量还会进一步发展。

除了具有传统特性的宗族组织之外，各种各样的农民技术经济组织以及社区服务组织也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农民技术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老年协会等。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已经引起了重视，中共不仅在国家层次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6年10月31日），而且在组织层面试图将组织体系渗透到其内部（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内设立党支部）。这种举措意在将这些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活动加以规范，并将其吸纳进中共组织体系。目前来看，法律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它已

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第141～169页；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徐勇：《“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①[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页。

②当前农村地区宗教力量的重新介入以及黑社会势力的抬头也从反面说明了重构农民组织的迫切性。

经成为农民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此外，在农村社会冲突中，农民也表现出自发的组织化倾向。^①例如“乌坎事件”中的“乌坎热血青年团”以及“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等组织。

中共面对着多元化的农民组织化趋势，以及村党支部及其外围组织（村团支部、妇联等）的动员能力消减的情况，就需要正视农民组织的发展。在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过程中，中共需要推动新型农民组织的发展并将其吸纳进既定的政治体系中。所以，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需要从执政党思维看待这些农民组织。^②众所周知，革命党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参与革命而夺取的全国性政权。在建国之后，中共则撤销了此项制度，以农民合作社来代替它。至今，中共内部仍然存在着以革命党思维判定农民组织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一是视农民组织为洪水猛兽，担心它们反对政府，所以此种惯性思维的去除是农民组织发展的前提。其二，农民组织不可以从事政治性活动，以此防止出现对现有政治秩序的冲击。比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就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定性为农民经济组织而去工商部门登记，而一改先前的农民社团要去民政部门登记的制度。实际上，农民组织内部不可避免地要有政治性活动，比如农民合作社内部设立党组织、他们向政府反映情况提出政策诉求等等。即使是革命年代的农民协会它首先是经济组织，然后才组织受益的农民参与革命而变成一个政治组织。所以，在看待农民组织问题上，中共需要有执政党思维，提倡对于农民组织的建设性思维，将其纳入法律管理的框架，而不是一味地惧怕、遏制之。如果革命党思维依然存在就会如“乌坎事件”中一样，出现各种的“非法”农民组织。

第二，以农民组织为载体重构农民利益共同体。农村地区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共同体在建国之后就被合作化运动瓦解了，改革开放之后即使宗族复兴也很难再建立起来农民自然共同体，它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温床。那么，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组织缺失和农民共同体亟需重建的局势下，以农民

^①赵树凯曾经通过对《农民日报》刊登的196封农民来信进行分析，指出“组织起来抵制地方社区组织的种种非政策甚至非法行为，已经成为农民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趋向。”参见赵树凯：《社区冲突和新型权力关系——关于196封农民来信的初步分析》，《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2期。于建嵘也对农民集体维权的组织进行了实证研究。参见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基于衡阳农民协会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2期。

^②相关内容可以参考蔡永飞：《以执政党思维看待和支持农民组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组织为载体重构农民利益共同体也许有效选择之一。有研究表明，“极度贫困和落后的原因主要是（但并非完全是），村民们没有为他们的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甚或没有能力集体地创造任何超越核心家庭即时的物质利益以外的利益”。^①日本战后农村社会的转型，从某角度看，就是以农协为载体形成了农民利益共同体以带动农村民主化发展。因此，建立一种“农有、农治、农享”的新型农民组织^②，以及以它为载体形成农民利益共同体，是当前中共整合日益分化的农民利益以及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之一。这种组织最好“是在比较有凝聚力的地方社区由当地人发起并积极参与的组织”^③。

第三，建立与农民组织的功能性联系。日本的经验证明：一个有效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引导农民共同致富的载体，也是协助政府安定农业生产并保证农业政策贯彻落实的重要的“执行机构”。^④也就是说，如果执政党能够和具有经济功能的农民组织建立有机的联系的话，那么不仅能够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而且政党本身也能得到有效的支持，它制定的政策能够得以顺利实施。“如果没有地方组织的广泛参与，任何促进生产力增长和广泛的利益分配的乡村发展战略都不可能取得成功。”^⑤亨廷顿亦曾指出农民组织与政党的关系，“建立农民联合会是一项政治活动，它常常并最有效地是由政党来进行，政党对动员农民的支持感兴趣，并通过农民组织机制将农民紧密地团结在政党周围。实际上，现代化中国家的每一个强大的政党都与一个农民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的组织显然对政党领袖有利，但对农民也同样有利。”^⑥就目前中国而言，农民组织化倾向愈发增强，中共需要在这不可避免的发展潮流中加强与农民组织的联系。日本自民党与农协的关系为中共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也即通过“国家法团主义”模式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在中国指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功能性联系，从而推动农村社会的发展，以此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

①转引自[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②除了日本的农协之外，东亚地区的台湾地区和韩国均设有类似的农民组织，在台湾称之为农会，韩国则称之为农协。

③转引自[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④章政：《现代日本农协》，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⑤转引自[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⑥[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页。

3、公民文化建设：农民主体性的再发掘

依照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现代化的公民文化应该是一种参与者文化为主导的，即社会成员往往公开地取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以及政治的和行政的结构与过程（换言之，取向于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两方面）的一种文化，他们往往取向于政体中自我的“积极分子”角色。^①

众所周知，中国农村地区自古以来就缺乏参与者文化，更多的是一种“忠君”的臣民文化以及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村民文化的混合，即村民—臣民文化。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政治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混合，才致使政治系统得以长期稳定运行。中共早在革命年代就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得农民服从和依附于它的行动与目标。建国之后，中共试图通过引入一种农民集体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来打破农民的分散化，因而出现了“反复灌输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感以及服从中央权威管理的倾向”。^②这种倾向并不否定农民的政治参与，而是强调农民要按照既定的方式来参与政治，即不断响应中共的政治动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在农村地区就塑造出了更为极端的臣民文化。一方面，农民感受到了专业化政府的权威，他们要忠诚于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党中央的指示为行动指南，另一方面，他们也要在中共的动员下积极加入到政治生活中来。这种文化造成了农民的心理冲突：我不愿意去参与，但不得不去，否则我就是阶级敌人。这亦与中共群众路线的片面化有关，即一味贬低农民的主体性，实际上造成了对现行制度的不认同。同时，中共继承了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思想，将农民强化成了阶级主体，而不是享有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体，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保障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民主权利，民主、选举的观念也开始映入农民们的头脑。参与者文化开始在农村社会萌发。尽管如此，农民中的臣民文化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而村民自治则要求参与者文化为主导，因此，中共试图通过村民自治制度改善农村治理的努力屡遭挫折。通过“乌坎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乌坎的村民自治制度已经实施了十多年，但是村民们依然不懂得村民自治、选举的真正内涵。新当选的村党支部书记林祖恋也一再声称村民自治需要有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大

^①[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②转引自[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力支持。这种依靠上级政府介入而维持村民自治制度的想法，可能在一定时间内是有效和必须的，但是从长远看它是对社会自治制度的损害，因为它不利于自主性政治文化的发展。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与政治体系相符的公民文化可以为之提供持续而长久的内在动力。因为公民文化可视为公民们在其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如果公民认可了这种文化，便会遵从这种文化的规范，而基于某种政治文化形成的政治共同体的行为也会步入制度化的轨道以保持持久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公民文化，对于个人来说，控制和指导着有效的政治行为，对于集体来说，提供了系统的价值结构和系统的理性思维结构，这些保证了机构和组织行为的延续性。^①

也许中共内部的一些人士依据革命的经验担心公民文化一旦形成之后，就会招致农民与政府争权、破坏政治秩序的恶果。这实际上仍是一种革命党思维，并将阶级斗争文化与公民文化相混淆。事实上，“‘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入，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所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②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才是未来农村公民文化的主流。农村公民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现代文化，而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结合；它是一种建立在沟通和说服基础上的多元文化，它是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的文化，它是允许变革，但必须有节制地进行的文化”。^③只有确立这种政治文化，并使得农民进入政治领域，在不断尝试和失败的过程中，才能找到表达自己要求的语言和使之生效的手段。“乌坎事件”的重新选举就体现了构建参与式、妥协式、守法的政治文化的尝试。尽管官方声称乌坎的选举只是落实了村民自治法，但是也许村民自治的实施就需要此种政治文化的支撑。

农村公民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农民从阶级主体变成社会主体，让农民成为公民并相应地享有公民权利，从而激发农民主体性，进而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公民文化建设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其所内蕴的平等、自由、契约精神有可能内化为农民的精神；

^①徐大同：《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②余振等：《澳门华人政治文化》，澳门：澳门基金会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③[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二是农村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培育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共享，义务共担的自主性人格，从而与公民文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三是村民自治的政治系统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民主的公民文化；四是农民的流动促成了他们政治意识的变迁，也就改变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社会基础。^①

此外需指出的是，农村公民文化建设，需要在尊重农民主体性的基础上借助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②进行，它的重点是能够形成一个彼此信任与合作的公共领域。这样可以使得农村公民文化深深地植根于农村社会，不至于致使二者相脱节。可以说，公民文化建设为农民组织与中共之间的功能性联系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桥梁，也给协同治理机制的形成提供了社会资本。目前而言，中共需要构建以法治精神为指引的农村公民文化，使之成为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内在于支撑与契合机制，推动内在自觉的法治秩序的形成。这种法治的公民文化有利于中共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

4、政策合意与协同治理：农村政治制度逻辑的重建

从政策角度看，在革命年代形成并被继承下来的群众路线，已经成为中共政策过程的基本方法。如前所述，在群众路线之中存在精英—大众的二分法。中共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它能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并领导只顾眼前利益的群众实现他们的长远利益。

基于这种认识，并且在党、国家和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情形下，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与综合是由各级权力精英（包括党的干部和政府行政领导）进行的。正如胡伟所指出的，“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较低，社会利益的表达与综合并非由各种社会结构来承担，而是由权力精英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而将他们所认定的社会利益输入到公共政策中去。概括地说，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治体系（决策中枢），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来进行利益要求的输入，即‘内输入’。”^③ 尽管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利益表达与综合是一种“内输入”，但是“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共产主义

^①包美娇、章伟：《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公民文化的演进路径分析——台州农村政治参与是如何推进政治文化变革的》，《甘肃理论学刊》，2005年第4期，第85～86页。

^②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参见[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译本序第1页。

^③胡伟：《政府过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宗旨的作用，许多权力精英在决策过程中并非考虑的是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而是按照他们对‘人民利益’的体认来努力体现出一定的社会需要，因而通过权力精英的斗争与妥协，公共政策实际聚合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利益，而不是为权力精英自身着想。”^①

随着中共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以及党对党员的约束力的下降，且缺乏外力监督和有效的外部社会互动的情况下，部分权力精英的主要政策出发点开始转换成“为自己和小集团或统治集团的利益考虑，尽管他们也可能客观上体现出一定的公众利益，但这只不过是其追求自身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的副产品”^②。如乌坎村的前任书记薛昌为了巩固他在村内的地位，也对村庄内部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不论权力精英基于何种目的而制定公共政策，当代中国决策过程中利益表达与综合的主要形式是内输入，即“人民利益”是由“权力精英”所代表的，主要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的妥协与折中。这种内输入的政策过程可以用图 6-6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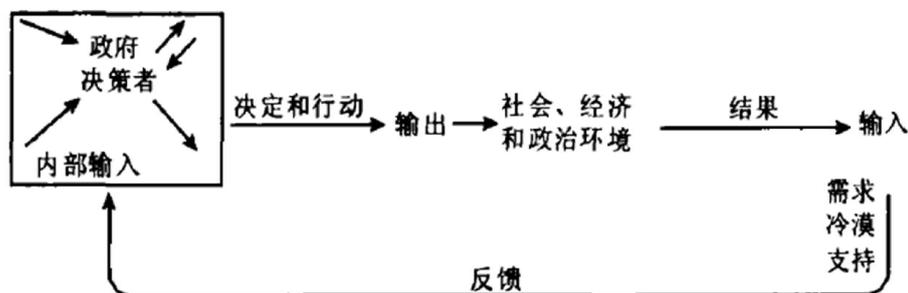


图 6-6 内输入的政策过程

资料来源：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第 6 版），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5 页。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发现在群众路线的政策过程中，决策是权力精英的事情，群众只能是对出台后的政策表示赞成、支持或冷漠。然后，这种群众的反应也会反馈^③给权力精英，从而进入新的政策循环。这正与中共的“从群众中来，

①胡伟：《政府过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83 页。

②胡伟：《政府过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82～283 页。

③这种反馈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以权力精英到群众中开展调查从而发现问题，一种是以官僚机构为载体接受群众的来信来访等反映问题。实际运行中，在调查中上级政府的领导一般会被下级领导蒙蔽；后一种

到群众中去”的精英—大众二分的群众路线相契合。

然而，中国政策过程的最大弊病就在于政策执行后的反馈环节。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互动机制，农民的利益诉求不能有效地反映给政府决策者，造成了政策积怨，从而引发了群体性事件。“乌坎事件”就是由于多次上访未果而引发的。农民的上访行为说明，在村庄内部没有对于决策者的监督制约机制，村民的正当合法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当他们的合法利益受损之时，一般的选择是求助于上级政府而进行上访，甚或采取非法的暴力方式进行反抗，这种行为实际上不利于农村社会自治制度的发展。虽然，网络的发展给公众监督政府提供了一条新的渠道——网络问政，但是对于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民来讲，网络问政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因此，由于农民无法参与到政策过程中，而且政策的执行效果也无法反馈给决策者，就会致使农民正当利益遭到破坏，从而影响农村的政治动员。鉴于此，中共重构农村政治动员体系需要遵从新的制度逻辑，即以政策合意制度构建农村的协同治理机制。

所谓政策合意，也就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者与利益相关者能够在一定的框架内实施讨价还价、相互妥协而达成共识。在政策合意制度的构建中，“合意空间”^①的形成是其基础。“合意空间”的建构就意味着政策过程要由内输入转换成外输入，如图 6-7 所示（见下页）。

应该说，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为农民参与农村事务管理提供了制度路径，而中共对于群众路线的最新阐释^②则为农村政策的外输入提供了指导思想。关于经典群众路线与最新阐释的对照如表 6-1 所示（见下页）。

尽管当代中国的政策过程依然以内输入为主，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由于农民参政能力不高，内输入的色彩就更加浓厚一些。但是，中共在重建农村政治动员体系时需要正视农民的利益诉求并将其吸纳进政策过程，通过政策分配满足农民的需求，保障农村地区的稳定，进而实现自身执政地位的稳固。如前所述，自民党农村政治动员的主要经验就是形成了政策领域的协同机制。那么，基于政策合意制度构建的协同治理机制，也是提升中共合法性、促进农村发展

方式则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中国还缺乏有效的社会互动机制。所以，中国未来政策优化就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互动机制。

①虽然这个概念是有关政治改革过程的一种解释，但是笔者认为它也可适用于公共政策制定领域。

②关于群众路线的最新阐释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景跃进：《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释与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283页。

的可能路径选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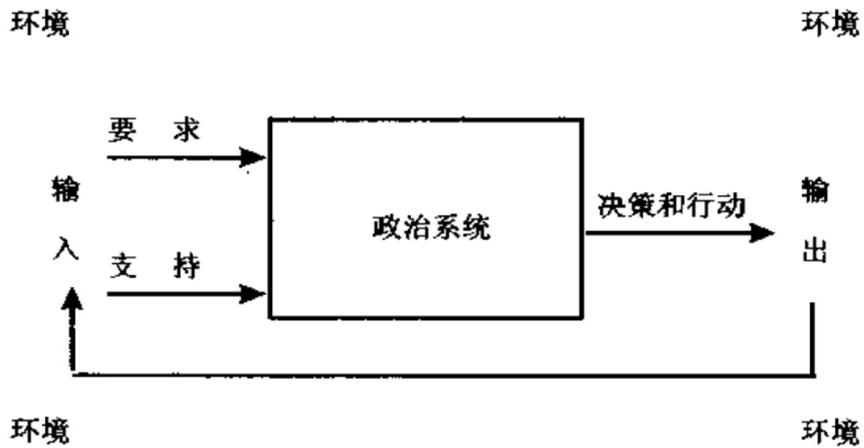


图 6-7 外输入的政策过程

资料来源：[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7 页。

表 6-1 经典群众路线与新阐释的对照

	经典群众路线	新群众路线
对人的看法	阶级观/群众	公民观/选民
农民观	被教育对象	自治主体
利益认知	遮蔽说/虚假利益说	利益的自我认知
利益表达	分散的意见	自身利益的最好表达者
上下连接的机制	非制度化的群众路线/工作作风	定期的选举+群众路线
代表的基础	先锋队理论	民意的显示
治国的手段	政策过程的政治动员性	依法行政+诱致性动员*

注：*部分为笔者所加。

资料来源：景跃进：《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释与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83 页。

协同治理理论是继“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之后的第三代善治理论。^①关于协同治理理论的内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界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①参见燕继荣：《协同治理：社会管理创新之道——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13 年第 2 期，第 59 页。

观点有：

——所谓协同治理，是指在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社会多元要素相互协调，合作治理社会公共事务，以追求最大化的治理效能，最终达到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之目的。^①

——基于协同学理论和治理理论，协同治理是指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货币、法律、知识、伦理等作为控制参量，借助系统中诸要素或子系统间非线性的相互协调、共同作用，调整系统有序、可持续运作所处的战略语境和结构，产生局部或子系统所没有的新能量，实现力量的增值，使整个系统在维持高级序参量的基础上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最终达到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之目的。协同治理虽然体现了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但更强调对价值理性的关切，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②

——简言之，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是指政府出于治理需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并与社会一起，发挥社会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政府始终保护并尊重社会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并综合运用行政管理、居民自治管理、社会自我调节以及法律手段甚至市场机制等多种方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③

——善治理论 3.0 版本的主要代表是“公共治理”或“协同治理”理论。3.0 版本的善治理论强调“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它把公共管理定义为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单位、企业、个人等所有利益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过程，认为“善治”意味着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协同治理，因此，建立集体决策和共同参与制度，加强公共选择和公共博弈，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分享，权力协同，这是第三代治理理论的主要诉求。^④

①何水：《协同治理及其在中国的实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03页。

②郑巧、肖文涛：《协同治理：服务型政府的治道逻辑》，《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7期，第49页。

③郁建兴、任泽涛：《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学术月刊》，2012年第8期，第27页。

④燕继荣：《协同治理：社会管理创新之道——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2期，第59页。

以上四种观点代表了“协同治理”理论的四个维度的解读。第一种观点提出协同治理要以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为基础，也就陷入了技术化的泥坑，因为协同治理不一定要依靠网络技术；第二种观点则是从系统论的角度对协同治理进行了概括，并提出了子系统的自组织对于治理的重要性，但是是何种机制导致子系统之间达致新的更高水平则没有很好地揭示出来。第三种观点实际上指出的是要在强国家—弱社会关系格局之上，发挥社会力量在治理过程中的协作功能，这就把国家—社会置于不平等地位，从而难以发挥协同治理的功效。第四种观点从善治的角度阐释协同治理，可是它忽视了社会组织、个人何以能够参与决策以进行协同治理。然而上述四种观点都表达了一定的共性：一是协同治理的前提是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二是治理权威的多元化；三是子系统的协作性；四是系统的动态性；五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善治。

综合上述四种观点，本文认为：协同治理指的是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单位乃至公民个人作为子系统组成开放整体系统，作为子系统的治理主体之间享有法律与机会的平等并尊重社会的自组织运行及主体地位，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围绕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进行公共选择与博弈（其手段可以是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或者几者的混合），以推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有效协同互助而达致更高的治理水平，从而实现善治目标的过程。它是以系统论特别是协同论的视角来考察公共事务的治理，因此它有两大理论基础：多中心治理理论、以及协同论中的自组织理论。这就为公共治理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如果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反观协同治理理论，它基于强国家—强社会（powerful state-powerful society）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第一，国家对外实力强大，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不受侵害，对内管理有效，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第二，公民生活富裕，社会高度自治，民间力量在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活领域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自立性和自助性；第三，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国家权力机关—政府—与政党组织、社区和社团组织所构成的“社会”大体上各守本位，各司其职，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彼此分工协作。^①当然，这种模式也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只能不断地逼近此种状态。可以说，实现国家的善治关键在于处理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协同治理理论辨

^①燕继荣：《协同治理：社会管理创新之道——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2期，第59页。

弃了以前的片面强调“政府治理”或单方面提倡“社会治理”的善治理论的缺陷，而是从国家与社会二者的互动与协同着手思考实现国家的善治，因而对社会发展极具推动力。要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需要做到：（1）权力和权利的协调；（2）政府与社会的彼此合作；（3）公共选择和公共博弈的公平有效；（4）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责任共担，利益共享；（5）政府与民间组织良性互动，分工协作，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共管共治。^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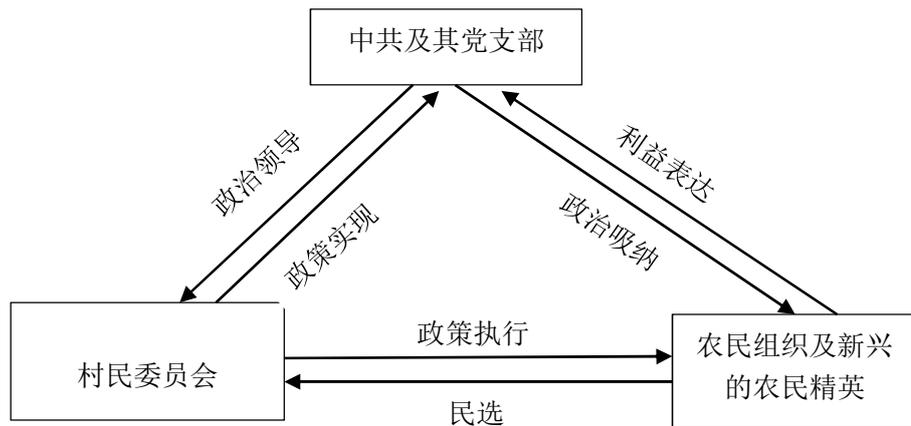
以上是对协同治理理论内涵的阐述。在经验层面，日本自民党的农村政治动员体制则为该理论提供了现实支持。那么如何实现协同治理体制呢？本文认为借鉴日本自民党的经验，从政策合意机制入手也许是可能路径之一。因为现代社会，政府主要是通过法律化的政策来调节各方面的利益，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推动社会的发展。同时从心理认知角度看，公众在政策过程中自由地表达和充分地参与，能够带来对政策的认可。因此，可以凭借建构政策合意机制为突破口逐步建立协同治理体制。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已经为协同治理体制的建立做出了尝试，例如浙江温岭的恳谈模式^②，它就是通过政策过程吸纳民意，并且平衡各方利益需求从而达成共识的机制。它反映出在既有制度框架下的改进与创新，为民主政治寻找和确定新的生长空间。这既满足了农民的利益需求，也符合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可以是中共重构农村政治动员的有益参考。应该说，以温岭“民主恳谈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创新，为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的重构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温岭恳谈会”仍然是缺乏公民文化素养的农民个体的参与，所以，农村政治动员的重构除了

^①燕继荣：《协同治理：社会管理创新之道——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2期，第59页。

^②“民主恳谈”是诞生于温岭的一种基层民主政治的形式，2004年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它最初是1999年6月台州市委宣传部和温岭市委宣传部联合在温岭松门镇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试点教育中创造的、以会议对话和讨论为基本形式的一种思想教育方法。而后不断发展成为基层民主的一种载体。从内容来说，“民主恳谈”会具有多种类型：民主沟通会、乡镇政府决策听证会、乡镇党委决策议事会、村民议事会、乡镇人大表决会、党代表建议回复会、重要建议论证会和村民代表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尽管类型多样，其核心或基础仍是“民主恳谈”，即基层党委、政府或农村自治组织在就公共事务做出决策前，先在干部和群众或群众代表之间，对公共事务了解不多、知识不多的人与具有处理相关问题的经验和相关知识的人之间，开展完全自由、平等、公开、坦诚、双向和深入的讨论，交流思想，分析利弊，论证观点，辨明事理，相互说服，在形成基本共识后，再通过一定程序，由基层党组织、政府、基层人大或人民群众自己做出决定。现在，“民主恳谈”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它的特点主要是：程序化、规范化程度比较高，与实际工作结合紧密，为各界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的空间比较广阔，运行成本比较低，操作比较简单，与党的传统和现有的各种制度之间的融合程度比较高。参见余逊达：《序：基层民主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载于慕毅飞、陈奕敏：《民主恳谈：温岭人的创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1~2页。

要进行制度创新之外，农民组织的培育以及公民文化的建设也会增强农民在协同治理体制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我们深信，如果农民主体性得以发挥以及首创精神得到尊重，以协同治理为方向的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的建构将会获得新生。

那么，协同治理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有哪些特征呢？第一，中共作为执政党依然是政治动员的主体（也包括中共的外围组织等），动员的客体则是组织化了的农民或者是新兴的农村精英，二者之间的关系日益法制化、平等化；第二，该动员体系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共治基础上的；第三，中共在民主法律的框架内，遵循村民自治原则，围绕利益相关问题，通过政策合意机制实现对农民意愿的吸纳与对农民的动员，进而推动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也提升执政党的合法性；第四，动员手段主要依靠法律规范和利益诱导，意识形态则起辅助作用；第五，动员的直接目标是改善农民的生活以及实现农村地区的善治，间接目标则是巩固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协同治理体制下的政治动员可以用图 6-8 表示。



经济社会基础：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农民异质化与组织化、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嵌入性自主与合作共治

图 6-8 协同治理体制下的政治动员

资料来源：作者自拟

6.3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笔者试图论证的是：未来中共农村政治动员需要实现由革命范式向治理范式的转变，从而实现农村的善治。日本是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典型国家，于是本章先是从考察日本自民党的农村政治动员着手，通过“不买《读卖新闻》”运动的解读，发现自民党的农村政治动员体现出这样三个特征：制度化的政治动员、民主化的农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及利益交易的诱致性动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自民党、政府与农协（农民）在政策领域的协同机制的形成。随后，本文分析了中共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内在需求，即中共内部秩序与变革的张力以及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两大要素；在借鉴日本自民党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政治动员模式重构的策略取向——政策合意基础上的协同治理体制的构建。最后，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协同治理体制建构的途径与手段，分别为：一是实现由强制性动员向诱致性动员的转变；二是培育农民组织，塑造新的利益共同体；三是以公民文化建设推动农民主体性的发挥；四是政策合意与协同治理成为农村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协同治理体制是在承认各个利益主体平等地位基础上的政策合意机制，有利于平衡和满足各方面的利益诉求。

结语：调适与发展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农民占据绝大多数，而且是实现现代化的主力军。所以，如何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是任何一种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所必须要深思熟虑的。掀开中国现代化历史的长卷，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古老帝国的国门被扣开，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中华帝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一代代中国的仁人志士都试图挽救中华民族每况日下的颓势，然而不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抑或是辛亥革命均没有改变中国的局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忽略了农民占据中国人口大多数之事实，没有意识到唯有改变农村社会才能改变中国社会。

面对着20世纪初产生的全面危机，中共自诞生起就提出了要通过社会革命来改变中国面貌的目标。可是，囿于时代的限制，中共早期也没有对农民高度重视，虽然也声称要团结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出于生存的需要它的战略重心才开始转向农村，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开始了农民革命道路的探索。这一探索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农村和农民的政治动员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虽然之前的天平天国运动、捻军的起义乃至义和团运动都发动起了农民，但是它们的发动与中共的政治动员有着显著的区别（因为此问题不是本文的重点，在此就不再赘述）。从某种角度看，中共的农村政治动员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出各异的特征，这与它的灵活的农村策略有关。换言之，中共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的变迁反映了它的农村策略的调整。

任何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也许均不能回避样的事实：革命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诞生并获得重生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惊人的自我调适与发展能力。时至今日，它已经是拥有8000多万成员的大党，甚至超过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①这正是中共调适与发展的结果。回顾中共的历史，它既

^①马海燕：《党员“新面孔”渐多对中共和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载于“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11-05/4301239.shtml>，2012年11月5日。

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涵，又凭借着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农民革命，建国之后它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可以说，中共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色，显示出它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发展。

基于这两种关怀，本文先是对革命年代中共的农村政治动员进行了考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十个年头，当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号召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以继续他未竟的革命事业。正是革命催生了中共的诞生。通过梳理中共发展之初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基本上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从而导致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失败。实际上，自从中共建立伊始，其内部就已经形成了两派：一派以陈独秀为代表，主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即城市革命；一派以李大钊为代表，强调农民的力量，试图以农村的改变来带动中国社会的变革。作为李大钊的学生，毛泽东秉承了通过农村的解放而推动全中国解放的思想，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初步显露了他的农村政治动员的思想。然而，这时毛的农民动员思想还尚未成熟。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出于生存斗争的需要，中共的战略重心开始转入农村。在此时，澎湃在海陆丰地区领导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尝试更加鼓舞了毛泽东，毛开始以井冈山为根据地开始了对农民革命的深入探索。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同时党对党员的控制也空前地加强了。此外，中共在根据地建立了一元化领导，凭借其强大的组织体系和意识形态力量而充分地调动党员干部去动员农民，从而获得了革命的胜利。经过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演练，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的技术与能力得以进一步的提升，而臻于成熟。纵观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农村政治动员，是出于生存策略和取得革命胜利的需要自我调适的成果。因而，它具有预设性、建构性以及鼓动性的特征，通过诉苦等一系列技术而促成农民的阶级意识觉醒，利用土地改革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从而推动他们自觉地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为本阶级利益服务。可以说，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与技术 in 革命年代的农村政治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被中共的党员干部利用而塑造农民的革命主体地位。革命年代的农村政治动员已经成为中共的政治遗产，其中的某些要素影响至今。

1949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全国性政权而成为执政党，然而，从战争

年代走来的共和国领袖特别是毛泽东并没有相应地实现执政观念上的转变，他依然将 1949 年后的中国政局称作解放。因此，1949～1976 年的二十七年间被西方诸多学者称之为“继续革命年代”。此时期中国逐步进入全能主义政治时代，所形成的政治动员模式，本文称之为“一元化建构”。这种动员模式是革命年代政治动员的继承和扩展，是中共试图利用以阶级斗争为内核的政治动员方式继续激发农民的潜力、迅速实施社会革命而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尝试。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党的一元化领导；组织体系延伸到村庄内部；依靠以党员为代表的新型精英治理村庄；以及凭借自上而下的政治沟通和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以鼓动被组织化的农民为中共预设的目标努力。基于这些特征，也可称其为“金字塔式的动员体系”。如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看，它属于强制性政治动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1949 年后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中共模仿苏联的做法，即“试图按城市那样去改造农村，摧毁传统生活方式，通过将集体化和共产党的政治机构扩大到农村而强迫农民接受现代价值观”。^①中共建立的全能主义政治付出了极大的隐形成本，“原来个体农民的‘勤劳’、‘智慧’的天性，只在非常狭小的私家空间里才能得到发挥，更多时光则在集体生产中消极怠工，在政治运动的应付糊弄中打发。农民的政治热情似乎已经释放得差不多。”^②也就是说，人民公社时期表面上的统一秩序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导致了他们对制度的忠诚度下降并对制度的积怨甚深，而为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创新留下了空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步入后全能主义时代，与土地家庭承包和村民自治制度相适应，此时形成了“嵌入式管控”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在该模式下，中共的一元化领导虽然被坚持，它已经不能全面掌控村庄事务，以中共为主体的官僚制动员与以民间精英（有声望之人、先富能人）为主体的卡里斯玛型动员之间的博弈关系出现了，但是它的基层组织——村党支部仍然在村庄内部发挥领导作用，并且依然遵循管控的思想管理村务；动员手段更多的是采取利益诱导的方式；此时农民的意识也变得日益多元，公民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萌发。与此同时，党的意识形态呈现开放性特点，它对党员的控制亦不如改革开放前那样严密，党的基层组织也出现了涣散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共在农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年版第 420 页。

^②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61 页。

村的政治动员能力。某种程度上，该模式的形成并不是中共有意为之，反倒有多少倒逼式改革的意味。面对着诸多的挑战，中共在组织建设和意识形态方面均做出了回应与调整，借此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也证明了中共的适应性与制度弹性。

总体上看，中共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能够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局的变化做出调适的政党。它在牢牢把握执政党地位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改革开放前后农村政治动员模式出现的变迁，也可视为中共因时制宜的结果。至2012年7月，中共已经建党91周年，执政也将有63年。在这不算太长的时光中，中共发展并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这正是它能够结合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调整的认识论源泉。可以说，中共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追求并实现了“动态的稳定”^①。此种“动态的稳定”应当成为长期执政的指引。

当前中共需要面对的是农村政治动员的重构，动力则来自于它的内在张力：一是秩序与变革之间的冲突；二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同时，中共也面临着来自组织内部的挑战，即基层党组织总是对中央的政策进行选择性地执行，从而不断侵蚀着中共的合法性。对此，本文提出了农村政治动员需要从革命范式转向治理范式、在中共实现执政党转变以及发挥和尊重农民主体性的基础上构建协同治理体制的设想，其关键依然是中共能否进行调适，能否有极大的政治勇气进行制度创新。此外，中共为了更大限度的动员农民和巩固其执政地位，也应该在城乡平衡发展中发挥其主导作用。因为根据赛多·考雅特的说法，一个理想的政党应该是“把农民和城市居民熔合在一起的熔炉式的政治组织。它应使前者摆脱孤立状态，治疗后者对农村的蔑视症，达到民族统一并从中汲取力量。这样，就填平了城乡之间的鸿沟，不同阶层的人汇成了一股奔向各种政治目标的洪流”。^②

^①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曾经对“动态的稳定”与“静态的稳定”做出了有用的区分。所谓“静态的稳定”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领导层要么吓得不敢作为，要么满足于现状，因而不作出任何的调适。“静态的稳定”产生出稳定的幻象，但实际上是制度溃烂的反映。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时代前的苏联和当今朝鲜的状况。相反，“动态的稳定”认识到不断调适和改变的必要性，因而创造出另一种类型的稳定。参见 Kenneth Lieberthal. *U.S. Policy towards China*, Brookings Policy Brief, No.72,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1. 转引自[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

^②转引自[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19页。

总之，中共依靠动员农民而发展壮大，也凭借农民的力量获取了政权，还利用农民的剩余价值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可以说，中共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动员起农民的力量，决定着它现代化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也影响着它执政地位的巩固。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了“中国梦”的愿景，也言明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决心。那么，中共的历史选择还需要接受时间和实践的双重检验。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著作类：

- [1] [美]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 [2] 李约瑟、黄仁宇：《中国社会的特质——一个技术层面的诠释》，原载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东方文化》，第12卷（1、2期合订），1974年。收录于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 [3] 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 [4] [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5] [美]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 [6] 徐彬：《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21～1966）》，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 [7] 杨龙：《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8]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9] [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 [10] 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11] 胡伟：《政府过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12] 徐湘林：《渐进政治改革中的政党、政府与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 [13]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14]石永义等：《现代政治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15][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16][以]S. N.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 [17][美]A.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18][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 [19][美]塞缪尔·P.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 [20][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小 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 [21][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惊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714页。
- [22][加]伊莎贝尔·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安强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 [23][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 [24][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
- [25][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 [26][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 [27][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俞金尧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 [28][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 [29][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30][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 [31][瑞]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杨建立等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 [32][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33][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34][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胡愈之等译，1984年版。
- [35][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马庆平等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
- [36][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沈苏儒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 [37][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陈瑶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 [38]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 [39]关海庭：《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40]邓正来等：《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 [41]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42][英]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井建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43][美]西达·斯考切波：《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44][美]S.肯德里克、P.斯特劳、D.麦克龙：《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王辛慧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45][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46][美]费正清：《中国新史》，薛绚译，台北：中正书局，1994年版。
- [47][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 [48]《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49][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 [50]《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5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52]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53][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自传》，汪衡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 [54]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55]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八七会议》，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 [5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57]《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8页。
- [5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页。
- [59]《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 [6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61]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二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62]萧延中：《从奠基者到“红太阳”》，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
- [63][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编选辑》编辑组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 [64]杜李：《论群众路线》，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65][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

- [66]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编辑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67][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 [68][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69][美]路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王恩光等译，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
- [70]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载于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71]金德群：《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 [72]王友明：《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 [7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 [7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年版。
- [75][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 [76]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 [77]丛进：《1949~1976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 [78]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
- [79]徐水县委办公室编：《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典型经验》，北京：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
- [80][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 [81][美]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国家与社会革命》，刘北城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 [82][美]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83]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

- [84]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沂水：大众日报社，1943年版。
- [8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8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 [87]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88]《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89]《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90]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91]田锡全：《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 [92]《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93]《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 [94]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 [95][美]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96][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 [97]《刘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98][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程洪、李荣昌、卢汉超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 [99]景跃进：《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 [100]彭勃：《乡村治理：国家介入与体制选择》，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 [101][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 [102]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 [103]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104][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 [105][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106][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 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 [107]梁鸿：《出梁庄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
- [108][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109]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110]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 [111]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 [112]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113]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114]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1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1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117]吴新叶：《农村基层非政府公共组织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118][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119]肖唐镖：《宗族政治：村治权力网络的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 [120]刘志军：《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张店镇个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 [121][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 [122]荣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 [123][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 [124][美]雷蒙德·塔塔洛维奇、拜伦·W. 戴恩斯：《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吴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 [125][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元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 [126][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127][美]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 [128][美]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0页。
- [129][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 [130]慕毅飞、陈奕敏：《民主恳谈：温岭人的创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 [131]章政：《现代日本农协》，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
- [132]徐万胜：《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 [133]李汉卿：《自主与参政：日本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研究（1900～1975）》，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 [134][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解莉莉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 [135]张静：《法团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 [136]谢岳：《维稳的政治逻辑》，香港：清华书局，2013年版；
- [137]《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138][美]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 [139][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140]徐大同：《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1]余振等：《澳门华人政治文化》，澳门：澳门基金会出版社，1993年版。

[142][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论文类：

[1] 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2] 冯士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3] [美]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

[4] [美]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载于[美]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6~95页。

[5] 徐彬：《论政治动员》，《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

[6] 孔繁斌：《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7] 张新萍：《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动员》，《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12期；

[8] 刘一皋：《社会动员形式的历史反视》，《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

[9] 刘荣刚：《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现实思考》，《理论与改革》，1998年第4期。

[10]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第15期。

[11]许蕾：《政治运动的动员机制——以“三反”运动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2]张励：《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的群众动员》，《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第3期。

[13]李巧宁：《建国初期山区土改中的群众动员——以陕南土改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4]林伟京：《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动员》，《齐鲁学刊》，2007年第1期。

[15]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16]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 [17]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
- [18]陈华森：《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模式研究》，《党史文苑》，2004年第8期。
- [19]梁丽萍、邱尚琪：《建国以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演变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5期。
- [20]张雷、刘曙光：《论网络政治动员》，《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 [21]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 [22]萧楼：《柔性政权：“政治动员”下的乡镇和村庄——东南沿海D镇个案分析》，《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 [23]翁有为：《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山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 [24]林伟京：《转型时期党的政治动员实效下降的原因分析》，《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
- [25]汤忠钢、魏丹：《论“共同态度性”范式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的运用问题》，《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 [26]吴帆、吴毅：《“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与特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 [27]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 [28]景跃进：《“群众路线”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内涵、结构与实践》，《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 [29]陈金美：《论主体性与客体性、主体间性的关系》，《求索》，1997年第5期，第86页。
- [30]王雪竹：《略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标语宣传及其启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2期。
- [31]辛逸：《关于人民公社的分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 [32]杨善华、苏红：《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

- 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 [33]吴志军：《试论1957年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北京党史》，2007年第1期。
- [34]朱佳木：《陈云与中国工业化起步过程中若干基本问题的解决》，《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 [35]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上）——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
- [36]A.F. 莱特：《斗争与和谐：现代中国相互竞争着的价值符号》，载《世界政治》，1953年第1期。
- [37]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 [38]徐勇：《“行政下乡”：动员、任务与命令——现代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行政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 [39]徐勇：《“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 [40]徐勇：《“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 [41]徐勇：《“宣传下乡”：中国共产党对乡土社会的动员与整合》，《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0期。
- [42]徐勇：《“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兼论乡镇体制改革的走向》，《东南学术》，2009年第1期。
- [43]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 [4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
- [45]熊伟：《亲历乌坎选举》，《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
- [46]张严冰、曾志敏：《“小乌坎，大中国”——论“乌坎事件”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启示》，《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年第2期。
- [47]梁惟：《透过乌坎事件看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党政干部学刊》，2012年第4期。
- [48]王赐江：《处置群体性事件需要新思维——广东“乌坎事件”启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2期。

- [49]陈强、李诗雅：《从“社会冲突正功能”观点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以广东陆丰乌坎事件为例》，《学术论坛》，2012年第8期。
- [50]何光伟：《“乌坎转机”开启地方治理新思路》，《理论参考》，2012年第1期。
- [51]秦晖：《农民地权六论》，《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9期。
- [52]张厚安：《乡政村治——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政策》，1996年第8期。
- [53]林坚、马彦丽：《我国农民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特征——一个基于全国1185份调查问卷的分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 [54]孙秀林：《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 [55]肖唐镖：《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 [56]王朔柏、陈意新：《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 [57]贺振华：《转型时期的农村治理及宗族：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1期。
- [58]何慧丽：《农村宗教生态：“多元一体”关系的动态发展——以河南农村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2期。
- [59]吴理财、张良：《农民的精神信仰：缺失抑或转化？——对农村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反思》，《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
- [60]张旭光、任强：《“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现象的调查与思考》，《资料通讯》，2003年第9期。
- [61]顾正喜：《我国农村先富群体参政的激励结构及规范之道——以先富捐资竞选为例分析》，《探索》，2004年第1期。
- [62]胡序杭：《先富能人治村条件下村党组织发展经济的新模式探究》，《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
- [63]程珂：《先富能人治村绩效探析——以浙江省临安市板桥乡为例》，《黄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 [64]朱江平：《需重视“先富能人治村”——访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原巡视员曹国英》，《农村工作通讯》，2011年第16期。
- [65]胡序杭：《“先富能人治村”：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及其对策》，

-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 [66]胡序杭：《“先富能人治村”条件下发展党员工作的调查与思考》，《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
- [67]黄俊尧：《先富能人参政背景下的村庄政治生活——从选举与治理的维度》，《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 [68]景跃进：《如何扩大舆论监督的空间——〈焦点访谈〉的实践与新闻改革的思考》，《开放时代》，2000年第5期。
- [69]王斐弘：《法律的底色——以〈今日说法〉案例所作的法社会学分析》，《中国司法》，2006年第5期。
- [70]杨彩云：《十年法治的记忆——从〈今日说法〉透视中国法治进程》，《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7期。
- [71]张桂娜：《“法治中国”的主流叙事——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为例的考察》，《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17期。
- [72]赵树凯：《农村发展与“基层政府公司化”》，《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10期。
- [73]赵树凯：《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优势还是劣势？》，《文化纵横》，2012年第2期。
- [74]宫希魁：《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及其治理》，《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
- [75]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 [76]赵树凯：《基层政府的体制症结》，《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11期。
- [77]张厚安、蒙桂兰：《完善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制度 推进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湖北省广水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调查》，《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第4期。
- [78]李连江：《差序政府信任》，《二十一世纪》（香港），2012年6月号，总第131期。
- [79]王国敏、邓建华：《重塑农民主体性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现代经济探讨》，2010年第9期。
- [80]陈潭、刘祖华：《迭演博弈、策略行动与村庄公共决策——一个村庄“一事一议”的制度行动逻辑》，《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6期。
- [81]刘祖华：《农村“一事一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江汉大学学报》，2007

年第3期。

[82]李汉卿：《日本农业政策过程中的协同机制——从“不买<读卖新闻>运动”谈起》，《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3期。

[83]王新生：《日本的利益集团》，《日本学刊》，1993年第1期。

[84]唐皇凤：《“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85]应星：《超越“维稳的政治学”——分析和缓解社会稳定问题的新思路》，《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7月下。

[86]袁新华：《压力维稳机制下的社会稳定》，《求实》，2011年S1期。

[87]于建嵘：《压力维稳的政治学分析——中国社会刚性稳定的运行机制》，《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7/8期合编本。

[88]王贵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治成长中的地位转变与角色转换》，《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

[89]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九七效应：香港，中国与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第141～169页。

[90]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91]赵树凯：《社区冲突和新型权力关系——关于196封农民来信的初步分析》，《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2期。

[92]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基于衡阳农民协会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2期。

[93]蔡永飞：《以执政党思维看待和支持农民组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94]包美娇、章伟：《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公民文化的演进路径分析——台州农村政治参与是如何推进政治文化变革的》，《甘肃理论学刊》，2005年第4期。

[95]燕继荣：《协同治理：社会管理创新之道——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2期。

[96]何水：《协同治理及其在中国的实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97]郑巧、肖文涛：《协同治理：服务型政府的治道逻辑》，《中国行政管理》，2008

年第7期。

[98]郁建兴、任泽涛：《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学术月刊》，2012年第8期。

[99]景跃进：《转型、吸纳和渗透——挑战环境下执政党组织技术的嬗变及其问题》，《中国非营利评论》，2011年第1期。

学位论文：

[1]李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以5.12抗震救灾为例》，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关兴：《新农村建设中的政治动员研究——以皖北T县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3]齐美胜：《乡村社会动员机制研究——以皖南G村为个案》，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4]朱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探析——以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视角》，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5]杨会清：《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动员模式研究（1927~1937）》，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6]黄兢：《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研究》，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7]王长付：《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政治动员分析(1927~1937)》，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8]李杨：《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49~2007)》，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9]王兴东：《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政治动员概述》，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0]周政华：《当代中国乡村政治动员研究——从人民公社到村民自治的历史之旅》，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1]吴婉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运作模式研究——以“大跃进”运动为例》，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12]李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3]张建涛：《危机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例》，河

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4]郭东峰：《中共政治动员研究：以“工业学大庆”为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5]乔晶：《重构农村：“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政治动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6]程秀英：《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

[17]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18]马磊：《乡村社会中的政治动员——对共产党乡村革命的治理术分析》，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9]李姿姿：《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0]韩承鹏：《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1]吴素雄：《政党下乡的行为逻辑：D村的表达》，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22]黄晓龙：《“支部下乡”：建国初期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以鄂东C村为分析对象》，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3]张友庭：《市场化进程与小农的风险规避：基督教传播的社会功能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4]李小艳：《电视媒介中农民话语权的缺失与重建——以《焦点访谈》的“三农”报道为例》，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5]吕岩梅：《社会转型期新闻框架真实建构新探——以〈焦点访谈〉为例》，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26]程玲玲：《〈焦点访谈〉的政治传播学分析》，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网络文献及报道：

[1] 郭岩：“社会动员的概念方法与过程”，载于“城市社区参与治理资源平台网”，<http://www.ccp.org.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6>，2006年04月01日。

[2] 李炜光：《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载于“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网”，http://www.scuphilosophy.org/ScholarsLibrary_display.asp?userid=8

18&art_id=6744, 2008年9月16日。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网络版）第三章第三节《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http://www.zgdsw.org.cn/GB/218994/219014/220524/222757/222777/14961985.html>。

[4]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原文），“载于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网”，http://www.zjsy.org.cn/news_detail.aspx?id=5308&classid=183，2013年4月15日访问。

[5]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运动》（1926年9月21日），第8期。参见<http://news.sina.com.cn/c/2006-08-31/150510885041.shtml>，2013年4月12日访问。

[6] 《乌坎民选村代表薛锦波遗体已安葬 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经过回顾》，载于“华讯财经网”，http://finance.591hx.com/article/2012-02-20/0000123344s_1.shtml，2012年2月20日。

[7] 《乌坎事件经过、乌坎事件起因、乌坎事件详细解析》，载于“华讯财经网”，<http://money.591hx.com/article/2011-12-23/0000097216s.shtml>，2011年12月13日。

[8] 《陆丰市乌坎事件情况》（中英文版），载于“汕尾党政信息网”，<http://www.shanwei.gov.cn/163747.html>，2011年12月16日。

[9] 《乌坎民选村代表薛锦波遗体已安葬 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经过回顾》，载于“华讯财经网”，http://finance.591hx.com/article/2012-02-20/0000123344s_1.shtml，2012年2月20日。

[10] 《陆丰9·21乌坎事件基本平息 村民代表终获满意答复》，载于“南方网”，http://news.southcn.com/d/2011-09/24/content_30399798.htm，2011年09月24日。

[11] 张洁平：《呼啸村庄——乌坎的死亡与反抗》，载于“阳光时务周刊网”，<http://www.isunaffairs.com/?p=2063>，2011年12月16日。

[12] 洪继宇、陆宣：《陆丰迅速妥善处置村民上访》，载于“南方报网”，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1-11/22/content_7028389.htm，2011年11月22日。

[13] 《乌坎在行动》（视频），载于“阳光时务周刊网”，<http://www.isunaffairs.com/?p=1668>，2011年12月2日。

[14] 《汕尾通报“9·21”陆丰乌坎村事件处置结果》，载于“南方网”，http://news.southcn.com/dishi/shanwei/content/2011-12/09/content_34742612.htm，2011年12月09日。

- [15] 《广东乌坎民选代表薛锦波遗体归还》，载于“四月网”，<http://app.m4.cn/print.php?contentid=1152560>，2012年02月17日。
- [16] 《公安机关开展清障行动，推进乌坎维稳工作》，载于“汕尾党政信息网”，<http://www.shanwei.gov.cn/163493.html>，2011年12月11日。
- [17] 辛均庆：《汕尾通报“乌坎事件”嫌疑人死因调查结果：排除薛锦波外力致死可能》，载于“南方报网”，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1-12/15/content_7038295.htm，2011年12月15日。
- [18] 《存粮有限广东乌坎村警民继续对峙》，载于“BBC 中文网”，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1/12/111218_wukan_update.shtml，2011年12月18日。
- [19] 《郑雁雄乌坎讲话实录》，载于“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476.html>，2011年12月22日。
- [20] 《政府突愿赔 村民指分化拒接受 保证不派军警 未肯归还薛锦波遗体》，载于“香港雅虎网”，<http://hk.news.yahoo.com/政府突願賠-村民指分化拒接受-保證不派軍警-未肯歸還薛錦波遺體-212338626.html>，2011年12月20日。
- [21] 辛均庆、洪继宇：《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通报“乌坎事件”有关决定：政府收回并赔偿 404 亩涉事用地》，载于“南方报网”，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1-12/20/content_7040024.htm，2011年12月20日。
- [22] 《汕尾市参与解决乌坎危机，村民筹划大游行》，载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版”，<http://chinese.wsj.com/big5/20111220/bch144837.asp>，2011年12月20日。
- [23] 《认真落实朱明国副书记讲话精神 加快平息乌坎事态》，载于“汕尾党政信息网”，<http://www.shanwei.gov.cn/163919.html>，2011年12月20日。
- [24] 《广东汕尾传达朱明国讲话 声称乌坎挑头者再闹必追究》，载于“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12/20/11453989_0.shtml，2011年12月20日。
- [25] 《乌坎村事件最新进展：乌坎村代表林祖恋将与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会面谈判》，载于“IBTIMES 中文网”，<http://www.ibtimes.com.cn/articles/8319/20111221/wukancun-linzulian-zhumingguo.htm>，2011年12月21日。
- [26] 《乌坎村民欢迎省工作组进村》，载于“汕尾党政信息网”，<http://www.shanwei.gov.cn/164022.html>，2011年12月22日。

- [27] 《陆丰公安机关：乌坎被刑拘三村民取保候审》，载于“星岛环球网”，http://society.stnn.cc/anjian/201112/t20111224_1683777.html，2011年12月24日。
- [28] 《广东乌坎村成立党总支及村委会重新选举筹备小组》，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1/15/c_111439905.htm，2012年1月15日。
- [29] 李强：《官方：林祖恋9·21事件中保持理性 胜任乌坎党总支书记》，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01/16/c_122589732.htm?anchor=1，2012年1月16日。
- [30] 《乌坎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载于“中国青年报”，http://zqb.cyol.com/html/2012-02/02/nw.D110000zgqnb_20120202_2-01.htm，2012年2月2日。
- [31] 《乌坎村昨推选出村民选举委员会》，载于“南方报网”，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2-02/02/content_7053120.htm，2012年2月2日。
- [32] 《乌坎村推选出村民代表》，载于“南方报网”，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2-02/12/content_7055675.htm，2012年2月12日。
- [33] 《乌坎村民为薛锦波举行追思会》（视频），载于“香港有线电视台网”，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news_video/index.php?news_id=378038，2012年2月17日。
- [34] 《乌坎内讧》，载于“东方日报网”，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20302/00178_001.html，2012年3月3日。
- [35] 《乌坎今选村委 官方监视村民》，载于“东方日报网”，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20303/00178_008.html，2012年3月3日。
- [36] 《乌坎终极选举 中央派员观察 宗族摆酒拉票 气氛诡异恐有人捣乱》，载于“香港雅虎网”，<http://hk.news.yahoo.com/烏坎終極選舉-中央派員觀察-宗族擺酒拉票-氣氛詭異恐有人搗亂-211518843.html>，2013年3月3日。
- [37] 广东政法微博，<http://e.weibo.com/2176235777/y8cqSgKdx>，2012年3月3日 17: 18。
- [38] 广东政法微博，<http://e.weibo.com/2176235777/y8ebO3cTM>，2012年3月3日 21: 47。
- [39] 《乌坎村选举出新村委会》，载“南方网”，http://news.southcn.com/g/2012-03/04/content_39534528.htm，2012年3月4日。
- [40] 《“乌坎转机”的时代意义和国家样本意义——北京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乌

坎转机”》，载于“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zonghe/zuixinshiliao/2011-12-26/28051.html>，2011年12月26日；

[41]《广东年鉴 2006·人物》，载于“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d.gov.cn/govinc/nj2006/rw.htm>，2013年6月10日访问。

[42] 安卓：《乌坎转机：精神领袖任村党支部书记》，载于“第一财经网”，<http://www.yicai.com/news/2012/01/1360229.html>，2012年1月16日。

[43]《汪洋：乌坎选举无创新 纠正了走过场形式》，载于“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2012lianghui/content-3/detail_2012_03/05/12977573_0.shtml，2012年3月5日。

[44] 全志辉：《乌坎事件中的道义政治》，载于“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236.html>，2012年1月14日。

[45]《声援乌坎村 大陆出现零星示威活动》，载于“中央广播电台网”，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32755，2011年12月19日。

[46]《陆丰龙头村过千村民效乌坎抗争》，载于“自由亚洲电台网”，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lufeng_followup-12152011103326.html，2011年12月15日。

[47]《受乌坎村事件启发 邻市村民站起来》，载于“自由亚洲电台网”，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china_procession-12192011095722.html，2011年12月19日。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2》（网络版），十、人民生活，“10-23 按收入五等份分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2011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2013年6月15日访问。

[49] 唐逸如：《当民主理想照进乌坎现实——独家对话乌坎村支书林祖恋》，载于“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tang-yi-ru/2013_04_02_135874.shtml，2013年4月2日。

[50]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54.htm，2002年11月17日。

[51] 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4/22/content_4460879.htm，2006年4月22日。

- [52] 《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 2008 年新年贺词：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ldhd/2007-12/31/content_848071.htm，2007 年 12 月 31 日。
- [53]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jrzg/2008-05/07/content_964157.htm，2008 年 05 月 07 日。
- [54] 《温家宝接受欧洲媒体采访 纵论国内外政经大事》，载于“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other/news/2006/09-06/785483.shtml>，2006 年 09 月 06 日。
- [55] 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2/26/content_5775212.htm，2007 年 02 月 26 日。
- [56] 肖菁、岳海智：《先富群体竞选村官调查报告 浙江富人治村占 30%》，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9/20/content_1091309.htm，2003 年 09 月 20 日。
- [57] 《乌坎村主任：民众只认为民主是能让其发财》，载于“战略网”，http://observe.chinaiiss.com/html/20132/28/a5bb20_2.html，2012 年 02 月 28 日。
- [58] 《国务院公报开通腾讯微博 首个“公报矩阵”将诞生》，载于“中国广播网”，http://www.cnr.cn/gundong/201303/t20130329_512254428.shtml，2013 年 03 月 29 日。
- [59] 《雷政富曝光到免职 63 小时 创正厅级官员落马纪录》，载于“北方网”，<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2/12/15/010407009.shtml>，2012 年 12 月 15 日。
- [60] 吴酩：《人民时评：“最后疯狂”，给政府“公司化”添加新注脚》，载于“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0112933.html>，2009 年 09 月 25 日。
- [61] 曾德斌：《“三剂妙药”诊治村党组织“涣散症”》，载于“全国党建网”，<http://www.cpc1921.org.cn/jiceng/nongcun/2012/0730/25160.html>，2012 年 07 月 30 日。
- [62] 杜春华：《关于对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的思考》，载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117092/117104/7270066.html>，2008 年 05 月 20 日。
- [63] 《日本：自民党执政得靠农协帮忙》，载于“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o/2008-11-09/020714700184s.shtml>，2008 年 11 月 09 日。
- [64] 张立：《日本大选：各业界团体均支持自民党》，载于“中国日报网”，<http://>

/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2-12-13/content_7759187.html, 2012年12月13日。

[65]黄立俊：《日本明日宣布加入 TPP 谈判 农业利益最敏感》，载于“第一财经日报网”，<http://www.yicai.com/news/2013/03/2553351.html>, 2013年3月14日。

[66]石仲泉：《“执政能力”概念是怎样提出的》，载于“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4/2004-09-20/26/486083.shtml>, 2004年9月20日。

[67]中共潍坊市委组织部课题组：《常委分工负责 地方党委换届后的重要制度安排》，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9/13/content_5085235.htm, 2009年9月13日。

[6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新华网”，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_12.htm, 2012年11月19日。

[69]马海燕：《党员“新面孔”渐多对中共和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载于“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11-05/4301239.shtml>, 2012年11月5日。

报纸杂志类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第1版。

[2] 《河北徐水县成立人民公社》，《河北日报》，1958年8月22日。

[3] 中共中央委员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6日第1、2版。

[4] 《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7日第1版。

[5] 《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第1版。

[6] 谭震林：《推荐河北省徐水县的几个主要经验》，《中国农报》，1958年第5期。

[7] 人民日报社论：《徐水创造了好经验》，《人民日报》，1958年3月11日。

[8] 《徐水县在生产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河北日报》，1958年4月1日。

[9] 《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人民日报》，1958年4月17日。

[10] 《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人民日报》，1955年9月20日第2版。

- [11] 《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畅谈农村中兴修水利的高潮》，《人民日报》，1958年2月7日第3版。
- [12] 李葆华：《水利运动的新形势》，《人民日报》，1958年6月23日第2版。
- [13] 傅作义：《印度扩张主义者在西藏叛乱中扮演了很不光采的角色》，《人民日报》，1959年4月24日第3版。
- [14] 顾阿桃：《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北京周报》，1967年第33期。
- [15] 林胜淡、陈春火：《乌坎村——一颗璀璨的“滨海明珠”》，《汕头日报》，2008年11月21日。
- [16] 张建锋：《乌坎密码》，《经济观察报》，2012年6月11日第034版。
- [17] 吴丽玮：《乌坎土地纠纷与宗族之争》，《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49期（总第660期）。
- [18] 《朱明国走访乌坎村 称给村民的承诺不会变》，《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23日，AA10版。
- [19] 《乌坎村今年2月第五届村委会换届 选举整体无效》，《南方日报》，2011年12月29日第A15版。
- [20] 温铁军：《“土地私有化”不是中国农村的未来方向》，《环球企业家》，2008年7月5日第13期。
- [21] 张周来：《走进“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40期。
- [22] 《“白猫黑猫”开启了思想之门》，《信息时报》，2008年12月12日A27版。
- [23] 庾康、徐明泽：《村级“公司化新政”的价值追问》，《新华日报》，2009年11月2日A2版。
- [2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09月27日第1版。
- [25] 钟美兰：《村支书跨村任职 越西“问题村”有了带头人》，《四川日报》，2013年06月27日第19版。
- [26] 樊平：《“老板村官”日益增多》，《当代广西》，2004年第11期。
- [27] 谭飞、赵锋：《老区“富人治村”现象解读》，《瞭望》，2004年第25期。
- [28] 李存才：《公共服务解民忧 一事一议暖民心》，《中国财经报》，2012年04月14日第1版。

- [29]刘华：《日本农业罹患“富贵病”》，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1期。
- [30]魏星、叶娜：《十举措筑牢稳定“第一道防线”：我省要求在维稳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江西日报》，2012年02月27日第A01版。
- [31]《中共中央加强改进新形势下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9年09月28日01版。

档案、地方志及文件汇编：

- [1] 《湖南组织报告（5月～8月）》（1927年9月5日），载于《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省委文件）》（1927年）甲5，北京、长沙：中央档案馆、湖南档案馆，1984年版。
- [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 [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 [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 [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 [6] 河北档案馆：《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 [7] 河北省徐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徐水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 [8] 瀑河水库施工指挥部：《关于施工前的工作安排意见》，1958年2月25日，徐水县档案馆。
- [9] 中共徐水县委办公室：《关于完成水库情况简报》，1958年1月9日，徐水县档案馆。
- [10]张国忠：《全面整顿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深入开展农业增产竞赛运动，为胜利实现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粮棉增产计划而奋斗——张国忠同志在中共徐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徐水县委办公室印，1956年3月26日，徐水县档案馆。
- [11]中共徐水县委：《中共徐水县委关于执行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

- 展纲要（草案）的规划（草案）》，1956年3月27日，徐水县档案馆。
- [12]瀑河水库指挥部：《徐水县瀑河水库工程计划方案》，1958年1月，徐水县档案馆。
- [13]瀑河水库指挥部：《水库修建前准备工作进行情况的报告》，1958年1月31日，徐水县档案馆。
- [14]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瀑河水库施工情况的总结报告》，1958年4月4日，徐水县档案馆。
- [15]瀑河水库施工指挥部：《瀑河水库施工以来的情况》，1958年6月8日，徐水县档案馆。
- [16]瀑河水库指挥部：《领导挂帅，骨干串连，人人立志宣誓，队队干劲冲天，群英大闹决战旬，奇迹迎接红五月》，1958年4月20日，徐水县档案馆。
- [17]徐水县瀑河水库指挥部：《关于政治、文化、宣传工作的总结》，1958年4月30日，徐水县档案馆。
-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 [19]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 [20]中共徐水县委：《关于在麦收前进行麦田点种间作和政治教育工作向地委的报告》，1957年5月10日，徐水县档案馆。
- [2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 [25]中共中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3年版。

[27]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1949～1952)》(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外文文献

[1] Karl Deutsch .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5, 1961.

[2] Cameron, David R. “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36, No.1. 1974, pp.138～171.

[3] William A. Darity Jr. (Ed.).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nd edition) Vol.5, Detroit: Thomson/Gale, 2008, pp.213～215.

[4] Sumit Ganly. Explaining the Kashmir Insurgency: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c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2, 1996.

[5] Stefano Bartolini.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European Left, 1860～1980: The Class Cleav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Cano, Gustavo Hernández. “The Chicago-Houston Report: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Mexican Immigrants in American Cities”, <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5h93g1gk>, 2002-10-30.

[7]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8]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rologue.

[9]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 and Society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 Xu Wang. “Mutual Empowerment of State and Society: Its Nature, Conditions, Mechanisms, and Limits”, *Comparative Politics*, Jan.Vol.31, No.2, 1999.

[11] Wai Fung Lam.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Public Agencies and Coproduction: A Study of Irrigation Associations in Taiwan”, Elinor Ostrom. “Crossing t-

- he Great Divide: Coproduction, Synergy and Development”, both in Peter B. Evans (Ed.). *State-Society Synergy: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pp.11-47; pp.85-118;
- [12]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3]David Easton, Jack Dennis.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rigi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9.
- [14]Philip C.C.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5]Karl W. Deutsch.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New York: Free Press, 1966.
- [16]Karl W. Deutsch.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how people decide their f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ress, 1974.
- [17]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3, No.4, 2001.
- [18]加々美光行：『中国の新たな発見』，東京：日本評論社，2008 年第 2～38 ページ。
- [19]金野純：『建国初期中国社会における政治動員と大衆運動——「三反」運動と上海社会（1951～52 年）』，『アジア研究』，Vol.51, No.3, 2005。
- [20]高橋伸夫『党と農民——中国農民革命の再検討』，東京：研文出版社，2006 年。
- [21]天児慧：『現代中国政治変動論序説』，東京：財団法人アジア政経学会，1988 年。
- [22]竹内実：『人民公社史』，東京：平凡社，1972 年。
- [23]桜井誠：『米価政策と米価運動』，東京：全国農業協同組合中央会，1977 年。
- [24]田中豊稔：『生きている農協史』，東京：家の光協会，1976 年。
- [25]小倉武一：『食糧管理の彼方』，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81 年。
- [26]田中豊：『日本の農協——農協二十年側面史』，東京：社団法人農協協会，1971 年。
- [27]大森真一郎：『米価政策史』，東京：三一書房，1960 年。
- [28]全国販売農業協同組合連合会編：『昭和二十四年産米に対する米価運動の

経過：米価審議会活動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全国販売農業協同組合連合会，1949年。

[29]功刀俊洋：『1950年代の知事選挙（1～5）』，『行政社会論集』，13(3)、14(3)、15(1)、16(1)、16(4)。

[30]石渡貞雄：『日本農業年報第32集 農民と選挙』，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4年。

[31]猪口孝、岩井奉信：『「族議員」の研究——自民党政権を牛耳る主役たち』，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87年。

[32]山下一仁：『農協がTPPに反対する本当の理由—農業人口250万人なのに異様な政治力』，『WEDGE Infinity』（ウェブ），<http://wedge.ismedia.jp/articles/-/2619>，2013年03月08日。

[33]協同組合経営研究所：『農業協同組合制度史（第1巻）』，東京：不二出版株式会社，1967年第177～227ページ。

[34]合田公計：『GHQ占領史の農業協同組合』，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8年。

[35]合田公計：『GHQ日本占領史——農地改革』，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7年。

[36]福武直：『日本の農村』，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

[37]農政調査委員会：『農業補助金の構造』，東京：不二出版株式会社，1965年。

[38]広瀬道貞：『補助金と政権党』，東京：朝日新聞社，1981年。

[39]升味準之輔：『現代政治1955年以後（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

[40]北出俊昭：『食糧制度と米価』，東京：農林統計協会，1986年；

[41]協同組合経営研究所：『農業協同組合制度史（第2巻）』，東京：不二出版株式会社，1968年。

[42]栗原百寿：『現代日本農業論』，東京：青木文庫，1961年。

相关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10月28日修订）

[2]《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2010年12月1日修订）

[3]『農業協同組合法』（最終改正：平成二四年九月一二日法律第八六号）

致 谢

逝者如斯，今年是进入爱知大学读书的第六个年头。应该说，这六年是我一生中难以磨灭的时光。这篇论文也算是为此段的学习生涯作结。

非常荣幸，我能够成为加加美光行教授的学生。加加美先生从事中国研究四十余年，他倾注了极大的精力研究中国，也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在日本留学的一年间，能够聆听先生的教诲，并与先生作交流，让我醍醐灌顶、如沐春风。然而，先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学生的关爱。尽管先生从二十几岁起就开始和肾病作斗争，但是他从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中国研究，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虽然他因研究身体极度疲倦，然而仍亲自带领我们去欣赏京都红叶的如虹似火，领略奈良的古朴风情。这一切构成了我在日本留学的深刻回忆。回国后，已经有几年没有看到先生，期间也得知先生曾得中风的消息，由于不能前往探望，心中十分内疚。但是在每一次的通话中，我都能听闻到先生坚定的声音，也能感受到他乐观的人生态度，因而也自信与力量倍增。先生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还是通读了本篇论文。从先生身上，我明白了日语中“一生懸命”的真正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篇论文可以算是对先生的教诲与关爱的致敬。

本文初稿完成后得到了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燕山大学吴勇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吴新叶教授以及同门师兄黄俊尧副教授的指导，他们所提出的富有洞见的建议，使我的论文变得更加完善。对此，我表示真挚的感谢。

同时，还非常感谢加加美光行教授、高桥五郎教授以及三好章教授。他们在答辩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真知灼见，为我论文的完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指导。

在日本留学期间，我还得到了高桥五郎教授、马场毅教授、松冈正子教授以及张琢教授的帮助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在此，也感谢爱知大学 ICCS 的工作人员，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在日本的学习与生活无忧。特别感谢 ICCS 驻北京的殷凡老师，为我们办理了诸多繁杂的留学事务。一同留学的

九位同窗，在日本留学期间给予我诸多的帮助与支持，也向他们道谢。

还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黄丽丽。结婚一年以来，原本是新婚燕尔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刻，但是由于我的写作与工作而没有多少的时间陪她。妻子任劳任怨，她勤奋积极的生活和工作态度深深地鼓舞着我。岳父母在生活上的照顾，使我们没有了后顾之忧。远在北方的父母及小妹的关心，使我的生活充满温馨。我所能做的只有更加努力，以回报他们的支持。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李汉卿

2014年3月20日